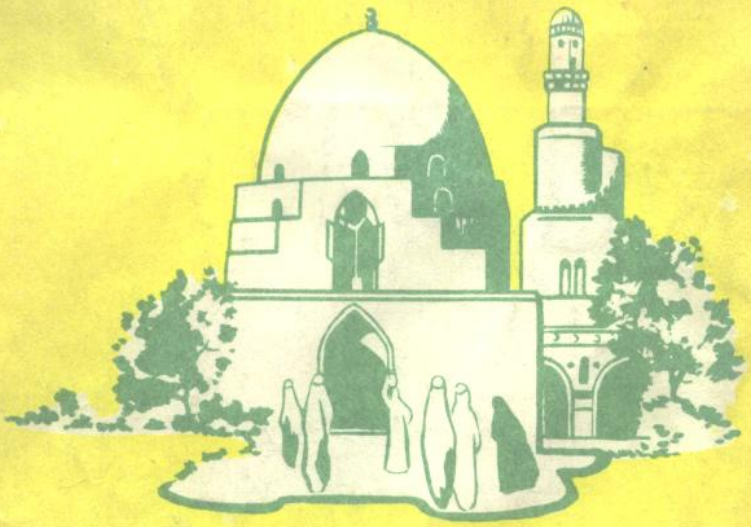
《参考消息》专辑7

穆斯林世界

العالم الإسلامي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参考消息》专辑之七

20015794

穆斯林世界

主　　编　杨效农

责任编辑　卓燕城

中共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编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57234

编 者 的 话

全世界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现近八亿，约占当今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这支力量的出现、存在和发展，对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和人类文化曾经和正在起着巨大的影响。

世界穆斯林的状况是研究当代国际关系、世界历史、社会文化和宗教问题的学者、专家们经常关心的一个课题，而往往又苦于材料不足。

这本专辑汇集了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外国记者、作家和学者研究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的部分成果，其中包括系列通讯、调查报告、专著文章等共二十多篇。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属于概况性质，介绍伊斯兰教的起源、发展和教派；第二部分介绍一些穆斯林聚居的国家和地区穆斯林社会的基本情况、风俗习惯、礼仪和生活方式；第三部分是关于当前穆斯林世界中出现的新动向，如伊斯兰复兴运动、原教旨主义、宗教狂热思潮和穆斯林兄弟会等等。这些文章的作者背景不同，观点各异，有些说法互相矛盾。我们本着提供研究资料之意，采取兼容并蓄的做法，如实介绍给读者。在编辑方面，前四篇属于概况，以后各篇按地理位置——南亚、中东、北非、欧洲——的顺序排列，只是为了便于阅读，并不具有内在的逻辑性。而从整体来说，这本专辑也不具有系统性。

这本专辑中部分材料曾在我们编印的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但所有材料都未公开发表过；有些则是首次刊登。由于编者、译者对于伊斯兰教、穆斯林问题缺乏专门研究，因此这本专辑中会有不少错误，希望并欢迎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我们改进工作。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美）戴维·K·威利斯（1）
伊斯兰世界 ……美《时代》周刊（32）
伊斯兰两大教派的来源
……（美）肯尼思·伍德沃德　雷切尔·马克（43）
穆斯林为什么勇于战斗 ……（美）唐·麦克里（46）
为了建立伊斯兰社会的亚洲穆斯林 ……（英）戈弗雷·詹森（51）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社会 ……塔希尔·苏尔蒂（59）
世界屋脊上的穆斯林 ……（科威特）法赫米·胡韦迪（64）
阿富汗与信仰复兴运动
……安瓦尔·穆阿扎姆　穆罕默德·艾哈迈杜拉（67）
阿富汗的穆斯林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77）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伊朗《新闻周刊》（79）
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斯兰教 ……詹姆斯·皮斯卡托里（84）
黎巴嫩的三派穆斯林 ……（美）海伦娜·科班（99）
黎巴嫩什叶派的存在和渴望 ……艾斯阿德·海达尔（105）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衰史
……（埃及）阿卜杜勒·阿齐姆·拉马丹（111）
埃及面临伊斯兰挑战 ……（瑞士）让—皮埃尔·阿达（190）
马格里布国家的原教旨主义
……让—路易·比歇　穆罕默德·塞勒哈米（195）
塞内加尔的穆斯林 ……（科威特）法赫米·胡韦迪（200）
苏联的穆斯林 ……英《经济学家》周刊特约记者（211）
苏联伊斯兰教问题的历史背景 ……（日）仓桥敏夫（217）
南斯拉夫科索沃的穆斯林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222）
英国穆斯林自办穆斯林学校 ……英《经济学家》周刊（231）
伊斯兰教在美国 ……（美）彼德·盖勒（233）
附：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和人口 ……（235）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　戴维·K·威利斯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访问埃及、巴基斯坦、英国等国后连续写的五篇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调查文章。

文章介绍了穆斯林遵奉的伊斯兰教的五功，以及伊斯兰教为穆斯林行为提供的规范和基础。

文章介绍全世界约有八亿穆斯林，分布在七十个国家。各国各地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不尽相同，伊斯兰习俗多种多样，有的差别很大。人们根据不同国家的传统与文化对伊斯兰各种原则有不同的解释。

作者在分析伊斯兰教同政治的关系方面时说，自一九六七年中东战争后，许多穆斯林学者都在辩论伊斯兰要求建立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伊朗革命等事件使这场辩论更为激烈。但是，各种各样的穆斯林思想家，无论是“现代派”的还是“正统派”的，都认为“没有民众参加的政府实际上是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和学说背道而驰的”。

作者对伊斯兰复兴运动进行了分析。在一般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务之急是“摆脱欧洲二百年殖民统治的影响，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他们认为，正是这种“纯洁性”导致最初在世界掀起伊斯兰高潮。

作者认为，伊斯兰教涉及的方面是广泛的，包括政治、社会生活和经济等。伊斯兰教近十年来在金融方面发起了挑战。穆斯林学者说，古兰经禁止人们拿固定利息。有些国家的银行废除了利息。然而这种做法遇到许多障碍。

除此之外，伊斯兰教还面临西方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发达的经济、主要是非宗教的观点等问题。】

（一）伊斯兰信念的基础——简单的原则复杂的规则

当埃及的身材高大、和蔼可亲的苏丹·阿布—阿里在哈佛大学研究经济学时，有人请他向其它班谈谈伊斯兰教问题。

他详细讲述了世界上三大一神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一千四百年的历史。现在大约有八亿人信奉此教。他谈到了这个宗教一千年前对数学、代数学、三角学和物理学所作的贡献。

他最近回忆说："当我快要谈完时，总有人提出一、两个相同的问题：'你有多少个老婆？'。"

一层面纱仍然遮盖着穆斯林世界的许多事情。

只有从伊朗到黎巴嫩的政治危机的大字标题才把它揭开。但是，它仍然不让西方人看到伊斯兰教的真面目。

当你向普通的北美洲人或欧洲人问到伊斯兰教（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服从"真主的意志）时，你立即得到的回答通常是否定的——暴力行动、一夫多妻或砍断窃贼的手。

据认为，穆斯林是"狂热的"，他们留着胡须，要么抬高石油价格，要么威胁西方的供应线路。

当你问到伊斯兰教的历史时，人们常常回答你说是《一千零一夜》的模仿、阿拉伯头饰、坐在锃亮的卡迪拉克牌小汽车里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谢赫和以前奥斯曼帝国衰落的昌盛。

当你要求对穆斯林进行一番描述时，你得到的将是对阿拉伯人或土耳其人的描述，尽管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今天生活在非阿拉伯、非土耳其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中国西北部和苏联中亚地区。当你想知道历史上五位著名的穆斯林的姓名时，你也许只能知道两位或者三位。

然而，伊斯兰世界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发生一些事件，这就迫使西方要越来越深入地注视面纱背后的事情。

这些事件是非洲、亚洲和阿拉伯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在被西方及其占优势的科学技术统治了两个世纪之后，为了谋求和维护它自己的特性而作出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充满西方报纸和电视屏幕的动乱看来是令人不安的、无休止的和好

战的：

• 阿亚图拉霍梅尼推翻了伊朗国王，尽管对后来的革命路线的看法存在着深刻分歧，但是这个行动仍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的西方化的非宗教统治者被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而不是被更通常的政变或者暗杀推翻的少数几个例子之一。

• 伊朗和伊拉克的历时四年的战争威胁着海湾的石油航道，分裂了穆斯林世界，使超级大国感到不安并把伊朗青少年派到战场上去。这些

“尽管许多人根本不做礼拜，而且泛伊斯兰运动的思想几年前就熄灭了，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穆斯林的确想把自己看作世界范围的信徒的一部分。”

施莱弗先生说：“这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十分相似，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徒就把他们自己看作所谓的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

象苏丹·阿布—阿里（现在是开罗的一位经济学教授，他只有一位妻子）这样的穆斯林就对西方对伊斯兰教的无知和自十字军东侵时代以来就惧怕它的现象感到遗憾。

他说：“你们把你们的文化说成是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你们忽视了伊斯兰教，认为它是敌人，结果，咱们都受到了损失……。”

在他和其他穆斯林看来，不应该把遍布穆斯林世界的政变、独裁者、贫穷、文盲和贪污归咎于伊斯兰教。他伤心地说：“我们穆斯林只不过是没有充分实现我们的信念罢了。”

穆斯林说，把伊朗同伊拉克的战争归咎于《古兰经》的做法就如同把“允许”北爱尔兰基督徒之间的内战归咎于《圣经》一样。

但是，伊斯兰教就象基督教一样，是许多人用来证明他们想采取的几乎任何行动都是正确的的一种信念。

它还为先于它的传统的、部落的和种族的信仰留有余地。例如，在印度尼西亚——它的穆斯林在人口中占多数，是世界上穆斯林最多的国家，伊斯兰教是以神秘主义、泛灵论和村庄社会风俗（叫作印度尼西亚传统法律）为基础的。在雅加达，本记者同受过西方教育的爪哇穆斯林谈了话。他们仍然相信宝石能够避邪。

西方人（除了美国电台和电视台的福音传教士以外）普遍不公开自己的宗教信仰，并且认为在象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地方采取公开的虔敬行为是不合适的。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伊斯兰教是一种潜藏在世界三分之二较穷的人头脑中的一种中世纪宗教思想。

然而，伊斯兰教本身对宗教信仰和人们日常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事务不加区别。

今天，穆斯林和西方专家一样，都在争论伊斯兰教是否正在“复兴”，在伊朗国王垮台之后，推翻更加西方化的统治者，也许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

看来已经恢复了信仰的形式——留胡须、蒙面纱、筹集伊斯兰资金

（无息），尽管对一位外人来说很难说清这到底是虔诚，还是在殖民统治后的时期在维护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特性。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苏丹总统加法尔·尼迈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哈托和其他统治者看来都同样说不清。

在伊斯兰教中，如同在其它宗教中一样，观念与实践是互相冲突的。西方人赞成实践而谴责观念。许多穆斯林则对实践感到遗憾，而坚持他们自己的观念。

亚洲穆斯林——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认为，他们自己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比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更纯洁”。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掺杂了石油财富和唯物主义。

伊斯兰教是保守的和传统的，它把家庭置于人与人的一切其它关系之上。但是，对于许多年轻的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也是一种取代西方和东方文化的革命手段。

伊斯兰信念的基础是什么？

对于穆斯林来说，安拉（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眞主”）照着自己的形体长相用尘土造了人，使他能在正确和错误之间作出自由选择。安拉将在人的末日到来之际对他的一生作出审判。穆斯林认为，善人在人世间的所作所为将帮助他免进地狱，而升天堂。

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同犹太教以及正统基督教有许多共同之处。对他说来，眞主开始是通过亚当，接着通过摩西、亚伯拉罕和耶稣向人类启示的。古兰经对他们都作了赞扬和描写。据认为，他们都传播了伊斯兰教。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眞主的最后启示。在阿拉伯语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背诵”。穆斯林说，古兰经是在公元六一〇年到六三二年在麦加和麦地那通过报喜天使伽百利向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商人，父亲和领袖启示的。

穆罕默德不识字，他用阿拉伯语依次向家庭和朋友背诵了古兰经。古兰经的基础文本是在他于公元六三二年死后不久定稿的。所有穆斯林都接受这部文本。

古兰经是一本篇幅很长的书——全书一百一十四章，大约六千节。穆罕默德总共用了九十九个名词来称呼安拉——智慧、仁慈、宽大等等。

对于穆斯林来说，穆罕默德不是神，而古兰经却是神的信息。伊斯兰教中的古兰经不象基督教中的圣经。对于一位穆斯林来说，它的作用

同一位正统基督徒认为的耶稣基督这个人的作用相类似。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服从”就等于宿命论——“一切取决于安拉”。对于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它意味着使人类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服从安拉的永恒的意识。阿拉伯语中常用的一个短语是INSHALLAH——“如果眞主愿意的话”。

象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只承认一个神。它赞成犹太教的观点（不赞成正统基督教的观点），认为耶稣是人，不是神，并且否认存在三位一体和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记载。

穆斯林称耶稣为“仁慈的先知”。他们不认为神变成了人，也不认为在十字架上能赎罪。（人们普遍所持的一个传统看法是，倒是法利赛人和罗马人成了“被错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大。）

耶稣被称为伊萨·伊本·马里亚姆——耶稣是玛利亚生的。古兰经记载了圣灵感孕的故事（丝毫未提约瑟）。它谈到，耶稣治愈了残废人，使瞎子恢复了视力。据认为，穆罕默德沒有任何奇迹（在民间流传的穆斯林传说中的除外）。古兰经既沒有记载十戒，也沒有记载耶稣登山训众的福音。据认为，穆罕默德不仅是一位宗教领袖，也是一位世俗领袖，这一点与耶稣不同，而同摩西及亚伯拉罕相同。他率领军队参加战斗，把一个城邦扩大成一块较大的领土，并且裁决爭端。

在伊斯兰教的第三世纪（大约在九世纪），门徒们把穆罕默德的朋友和家庭所记载下来的话编成六本公认的传说集，或者叫作圣训。

人们并不认为圣训是神圣的，实际上，穆斯林门徒也承认，其眞实程度不等。

其中有一些得到了三名目击者的证明，一些只有一个人证明。这六本传说集加上对他的功绩的记载一起构成伊斯兰教教规的传统部分，或者叫“常规”。

因此，接受它们的穆斯林多数派的名称叫逊尼派。

穆斯林主要少数派是什叶派——主要是生活在伊朗、伊拉克、黎巴嫩、海湾国家、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八千万到九千万穆斯林。

什叶派赋予他们的伊马姆（宗教领袖）的政治权力比逊尼派赋予伊马姆的政治权力大，这更多的是从基督教牧师的意义上讲的。

什叶派认为他们的领袖是根据眞正的伊斯兰权力行动的，他们说，

伊斯兰权力不是通过头三位伊马姆降示，叫他们接替穆罕默德的，而是通过第四位，即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并且是通过阿里的儿子侯赛因降示的。他们计算了总共有十二名名副其实的伊马姆。

侯赛因在公元六八〇年的战斗中因寡不敌众而被打死。什叶派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烈士，并且怀着激情来纪念他的死亡。他们看到在第十二位伊马姆不知何时重返地球之前，现代伊马姆正在掌管着地球上的权力。

从神学上讲，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并不大。几个世纪以来，分歧一直潜伏着。但是，自从一五〇二年以来，什叶派在波斯国（伊朗）已成为多数，阿亚图拉霍梅尼是那里的一大批政治上强有力的伊马姆中最新的一位。

古兰经（逊尼派和什叶派都接受）没有记载同创世纪第一章中所记载的创世故事相类似的任何东西。它一开始就讲安拉用尘土创造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夏娃。据说，他们都已无罪了。

据记载，安拉要求他的众天神向他们叩头。据说，唯有易卜劣厮（后来被称为恶魔）不肯，理由是，他是火做的，而亚当只是尘土做的。于是安拉把易卜劣厮赶了出去，但是给了他引诱男人的能力和在任何时候统治任何男人的权力——除非他们信了。

古兰经说，是易卜劣厮说服亚当和夏娃一起偷吃了辨别善恶之树上的禁果。对于一位穆斯林来说，这个魔鬼是确实存在的。

穆斯林认为，他的生命和财产都是安拉赐给的，将用来上供眞主和帮助别人。自杀是被严格禁止的。也严格禁止火葬，因为必须通过土葬“把尸体还给眞主”。

所以，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是既简单（一个眞主，一个最后的先知）又复杂的（是墨守法规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教规和解释）。

在一些方面，它更接近于犹太教而不接近正统的基督教，这些方面就是：耶稣不是神，不是三位一体，有得到法律承认的学问和关于饮食的规则。

伊斯兰教同意正统基督教关于存在来世和末日审判的说法，但是相信耶稣是不会死而复生的，而完全是由上帝接上天的。

在伊斯兰教逊尼派中，伊马姆完全是博学多识的人，他可以在星期五聚礼时领拜（穆斯林的安息日）。伊马姆不代人向眞主祈祷，尽管什

叶派认为伊马姆代人向眞主祈祷。

巴基斯坦官员沙法克·哈什米说，“对于我们逊尼派来说，是直接与眞主通话的。而什叶派则要通过接线员。”

所以，伊斯兰教是保守的和墨守传统的幷将家庭置于人与人的其他一切关系之上——但是，对于许多比较年轻的穆斯林来说，这也是一种取代西方和东方文化的革命手段。伊斯兰教是公有的，拘泥于宗教仪式和苦心修行的——什叶派教徒和许多追随兄弟会中个别教长的逊尼派教徒都狂热地加以实施。

埃及的纳比尔·奥斯曼说，“伊斯兰教谋求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保持平衡，这对保持人类的均势是同样重要的。”

几乎所有的穆斯林遵奉的伊斯兰教的五功是：

1、宣讲只有一个眞主，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

2、每天晨、晌、晡、昏、宵五次礼拜。

3、在斋月里，白天斋戒三十天。

4、在一生中，至少前往麦加朝觐一次、朝觐的中心是天房。

5、完纳天课。一种每年向穷人布施的百分之二点五的课税。

每一项功课都具有其内在的含义。数百万穆斯林都很清楚（斋戒是洗罪和顺从，同时许多人说眞正的天房是人的心）。还有成百万的穆斯林完全是遵守表面的形式。

（二）世界各地穆斯林的生活习惯和传统文化色彩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妇女不许开汽车，不许参加工作，不许沒有家里男成员的陪同只身出外旅行。

她在公共场合出现必须穿黑色拖地长袍，头蒙黑纱巾（以遵循古兰经的训谕：妇女必须在公众面前保持端庄淑静，如一位学者所谓的省得吸引“男人的贪婪目光”）。

传播德行和禁止恶习委员会的蓄胡子男子每天数次上街巡逻。他们敦促商店在伊斯兰聚礼时全部关门停止营业。

根据这样的一些事实，西方人认为，在伊斯兰教方面，妇女总的来说是二等公民，幷认为伊斯兰是以七世纪的实践为基础的，那种实践同现代世界几乎毫不相干。

西方人略知一点伊斯兰法的惩罚（伊斯兰法以古兰经、传统和法理学为基础，包括凡已婚女子与人通奸就要处以死刑，偷盗者要剁手等等）。加上西方人还相信，穆斯林男子每人自然地有权娶四个妻子。因此西方人对穆斯林习俗的厌恶心理加深了。

这种厌恶情绪加深了隔阂，使西方不能充分了解穆斯林世界的想法，而目前伊斯兰世界拥有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共七十个国家和八亿人口，他们正在越来越不安静地寻求他们自己的第三世界特性。

但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法根本不是象远远看起来那样简单。

·在同沙特阿拉伯隔一个红海的埃及，穆斯林妇女可以不带面纱出外活动。她们在解说古兰经方面比较开明，认为妇女可以在出入公共场所时以不袒胸露臂、不穿露腿的短裙而保持端庄。在波斯湾东边的巴基斯坦，特别是在世界性都市卡拉奇的妇女也是这样。在那里，表明情况已有变化的证据是妇女给国家航空公司的驾驶员上课；四百名穿着整整齐齐制服的女子在一所政府办的职业学校修理电视机、设计公寓和为电动机重新接电线。

·古兰经本身沒有说到过面纱问题，它说在眞主眼里妇女和男子一样都是平等的。但是它确实要求妇女要庄重，认为她们所起的作用不同于男子。文化和部族的风俗习惯以伊斯兰的名义使许多妇女与世隔绝，而有的传统则并不这样。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那里的穆斯林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妇女不必带面纱（在西苏门答腊的一个地区是母权制社会）。在印度尼西亚出现的伊斯兰是属于温和的沙斐仪学派，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比较保守的伊斯兰很不相同。

·巴基斯坦的妇女是在家里做日常的礼拜的，许多较小的清眞寺根本沒设供妇女在穆斯林聚礼日（每星期五）做礼拜的地方。在埃及与印度尼西亚，妇女是去清眞寺做礼拜的，尽管她们不与男子坐在一起做礼拜。

·在伊斯兰世界里受过西方教育的妇女好像很乐于返回伊斯兰世界。有些人说，她们接受伊斯兰世界的教规是作为抛弃在很大一部分西方的广告、服装、娱乐和举止行为方面强调女性诱惑做法的小小代价。有的则喜欢西方式自由。

开罗一位伊斯兰学者的女儿纳迪亚说："我喜欢用头巾蒙住我的头

发，我喜欢穿伊斯兰服装（盖住肩膀、手臂和双腿）。我并不觉得受到限制。如果我想按我自己的意思办，我可以通过同父兄讨论来实现。”

在伊斯兰堡，穿一身雅致的粉红色巴基斯坦服装，在牛津大学上过学的雷哈纳·海德尔说：“巴基斯坦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妇女当然自由些了。”她本人在当地的联合国办事处就有一个称心的工作，但对她的规定是，不许同男青年约会。她说：“我们的社会是理解不了这一点的。”

·不论古兰经还是伊斯兰法都没有规定人们可以自动重婚，或是对偷盗者剁手，把通奸者处死。

在一个由于战争使麦加和麦地那的妇女多于男子的时期，古兰经说，一个男子可以娶四个妻子——如果他能公平地对待她们的话。一种看法是，古兰经关于这个问题的主要条文目的在于保护孤儿。

在有些国家里，民法禁止一夫多妻，除非第一个夫人允许。穆斯林学者指出，古兰经里有一节实际上禁止娶两个以上妻子，因为它说，男人不可能平等地对待他所有的妻子，不管他“是多么想这样做”。

根据伊斯兰法，男子仍然只要声明一下就可以跟妻子离婚。但是在巴基斯坦，必须让当地政府委员会有机会先对这一对夫妻进行调解。还有些国家也给男子设置了同样的障碍。如突尼斯就根本禁止只要声明一下就能离婚的做法。妇女也有权提出离婚，尽管她们必须利用特殊的伊斯兰法庭。

虔诚的穆斯林也知道，据说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眞主所允许的所有行动中，离婚是最不能令人接受的事。

家庭关系在伊斯兰教里是极其牢固而不是淡薄的。

至于通奸和盗窃，必须要有具有说服力的眞凭实据，而处以死刑、剁手以及鞭笞，现在在许多国家里已很少见。

在近代史上，不论是埃及还是巴基斯坦都已不再实行这类惩罚。但是在沙特阿拉伯是确实实行的。（沙特阿拉伯的公主米沙因通奸罪而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在吉达被枪决，她的情夫被杀头。）开罗的伊斯兰法首席法官加迈勒·马哈茂德说，如果要处死一个犯有通奸罪的已婚者，需要有招供（据说就沙特阿拉伯公主的案子而言是得到了招供的）或四个亲眼目睹的公正信徒作证，“要四个证人是不可能找到的。同时凡提供伪证者可能遭鞭笞”。

剁掉一只手，必须有两个信徒作证，必须是超出十一项限制之外。如果偷盗了家庭内部的东西，如果偷盗物品的价值不到十七克黄金（以今天的价格计算为二百零六美元），如果是物主沒有能适当保护好物品而引起被盗，有这些情况就不得剁手。如果有证据证明盗窃是因饥饿造成的，那就应由沒能提供足够食品的当局负责。

在苏丹，尼迈里总统试图在全国各地强加伊斯兰教，最近已经有些人因盗窃等罪名而被剁了手脚。在印度尼西亚，人们认为这种惩罚是象征性的，法律制度是以拿破仑一世的法典为基础的。

与伊斯兰原则截然不同，伊斯兰习俗多种多样，差别很大，而且还有种种限制。

人们根据不同国家的传统与文化沒完沒了地解释各种伊斯兰原则。古兰经和伊斯兰法被一再地援引来论证相反的观点。

在沙特阿拉伯，国王和出租汽车司机的墓葬是一样的规格，都是只用一块墓碑，这叫做汉巴利法（汉巴利是某教长的名字——编者注）。但是在埃及，它的法老在四千七百年前修建了金字塔，现在家家戶戶仍然爭着精心修建陵墓。伊斯兰教对此幷不禁止。

在利雅得，如果有人在斋月白天当众进食而被逮住的话，就可能要挨揍。在开罗，埃及人吃与不吃，悉听尊便。

古兰经尤其禁止喝酒和吃猪肉，但幷沒有规定惩罚的法律条文。古兰经禁止穆斯林做任何有害于身体健康的事，所以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戒烟，尽管这点在古兰经里幷沒有明文规定。

然而，西方人士在拿自己关于自由、平等、民主以及法治的价値标准跟伊斯兰法相比较时，对伊斯兰法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

例如西方对伊斯兰妇女的看法，由于有基督教欧洲（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波兰）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的传统保守主义而得到了加强，那些地区仍然很象欧洲中世纪时期那样让妇女与世隔绝。

不过虔诚的穆斯林拒绝西方式的妇女自由与“平等”。她们宁愿要她们所认为的伊斯兰对建立在衡平法、遗产法和其他合法权利基础上的妇女地位所给予的牢固保证。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对妇女的看法是守旧的，认为妇女应谨慎谦让，当贤妻良母和好管家。

文静的肯尼亚妇女亚斯明·穆罕默德说：“我不希望与男子平等。”她是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女儿七岁，一个儿子五岁。家住内罗毕

的基贝拉地区。内罗毕有大批穆斯林。她说："男子是一家之主。我有我的权利——我也赞成计划生育。"

另一方面，甚至连《战斗的伊斯兰》这本书的作者戈弗雷·詹森等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也说，妇女肯定是从属者。

在巴基斯坦有一种说法："对伊斯兰可以容忍，但是对穆斯林不可容忍。"

在埃及与巴基斯坦的农村，妇女的文盲率大大高于农村的男子，有人说，这应归咎于伊斯兰教，有的则认为这是第三世界的常见现象。

沙特阿拉伯劝说公众严格遵守七世纪的标准，虽然批评家说，有钱的沙特阿拉伯妇女在国外则换上时髦的巴黎时装，在许多沙特阿拉伯人家里都有酒类饮料。

著名的穆斯林学者穆罕默德·扎基·巴达维在伦敦说：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男人的宗教。耶稣是作为一个男人降临的。

不过巴达维马上又为伊斯兰的立场辩护说："在穆罕默德之前，妇女在阿拉伯半岛毫无权利。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下，妇女几乎没有什么权利。伊斯兰教解放了她们。在英美妇女能够拥有财产之前的一千多年，伊斯兰教给了妇女工作、继承和拥有财产的权利。"

所以穆斯林世界是个似乎自相矛盾但确有道理的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巴基斯坦农村妇女是文盲。但是内阁秘书处妇女部研究主任萨比哈·哈菲兹正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她在自己办公室墙上标上古兰经的一句名言："妇女对男子拥有同男子对妇女一样的权利。"

两年前，伊斯兰学者试图阻挠妇女当法官或审判官。他们引了古兰经中的一句话说，审判时需要一个男子或两个女子作证，需要两个女子的原因是，一个女子可能健忘。

但是巴基斯坦联邦伊斯兰法庭否决了这一案件。首席法官阿夫塔布·侯赛因利用同一个古兰经驳斥了所有这些论点。

他说，是的，古兰经中有句话说，"男人是管女人的"——但是只在扶养者和保护人这个意义上是这样。这位首席法官以前曾认为，一个妇女在法庭作证是足以审理一个案子的。

今天，许多穆斯林不仅对他们所认为的伊斯兰法的稳定性和秩序感表示满意，而且还希望他们的世俗统治者也毫无保留地奉行伊斯兰法。穆斯林国家没有一个是彻底奉行伊斯兰法的，尽管伊朗、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和利比亚奉行伊斯兰法最严格。

巴基斯坦刚重新研究过自己的法律以使这些法律与伊斯兰法相一致，它在惩罚通奸犯、酗酒犯、盗贼和提供伪证者时奉行特殊根本法。巴基斯坦国每年要收缴天课，并将从一九八五年十月起免去国内银行利息。但是它仍然要在国外发行有利息的政府公债以筹集资金。

以拿破仑法为基础的埃及法规是背离伊斯兰法的，它允许放利息、买卖酒类和猪肉、买彩票和做期货交易。

苏丹总统尼迈里以实行军事管制来支持他的伊斯兰法典。哈桑·陶拉比等顾问为他辩解，有的人则认为他使用伊斯兰法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

首席法官阿夫塔布·侯赛因在伊斯兰堡会见记者时说，伊斯兰法比西方的法律要积极，例如，双亲不能剥夺孩子的继承权。

按逊尼派穆斯林的习惯，独生女必须与侄子以及其他亲属分享遗产。对少数派什叶派和他的法典来说，由独生女儿继承全部财产。

继承法规定得明确而不言而喻。在伊斯兰堡某家的饭桌上，父亲毫不迟疑地用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法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把财产分成四十份，两个儿子各得十六份，女儿则得八份。

但是仍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巴基斯坦伊斯兰意识形态委员会刚向政府提出意见说，人为的节育是违背伊斯兰教的（并且所有穆斯林男子都应当蓄胡子）。在人口有一亿六千万的印度尼西亚，情况恰恰相反。政府本身提倡实行了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计划之一。在爪哇，在十五岁到四十四岁的夫妇中实行节育的达百分之六十六。

在雅加达，计划生育主要协调人哈约诺·苏约诺博士说："穆斯林国家是能实行计划生育的，我们就是证据。"

信奉伊斯兰对穆斯林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来自各国、各城市和村庄的答复也就各不相同。

在英国伯明翰学习的一位马来西亚学生纳比赛·易卜拉希姆说："伊斯兰是我所属的，也是我为之而生的。我首先认为自己是个穆斯林，其次才认为是个马来西亚人。"

埃及外交官纳比尔·奥斯曼说："伊斯兰对我来说是一种承诺，首先是坚定的信念。真主对我来说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通过物质表现就解释不了这种力量。"

印度尼西亚的内阁部长埃米尔·萨利姆在雅加达说："关键是使宗教和物质生活平衡——我现在在这里生活是为来世作准备，是为永恒的生命获得信任分数的一种办法。"

（三）伊斯兰允许或要求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

在第三世界的历史中，这些情景即使以前有过可以与之相当的，那也是很少的。

这些情景所产生的异乎寻常的作用是如此之大，那些经历过的人至今一想起来仍然连连摇头。

在苏联的一个幅员辽阔、具有战略地位的邻国的首都，每天都有一百多万人摩肩接踵地拥上街头。他们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一句口号。这句口号响彻这个首都的大街小巷，把世界上武器最多的亲美统治者之一赶下了台。那就是：

"眞主最伟大。"

五年后的今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仍然使西方和东方惴惴不安，也使穆斯林世界本身产生分裂，惊愕不已。

除了对波斯湾石油供应线的威胁以及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以某种方式最终在损害西方利益的情况下捞到好处这两点以外，目前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有：

在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在伊朗的穆斯林当中，有什么因素是人们认为促使伊朗发生革命，并使这场革命持续的时间比它的批评者原来所料想的长得多，即使在伊朗和伊拉克长期交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的？

这些因素是否会以难以计算的影响扩散到其它穆斯林国家，如果群众再起来反抗不信教的西方化统治者的话？

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的非伊斯兰因素，即贫穷，人口迅速增长，城市中的贫民窟迅速增加，出口太少，进口太多，债台高筑等等。

但是，这个问题同许多国家的穆斯林学者正在进行的深入而重要的辩论也有很大的关系。他们辩论的问题是：伊斯兰允许或要求建立什么样的政府。

这场辩论是在阿拉伯国家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打败之后展开的许多

辩论之一。伊朗发生的情况对这场辩论起了刺激作用。后来的事态发展，包括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穆斯林反抗力量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军队，黎巴嫩的动乱以及沙特阿拉伯越来越努力反对伊朗等等，使这场辩论变得更加激烈了。

对这场辩论的情况西方还不甚了解。

然而，越来越多的统治者现在不得不想方设法地应付伊斯兰教对民众的感召力，而在各种各样的穆斯林思想家——无论是现代派思想家，还是正统派思想家——中，越来越多的人则强调，在他们看来，没有民众参加的政府，实际上与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遗训和学说都是背道而驰的。

伊朗加剧了伊斯兰世界那些西方化、不信教的统治者、军人、独裁者和国王进退维谷的处境：他们是应该同伊斯兰教的感召力妥协，还是应该在公共事务方面对伊斯兰的感召力只是说说而已。

（沙特家族的做法是独一无二的。它试图同时骑两匹马：一方面迅速搞西方化，但在国内又采取伊斯兰的正统作法，同时还大规模地反对伊朗，亲逊尼派的正统宣教士努力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以及美国和欧洲宣教。）

埃及一位知名人士在开罗说："我们穆斯林在精神上是强大的，但在治理上却是软弱的。"他马上要求记者不要透露他的姓名。

什叶派穆斯林的思想在伊朗革命中的作用：

这场革命为什么不象通常的那样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或政党领导？这场革命为什么没有得到其中哪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

这场革命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生，在于伊朗国王本人犯了一连串的错误：他专横跋扈，采用西方方式，他的特工人员心狠手辣，他的官员贪污腐化，他利用石油资源的方式使人们的幻想破灭而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这场革命的基础、形式和言词却深深地植根于伊斯兰什叶派，植根于一五〇二年以来它在伊朗国内的发展。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一五〇二年成为这个波斯国的国教的。

世界上的穆斯林，大多数属于逊尼派，就是说，他们信奉古兰经（据说，古兰经是神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和圣训（他的其他遗训和传统）。圣训连同关于他的行动的说明，组成了伊斯兰教教规的传统部分。

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少数派——总共大约八千万人——承认古兰经，但是他们对传统教规的看法却略有不同。他们认为穆罕默德的权力——俗权和教权——只是通过他的女婿阿里、阿里的儿子哈桑和侯赛因以及随后一代接一代的伊马姆（总共有十二人）才传下来。

什叶派的名字出自阿拉伯文的阿里或“阿里的信徒”一词。

什叶派穆斯林由于信奉阿里和他的儿子，因此具有两个极其重要的特点：

一、他们有殉难精神；二、有一个在政治上的活跃的宗教领导班子，据说，现任的宗教领导人的讲话有一种神授的权威。

殉难的意识可追溯到侯赛因时代。穆斯林说，侯赛因是在公元六八〇年率领一小批人同倭马亚王朝的一支有很大优势的部队交战时殉难的。

据著名穆斯林学者、在柏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波斯语和伊斯兰教研究的哈米德·阿勒贾尔教授说，在什叶教派看来，侯赛因是最高的殉难者，是人同暴力斗争的象征：“人的一生，每一天都是战斗的一天，在战斗中必须要么取胜，要么殉难。”

印度什叶派教徒、目前在英国伯明翰伊斯兰教研究中心执教的哈桑·阿斯卡里教授说：“什叶派的教义完全是关于反抗权威、殉难和不断造反的。”

因此才有那么多包括青少年在内的伊朗人显然准备在同伊拉克的战争中为国捐躯。因此，阿亚图拉霍梅尼才在阿里墓和侯赛因墓的所在地伊拉克度过了大部分流亡生活。因此，在伊朗、伊拉克、海湾、沙特阿拉伯东部、印度以及其它地方，每年都有千百万什叶派教徒到街上痛哭流涕，哀悼侯赛因的殉难。

当代伊马姆的政治权力来源于这样的信念，即第十二个，也是最后一个“真正的”伊马姆于公元八七四年在叙利亚北部，在人的视线里消失了。据说，他将一直“隐伏”下去，直到在遥远的将来在某个不为人所知的时候返回尘世之后，人才能见到他。

阿勒贾尔教授在文章中写到，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逊尼派穆斯林也认为，在个人的经历中，伊斯兰教和政治是连在一起的，但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伊马姆是在世俗的统治之外。他们承认穆罕默德的权力是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由第一任哈里法依次传给第

二任和第三任哈里法，只是在第三任哈里法死后才传给阿里。按正式说法，阿里是第四任哈里法。

在逊尼派穆斯林看来，逊尼派的领导权此后便落到设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历代王朝的非宗教统治者手中。这些王朝不断扩张，先后扩张到北非、西班牙、土耳其、伊朗，向东扩张到印度。这些王朝后来终于被蒙古人，接着又被土耳其人征服。在此后的几百年中，这些王朝日益衰落，并为欧洲人所控制。一九二四年，土耳其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废除了哈里法的职位。

逊尼派是易于接受俗权统治的，而什叶派则不同。阿勒贾尔教授说，什叶派认为，只有第十二个伊马姆才有眞正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什叶派在尘世间的领导人物是他的摄政者。

波斯的什叶派说，必须宣布非宗教统治是非法的。在第十二个伊马姆返回尘世之前，只有在伊斯兰法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并由高级阿亚图拉（这个头衔的意思是“眞主的象征”）实行有效的统治，这个国家才是合法的。在波斯，数百年来，什叶派的伊马姆不参加政府，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于一九六三年开始抨击前国王的西方方式。他当时反对，现在仍然反对美国（“头号撒旦”）以及苏联（“二号撒旦”）的非宗教影响。

当伊朗的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他有在伊朗的什叶派的另一个方面可以依靠，那就是什叶派的基层工人组织以及信徒们捐献的大笔资金。

乡村中的大约十八万名清眞寺的阿訇——他们都是在库姆的宗教中心培训出来的——迅速传播这位阿亚图拉发出的文告。他的文告是在巴黎录音，或者通过电话传到伊朗城市的。

另一个因素是：许多大学生的心都被已故阿里·沙里亚提打动了。沙里亚提是伊朗人，从巴黎索邦大学得到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把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不能解答的问题，在伊斯兰教中都能找到答案。

今天，诸如英国穆斯林学会会长卡利姆·萨迪基这样的亲霍梅尼人物打破了西方通常进行的那种批评，并指出，自一九七九年以来，伊朗已经举行了九次选举和公民投票，新的国民议会已初具规模。

接着实行了伊斯兰法。银行被迫放弃利息。萨迪基博士说，尽管据

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西方估计的通货膨胀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中产阶级很不高兴以及同伊拉克的战争消耗了人员和经济，但大多数人仍然支持这场革命。

在开罗的一位传统的穆斯林学者说："我不喜欢这样打仗，也不喜欢革命卫队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不得不说，霍梅尼虔诚、眞挚、为人朴实无华……。"

一位巴基斯坦外交官说："你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伊朗所做的是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搞群众运动，而不是政变，而且是见效的。"巴基斯坦正设法在这场战争中保持中立。

设在纽约的全国教会理事会中东分会会长查尔斯·金布尔说："人们可以对正在发生的各种情况持保留态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大多数伊朗人都希望背离西方和东方，希望表明，在二十世纪有一种伊斯兰方式……这场革命在某些方面是艰难痛苦的，但却充满了活力，西方对这场革命所知甚少……。"

另一方面，开罗爱资哈尔清眞寺（大学）保守的阿訇在同本报记者谈话时说，伊朗几年前就应该同意停火。这位阿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逊尼派穆斯林领导人之一。现代派伊斯兰学者一致认为，许多人最初对这场革命表示欢迎，而今却认为这场革命"越来越背离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开罗的艾哈迈德·沙拉比就是其中之一。

这场革命是能够输出的呢，还是仅仅是在波斯什叶派穆斯林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连在邻国伊拉克占多数的什叶派教徒都不能唤醒的呢？

在伦敦出版的《阿拉伯周刊》主编贾维德·萨里说，阿亚图拉霍梅尼未能对其它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产生影响，例如伊拉克（受萨达姆·侯赛因控制）、沙特阿拉伯和海湾的什叶派穆斯林。

实际上在伊拉克居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一直控制在萨达姆·侯赛因手中。侯赛因以所谓的叛国罪枪毙了一批人，同时又通过兴建新的清眞寺并要求坚持民族主义来安抚其他人。

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则通过出版物、宣教士和存在国外的资金间接地同阿亚图拉霍梅尼较量。沙特阿拉伯是属于所有伊斯兰教徒的两个圣地（先知穆罕默德曾经住过的麦加和麦地那）的所在地，在历史上就反对波斯的扩张主义。

然而，从更长远的观点看，伊朗的影响实在不能忽视。

穆斯林世界正处于从殖民时代向发现自己的独立特性过渡的激烈而

艰难的阶段。法治基本上不存在。一人统治是标准做法，尽管许多穆斯林都知道，除自卫外，古兰经是反对暴力和圣战的。

穆斯林国家钱太少，人太多，出口太少，渴望太多。它们远比西方更了解自己的历史：伊斯兰教徒曾控制大半个世界，长达一千年，一直到被蒙古人、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征服。

目前仍然占领着穆斯林领土的唯一殖民大国是苏联，这块领土就是中亚。不过，仇视西方的情绪仍然很强烈。伊斯兰教看来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不仅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可以用来代替西方的非宗教主义和东方的无神论，而且也是一种民族特性和文化。

伊朗的事态发展使一些人发表了信心十足的言论，萨迪基的下述一番话就是一例：

“同穆斯林世界的公共汽车司机和人力车车夫——无论是什叶派的，还是逊尼派的——谈一谈，你就会发现，他们都赞成霍梅尼在伊朗的所作所为……。”

“伊朗现在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确定自己的意义……伊朗的边界不是有形的，而是伊斯兰的……国界线是人为划定的……我不知道新的革命何时在哪里发生，但是，这种革命即将发生，大约在今后十年之内吧。”

西方会有许多人持嘲笑态度。尽管许多地位重要的穆斯林国家似乎重新对伊斯兰的方式和原则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当前还远远没有使这些国家跟着阿亚图拉霍梅尼去参加战斗。

伊朗使伊斯兰教戏剧性地成了世界各地考虑的中心问题。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伊斯兰教是否确实可提供所需的形式、语言、强度和保证，把摆脱殖民统治之后的第三世界穆斯林的不满情绪利用起来，使之发展成为一场意义重大的起义，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得而知。第三世界的穆斯林人口众多，贫穷落后，多半住在城市。

查尔斯·金布尔在纽约说：“不但阿拉伯国家担心主张建立群众性代议制政府的思想会扩散，而且，许多拉丁美洲人也把伊朗视为在民众支持的基础上反抗拥有大量武器的统治者的榜样。”

伊斯兰教是要求建立一人一票的民主，要求采取其它参与形式，还是要求建立社会主义？穆斯林对这个问题目前正进行激烈的辩论。几乎所有的人都断然拒绝了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就是无神论。大多数人认为，伊斯兰教带有社会主义色彩，但不是社会主义，因为伊斯兰教强

调按照伊斯兰法把富人的财富公平地分配给穷人。

现代派的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提倡实行西方式的人权和法治。

改革派认为，应该建立一种独特的、以一位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人为核心的伊斯兰政府。这位领导人将由一个有学识的人组成的委员会协助工作，并受伊斯兰法的制约。

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者则转向采取抵制行动和暴力行动。

主要由于伊朗的情况，这场辩论不是在冷却下来，而是越来越激烈了。

（四）穆斯林谋求建立合乎更为纯洁的伊斯兰理想的政府

一个身材瘦小，看上去很年轻，穿传统的白大袍、肥裤子的人请一位客人进入一个没有什么摆设的办公室。这时候，加伊德—阿扎姆（意思是“伟大领袖”）大学校园阳光下的水泥地上的气温是一百一十度。

伊贾兹·沙菲·吉拉尼细声细气地、死扣语法地用英语开始详细说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坦率反对巴基斯坦军政府的态度。吉拉尼曾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

伊贾兹是伊斯兰党较年轻的主要成员。伊斯兰党是由现代伊斯兰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已故大毛拉阿卜杜拉·毛杜迪创建的。

在开罗一所淡褐色混凝土办公楼的楼上，一位有着传奇式声望的老人坐在一张靠墙书桌旁研究阿拉伯文报纸。

他就是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领导人谢赫·奥马尔·泰勒迈萨尼。穆斯林兄弟会这个阿拉伯原教旨主义组织是由哈桑·班纳于一九二八年创建的。它在埃及已被正式取缔，但是，它在埃及、叙利亚、约旦、苏丹和海湾国家仍有很大的影响。

谢赫·奥马尔·泰勒迈萨尼一九八一年九月被已故总统萨达特投入监狱之后，体重虽然减了几斤，但在反对派人士中的威信却提高了。泰勒迈萨尼入狱一个月后，萨达特就被极端分子暗杀了。

最近，据说他是由于违背了班纳的原则而受到抨击。几十年来，兄弟会反对一切政党，要求建立以伊斯兰法为基础的政府。然而，泰勒迈萨尼却允许兄弟会的候选人作为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华夫脱党的候选人参加埃及五月二十七日的竞选。

他尽力解释说："我们仍然处于被取缔状态……我们需要参加在治理埃及方面的协商……竞选国民议会议员是唯一的途径……。"

这两个原教旨主义组织是世界各地不安宁的正统伊斯兰思想的两个组成部分。

他们和其他的穆斯林都认为自己在全面恢复对伊斯兰的兴趣方面走在最前列，使人们普遍地决心既反对共产党的无神论，又反对西方的物质主义，而追求在政府治理方面有更纯洁的伊斯兰理想。

到目前为止，由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推翻了非宗教的西方化政权的国家还只有伊朗。

（"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自己最接近先知穆罕默德"眞正的"伊斯兰。亚洲的穆斯林对这一说法有争议。亚洲的穆斯林认为，他们信奉的才是"眞正的"伊斯兰。亚洲人倾向于称伊朗人和其他激进的穆斯林是"好斗分子"。）

然而，原教旨主义者正在迫使巴基斯坦、埃及、海湾国家、苏丹、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喀麦隆和其他地区的世俗统治者作出某些让步，否则就困扰他们。今天穆斯林国家的统治者几乎没有人能经得起无视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的号召力。

至于这些组织将来能否成功，谁也没有把握。但是，考虑到伊朗的榜样，这些组织的决心和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所加强。

在一般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当务之急是要摆脱欧洲二百年殖民统治的影响。他们想要恢复伊斯兰的纯洁性。他们认为，正是纯洁性导致最初在世界掀起伊斯兰高潮。

先知穆罕默德死于公元六三二年。在这之后不久兴起的伊斯兰教经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很快传播开来，南到北非，西到西班牙，北到土耳其，东至印度。

许多穆斯林说，这是殖民地时代以前的历史观，基督徒世界已基本上忘掉了这种历史观。美国和欧洲的学校不怎么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如果有的话也不多。

西方的确没有忘记以前的战争，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十字军奉命于一〇九九年从"异教徒"手中夺回耶路撒冷。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强调的是在那之前阿拉伯帝国的成就和一一八七年萨拉丁重新夺回耶路撒冷。一二五八年蒙古人洗劫巴格达和一五

一七年奥斯曼帝国打败马穆鲁克苏丹国以后，开始了几百年的衰微时期。

象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党和各个不同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一些组织一开始就把眞主看作是世上的唯一合法权威。

在解释“眞主的意志”方面穆斯林应有多大程度的独立判断？这些组织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分歧，但是，他们奉行有影响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一八四九——一九〇五）和拉希德·里达（一八六五——一九三五）的路线，强调政府的决定和形式必须尽可能严格地以古兰经本身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为基础。

伊斯兰党和穆斯林兄弟会都反对专断统治。在它们看来，伊斯兰政府必须是民主的，不一定是一人一票制，但是时刻不能脱离宪法的原则。必须允许每一个穆斯林以某种方式表示他们的观点。

总的说来，这些组织设想有一位中心领袖，一个向这位领袖提供咨询的议会，一个根据伊斯兰法来审查法律与行为的独立司法机构和执行法律的各个部。

要实施伊斯兰式的严厉惩处违法行为的制度，并要为这种制度的实施规定严格的条件（这在西方基本上是沒有人知道的）。什么迪斯科、酒、猪肉、贷款的利息和银行储蓄、彩票等等统统要禁止。

为局外人所不清楚的问题之一是，要是一位统治者变得不公正的话，逊尼派穆斯林将怎样实现更迭。逊尼派的传统是避免使用暴力。一般说来它极力主张服从符合宪法的世俗当局。

中欧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提出，穆斯林不必服从他们认为是罪恶的法律，只有多数人的公开投票才能废除一位领导人。这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还从未检验过；批评家们说，这听起来太消极了。这位思想家出生后取名利奥波德·魏斯，但他后来改信伊斯兰教，取名穆罕默德·阿萨德。

西方的另一种批评是，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可能会在伊斯兰国家受到歧视。

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在古兰经中得到明确的认可。但是，过去对伊朗的白哈教派和巴基斯坦的艾哈迈德教派特别采取了严厉的态度。

为消除这种形象而作出的一种努力来自设在伦敦的中间偏右的伊斯兰理事会。它的秘书长，前沙特阿拉伯外交官萨利姆·阿扎姆在同记者

的一次谈话中说，任何形式的伊斯兰政府必须包括实行一人一票代表制和制订一部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的宪法。

阿扎姆说："即使你修建了一所清真寺，然后又侵犯人权，那你也不能算是穆斯林。是的，伊朗伊拉克战争、苏丹发生的战争、利比亚人在国外的暴力行动，全都有损于伊斯兰在西方的形象。但是，伊斯兰本身是无辜的……我们希望西方的宣传机构深入了解伊斯兰，要弄清楚它是一种文明、一种文化、一种宗教信仰。这些它是不知道的。我们都有权利了解不同的宗教有什么不同的主张。"

穆斯林承认，现在还不存在任何一个完全以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为基础的伊斯兰政府。

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革命也许是向着这个目标走在最前面的。（而且有意思的是，阿扎姆部分地为它辩护说："伊朗革命不是政变。大部分伊朗人仍在支持这场革命。西方新闻机构的消息对伊朗革命抱有偏见，而且阿拉伯世界也没有任何新闻自由，来予以客观的报道……一九七九年以来被杀掉的那些人有许多是毒品贩子和罪犯。"）

在逊尼派是多数派的穆斯林世界里，沙特阿拉伯声称，它的整个宪法就是伊斯兰法本身，尽管沙特阿拉伯执政的王室没有任何民主基础。

象伊斯兰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这样的组织决不是最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

在埃及、在黎巴嫩、在科威特以及别的地方存在一些虽小但更为激进的组织，它们的名字是圣战组织、赎罪与迁移组织和真主党。

这种不安宁的伊斯兰思想最极端的是这样一些个人，这些人转而从事暴力和暗杀：例如：前埃及陆军中尉哈立德·艾哈迈德·沙乌基一九八一年十月领导暗杀萨达特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都感到从伊朗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某种动力，尽管德黑兰同伊拉克的战争旷日持久和经济困难继续存在。

从短期来说，什叶派伊朗的榜样未能在其他国家促使逊尼派穆斯林立即作出革命努力。然而，许多穆斯林说，它的继续存在从长远来说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样板。

伊朗进行了输出叛乱的尝试。它已派革命卫队同黎巴嫩的什叶派穆斯林（包括真主党和伊斯兰"阿迈勒"运动）一道工作。它们的部队今年早些时候攻入东贝鲁特时一路上在沿街的墙上张贴阿亚图拉霍梅尼的

画像。（报纸消息还把伊拉克亲伊朗的呼声党同一九八三年十月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被炸相联系。）

据了解情况的穆斯林说，阿亚图拉霍梅尼还试图渗入巴基斯坦和其他国家的什叶派社会，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似乎没怎么成功。

国外的什叶派仍忠于他们自己的制度和国家。据西方的另外的消息说，黎巴嫩的大部分什叶派穆斯林在宗教事务上尊敬霍梅尼，但是对黎巴嫩的党派斗争有他们自己的看法。这种斗争周而复始，各派都在利用那里的多党制为自己捞取尽可能多的好处。

伊朗附近的海湾国家可能对伊朗的影响更感忧虑。因为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什叶派穆斯林人数相当可观。

科威特亲伊朗的什叶派参加了目前旨在改良放任自流的科威特社会的伊斯兰努力（尽管人们把去年十二月美国和法国驻科威特大使馆和工业场地被炸事件同亲伊朗的什叶派组织相联系）。

在开罗美国大学的一楼办公室里，一位知名的阿拉伯学者正在解释原教旨主义为何仍能在埃及和其它地区引起突发暴力行动，尽管目前是个平静时期。

黑胡子的萨阿德丁·易卜拉欣心平气和地用流利的英语说，他所称的“好斗的伊斯兰”正在埃及、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别的国家的青年大学生中发展壮大。

易卜拉欣博士说，“这些年轻人对社会有四种抱怨。他们毕业以后没有就业机会。埃及各大城市过于拥挤。除非你在社会上出类拔萃，会讲英语，而且能为一家外国银行或者多国公司工作，否则就很难找到好工作。

“他们认为现行经济体制已经失败：工业不发达。

“他们认为西方的兰色斜纹布裤子和可口可乐这种特殊文化使他们感到困窘。

“这些青年年幼、敏感，经不起引诱。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正寻求某种归属感。这样的人有几十万。”

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通过努力使好斗分子重新同社会融和，到目前为止已使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他允许青年好斗分子在埃及电视台同伊斯兰学者辩论，让他们为伊斯兰新刊物写文章。

中东驻伦敦的另一位老资格观察家评论说：“有关埃及青年的种种

问题在叙利亚同样存在……。”

正统伊斯兰思想另一派的代表是所谓泛神论神秘主义兄弟会，这些组织相当于罗马天主教会。

从严肃不苟的组织到边唱边摇摆的组织都是由这样的穆斯林组成的，每一个组织跟随一位“圣洁的人”或领袖，定期地同他一道礼拜和做额外的礼拜以及履行其他的宗教仪式。

今天，已有一百多个独立的教团，其中一些已有一千年的历史。

过去，这些教团（其中有许多信奉神秘主义的成分），特别对亚洲人和非洲人有吸引力，并帮助使伊斯兰在北非和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以及利比亚、苏丹和其他地区得到传播。

据西方一些学者说，有明显的事实表明，这些教会正在苏联中亚部分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塔吉克、吉尔吉斯和土库曼共和国帮助使伊斯兰保持活跃。

埃及泛神论神秘主义教团中地位很高的谢赫阿布·瓦法·塔夫帕扎尼博士说，单在埃及就有六十七个教团。成员有三百万人。

他称这些教团是伊斯兰“道德哲学”，同政治分离，但起着穆斯林信仰基础的作用。

（五）伊斯兰教的冲击：在金融方面的挑战

伊斯兰教的发展及其前景

目前，除了在伊朗以外，伊斯兰教在拥挤不堪、气候炎热和尘土飞扬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似乎也在十分明显地表现着自己。

例如，在卡拉奇最大的商业银行里，沒有最新的关于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表，而是挂了一条条用令人瞩目的乌尔都文写的横幅，上面写着先知们的启示：

“谁用正当手段获得收益，谁就是眞主的朋友”，一条悬挂在银行忙碌的出纳员头顶上的紫红色横幅上用黄字这样写道。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话。

“谁不能实现自己的诺言，谁就沒有宗教信仰”，一条兰色横幅上用粉色写着这样一句告诫的话，人们存款时举目可见。

“要待人以公正”，这是摘自古兰经的一句话。

总之，在这些银行里，银行所有的利息正在迅速地按照伊斯兰法的规定被废除。巴基斯坦是根据伊斯兰法取消利息的第一个穆斯林国家。

巴基斯坦的这种努力正在十几个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作为在银行业、金融界、信仰领域、社会事务、政府部门和政界日益兴起的一场表示信仰伊斯兰教的运动的一部分。

而这种运动又是穆斯林们深信的全面恢复对伊斯兰教的热衷以此来对付和抗议西方世俗主义和东方无神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本报连载的关于伊斯兰教的几篇文章中的最后这篇文章，不仅谈到在金融方面的挑战，而且也谈到更广泛的、有待作出全面回答的问题，比如：

伊斯兰教本身在全世界实际上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伊斯兰教越来越意识到要维护自己的特性这一点应当被视为对西方有多大的威胁？

伊斯兰教从这里传向哪里？

伊斯兰教如何适应现代的西方世界？

伊斯兰教在金融方面发起挑战仅有大约十年的历史，问题的核心不表现在银行柜台上面悬挂的几条横幅标语上，而表现在用来废除西方惯用的利率制的做法上。

绝大部分穆斯林学者说古兰经是禁止人们拿固定利息的（尽管不禁止其它形式的报酬和利润）。据认为用利息的钱是不正当的，而且带有剥削的性质，伊斯兰教不把钱当成商品，而是把它视为眞主赐给的财富，按照伊斯兰法用以帮助那些穷困的人和进行投资促进经济的发展。

伦敦一位穆斯林经济学家说：“建立在亚当·史密斯（苏格兰经济学家）概念基础上的现代经济体制，是随着宗教信仰的下降而发展起来的，”“它用物质和积蓄取代信仰。利率本身增加了通货膨胀，帮助把钱从在银行里存款的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的手里重新分配到经营实业的人的手里……。”

所以，诸如巴基斯坦的哈比卜银行这样的机构，就类似于西方的投资银行、股票银行和金融公司。

他们把存款人的钱列入损益帐内，用以投资，然后每三个月、六个月或十二个月分红一次。他们依靠大部分能够赚取利润的投资来补偿那

些亏损的投资。

利率不是在事先确定。但到去年为止，总的来说它们的利率比一般银行的利率都高。现在，卡拉奇哈比卜银行的年率为百分之八点五，而不是百分之八。定期存款的利率，从六个月的百分之十一点五到五年的百分之十五点二五不等。

他们还以各种方式向实业家提供货款，最后意味着合股，在规定的日子期满时平分益损。

目前，在巴基斯坦、约旦、埃及、苏丹、科威特、巴林、海湾国家、印度尼西亚和其它一些国家，已经建立起了大约三十个这样的机构，拥有资产九十多亿美元。

一些控股公司已在沙特阿拉伯、日内瓦和卢森堡开业。阿拉伯法国银行联盟和阿拉伯美国银行的总部设在纽约。迄今，还沒有一家伊斯兰银行获得在伦敦开业的许可证，因为在伦敦，英格兰银行只承认那些把业务活动置于利息基础之上的银行。

最大的银行组织——由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亲王主持——是伊斯兰金融信托公司，它一九八三年称拥有净资产二亿八千六百万美元。

然而，就象广泛恢复对整个伊斯兰教的热衷一样，这种新的做法也面临着许多障碍。

西方银行家和世界银行的官员们对于这种做法都表示怀疑。一位企业家说，“这是一种不叫利息的利息。”

在伦敦的一位获得成功的巴基斯坦企业家说，“阿拉伯人可以试一下，因为他们有许多石油美元。就我自己而言，我还是倾向于西方银行那种有保证的利息。”这位巴基斯坦人是一个穆斯林。

去年，由于经济衰退，利率下降了。自称是伊斯兰世界最大的私人银行的埃及费萨尔银行，一九八三年所获得的利润有一亿多美元，它一九八二年的利率为百分之十一，但是去年，它的利率低于通常的利率标准，降到了百分之十点二。

伊斯兰金融信托公司一九八二年赚取利润七百万美元，但是去年却亏损了二千七百万美元，沒有分红。

到目前为止，只有巴基斯坦命令它的整个银行系统都改用无利息存款的做法（于明年十月以前开始实行）；伊朗也颁布了一种取缔利息的新的银行存款法，但是还沒有全面实施。

在沙特阿拉伯，虽然公开说要禁止利息，但是巴基斯坦的银行家们说，利雅得不希望把外国投资者吓跑。所以，现在的银行业务还是以利息为基础的。一位穆斯林银行家毫不夸张地说，“谁要是（根据伊斯兰法）到伊斯兰法庭去控告这种做法，可能会赢得这场官司，但他立即就会陷入困境，再也借不到款了。”

目前，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在不发达国家要找到足够的受过训练的职员，要有用于密切监视投资和合股经营的经费。而企业家借款后，总是要夸大亏损和少报收益的。

本记者为写这几篇连载文章而采访了一些银行界的负责人，他们对这件事都很热心，但他们承认，最后结果如何，尚不得而知。

卡拉奇哈比卜银行总经理阿卜杜勒·贾巴尔·汗说：“我把这种做法叫作‘绝妙的金融制度’，”“虽说无利息，但肯定也不是沒有赢利的。我们将对外国资本和贷款保留付息帐戶。”

保留这种有息帐戶，表明巴基斯坦承认伊斯兰的银行业务与世界其它地方的做法实际上存在着差别。伊斯兰银行也必须对付通货膨胀，而他们所采取的是西方人所谓的在办理业务活动中向客戶强加高额“服务费”的办法。

开罗私人银行费萨尔银行总裁穆罕默德·法乌德·萨拉夫，在他的俯视着尼罗河的办公室里接见记者时说，“不管西方是否帮助我们，我们穆斯林都会实现我们的目标。”他说，“谁都无权对我们说，祈祷时我们是穆斯林，而在银行里我们还得同利息打交道。”

在伊斯兰堡新建的国际伊斯兰经济研究所所长齐亚·乌丁·艾哈迈德博士说：至于从世界银行贷款，“那里也有两个‘窗口’是发放无息贷款的，”“它们是国际金融公司（股票金融）和国际开发机构，它们就是收服务费的……。”

西方国家对伊斯兰教的历史和信仰都不怎么了解，但是他们却从报纸上看到了连篇累牍的关于伊朗、伊朗在同伊拉克进行的海湾战爭、扬言要切断石油供应线以及黎巴嫩、北非和西非国家动乱的报道。

这些报道倾向于把伊斯兰教看成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威胁性的，甚至是一种近乎于抽象的力量。

事实上，西方的和穆斯林的学者们一致认为，伊斯兰教是包括许多方面的：它是一种包括对政府、社会生活、经济甚至对饮食都有详细规

定的宗教信仰；它是一种从着眼点、语言到义务都表现出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所不同的政治修养；对于数以百万计的不祈祷、不斋戒或不予施舍而又自称是穆斯林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性的思想意识。

然而，同西方的某种信仰相反，除了在已经部分地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中间，伊斯兰教似乎是不会在世界上传播的。

英国伯明翰伊斯兰教研究中心负责人戴维·克尔说，“居住在英国的穆斯林约有八十万人，在西欧共有穆斯林五百万到六百万人。”

克尔博士说，“而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和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的移民。”

他说，“我本人认识五、六个改信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他们倾向于赞赏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明确的意识到对道德的指导，他们对于自己的牧师过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不满意的。”

英国伯明翰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的乔根·尼尔森表示同意，他说：“很难断定有多少人改信伊斯兰教，”“穆斯林世界，对诸如流行歌星卡特·史蒂文斯和法国大知识分子罗歇·加罗迪等重要人物改信伊斯兰教，总是要大肆宣扬的。”

丹麦的穆斯林们声称一周之内就有两个人改信伊斯兰教。他们许多人都是嫁给穆斯林的丹麦妇女，她们改信伊斯兰教是为了取悦于姻亲，还是出于真心，无人知晓。

尼尔森博士估计，仅在英国，现在清真寺就已增加到了四百五十个（其中包括普通人家里设的礼拜堂）。但是他说，这倒不是改信伊斯兰教的人越来越多的缘故，而是穆斯林移民日益增加的结果。

伦敦伊斯兰教中心发言人查尔斯·勒盖·伊顿（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英国前外交官）估计，在大西洋和乌拉尔山之间居住着二千五百万穆斯林。其中，在南斯拉夫就有三百五十万到四百万人（在萨拉热窝还有他们自己的伊斯兰教神学院）；还有的居住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高加索和土耳其。

伊顿先生说，“不断有人改信伊斯兰教，但并不都有那么多。”

在过去五十年里，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从西部的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到东部的乌干达和肯尼亚，伊斯兰教取得了新的发展。”

在美国，据美国基督教全国理事会估计，穆斯林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移民，而且他们许多人都居住在底

特律地区。在这些穆斯林当中，还有以伊莱贾·穆罕默德的儿子伊马姆沃里思·迪恩·穆罕默德为首的美国正统穆斯林委员会的追随者和以路易斯·法拉汉为首的一个分裂出来的小组织的追随者。

所以说，目前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势力，大体上还是在一百年来就已存在的那些老地方——从非洲西部的摩洛哥，经过北非，经过土耳其和中东，再经过伊朗、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然后再向南经过中国的西北部和印度，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然而，本记者为写这一组报道而采访过的大部分穆斯林认为，在伊斯兰世界内，目前确实出现了一种觉醒或复兴的迹象。

开罗美国大学的萨阿德丁·易卜拉欣博士说，这种复兴不仅在好斗的青年人当中有表现，而且在“作为国教”的伊斯兰教中也有表现。他解释说，“在过去十年中，宗教的广播、伊斯兰教的报纸和书籍至少增加了两倍。”他认为，苏菲派和兄弟会也有了发展——“在过去十五年中，参加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和其它庆祝活动的成员就增加了三倍。”最后，他还谈到所谓的“民间传说”，指出在每一个村子里一种称之为“扎尔”的民间集会日益增多，这种集会是盛行在埃及、东非和北非的一种宗教和迷信的混合物……。”

目前，阿拉伯国家仍然陷于和以色列的冲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是否能常进行对话呢？

基督教一方——美国基督教全国理事会和英国伊斯兰教研究中心这样一些组织，首先采取了主动。

但是，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梵蒂冈第二理事会一致认为上帝和安拉是同一的，因此作出了友好的表示。目前，欧洲和美国仍在讨论泛基督教主义的问题。然而，对于一位穆斯林来说，他的信仰就是眞主对人类的最终启示。如果他虔诚的话，那他就会相信眞主把“眞正的信仰”也告诉了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但是他们都不懂，这也就是造成穆罕默德必须背诵古兰经的原因。

伊斯兰教研究中心的克尔博士说，“对话是很值得的。”

他说，“担心和恐惧往往是由于彼此间互不了解的缘故。”

克尔博士说，“例如，在坦桑尼亚和印度，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就是和平共处的。在英国，出现了各个街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由发现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住进他们领域的基督教牧师们发起的。”

现在，伊斯兰教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它所面对的科学技术先进，经济发达，但主要是非宗教的西方世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

当代穆斯林思想家，欢迎科学进步、西方的平等价值标准和法治。一些比较正统的学者还强调需要把这些东西纳入以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为基础的一种强大的伦理范围。

因此，在西方化的人们和传统主义者之间出现了争论和斗争。

印度尼西亚内阁部长埃米尔·萨利姆在雅加达说，“不错，你们西方人有法治和技术，但是你们的社会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真主为中心。”他说，“你们是为了这种生活而活着。你们对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怎么操心的。”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在思想上的斗争，即在现在当权的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和富有的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的斗争。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强烈鼓吹传统的抗议和改革，而沙特阿拉伯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却每年都要花费几百万美元在国外传播他们自己的正统的伊斯兰教。

穆斯林们普遍认为基督教徒们太忽视伊斯兰教过去所取得的成就：一千年前它对数学、科学和医学所作的贡献，以及直到二百年前它对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仍然占有的支配地位。

而西方国家所记忆犹新的，主要是中世纪对伊斯兰教的讨伐，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在进入本世纪前后土耳其力图对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所进行的种族灭绝的大屠杀。而且，他们认为伊朗及其对伊拉克的战争正在不断威胁着世界六分之一的石油来源。

对伊斯兰教提出批评的西方人还说，伊斯兰教中有些东西与当今世界是格格不入的。

据统计，在斋月（今年六月）期间，穆斯林世界就花费了其经济收入的大约百分之十二。（因此，突尼斯这样一个穆斯林国家已经取消了禁食活动。）

对待妇女的做法被看成是家长式的和保守的。银行实行无息贷款就象伊斯兰法规定的一些惩罚办法一样，被认为是与当今社会不协调的。伊斯兰政府被认为导致一人统治。

目前，穆斯林自己仍处在过渡时期。许多地区，如尼日利亚、苏

丹、中东、伊朗和黎巴嫩等，都陷于动乱之中。传统的价值标准，同现代经济和第三世界的贫困、饥饿和人口过多的问题发生了冲突。

伦敦穆斯林学院创始人穆罕默德·扎基·巴达维认为，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在现代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情况下都需要确定自身的特性。

巴达维博士认为，今天，世界上有三个地方正在试验确立自己独特的伊斯兰方式。这三个地方就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尽管“大肆宣传，利比亚大多数人还是支持卡扎菲政府的”。

英国记者和作家戈弗雷·詹森写道，“今天，对于好斗的伊斯兰教来说，眞正的战场是在学校的教室里。”他说，这场斗争就是要摆脱西方几十年的压制或削弱穆斯林的影响而恢复民族的历史和传统。

伦敦一家阿拉伯新闻周刊总编辑贾瓦德·萨里说，“伊斯兰教在其特性方面出现了危机。”他还说，“或者说他们对宗教和人的生与死——即宗教对世界的看法——方面是否会有什么新的建树？”

巴达维博士还说，“要是伊斯兰教能够吸收现代文明的话，那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文明：权势受到伦理价值标准的约束，财产根据宗教法得到公平分配，寻欢作乐受到道德标准的限制。”

（原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　王成风、白景山、陈秀珍、薛琴珍、裴善勤译　吴江域、康敬贻校）

伊斯兰世界

美国《时代》周刊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分析了七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及其对各国的影响。它认为经过十多年酝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由于蔑视西方准则、蔑视那种使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深的现代化而要求稳定和巩固的现象。

伊朗事态对一系列中东国家有影响。伊斯兰在非洲政治中的复活、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财富和伊朗革命引起西方的关注。美国政府认为，伊斯兰复兴并不预示着倒退到过去，或是抛弃一切国际关系，穆斯林国家将继续要求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支援和与它们进行合作。】

“尽管我们受不同政府的领导，住在不同的地区，但我们穆斯林是一家。”

——伊朗革命领导人阿亚图拉霍梅尼

“伊斯兰的眞正力量是这种感情，那就是你们属于一种兄弟关系，你们的义务是为那种兄弟关系服务，从而为眞主服务。”

——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谢赫·亚马尼

“在出现非正义的情况下，伊斯兰裁决、伊斯兰保护、伊斯兰主张反抗。”

——埃及大学生安瓦尔·加马勒

上面仅仅是伊斯兰的一点点声音，今天，这些声音象唤礼者古时候唤虔诚的教徒去祈祷那样有威力和使人非听不可。这些声音讲俄语、波斯语和法语、柏柏尔语和马来语、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当然，还有阿拉伯语，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国语和伊斯兰圣书古兰经的语言。伊斯兰是世界最年轻的普遍信仰，同时也是第二大信仰，有着七亿五千万信徒；第一大信仰是基督教，大约有九亿八千五百万人。在整个东半球，但主要是在横跨三大洲的交叉点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新月形地带，穆斯林正在重新发现他们的精神祖先并重新维护伊斯兰生活方式的政治权力。受到现代化苦果的打击而又在对古老的遗产感到非常自豪因而受到激励的情况下，伊斯兰世界大家庭正在逐渐复兴起来。

伊朗就是一个最生动的例子。一九七九年三月末，数百万男男女女去投票处参加公民投票，他们占压倒地位地投票赞成成立伊斯兰共和国。阿亚图拉霍梅尼宣布，投的赞成票创造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个“眞主政府”。君主制将被有着当选的立法机关的民主制取而代之；宗教领袖们可能对未来的法律具有某种否决权。进行了一年时间的伊朗革命——这场革命把梦想使自己的国家变成西方式的工业和世俗国家的王朝专制君主赶下了台——的胜利，用科威特一家报纸的话来说，被欢呼为“伊斯兰人民的新的黎明”。巴勒斯坦敢死队涌上贝鲁特街头，用AK—47对空鸣枪，以此来庆祝胜利。在苏丹，反对政府同埃及结盟的好斗的穆斯林举行了庆祝伊斯兰胜利的游行，他们喊道：“打倒国王的朋友萨达特！”开罗保守的穆斯林杂志《呼声》周刊说：“尽管犹太人狡猾、基督教徒仇恨和共产党的猛攻，穆斯林还是来了。”

伊朗并不是令人感觉到复兴了的伊斯兰的力量与热情的唯一国家。

今年早些时候，巴基斯坦把伊斯兰法规——主要以古兰经为基础的伊斯兰法典——的一些措施补充到刑法和民法中去了。在科威特，这个盛产石油的沙漠国在法规中采用了经过修改的伊斯兰法规版本。埃及人民议会响应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也在辩论实行伊斯兰法规问题，这可能会关闭在开罗金字塔公路一带灯火闪耀的酒吧间、夜总会和赌场。

伊斯兰复兴的最可靠的晴雨计也许是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觐的习俗，预料，虔诚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到那里朝觐一次。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参加朝觐的人逐渐增多。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的朝觐盛况是历史上空前的。将近二百万人聚在麦加附近贫瘠的阿拉法特平原，住在帐篷里，进行十四个世纪一直保持不变的艰苦的五至七天的宗教仪式。现在的朝觐更有甚于以往，它是来自七十个国家，从最富有的石油酋长国到最穷国家的种族，有着不同的面孔，讲着不同语言的精神万花筒。

对伊斯兰重新感兴趣的情况在年轻人中更为明显。阿尔及尔一个著名法官惊奇地发现他十四岁的儿子同他的一群朋友每天在清眞寺作五次祈祷。在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提倡了妇女的平等权利，包括离婚和打胎），属于好斗的穆斯林兄弟会的学生涂抹掉带有色情的电影广告，并在城市的墙上用粉笔写上古兰经语录，他们用这些形式对“罪恶”开战。在开罗大学（入学人数：十三万），数以百计的埃及女学生已戴上面纱，并要求男女分班。

伊斯兰教在共产党世界如果沒有兴旺的话，总算幸存下来了。苏联现在在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占第五位（次于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莫斯科官员特别担心席卷伊朗的伊斯兰热潮会越出边界，影响到阿塞拜疆、土库曼和在苏联南部的其他一些共和国的伊斯兰人口。在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甚至在以色列自己的穆斯林公民中间，出现了去清眞寺祈祷的热潮，并重新开始对伊斯兰感兴趣。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的一位伊斯兰文明讲师拉菲·以色列说：“在穆斯林中间有一种活跃和自信的新感觉。伊斯兰终究取得了伟大胜利。”

伊斯兰的复兴已经酝酿了十多年了。伊斯兰不是星期五去清眞寺式的宗教。它是荣誉的法典、法律制度和无所不包的生活方式。固然，国家与国家、个人与个人的宗教仪式多少有些不同。然而，就普通穆斯林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虔诚的程度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基

督教的虔诚程度要更明显得多。在星期五（这是穆斯林的聚礼日），工厂、市场和公共广场便沒有了生气。男人们如果沒时间或不打算去清眞寺的话，就把祈祷用的小地毯放在扩音器附近；妇女们常常在家里祈祷。其他人在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所要求的沐浴仪式和祈祷。穿着白色短裤的职业网球运动员将把球拍放在运动俱乐部的球场然后祈祷。飞机上的乘务员将把一条毛巾铺在飞机的过道上进行祈祷。在田野上的工人将在中午脫掉靴子，跪在几片纸板上祈祷。穆罕默德·哈桑·谢拉夫年七十六岁，贝都印人，居住在撒哈拉边缘地区。他解释了他通过祷告找到的平静。他说："如果我不祷告，我的內心就发慌。如果我祷告了，我的內心就很平静。"

日常用语中有无数使人想起伊斯兰基本信念的提示，即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眞主的意旨。当你告诉开罗出租汽车司机你要到某处去的时候，他就会回答说："如果眞主愿意的话"。如果一位家庭主妇发现市场上有西红柿，她就会咕哝"赞美眞主"。尼罗河三角洲的农民在播种的时候会喃喃地说"以眞主的名义"。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作了一次政治家式的冒险，他去耶路撒冷进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然而，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知道，仅仅是凡人是无法控制结果的。他私下一再说，"不管产生什么结果，这是我命中注定的，我认我的命。"

阿拉伯主义者彼得·阿·伊斯曼写道："任何东西都不能玷污其影响无所不至的这位近在咫尺的眞主。人们的意外事件是眞主安排的，一切都是神的计划。阿拉伯人较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就是怀疑、內疚、焦急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他们的世界是个比较使人放心的世界，是个充满了起镇静作用的必然感的世界。"

伊斯兰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由于蔑视西方准则，蔑视那种使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加深的现代化而要求稳定和巩固的现象。卫生所可以使疾病减少，但是也使那些很少实行节育的伊斯兰国家的人口猛增。城市工业迅速增长提供了就业机会，但是也由于人们陆续去城市寻找工作而破坏了农村的极神圣的家庭结构。

开罗大学的一位高年级学生安瓦尔·贾迈勒说，埃及的电视里充满了象《查利的安琪儿和女警察》之类的美国系列本电视节目。他问："这些系列本电视节目与埃及生活有何关系呢？穆斯林应该做些什么？

仿效那种生活方式吗？忘掉伊斯兰，变成一个可塑人吗？”也在这所学校念书的一个女学生纳迪亚·法蒂姆蒙着修改了的面纱和穿着拖到地上的长袍。她说：“这是个身份问题。如果穿西方服装，象西方人一样地行动，那么你非变成西方人不可。但是如果你热衷于伊斯兰、伊斯兰方式、服装以及思想，那么任何东西都不能迫使你改变你事实上的身份。伊斯兰能使你恢复本来面目。”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伊朗问题专家马文·佐尼斯说，在伊朗和别的地方，“人们为了要恢复遭到很大损害的自尊感，伊斯兰被用作对西方进行还击的一种工具，他们认为，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西方在文化上完全制服了他们，从而他们自己的机构和生活方式就变成次要的了。”华盛顿的一位中东问题专家约翰·杜克·安东尼说：“我们是一种革新的见证人。我们感到，在伊斯兰世界里，可以实行一些变革，以便使伊斯兰国家适应本世纪后半世纪的各种压力。”

穆斯林可以象他们在英国那样作为少数民族很好地生存下来。例如，在那里，在伦敦摄政公园的对面有一座新的宏伟的清真寺，它是穆斯林社会越来越大的象征。现在这个穆斯林社会已有一百万人。然而伊斯兰本身有一种强有力的命定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具有渴望扩张的政治信念。在穆罕默德于公元六三二年死后的不到一百年，他的追随者突然冲出阿拉伯沙漠去征服并开创一个千年永放光辉的帝国。他们——真主的骑兵——征服了波斯帝国和大部分拜占庭地区，把这种信念由非洲北部传到了西班牙，从中东传到了印度洋。虔诚的阿拉伯商人后来又从那里把他们的信念传到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有些商人则把古兰经传到了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南部的非洲黑人部落。

后来，在面临蒙古人的入侵、西方十字军以及最近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的情况下，伊斯兰为维护它在思想意识上的统一而成功地进行了斗争。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奥斯曼帝国肢解了，它的大部分划归基督教欧洲的殖民国家统治。欧洲的统治表明，对伊斯兰来说，实行世俗的和精神的权力是何等重要。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里，只有贫穷落后的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名义上是独立的。伊朗、阿富汗和世俗的土耳其是自由的。在土耳其，凯末尔废除了伊斯兰教为他的国家的官方宗教，以便使土耳其成为一个稳定而进步的国家。但是在别的地方——在

印度次大陆，在东南亚，在非洲和太平洋——大量的穆斯林还在受殖民统治。

伊斯兰世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复活的。当时，厌战的欧洲列强看到它们的殖民帝国一个个在土崩瓦解。有权势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象埃及的阿卜杜勒·纳赛尔一样纷纷上台。这些人也都是穆斯林。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出现了一大片伊斯兰教占统治地位的独立国家。对中东的穆斯林来说，过去的二十年中有一件大事可以作为该教历史上的一个现代里程碑。一九七三年十月十六日下午，当埃及军队强渡苏伊士运河，攻占了以色列在巴列夫线上兵力稀薄的据点时高呼“眞主伟大！”，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升起的第一面埃及国旗被送到了开罗爱资哈尔清眞寺大谢赫那里了。

军事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用一项停火协议结束历时二十二天的十月战争时，以色列是占上风的。然而，穆斯林的评论员们却把阿拉伯人这一初步胜利看作是自萨拉丁一一八七年希廷一战打败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全世界的穆斯林对埃及和叙利亚在战争中的早期胜利以及一九七三年的石油禁运带来的甚至更大的经济胜利感到自豪。

最近一系列的事态发展联系在一起使西方的注意力集中于伊斯兰教。这些事态发展有：该教在非洲政治中的复活、阿拉伯半岛的石油财富和伊朗革命。但是，许多穆斯林认为，世界对他们和他们的信仰的这种迟迟才产生的关心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同情和谅解，而是敌对的宣传。他们这种看法是多少有些理由的。

人们总是一成不变地认为，伊斯兰的法典是非常严厉的，是不容其他信仰的，是约束妇女和同进步相抵触的。欧洲伊斯兰理事会总干事萨利姆·阿扎姆（沙特阿拉伯人）认为，目前伊斯兰教的复兴被看作是“倒退和反动”，原因是，西方人把伊斯兰教发生的情况同基督教恢复原教旨主义混为一谈。阿扎姆说：“这不仅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傲慢假想，而且这等于是说“回到了间接的，但是一种更为深奥类型的殖民主义”。

伊斯兰教的维护者进一步辩说，伊斯兰教不是铁板一块，它同各种社会和经济体制是一致的，非但不是回到黑暗时代，而是同进步完全一致。现分述如下：

伊斯兰和政府：穆罕默德的教导从根本上讲是民主的。因为它们主

张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伊斯兰国家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民主派和保守派，有民主主义者和独裁者。伊拉克和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者，更不说伊朗那些希望看到根据他们自己的新宪法建立的议会民主的温和派了——是瞧不起象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半封建君主制的。伊朗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的女婿侯赛因·巴尼—阿萨德说："在思想意识方面，这一革命是不可能支持象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制度的。伊斯兰教是沒有国王的。"沙特阿拉伯人回答说，他们有一个为他们社会的需要服务的机构。这就是议会。哈立德国王和王室的主要亲王可以接见他们国土上地位最低下的求见者。

实质上，按照伊斯兰理论，政府将是每个生活领域的调节者而不是直接代理者。它的主要职责是要确保社会公正的基本法则得以实现。

伊斯兰教和经济：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既要反对西方的唯物主义，又要反对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伊斯兰教对经济的看法是灵活的，这有助于它解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赞成个人积极性，尊重私有财产，允许获取有限的红利。总之，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从这个世界得到好处，但是它强调要有节制和对集体负责。古兰经谴责高利剝削，但允许收利息，如果钱确是用于公共利益的话。在沙特阿拉伯，伊斯兰的银行同西方的银行是并肩出现的。它们不收利息，但从它们资助的项目中占有股份。这样大家既分享好处，也分担损失。

穆斯林的五功之一是征收什一税。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为了宗教共同利益，每年要对个人的财产征收百分之二点五的税。财富分配原则也适用于政府。沙特阿拉伯每年要用它逐年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据估计，一九七八年为六百六十亿美元）的百分之七以低息贷款或赠款形式给不发达的穆斯林国家。比较起来，美国去年对外援助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的三分之一。世界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马赫布卜·哈克预言，将要组织起一个十亿美元的世界穆斯林基金会（将由中东产油国资助）来组织和提供援助，帮助那些甚至在伊斯兰处于低潮和衰退的年月也坚持这一信仰的贫穷的伊斯兰国家。他说："穆斯林国家需要有自己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伊斯兰教与进步：穆斯林学者坚持认为，伊斯兰教沒有什么东西是同技术发展或工业发展不相容的。伊斯兰国家在科学和创造发明方面是走在世界前面的。穆斯林所反对的是与现代化有关联的一些邪恶：家庭

结构被破坏，道德水平下降，放荡和世俗的生活方式的感染力。与此同时，穆斯林要求学习西方的长处：学校、医院、技术、农业和水利发展技术。实践可能会证明，只是收获现代化的果实，而不受它的一些副作用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的谢赫·马哈茂德·阿布·奥贝德说，穆斯林应当“极有选择性地”努力实现工业化。“我们必须取适用于我们的部分，舍有害部分。”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负责人安瓦尔·易卜拉欣则提出不同的意见：“现代化意味着建立酿酒厂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反对现代化。现代化意味着拥有电子工厂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赞成现代化。伊斯兰教不反对发展，但这种发展必须是以道德为基础。它必须是公正的，不能是剥削性质的。”

对工业化副作用的不快给使伊朗国王下台的群众性骚乱火上添了油。普林斯顿的理查德·福尔克称这一动乱是“第三世界的第一次革命。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一次土著的伊斯兰革命。”一些伊朗官员认为，他们的革命将鼓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骚乱。负责革命事务的副总理易卜拉欣·雅兹迪说，“我认为，我们的革命开创了伊斯兰斗争的新纪元和伊斯兰的新觉醒。凡过去在对待改变的态度方面或行动方面消极或推托的一切伊斯兰运动今后都将要在穆斯林世界公开化。”

谁都不怀疑伊朗革命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虽然看来它不大可能重演。伊朗局势有许多方面在中东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伊朗国王的支持基础要比伊斯兰世界尚存的一些君主明显具有的支持基础有限得多。大多数伊朗人是伊斯兰什叶派。该教派在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占统治地位。伊朗的圣人有长期从事政治活动的历史。正如革命后德黑兰的一位持枪的宗教领袖指出的那样，“政治是生活的一部分。毛拉们关心的领域是生活本身。”另外，伊朗的宗教组织机构同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宗教组织机构是不一样的，在财政上是不依靠政府的。但是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不满情绪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其中有：

沙特阿拉伯：它是穆罕默德的诞生地，也是世界上最正统的穆斯林社会。这里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声称遵循严格的原教旨主义的清净派教义，他们以热情奉行伊斯兰法规而闻名。但是巨富和赤贫之间的差距很大，外国流入的工人很多，并且，对于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来说，发展的步子可能过快而不易掌管。虽然清净派的领导人与王室有着密切的联

系，但是仍有一个小小的伊斯兰运动，它批评一些被骄纵的领主在国外侨居时过着淫逸的生活，这个组织还对这一王朝自称是伊斯兰的唯一发言人的说法提出异议。科威特一位学者阿卜杜拉·纳菲西的讲话录音带在吉达黑市卖至二百美元，它攻击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并宣称霍梅尼是“真正的穆斯林”。

埃及：尽管萨达特总统本人是虔诚的，但他现在是中东的贱民。在他无所畏惧地主动给伊朗国王提供避难地之后，现在又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德黑兰的一些官员说过，他们预料埃及将是第一个感到他们革命的冲击波的国家。埃及政府由于意识到了有发生事端的可能性，从而审查埃及报纸报道的有关伊朗动乱的消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在内，是这个国家中的一支日益增长的力量。伊斯兰是埃及的国教，但是大部分长老却倾向于支持政府，这部分原因是他们依靠开罗提供宗教活动经费。事实上，许多俗人认为长老是他们寻求破坏的体制的一部分。上个月，萨达特强烈告诫宗教不得干涉埃及的政治生活。他在亚历山大大学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宗教决不能干预政治，政治也不能参与宗教。”

苏丹：它是通过一项防务条约与埃及联系起来的最大的非洲国家。两国已经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成立一个政治和经济邦联。尼迈里总统对萨达特的以色列耶路撒冷之行和戴维营协议表示赞同，但是这种立场并没有普遍为人接受。尽管它奉行一种和解的政策，以便结束自从一九五六年独立以来折磨苏丹的阴谋和政变，但他仍然面临着安瓦尔·萨迪克·迈赫迪领导的全国阵线的反对。迈赫迪主张建立一个象邻国利比亚那样的伊斯兰国家。

伊拉克：伊朗革命一向是执政的复兴社会党心中感到有些不安的原因；它的领导阶层是逊尼派的人，而伊拉克的一千二百万人中百分之五十二是什叶派。正如在伊朗一样，毛拉有着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传统，并且在宗教反对派和政府指挥的十二万五千名“人民军”（全都是逊尼派）之间一直不断发生激烈冲突。虽然政府中的贪污腐化和对石油财富管理不善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萨达姆·侯赛因却管理着一个无情的警察国家：持不同政见的人受到无情镇压，据说伊拉克监狱中关押着数千名政治犯。政府最大的心事是，二百万库尔德人中又产生动荡。他们与他们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同族兄弟有着一个共同的愿望，这就是要求成立

库尔德人自己的自治的库尔德斯坦。

阿富汗：自从一九七八年九月以来，亲苏的塔拉基总统的政权一直被卷入了一场激烈的内战，莫斯科指责美国煽动了这场叛乱，华盛顿则愤然加以否认。一些叛乱者是受部族仇恨所煽动，另一些人则为反对政府的左翼路线的政治反对派所鼓动。据这一地区的一位美国专家说："伊斯兰已证明是使叛乱分子们团结一致的主题。"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搬入了在巴基斯坦的武装营地。塔拉基曾试图突出他自己作为一个优秀的穆斯林的资格；后来，阿富汗政府公布了边界那边的一批苏联穆斯林写来的表示支持的信件。但是，一些毛拉由于在清眞寺中大胆地表示反对政府而被捕，伊朗一些宗教领袖已呼吁支持阿富汗的叛乱分子。

土耳其：伊斯兰在世俗的土耳其国内仍然是一支潜在的势力。占优势的逊尼派穆斯林同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之间的宗教暴力冲突最近给这个国家长期的政治不稳的状态注入了一种危险的新因素。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正在利用这两派之间世代敌对的状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逊尼派的一帮人在土耳其南部的马拉什镇屠杀了一百名阿拉维派的人。但是，与伊朗国王的伊朗不同，土耳其有着起作用的民主制度，没有一个问题也没有一个著名人物能把反对派团结起来。然而，政府担心，"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将会试图利用宗教积怨捞一把。埃杰维特总理已通过电视和广播发动一场强烈的运动，呼吁团结和忍耐。

苏联：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九七七年访问莫斯科时，苏联党魁勃列日涅夫提出在班加西开设苏联领事馆。卡扎菲说，好，利比亚也愿意在塔什干设立一个领馆。勃列日涅夫问道："为什么要在塔什干设立领馆？"卡扎菲回答说："因为我知道在俄国的那个地方有许多穆斯林，我倒愿意照管他们一下。"显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愿意使好斗的利比亚获得机会在苏联的五千万穆斯林中煽起宗教情绪，因而便把这个事搁置起来了。苏联的穆斯林对莫斯科来说，是人口问题上的一枚定时炸弹。到了二〇〇〇年的时候，他们将有一亿人，而届时俄罗斯人估计约一亿五千万人。在苏联的中亚地区的一些穆斯林共和国中，一些党的领导人通过强烈要求优先搞一些发展项目，已经在显示着政治上的力量。

一些观察家认为，苏联的穆斯林比苏联的任何其它宗教组织在信教方面的自由更多一些。在星期五和一些假日，清眞寺里人挤得满满的。

并且也准许一些小型代表团出国去朝觐。穆斯林领袖、教法说明官显然已与政府达成了一种妥协，以准许他们信教来换得他们在主要政策问题上支持政府。伊斯兰对苏联制度的任何抵制，大概都是来自苏菲兄弟会的庞大组织系统，这个组织是一个极端保守的秘密组织，为苏联法律所禁止。苏菲组织的人在秘密的清眞寺中做礼拜，他们信奉一种与官方准许的伊斯兰“相类同的伊斯兰”。

西方是否应当担心伊斯兰复兴呢？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从长远来看，回答是不必担心。虽然，在不久的未来，华盛顿的确要对中东进一步不稳定的后果感到忧虑不安。因而，作为伊朗革命的结果，美国分析家们正在极其密切注意在其它伊斯兰国家（穷国和富国都一样）中正在酝酿的社会力量。国务卿万斯说：“伊斯兰在一系列国家中复兴表明了它返回到了它的原教旨主义根源和更加依赖在实现现代化的行动中被撇在一边的原则”。美国政府认为，伊斯兰复兴并不预示着倒退到过去，或是抛弃一切国际联系。穆斯林国家将继续要求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支援和与它们进行合作。

在战略方面也是一样，美国分析家认为，伊斯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从根本上说，伊斯兰国家是反共的。

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说：“我认为，我们有着共同的关心，可以在一起共事，发展一系列友好关系。它可以导致这一地区最终的稳定。”不管这是否证明的确如此，但是西方要无视或摒弃先知穆罕默德启示的活生生的力量是再也吃不消的了。

（原载美国《时代》周刊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

霞　飞译　刘幼兰校）

伊斯兰两大教派的来源

（美国）肯尼思·伍德沃德　雷切尔·马克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介绍了伊斯兰教内部的两派，即什叶派和逊尼派产生的由来和它们的一些基本情况。

这两派在基本信仰上没有差别，但在宗教气质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则完全不同。在全世界穆斯林中，逊尼派占百分之八十五。当今什叶派的主要领导人是霍梅尼。作者引用纽约大学近东研究所教授、什叶派文献专家切尔科斯基的话说，“霍梅尼之所以取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多半是因为他能把什叶派的赎罪仪式变成政治行动。”】

目前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主要领导人是阿亚图拉霍梅尼。在伊朗，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什叶派伊斯兰是国教。什叶派在伊拉克占一半人口。在巴基斯坦虽占少数，但却是畅言无忌的少数，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上星期就是被到处抢劫的穆斯林学生所焚烧的。他们在巴林、阿曼和北也门数量也相当多。

在什叶派穆斯林的基本信仰和做法方面，同世界八亿穆斯林的其他教派几乎毫无差别。世界穆斯林中，百分之八十五属于伊斯兰逊尼派。象所有穆斯林一样，什叶派穆斯林必须每天向眞主礼拜五次，遵守伊斯兰法，进行斋戒和布施。作为古兰经的研究者，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和耶稣是眞主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眞正祖先，并特别把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看成是“圣经上的臣民”。希望每个穆斯林一生要去麦加圣城朝觐一次，以参拜大清眞寺和亲吻在古老天房外的一块黑石，阿拉伯人认为天房是亚伯拉罕建造的。

然而，在宗教气质、表达方式和自知之明方面，什叶派完全不同于逊尼派。从他们对伊马姆的尊敬中可以看出这种差异，他们认为伊马姆是受苦受难的圣人，知识渊博的导师，首先考虑的是殉难，而殉难在他们的习俗和宗教仪式中占主导地位。什叶派倾向于不信任不是由他们的

伊马姆行使职权的当局，他们比其他大部分穆斯林更愿意为伊马姆认为神圣的事业献身。

伊斯兰早期的——而且是流血的——历史就有着这些差异的深刻根源。穆罕默德教祖于公元六三二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他死后有两个教派就继承问题展开了斗争。多数派，后来成了逊尼派，赞成阿拉伯的选举传统，在挑选头四名哈里法（确切地说，就是教祖的继承人）方面，他们这一派占了优势。名叫什叶派的少数派则坚持主张，哈里法应是穆罕默德的后裔，他们支持教祖的得意女婿和堂弟阿里的事业，他们推举他当伊马姆即眞主启示的护卫者。阿里最后被选为哈里法，但是六年以后遇刺。阿里的长子哈桑中毒身亡。于是叙利亚逊尼派总督立即把哈里法统治中心迁至大马士革，——从而为什叶派历史上最重要插曲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在公元六八〇年，居住在巴格达附近库法的什叶派邀请阿里的第二个儿子、穆罕默德的外孙侯赛因离开麦加，当他们的伊马姆。逊尼派的哈里法雅兹迪作为反应，派他的军队在卡尔巴拉沙漠平原上拦截侯赛因，在那里他们要求这位伊马姆承认雅兹迪是伊斯兰领袖。侯赛因拒绝了。侯赛因和他的七十二名男随从在沒有一点饮水的情况下在沙漠里坚持了十天，最后被剁碎，残骸被践踏进沙土里。总之，从阿里开始的十一名伊马姆全遭杀害，而根据什叶派传统，第十二个伊马姆——他也神秘地失踪了——最终将作为救世主返回。

一千多年来，象天主教国家的一些基督教徒公开地再次扮演耶稣受难和去世一样，什叶派穆斯林以宗教仪式再次扮演侯赛因和其他伊马姆的殉难。侯赛因是在穆斯林的禁月伊斯兰教历元月第十天(阿舒拉日)被杀害的。穆斯林的禁月标志着穆斯林新年的开始。在这一天，世界各地的什叶派排着长长队伍游行，举着摘自他们关于殉难者的书中的一句话。在伊朗和伊拉克的什叶派还为侯赛因、阿里和其他伊马姆的圣墓扫墓。此外，他们还演出一出威武雄壮的、常常是用鲜血染成的史诗般的戏剧，名叫塔兹耶赫，重现侯赛因的最后一次战役，而且在游行队伍中，捶打他们自己直到有时失去知觉的程度，这是为侯赛因的死亡而举行的一种公开赎罪礼仪。

据纽约大学近东研究所教授、什叶派文献的专家彼得·切尔科斯基说，霍梅尼之所以取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多半是因为他能够把什叶派

的赎罪仪式变成政治行动。切尔科斯基认为，“他成功地把国王描绘成哈里法雅兹迪，把伊朗国家安全情报署（国王的秘密警察）描绘成杀死侯赛因的军队。现在，他又在组织什叶派的殉难仪式，他告诉卡特总统：‘作为什叶派穆斯林，我们是欢迎有机会献出我们的鲜血的’”。

在伊朗以外地区，有数以百计的伊斯兰教小派别，这些派别不时地产生救世主式的人物，自称是被期待已久的救世主（马赫迪）。九十年前，在英帝国全盛时期，一位名叫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的苏丹马赫迪的追随者们在喀土穆进行了历时十个月的围攻以后，杀死了乔治·戈登将军，消灭一支由英国士兵组成的驻军。上周在伊斯兰教历元月开始时，一批狂热分子占领了麦加大清眞寺，在枪口的威逼下命令朝觐的人，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几名高级官员，承认他们的领导人是救世主（马赫迪）。

对麦加的袭击特别使穆斯林感到愤慨，因为这是他们的圣城。虽然最初这些狂热分子的动机不明，但是中东问题专家在本周晚些时候说，这位自称的救世主（马赫迪）和他的追随者们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宗教目的行事的。这些武装暴徒要求完全排除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影响，特别是要求取消电台、电视台，甚至禁止足球赛。

沙特阿拉伯穆斯林自称是十八世纪的伊斯兰改革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精神继承人，他们是现代伊斯兰的清教徒。瓦哈卜希望恢复原来对古兰经的信仰，因此拒绝什叶派诸如把伊马姆尊为眞主的解释者之类的发明创造；他的追随者们捣毁了侯赛因在卡尔巴拉的坟墓；作为保守的逊尼派穆斯林，瓦哈卜的追随者们坚持逐字逐句地阅读古兰经，严格地执行伊斯兰教法。瓦哈卜分子通过沙特王室的权力和财富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穆斯林——直到非凡的霍梅尼兴起为止。

本星期五，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将再次庆祝阿舒拉日，他们以自我鞭笞的宗教仪式再次扮演侯赛因的殉难。西方观察家们一直在反复考虑的问题是，最近对美国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加尔各答的外交官的袭击是否就是伊斯兰方兴未艾的赎罪愿望的一部分。自从一九二三年废除哈里法统治区以来，多数派逊尼派沒有任何合法的机构来宣布旧式的圣战。逊尼派是否会响应诸如霍梅尼之类的什叶派伊马姆所宣布的圣战是很可怀疑的。但是大部分穆斯林是带着一定的敬意来怀念侯赛因的。人们担心的是，一些逊尼派，特别是学生，今年可能很愿意把他们历来

对侯赛因之死感到的罪过从他们自己的传统做法转移到不信宗教的西方国家身上。

（原载美国《新闻周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
赵菊芬译　康敬贻校）

穆斯林为什么勇于战斗

（美国）　唐·麦克里

【内容提要：穆斯林有义务以安拉的名义进行宣教和尽力。这种尽力可以以道德规劝、宣教、经济引诱的形式，也可以根据古兰经的规定诉诸武力。这种勇于战斗的性质在其创建之初就显而易见，并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现代穆斯林诉诸武力的例子不少。近来，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复兴，并结成各种形式的伊斯兰社团。由于垄断石油而积聚起来的巨大经济实力为其活动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

伊朗危机已经给人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有关伊斯兰教的性质，另一个有关穆斯林的使命。

阿亚图拉霍梅尼说过，在伊朗的冲突不是伊朗与美国，而是伊斯兰和异教徒之间的冲突。这个使某些美国基督教徒迷惑不解的声明是什么意思呢？

要真正了解伊斯兰，最好的办法是将其与约书亚时代起圣经上的典型相比较。当时的普遍现象是对上帝的热忱；反对偶像崇拜者的军事行动；上帝之国的政治化。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出生在席卷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军事行动的漩涡之中。在他出生的公元五七〇年，基督教阿比西尼亚派与也门的基督教徒统治者勾结，由南部进攻非基督教的麦加。在穆罕默德早期的几十年中，拜占庭基督徒不停地发起战争，进攻北方的波斯。阿拉伯各部落素以图利著称。这位敏感的宗教宣传者甚至从基督教徒那里学到了寻求军事解决的办法。

穆罕默德由于在传教时猛烈抨击麦加的偶像崇拜者和富人统治者，

其生命曾受到威胁。公元六二二年，他手持短剑移住麦地那，伊斯兰教历史自此开始，伊斯兰教世界观随后逐渐形成。穆罕默德被邀当了麦地那畏敬安拉社团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反对异教徒的军事行动旋即开始了。目标是先征服麦加，继之整个阿拉伯，然后全世界。

在试图评价穆斯林的世界观和行为时，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他们对安拉的理解既扎根于神学，又扎根于宗教仪式。他们的教义包含信仰安拉，安拉的使者，圣书（古兰经），天使，末日审判，及安拉的定命论。在这种坚实的神学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教徒的功课，即经常念清眞言表示对安拉的信仰；记住穷人；每日五次礼拜；斋戒一月；一生应去麦加朝觐一次。许多伊斯兰学者认为还要进行伊斯兰教的护教战争，即圣战。就是这最后一点准许伊斯兰教在安拉的名义下寻求军事解决办法。

杰哈德是阿拉伯字，意即“尽力”，用在为安拉的事业而尽力这个意义上。

已故巴勒斯坦人赛义德·阿卜杜拉·毛杜迪在其著作《伊斯兰生活方式》中把这点作为伊斯兰教的柱石之一。他说：“最后是杰哈德，即尽自己最大努力，无论是通过嘴或笔，或剑，传播安拉的话，使其成为至高无上，扫除伊斯兰教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穆斯林可以引以为荣的是，他们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曾表现出了一种非军事的宣教热忱，这种非军事手段在宣教当中至少与别的手段同时运用过。我们很多人尚不清楚，不少民族和平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信异教的蒙古人在征服了中亚之后改信了伊斯兰教。穆斯林苏菲派把伊斯兰教传给了印度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基督教传教士到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诸岛之前很久，穆斯林商人就已把他们的信仰传到了这些地区。在我们时代，伊斯兰已经和平地传到撒哈拉南部许多非洲国家。今天，在沙特阿拉伯巨大的财力支持下，西非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建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伊斯兰宣教中心。

使一个民族改信伊斯兰教首先是穆斯林商人的到达，然后建立清眞寺，最后在清眞寺建起学校。穆斯林移民往往在对方改信伊斯兰教的前提下愿与当地人通婚。

伊斯兰在传播过程中，一直既利用文献，又利用通讯联络手段。伊斯兰教教理和传播方面的书籍，小册子，磁带，和广播节目现正向非伊

斯兰世界潮涌而来。沙特阿拉伯为促进伊斯兰教的传播，正以巨资在中东上空造一个通讯卫星。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里的伊斯兰出版机构正兴隆发达。

除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传教手段外，穆斯林还准许使用经济诱惑以孚取信徒。当初伊斯兰教就规定了向非穆斯林征收额外税的制度，无疑，这是有利于他们拉信徒的。在穆斯林控制国家里的非穆斯林一直不许担任某些公职，而穆斯林如改信其它宗教则要剥夺一切财产继承权，而且可能被处死。

穆斯林在诉诸圣战的情况下，可以拿起剑，以促进伊斯兰事业。这一点在《古兰经》上有规定：

告诉那些异教徒，如果改邪归正，他们的过去便可得到原谅；如果坚持罪恶，那么就让他们想想他们祖先的命运……

向他们开战，直到偶像崇拜者消灭，安拉的宗教至高无上。

（《古兰经》第八章第三八、三九节）

伊斯兰教把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分为两部分，即顺从者和抵抗者。穆斯林被迫以安拉的名义进行宣教和尽力。这种尽力可以有道德规劝形式，宣教，或军事征服。伊斯兰教的军国主义性质在公元六二二年其初创时期就是显而易见的。创立后的第一个世纪内，“安拉的军队”就冲出了阿拉伯大沙漠，并开始向东、北和西边扩张。“安拉的剑”迅猛地向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向伊拉克和波斯；向印度次大陆进发。最西边，伊斯兰教不停地通过北非，然后到西班牙和意大利沿岸。最东边，它传到中亚和印度内地。

通过伊斯兰教悠久而令人惊奇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出，极力主张建立帝国的愿望是由来已久的。

在我们时代，穆斯林诉诸武力的例子也不是没有。本世纪开始前后，土耳其穆斯林开始向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基督徒少数派实行有组织的屠杀。全部屠杀尚未进行完时，就有五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一百万希腊人被杀。对少数派的折磨现象仍继续至今。

伊斯兰好战的例子还有：穆斯林用暴力推翻乍得基督教当权的政府；伊迪·阿明企图使乌干达伊斯兰化，在此过程中，也许有五十万人被杀；菲律宾穆斯林为自治而进行的持久战；而最近，伊朗人又宣称，伊斯兰正在进行反对异教徒的圣战。

我们西方许多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其它人一直被这种发展弄得目瞪口呆。我们本不应该这样子，事实眞相是，我们沒有回顾以前的历史。正是由于这种疏忽导致我们对伊斯兰教作了错误的判断，而且估计不足。

就在一九七六年，在英国举行的“国际伊斯兰节目”就伊斯兰教的前途发出了一种新的信号，即“除非我们使伦敦改信伊斯兰教，否则我们休想使整个西方世界改宗。”他们相信，历史上的一次大转变正在发生。

世界上的穆斯林国家正发起某种形式的意味深长的伊斯兰社团。一九四五年，在亚历山大创立阿拉伯联盟。一九五五年创立穆斯林青年国际大会。一九六九年伊斯兰外长会议在吉达召开。

次年，在卡拉奇通过了伊斯兰大会宪章，为伊斯兰国家最高级首脑会议，常设外长会议和吉达秘书处作准备。一九七二年建立一个伊斯兰国际新闻社。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卡拉奇建立开始就有十亿美元储蓄的伊斯兰发展银行。

一九七四年，穆斯林世界联盟会议采取步骤以协调全世界的伊斯兰教活动。在同一会上，要求所有穆斯林政府将《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行作为基础文件并加强伊斯兰法律。会上还强调建立伊斯兰健康、教育和福利机构。现有的伊斯兰宣教团加强了力量，而且还建立了新的宣教机构。基督教徒所要特别注意的是，每个穆斯林国家的基督教传教活动都被禁止，其机构被接管，并改为伊斯兰教所用。

为实行这些“改革”，伊斯兰教国家一直在采取积极步骤。孟加拉宣布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朗和巴基斯坦已经执行伊斯兰法律。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正在复兴。正统的伊斯兰教长遍布印度尼西亚，试图淨化伊斯兰教。在几个伊斯兰教国家里，基督教学校已被国有化，不再给基督教传教士签发新的入境签证。

北美的情况也深深令人不安。这个地区的穆斯林人口估计有一千万，穆斯林移民，黑人穆斯林有十万到一百万。犹太人地区空闲的犹太人会堂被买去改作清眞寺。沙特阿拉伯给那些到麦加朝觐的新信徒以大量的经济补助，最近又拿出五千万美元用作黑人穆斯林的社团发展计划。从国外来的穆斯林学生人数也相当可观。

近年来，伊斯兰国家由于几乎对石油的垄断而积聚起来的巨大经济

实力，为他们通过宣教，经济引诱和军事冒险等手段实行伊斯兰扩张，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

那么，基督教会对已经复兴的伊斯兰教如何做出反应呢？下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几点想法。

首先，我们必须把基督教信息与西方文明分开。伊斯兰教对现代西方世俗主义的各种形式的观察及其相互影响已达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当前的伊斯兰复兴就是伊斯兰教对观察和相互影响之后所作的回答。伊斯兰教与西方的不可知论，唯物质主义，或道德堕落没有调和的余地。

长期以来，西方传教士不知不觉地把自己的文化传统强加给要发展的信徒。在那些人们本来就愿意接受西方文化的地方，情况是好的、但是对伊斯兰教地区来说就不同了。他们长期以来就有反对西方的偏见。直到最近我们方发现，所谓穆斯林对抗福音不是别的，只是对抗福音传播者的文化。当福音通过圣经函授课程，或广播节目这样一些相对来说不拘一格的形式进行传播时，效果是喜人的。而在个别情况下，那些当地传教士，或旅居的侨民传教士由于能够采取所在国文化形式，传教工作就有所收获。

这也说明了面临基督徒对穆斯林使命的第二个问题。基督教传教士固然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他们同样要尊重在其中工作的穆斯林文化。当然，在吸收新内容时，他们必须留心圣经上的原则，反对诸说混合主义（包含那些基督所不赞成的价值和仪式）。

伊朗危机和复兴的伊斯兰教，对基督教传教事业帮了大忙。对西方世俗主义的武力对抗在福音信息和西方文化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它也帮助我们认识到，福音信息可以与其西方文化形式分开。就在伊朗好斗学生与美国对抗的时候，一些德黑兰的伊朗人，通过已改宗的穆斯林，已经逐渐信仰了基督。

随着伊斯兰的复兴，福音传播的势头一直越来越大。在那些强制推行伊斯兰教法律的国家，转信基督的穆斯林正在戏剧性地增加。老的传教士报告说，对福音的感受性比以前要高。

我们眼前正演着两台戏。第一台是伊斯兰教几乎在世界范围内的复活。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的正统穆斯林正在觉醒，跃跃欲试，并变得更加好斗。互相携手的穆斯林国家与日俱增。验证穆斯林某些世界性打

算的计划正在出现。重要的是我们应如何来解释这些现象。作为西方基督徒，如果卷入伊斯兰和西方那种长期的对抗赛，将给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危害。但当我们认识到，伊斯兰复兴是对西方世俗主义，连同其无神主义，唯物质主义，和道德堕落的一种否定，那我们就可以指望，穆斯林渴望更加以神为中心和更加道德的东西。复兴的伊斯兰教，部分原因是对神的王国的一种乞求。细心而敏感的基督徒正从其中得到鼓舞，并在穆斯林当中找到空前多的对福音有好感的人。

第二台戏是福音在不少穆斯林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着。我们不要盲目反对伊斯兰的复兴及其咄咄逼人的宣教活动，从而助长过去的那种文化偏见。

我们要有在穆斯林中取得收获的想法，及向他们传教时顺从基督的勇气。上帝叫我们把长期以来的偏见和疏忽放在一边，去在那些基督为之而死的悲伤朋友中发展信徒。

（原载美国《今日基督教》一九八〇年三月二十一日　颜昌友译）

为了建立伊斯兰社会的亚洲穆斯林

（英国）《经济学家》记者　戈弗雷·詹森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詹森是信奉伊斯兰教的英国记者。这篇文章介绍了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穆斯林情况。

世界上将近二分之一的穆斯林，约三亿三千万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四国。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徒分为三个阶层：一、居于统治地位负责行政管理的教徒；二、由伊斯兰学者和因循守旧的教徒组成的正统伊斯兰教徒；三、由虔诚的、提倡改良的俗人组成的强硬的伊斯兰教徒。从理论上说，正统派和强硬派都具有建立伊斯兰社会和伊斯兰国家的共同目的，而实际上正统派经常与政府串通一气镇压强硬派。

伊斯兰的各种改良主义运动都认识到建立伊斯兰国只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新的目标是建立伊斯兰社会，通过教育培养优秀的穆斯林来实现这一目标。】

世界上将近二分之一的穆斯林，也就是说在七亿五千万教徒中有三亿三千万人居住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四个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外界人认为，这些政府是坚定的，甚至是强硬的穆斯林政府。当地的强硬派则不这么看。他们争辩说，这些政府是害怕穆斯林的斗争精神的，因为这是最可能推翻政府的力量。各国政权不能公开同这些强硬派斗争，所以它们努力智取强硬派。因此，由于这些政府声称自己是维护地地道道的伊斯兰教的，许多穆斯林只得屈从于违背自己信仰和习惯的一些歪曲教义的活动。

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徒有三个阶层：第一，居于统治地位的负责行政管理的伊斯兰教徒；第二，由伊斯兰学者和因循守旧的教徒组成的正统伊斯兰教徒；第三，虔诚的俗人组成的强硬的、提倡改良的伊斯兰教徒，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虽然决不是全部）是青年人。从理论上来说，正统派和强硬派都具有先建立伊斯兰社会并进而建立一个伊斯兰国的共同目的；但是实际上，正统派经常同政府串通一气以镇压强硬派。

第一阶层，伊斯兰决策集团，由宗教和宗教事务部长组成，加上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教会组织。第二阶层是一些正统组织，譬如，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党；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的一部分，和两个伊斯兰学者组织；孟加拉国的穆斯林联盟的三个分离出来的派别和伊斯兰民主联盟的一部分。

第三阶层，强硬的伊斯兰，其代表在印度尼西亚有过去的马斯友美党（现在换了不同的名称），该组织现在仍由年事已高但精力旺盛的穆罕默德·纳西尔领导；有加入附属于万隆技术大学的萨勒曼寺的一批男女青年；有大学和中学联合会；有大规模的穆罕默地耶教育组织，还有寺庙青年俱乐部的一个松散联盟。在马来西亚，有安瓦尔·易卜拉欣为首的阿比姆青年运动和伊斯兰教党的青年一派。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有伊斯兰党，该党过去曾是大毛拉毛杜迪领导下的一个运动，现在分在两个国家分头活动——虽然在孟加拉国的敌对环境里主要处于地下。该党在巴基斯坦和在孟加拉国都被承认为政党。

根据伊斯兰原理，宗教和政治活动之间没有分别：一名真正虔诚的穆斯林政治家致力于最终实现伊斯兰国家的工作，而以实现伊斯兰社会作为第一步。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统治者们曾正式宣布过宗教和政治活动必须分开。然而孟加拉国宪法有一条这样规定：相信真主“应

是一切行动的基础”。

齐亚·哈克将军在巴基斯坦比这走得远得多，他对伊斯兰教进行了一些根本的改革。但是，在新的强硬派运动中的改革派看来，他的权力的独裁性使他不符合伊斯兰教的正统做法。伊斯兰教纯政治理论的要旨是，应该既可以同意他人意见，又可以进行磋商和取得一致意见。因此，世袭君主政体和独裁政治，不管是文职的还是军方的，两者都是纯伊斯兰教徒所深恶痛绝的——尽管在伊斯兰的整个历史里，世袭君主政体和独裁政治一直是政府的通常形式。

这些穆斯林政府由于不能也不愿满足强硬的伊斯兰教徒的基本要求，便凭借镇压和智取的做法，正是在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这些强硬派大都处于守势，抵抗政府从多方面发动的非常猛烈的攻击。印度尼西亚使用过的最有效的战术之一不过是减少穆斯林的官方数字。一般人认为印度尼西亚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穆斯林，但是，通过篡改人口统计的办法，把这个百分比降低了。例如：对于“你能念古兰经吗？”这样一类别有用心的问题，如果普通的、不识字的穆斯林不答复“能”的话，他或她就被列入非穆斯林一类。

甄别和压制

印度尼西亚的四个穆斯林党已合并为一个党，名叫建设团结党。在过去的三次选举中不许该党提出宗教问题，因此，使该党丧失了它在选举中的特殊号召力。选举名单受到审查，候选人受到甄别（一九七一年三分之一的人被否决）同时投票和统计票数的工作受到干预。尽管有这些障碍，穆斯林联盟在一九七七年以及一九八二年五月的上次选举中，在四百六十个席位里令人满意地赢得了九十六席，虽然在一九八二年，他们在首都的席位丢失给政府了。

印度尼西亚的第三战术是对其他宗教给予官方支持，以便把他们作为对伊斯兰的抗衡力量。印度尼西亚除了精心制定和广泛宣传对建国五项原则（印度尼西亚神秘的官方思想体系）进行非宗教性崇拜之外，还复活了佛教，巴厘的温和的，外来的印度教徒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政府还提倡爪哇人的一种信仰，称为“忠诚”，这是万物有灵论、神秘主义和妖术的奇妙的结合，据说，这是苏哈托总统和他的一些高级将领的个人信仰——当然，这是他们除了信奉伊斯兰教之外的信仰。

天主教徒从官方的保护中受益最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教堂的数字增加了三倍，教徒人数增长一倍（据信这些皈依天主教的人，其中许多人过去是共产党员，在一九六五年大屠杀后，为了逃避迫害改变了信仰）。天主教传教士现在有自己的私人机场，这种机场遍布整个印度尼西亚，仅在一个省里就有四十一个。苏哈托先生利用天主教的少数派，多少有些象伊朗已故国王曾利用他的宗教少数派来填补伊朗的情报机构的职务一样：天主教徒现在担任诸如武装部队副司令、国防情报机构负责人，以及负责政治和安全事务统筹部长。结果，印度尼西亚的天主教和穆斯林之间旧有的亲善关系正在消失；天主教徒面临可怕的命运，正象伊朗的白哈教派在政权更迭后失去了官方的保护一样。

伊斯兰教徒在马来西亚的竞争虽然同在印度尼西亚的竞争有些类似，但是不象在印度尼西亚那样勾心斗角和复杂。正象印度尼西亚对文武官员进行建国五项原则的思想灌输那样，在马来西亚除了正式的伊斯兰教育外还给他们上正式的思想课——睦邻。在马来西亚，管理伊斯兰教的工作由联邦的各个州的象君主的统治者亲自负责，因此，使它在伊斯兰世界里最近似于以被加冕的元首为首的国教。

在政治方面，官方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和正统的伊斯兰教党之间存在不平等的一对一的竞选斗争。在马来西亚对各种政治活动存在非常多的限制——譬如，不许召开露天会议，除非有一位部长在会上讲话——以致于青年运动阿比姆仍然严格地保持着超政治性。即使如此，它的活动也是受约束的。不让学生加入这个运动，经常不让它召开会议和座谈会，它发行的一种月刊也不让全部出售。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安瓦尔·易卜拉欣于两年前未经审讯就被监禁；在阿比姆运动中担任职务的文官和教师被降级。尽管有这种种限制，仍要求取缔阿比姆运动，还要求取缔以槟榔屿为基地的改良主义阿利兰集团。该集团承认其成员为五十五名知识分子。

不鼓励去麦加朝觐

全部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政府也许是在一九七九年查封麦加的大清真寺后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可能为危险的激进思想提供了繁殖场所。因此，为了给这样做带来更大的困难，看来这些穆斯林政府正试图限

参加朝觐活动的人数。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可以以缺乏外汇为由，但是这种借口既不适用于印度尼西亚，也不适用于马来西亚。在印度尼西亚，前去朝觐的费用提高了，飞机票要价过高，以及由于宗教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困难，进一步阻碍了朝觐活动。

在所有这四国里，另一教规是：在清眞寺进行重要的星期五聚礼布道时，要受到官方的检查和控制。在大多数星期五聚礼和所有重要的宗教活动时刻，宣教的内容和指导方针均由宗教部交给伊斯兰教长（领拜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签订的伊斯兰合作协定的条文之一是，保证抵制“伊斯兰的消极影响”。

最多、最大、最高

官方的伊斯兰试图智赚强硬的伊斯兰教徒，方式上也存在一定格式。其中最明显的方式是修建更多的清眞寺，经常是沙特阿拉伯或利比亚提供资金（强硬的伊斯兰教徒倾向于以可以容忍的态度对待沙特阿拉伯，并且根据他们能理解的情况宣布利比亚的伊斯兰革命是浅薄而愚蠢的）。一九六七年，马来西亚有两千座清眞寺，每座清眞寺有三千名伊斯兰教徒；此后的十年内又修建了两座清眞寺，大多数是用公共资金修建的，尽管穆斯林的人数仅占联邦人口的一半。吉隆坡和怡保都声称自己在东南亚将拥有最大的伊斯兰组织。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修建不必要的清眞寺是当官的伊斯兰教徒的首要活动。伊斯兰堡的一座新清眞寺拥有世界最高的塔尖。

官方伊斯兰的另一个特点集中于伊斯兰的外向表现：在电台和电视台大量播放伊斯兰的消息，猛烈攻击酗酒、吸毒和流行音乐组织，鼓励学校的女学生穿长服，并不让她们和男学生接触。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花了大批的钱用来搞背诵古兰经的竞赛活动——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沒有人明白古兰经的意思。

官方的伊斯兰还有一个特点是支持传道。宣教组织——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福利协会总部大楼是由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出钱修建的，在吉隆坡大概是最高的楼房；该组织声称共有十六万皈依者，其中部分是马来西亚的精明华人，他们最会见风使舵。

官方的伊斯兰中一项有意义得多的活动是纳天课税和什一税，对现

金收天课税，对地产收什一税。在马来西亚，大多数征收什一税，因为农民在政治上是软弱无力的，而有钱的人在政治上是强有力的。在巴基斯坦，则又当别论，因为地主和农民输送了掌权的军官和军人。

征收和分配天课税是齐亚将军在巴基斯坦进行的伊斯兰化运动的长处之一。在一名非常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导下，把钱征收上来，然后通过由三万二千个天课税委员会组成的一个权力分散的机构，把这些钱分配给贫苦人。该委员会成员是在村或四周村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选出的。对穆斯林企业家和官员的银行账戶强迫征收天课税，是齐亚政权在生活较优裕的巴基斯坦人中不得人心的一个原因。

官方的伊斯兰活动的另一个好例子是达卡的伊斯兰基金会的活动。该基金会由一位职业官僚沙姆斯·阿拉姆负责，他说："我只不过是一名行政管理人员，但是，很可能成为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先生'。"基金会设于大清眞寺广场的一座大清眞寺内，它是一座灰色水泥的怪建筑物，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对任何穆斯林国家来说，这都是一座最丑的大清眞寺。在过去两年里，沙姆斯·阿拉姆使这个基金会恢复了活力。

他的最有趣的冒险活动在伊斯兰世界大概是无双的，他从各个村找来阿訇（这些阿訇在村子里是自相矛盾的保守主义的化身），把他们变成这样的穆斯林，即相当于从事工作的神职人员。已有一千多名阿訇就各种科目受过四十五天的突击训练，如村行政管理、急救办法、其中包括五小时的产科课程、施肥、杀虫、渔业和轮作课。目标是把十万名阿訇训练成团体领导人。

把穆斯林变成优秀的穆斯林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都认眞对待强硬的伊斯兰教徒提出的挑战，认眞到试图要末把他们控制住，要末把他们压倒。这表明，这一挑战是经过认眞策划的挑战。各种改良主义运动之间的接触不是特别密切或有连续性的，可是它们却得出了同样的诊断和治疗方法，这种一致之处令人感到惊讶。他们都说："不要向我们谈论伊斯兰国。那只是一个远距离的目标。"他们的分析是，一些较老的伊斯兰党——印度尼西亚的马斯友美党，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党，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联盟和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均试图在政治上抄近路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他们试图通过政党、宣言或选举取得权力；当这

些方法都失败后，他们转而采取暴力行动。

新的目标不是建立伊斯兰国，而是建立伊斯兰社会，这一目标通过缓慢的转化，通过教育和宣教者的努力来实现，以便使穆斯林变成优秀穆斯林（一个优秀的穆斯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特别不屈服于“现代生活”中一些邪恶的东西，如贪污和消费主义）。当一个社会有足够的优秀的穆斯林时，这个社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伊斯兰社会。如果伊斯兰社会建立起来，而且能坚持下去，那就必然会产生一个伊斯兰国家。而这一过程将要花多长时间？这些年轻的男人加上少得令人失望的年轻妇女的答复是，至少一代人时间，也许两代人时间。这些二、三十岁的青年人是有献身精神的，甚至是狂热的，但是并不着急。

西方人往往把激进的穆斯林的总计划说成是过分简单化的，甚至是头脑简单的计划，因而不予理会；他们说，社会不再以那种方式运转。在那些宗教仍是活跃势力的社会里也许能那样运转，正象现在在穆斯林社会里就是那样。

改良主义者们看来由于避免这种政治选择而使自己处于基本上无懈可击的地位。甚至最敌对的“穆斯林”政府如印度尼西亚的政府也不能禁止他们安排妥善的和大规模的教育、社会和文化活动。这些活动是相当可观的。譬如，在印度尼西亚，马斯友美党管理四所正规大学，还加上一些医药和工程院系。穆罕默地耶管理一万二千座学校。穆罕默地耶长期来都是非政治性的，但是，由于官方的对抗，现在已成为强硬派组织了。最大规模的大学生组织——伊斯兰大学生联合会——是伊斯兰组织，它有十四万成员正在受政治活动、社团发展和领导方面的训练。

在马来西亚，自然一切都是规模较小的：阿比姆的八十六个支部拥有四万成员加上一万五千名学生同情者；它管理七所高中，而且在周末管理医生治病的村诊疗所。在孟加拉国，伊斯兰党声称它拥有十万个办公室，仅在年轻人里就有五万成员；它有若干所小学和初中；在达卡，它有两三个社会中心和诊疗所。在巴基斯坦，较老的伊斯兰党是非常活跃的。它声称自己有一百万党员，管理着五十多所学校，每年有“数百万人”在自己的诊疗所和流动药房受到治疗；任何时候都有两万名学生由于它资助教科书和学费得以上学。

这些组织并不是由于这样做好事而成为伊斯兰组织的。培育“优秀穆斯林”的工作是在一些十来个左右的人一道学习、讨论和礼拜的小型

会议上进行的。对马斯友美党和两个伊斯兰党组织来说，这些会议是每周一次；而阿比姆至少是两周一次。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党说，它有三千个基层组织，只有卡拉奇设有“同人团体”。在孟加拉国，伊斯兰党的正式党员必须回答就他们每天的活动提出的、多少有点令人望而生畏的十道问题。

今天，在穆斯林世界里规模最大而又最不为世人所知晓的宗教运动是复兴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本身并非强硬派，但是却使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强硬派具有复兴伊斯兰的牢固基础。这项运动于一九四五年左右开始于新德里，并发展成为相当于重振道德运动之类的伊斯兰运动。其目的在于产生优秀的穆斯林——再生的穆斯林。一名优秀的穆斯林必须每天用一小时、或每周用一天、每月用三天、每年用四周或是一生中用四个月时间亲自从事宣教工作，主要是挨家进行拜访。复兴运动没有正规的办事处，没有组织机构，甚至没有固定的会员。但是，它吸引了各个阶层的各类穆斯林，从大学教授到农民。在达卡附近的一座小城镇通吉举行的一年一次的三天庙会上，吸引五百万人聚集在一起；每年麦加的朝觐活动吸引的是两百万人。复兴运动已把它的活动扩大到每个有穆斯林的国家。

虽然目前南亚和东南亚的伊斯兰改良主义组织差不多都避开政治活动或是回避谈论建立伊斯兰国，但是，他们总有一天必然卷入政治活动。到那时，我们就会知道，他们作为优秀的穆斯林，是否能使自己的国家获得优良的治理。

（原载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
曹玉如译　方乐颜校）

巴基斯坦的伊斯兰社会

伊斯兰堡伊斯兰研究学院　塔希尔·苏尔蒂

【内容提要：巴基斯坦是在“一切非主，唯有真主”这一基本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伊斯兰命名是巴基斯坦建国的首要条件。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在理解伊斯兰、注解古兰经等方面有着不同的见解，面对西方现代化的挑战，他们分成三派，即“守旧派”、“怀疑派”和“务实派。”

“务实派”是一些目光远大的经济学家，其中一些人在政府中任职，主张必须首先考虑和解决穆斯林面临的实际问题，必须对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改革。】

巴基斯坦以伊斯兰的名义在世界地图上出现了，这是巴基斯坦建国的首要条件。巴基斯坦是在一切非主，唯有眞主这一基本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参加了在孟买举行的一次庆祝会，已故最伟大的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眞纳主持了这次庆祝会，他以尊贵的古兰经指导了这次庆祝会，领袖站起来说：这本古兰经就是巴基斯坦的宪法。

全世界穆斯林的目标是一个

全世界穆斯林的目标是一个，即诵念赞主词，行好事，鼓励人们向前，实现包括全人类利益的更美好的愿望。最伟大的领袖说，我们建立了巴基斯坦，它是对伊斯兰原则的实践。它是一粒种子，种子将长成一棵大树，被折磨被压迫的人们将以它遮荫，人类定能在这里建立起正义，这里的人们只崇拜一个神，这里充满了社会正义，我们以它来团结世界穆斯林的力量，尔后我们号召世界都象我们一样来进行试验，步我们的后尘，直到眞主的光芒普照全球，实现全球的安全与和平。人再也不能妄称他是任何人的主宰，任何人都不有求于任何人，所有权属于独一的万能的眞主。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对伊斯兰有不同的理解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象世界穆斯林一样，相信他们的宗教是眞理，他们从内心深处希望在自己的国家建立一个忠诚的伊斯兰社会。但是他们在理解伊斯兰，分析伊斯兰指示，注解古兰经，解释圣训和阐明教律学等方面，见解是不同的。

他们当中有的人由于对伊斯兰无知，只知道伊斯兰的名字；有的人是从他们父辈的行动，从先辈学者的著作中了解伊斯兰；还有的人是从东方学者的外文著作中了解伊斯兰的。

学校和学院的伊斯兰教育

根据巴基斯坦人民对伊斯兰教育的渴望，政府规定对小学和中学学生必须进行宗教教育，学生根据政府的教学大纲进行学习。大学和学院的学生是作为选修课来学习伊斯兰的，他们可以获得硕士和博士的最高文凭。

有六百多所阿拉伯文学校，这里的学生用阿拉伯文书籍学习宗教课。所有的学校都是由宗教协会和宗教学者管理，经费由有钱人和富翁们捐助。

宗教基金会起着值得称赞的作用

有一个由政府负责管理的宗教基金会，过去是混乱的，自从政府接管以来，进行了有利于人民的改革。我们这里的宗教基金会，出版宝贵的宗教书籍，成立一个学院，培养清眞寺教长和演说家，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由大学的专家教授就一些现代科学问题作报告，使教长和演说家了解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新动向。这个学院有一个宝贵的图书馆，学者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宗教的和科学的书籍。这个学院的办学目的也在于改进阿拉伯文学校的教学大纲。

这个宗教基金会还负责管理巴哈瓦尔布尔大学，学生在这所大学里用阿拉伯文学习高深的伊斯兰学课程。基金会还根据时代需要以全力继续提高宗教课的教学水平。

宗教基金会还有另外一种特点，即非常可靠地把人们送来的所有奉献和捐赠集中起来，为了眞主，把它们用于伤残者、病人、鳏夫、用于

穷家女儿结婚和扫盲。

为了实现人民要按伊斯兰教规办事和尊从安拉命令的日益增长的愿望，政府成立了伊斯兰研究学院，伊斯兰文化学院，以研究伊斯兰伦理，出版宗教学著作，引导人民科学地、理智地、自由地解决新问题，因为书籍对建设社会是有影响的。

巩固伊斯兰法的努力

为巩固伊斯兰法作出了巨大努力，中央议会和地方议会负责这一工作。在伊斯兰法方面，议会要征求伊斯兰咨询机构的意见。

过去宗教复兴运动的失败并未使他们挫肘

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大众有一个迫切的愿望，即建立任何一个宗教复兴运动，以便他们参加这一组织。当伊斯兰宣传者号召他们要竭力团结在伊斯兰周围的时候，尽管由于过去宗教复兴运动的失败使他们感到失望，但这种愿望仍然在他们当中重新被提出来，因为他们中多数人相信，伊斯兰是眞理，过去宗教复兴运动失败的原因是领导者的错误，他们缺少经验，或沒有理解他们时代的需要和要求。

如果我们仔细了解这种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穆斯林人民失去了忠于伊斯兰教导的热心的领导人。

巴基斯坦宗教运动中的三派

自从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西方现代文化之间发生爭夺、欧洲的政治占领不断向他们挑战以来，我们看到在巴基斯坦有三派或称三种宗教观点接受了这一挑战，幷在这场战斗中与之交锋。

左右巴基斯坦伊斯兰社会的这三支力量在巴基斯坦人民当中产生了影响，幷以此为中心进行宗教活动，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谈一谈自印度次大陆分裂后它们在巴基斯坦的活动。

第一派

第一派或第一种观点，主要是反对所有的科学发展，根本不承认时代的迫切需要，认为世界应停止在十四世纪以前的状态，它应该象它的前辈一样丝毫不变地坚持它的宗教生活，任何企图了解现代发展和时代

需要的都是谎言和伪善。

所有守旧派都属于和维护这一派，其中包括极端顽固的强硬分子，绝大多数国民都支持他们，他们那里有他们自己的学者和教法说明官作判断、分析、禁止、思考和拒绝，他们的判断对舆论界很有影响，他们有传播自己思想的手段，或用笔，或口头，他们中有些人很擅长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有很吸引人的表达能力，一批有组织的人都支持他们的意见，为执行他们说的话和发出的命令视死如归。

他们沒有古兰经的注解，只有先辈注解的纪录，特别是伊斯兰教初期的先辈们的注解。除了先辈们的注解以外，任何人都无权有任何新的见解，穆罕默德言行的精华都记载在古代法学家的著作中，任何人都不能逾越。

这一派还竭尽其所有思想和理论力量，及其推理和论证力量来证明古代法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所记述的内容，用古代法学家根据若干世纪以前的社会情况和时代需要制定的法律条文来束缚奔腾前进的现时代，而那时并沒有遇到这些新问题，例如银行利息或保险，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产业工人的控诉、宪法问题、终审权、妇女自由和限制面纱、节制生育、一夫多妻、以及看月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只是用新的措辞，老一套办法，重复先辈们的著述，发展着的时代精神和现时已经达到的科学水平均与他们无关。

第二派

第二派或第二种观点，除古兰经外，否认一切古老的东西，它希望抛弃第一派背负的所有古老的负担，认为这些都是阻碍达到伊斯兰崇高目标的障碍。这一派对所有现代问题，从银行利息到妇女自由及类似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它有追随者，但是数目屈指可数。一些批评家认为，它比第一派更能了解新问题，这一派只根据古兰经和现代科学发展看待一切问题，屏弃一切老看法，有时也作一些几乎古人从未有过的注解和说明。

这一派的特点之一是对引证的圣训和教法书上沒有规定的东西抱怀疑态度，允许加入苏菲派，完全不依靠任何注解。一些学者指责它极端自私自利，过份地妄自尊大和自负，对先辈不信任，不了解他们的科学地位。

第三派

至于第三派，它拥有许多研究古代与现代的学者，他们了解新生活的问题和科学发展的规律，他们了解古兰经的规定和现实的宗教教导。他们是一些经济学家，他们的目光是远大的，心胸是宽广的，思想是高尚的，他们努力把每一件事情都放在应有的地位，他们对自己的宗教有深入的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政府的职员，在政府办的伊斯兰研究学院中任职，但是由于第一派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所以他们在改进伊斯兰社会方面没能成功。

这一派认为，学者必须研究和优先考虑穆斯林的事务，根据伊斯兰的教导，解决穆斯林民族所遇到的一些重要问题。

贫富悬殊的改革

为此，必须改革不平衡的经济制度，因为人的贫穷是穆罕默德祈求眞主使人们免遭其害的弊端。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眞主啊！我祈求你使人们免遭背叛和贫穷的灾难。他身边的一个人说：眞主的使者啊！这两者是否应该改变？他说：是的。这是今天世界上有识者已经了解的至理名言。在许多非伊斯兰国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看到伊斯兰国家的人民至今仍然在贫穷、卑贱和匮乏的重压下挣扎，而他们遵眞主命令要为眞主而努力捐赠、施舍和交纳天课，不储蓄，不放债，不爱财，不积累金钱。这一派强调，如不解决这个经济问题，这个时代的任何民族决不可能繁荣昌盛。众所周知，这个问题决不会再继续下去，并将于最近解决，但是伊斯兰的繁荣和幸福关键在于首先以伊斯兰的名义根除这一弊端。

妇女自由和对面纱的限制

有一个妇女自由和限制面纱问题，她们参加社会建设达到什么程度，她们应该做什么工作，学什么技艺，担任何种职务的问题，因为如果妇女不工作，就会使社会上一半人没有职业，这个民族就不能进步，并将把一半人的担子担在自己的肩上。

教育问题

关于教育问题，以及教育要适合时代需要和伊斯兰原则，这是一个难题，我认为我们尚未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新的普及教育计划为解决这个问题作了成功的尝试，它强调，教育问题需要不断地改革，这个问题没有最终的决定。

（原载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一九七三年十月号　马亚慧译）

世界屋脊上的穆斯林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　法赫米·胡韦迪

【内容提要：居住在印度北部靠近中国的洪扎人信奉伊斯兰教，属于伊斯马仪教派。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阶梯上，在最巍峨的山巅、在最坚硬的石块中，与云母“杜马尼”和山神“希法”以及神龙和精灵为伍，神话般地与世隔绝地生活了两千年，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才同我们这个世界取得联系。】

洪扎在哪里？洪扎苏丹回答这一问题说，他的国家是在俄国、中国、印度和西藏的交界处，位于印度最北端，一千多年前原是一个王朝，后来分成了两部分：洪扎和纳吉尔。到现在为止，洪扎一直是很强大的，它的统治范围达七千平方公里，人口为三万，分散在四十四个村庄里务农。

不是亚历山大的子孙

普遍认为，洪扎人有非洲血统。流传的故事说，有五个亚历山大大帝的士兵（公元前四百年）在洪扎迷了路，他们得了病，便在那里定居，结婚，蕃衍下来，形成了现在的一些部落。

但是历史研究根本不同意这种说法。最正直的研究人员不排除这种非洲血统，即属于少数的洪扎库特人，但是最可能的是，他们最明显的欧

洲人特征是受了都兰（土耳其）血统的影响。

无论他们是属于都兰血统，还是亚利安或伊朗血统，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公认的最起码的看法是，洪扎人是属于亚洲血统而不是欧洲血统，尽管代表统治家族的贵族坚持说他们属于非洲血统。关于洪扎传说的神话色彩，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神话色彩都浓厚。你可以想象，这个与世界隔绝了二千年的社会可能有罕有的特征，它不知道什么叫政府权力，也不知道货币和赋税这种语言，他们的主要食品是杏子，人人长寿，平均寿命为一百岁！

在七十年代，洪扎历史上出现两次重要的变化，第一次变化是一九七四年巴基斯坦总理宣布，洪扎王国属于巴基斯坦政府管辖，取消埃米尔和议员职位，彻底结束了洪扎最后保留的特权和独立性。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一九七八年修筑了喀拉昆仑公路，彻底结束了这一地区的隔绝状态，使其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洪扎地区包括三部分，最高部分与中国新疆毗邻，居民讲“瓦哈”语，中部是最大部分，讲“俾路支”语，山麓地区讲“希纳”语。三个地区共有四十四个村庄，居民三万人，多一半是俾路支人，讲俾路支语。

洪扎人口少的主要原因是，伊斯马仪派的人只允许同一个女人结婚，而一个母亲每三年才生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女人给孩子喂奶的时间要整整两年，这是大家都遵守的传统习惯，如果再加上怀孕一年，那么总共就成了三年。因此洪扎每一个家庭平均只有两个孩子，也许多至三个，也许少至一个，而巴基斯坦一般是每个家庭平均有五至七个孩子。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妻子都是巴基斯坦其它省份的人。

有一些大家都必须遵守的传统和习惯。例如，在许多落后和发展中的社会，青年与自己的堂姐妹结婚已经成了一条规律，但是在这里却不欢迎这种婚姻，血缘关系越远越受到欢迎。妇女没有土地，也没有继承权，他们只有一些杏树。在过去，结婚只能在冬季，十二月十日至二十日是结婚季节，他们称之为“杜姆欣”。

洪扎的官方节日有八个：开斋节和宰牲节，两个祖传的节日：水塘节和元旦，穆圣诞辰，伊马姆日（纪念阿里继任哈里法），毛拉纳诞辰和毛拉纳第一次访问洪扎（即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纪念日。

开斋节和宰牲节的庆祝活动没有庆祝其它节日那样重要，特别是伊

斯马仪教派的节日，其原因是伊斯马仪派教徒占洪扎地区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五，确切地说，在洪扎地区只有一个村庄的居民属于扎法里耶什叶派或十二伊马姆派，这个村庄就是扎尼什。这一情况是这样发现的：我注意到，我所去过的所有洪扎村庄里都沒有清眞寺，沒有宣礼楼和宣礼人的宣礼声音。后来我又注意到，在扎尼什有两座清眞寺，当我问当地的陪同时，他向我诉说了这一可悲的事实，激起了我迫切要了解这一教派的教义的渴望，最后他领我看了几件令人激奋和可怕的事实。

开始，他们告诉我，巴基斯坦北部这块边远地方的居民属于什叶派，近七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霍拉桑和伊朗的影响，从一开始，他们就属于扎法里耶什叶派，即追随伊马姆扎法里尔·萨迪克，他们的教义在全世界绝大多数什叶派教徒中广为传播，现在，他们的主要中心是在伊朗，其次是伊拉克。

位于洪扎对面的“纳吉尔”酋长国至今仍然属于扎法里耶什叶派，他们有清眞寺，他们礼拜、封斋和朝觐都和其他穆斯林一样。

但是洪扎酋长国信奉伊斯马仪派教义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过去他们信奉什叶派中的另一支，即相信伊马姆继续传到第十二伊马姆，现在他隐遁起来了，现在他们改信什叶派的这一支，即在一系列的伊马姆中，他们站在第六伊马姆扎法尔·萨迪克的长子伊斯马仪一边。

一个普通穆斯林很难接受伊斯马仪派的这些信仰，因为它与伊斯兰教的原则、基础和教义都是抵触的，他们取消清眞寺是人们不能理解的，他们的如下说法是不能接受的，即礼拜的朝向有两个，一个是表面的朝向，在克而白，另一个是内心的朝向，即他们的第四十九伊马姆居住的地方，巴黎的一个郊区。此外，令人怀疑的是，这个国中之国有一条肉眼看不见的铁的纪律，即断然拒绝其他穆斯林加入他们的集体。

（原载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号　马亚慧译）

阿富汗与信仰复兴运动

安瓦尔·穆阿扎姆　穆罕默德·艾哈迈杜拉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从所谓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立场解释苏联入侵阿富汗，认为这是苏联“要保护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政权”，是支持“革命”。

作者介绍，自一九七八年四月以来，阿富汗发生了三次政变，处决了三位国家元首：达乌德、塔拉基、阿明。每次政变都有苏联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军事因素。苏联的目的是摧毁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因此，代表阿富汗各族人民当中的那些亲伊斯兰的阶层逐渐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对政府的运动。这一运动得到所有穆斯林国家民众或官方的支持，力量日益强大。

文章说，苏联支持的卡尔迈勒政权如能提供具体证据证明阿富汗人民生活有了改善，如能给伊斯兰教一个受到尊敬的地位，那这个政权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

近年来，一些穆斯林国家相继建立了伊斯兰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说一九七八年四月阿富汗亲马克思主义政府的建立是“叛教”行为呢？在过去的二十个月中，阿富汗在俄国进行军事调动的背景下发生了一次革命、掀起了一场反对革命的伊斯兰运动、处决了三个国家元首。

阿富汗国内和国际上的事态发展性质非常复杂多变，很难作出分析和预测。然而，从意识形态方面而言，阿富汗的变化意义非常重大，因为阿富汗采取了亲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策立场，同时，某些阶层的阿富汗人掀起了反对革命的伊斯兰抵抗运动。

由于“伊斯兰复兴”的浪潮席卷整个西亚，尤其是毗邻的伊朗和巴基斯坦，因此，必须把这些事态发展作为两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而不是仅仅作为国内问题来加以研究。使阿富汗的政府更迭国际化的是俄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军事因素。应当指出，自一九七

八年四月以来，在阿富汗革命领导人内部发生了三次政变，但是在每次政变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军事支持都依然保持了下来。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在阿富汗军队的支持下对达乌德·汗总统发动政变。塔拉基在同年五月四日宣称，他的政府并不是共产党政府，而是极其尊崇伊斯兰教的政府。然而，正如后来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塔拉基总统是把这场革命当作一场“无产阶级革命”来看待的。一九七九年九月，哈菲祖拉·阿明主席推翻了塔拉基总统的统治，接替了他的职务。阿明当时说，“一人”统治局面已经结束，九月十六日的事态发展使国家向“工人阶级社会迈进了一步”。三个月后，即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发动了第三次政变。这次，卡尔迈勒没有使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而是采取了一种比较和解的态度，宣布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给人们以种种政治自由。但是，俄国军队在此期间对阿富汗事实上的占领却使人毫不怀疑，卡尔迈勒仍在奉行一九七八年四月革命的理论。因此，在阿富汗二十个月来发生的三次革命变化期间，始终存在着俄国的意识形态因素和军事因素。

阿富汗的面积为六十五万平方公里，有一千六百万穆斯林，他们几乎全部属于逊尼派中的哈乃斐学派。阿富汗一直在争取把它的部落文化发展成为现代文化。部族的习惯和传统势力同伊斯兰教教义一样强大。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落后的穆斯林国家之一。由于同俄国的共同边界长达一千公里，阿富汗不得不在许多方面依赖于苏联。俄国向来是向阿富汗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

在达乌德·汗（王室成员）当政期间，俄国的影响大大增强，特别是由于阿富汗于一九五六年同苏联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但是后来，由于受到来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施加的各种压力，和对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敌对所表示的不悦（巴基斯坦本身正显示有足够的军事力量），达乌德认识到必须按新的方针改变他的外交政策。最后在一九七六年至七八年间出现了明确的变化，而不是完全依赖苏联。阿富汗通过同印度、埃及和南斯拉夫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向着奉行不结盟政策的方向迈进。此外，通过达乌德·汗与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后来的总统齐亚·哈克的个人接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善。随着同沙特阿拉伯、伊朗和科威特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苏联在阿富汗所拥有的首要地位开始消失。阿富汗的军事人员正被送往印度、埃及和美国

接受训练。所有这些作法显然是为了摆脱对苏联的完全依赖而加入不结盟第三世界的行列。

考虑到其他某些因素，局势使苏联极为惊恐，以致不能再袖手旁观了。阿拉伯国家石油美元推动下的伊斯兰复兴浪潮以及伊朗的反对国王的伊斯兰革命越来越猛烈和哈克总统成为伊斯兰的倡导者，使苏联极其担心这对苏联南部地区穆斯林可能造成的影响。

到达乌德总统决定使阿富汗摆脱苏联势力范围的时候，苏联在这个国家内部的势力加快了动员进步力量的步伐。有消息说，达乌德总统在群众宗教情绪的影响下，已决定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处决他的一些思想左倾的部长，因此在四月二十七日就爆发了塔拉基革命。

新政权重新命名阿富汗为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就任共和国总统。新政权宣布，它信奉伊斯兰的人道和进步原则，阿富汗新宪法将以伊斯兰和保障个人自由为基础。在接受《阿拉伯人》月刊记者采访时，塔拉基总统否认他们是共产党，并说他们是信仰唯一眞主的穆斯林；然而，宗教是人和他的造物主之间的一件个人私事。尽管有这种亲伊斯兰的情绪，新政府的政策声明表明有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锋芒。塔拉基总统直截了当地宣布，他的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

塔拉基革命是由人民民主党策划的。人民民主党是由人民党和旗帜派联合组成的一个联盟。人民党和旗帜派分别由塔拉基和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领导。这两位领导人都不是军人。他们得到阿富汗陆军与空军一部分人的支持。新政府一成立就得到了苏联与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的承认。

人民党和旗帜派在忠于马列主义问题上看来是一致的。但是据一种看法说，塔拉基和卡尔迈勒之间的根本分歧在于优先考虑什么问题的次序上：人民党优先着眼于权力，然后再考虑共产主义，而旗帜派则完全致力于共产主义。象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证实的那样，看来两个集团合并成人民民主党并不是眞心诚意的。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塔拉基否认人民党和旗帜派之间存在什么分歧。然而两个月之后，即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塔拉基却说，他不承认旗帜派集团的存在。与此同时，旗帜派集团被夺了权。旗帜派集团的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在政变之后马上被任命为副总统，而三个月之后却被解了职，被派往捷克斯洛伐

克任大使。他后来甚至离开了这个大使职务，十之八九是在苏联流亡，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返回喀布尔就任新主席。

在存在这些内部分歧的同时，这些革命者突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人民党的实权人物和国防部长哈菲祖拉·阿明在阿富汗科学院出版的塔拉基撰写的《二月》一书的引言中说，塔拉基谈到了“扩大阶级斗争、解放劳苦工人、成立工人党和促使工人取得进步”等问题。新政府提出了反封建改革计划，注意不触及与伊斯兰有关的问题。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宣布了一项二十二点纲领，其目的是肃清政府内的贪污腐化、实行土地改革和修改宪法，以便制止封建地主剥削穷人。高利贷被禁止（伊斯兰也禁止高利贷）、用大笔彩礼娶媳妇的风俗习惯也被宣布为非法。结婚年龄有所提高。法令规定，拥有不到一千六百平方米土地的小农凡在一九七四年前贷款者无须偿还贷款及利息。规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政府在新闻部内成立了一个人民文化部以便发展阿富汗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如普什图语、达里语、俾路支语、乌兹别克语、土库曼语等等。阿富汗人民民主共和国驻卡拉奇的总领事努尔·扬·科蔡对新政权纲领的宗旨与目的作了如下概述：

据他说，塔拉基总统把无产阶级理论作为人民党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这个国家落后而没有工业，根本就不存在无产阶级。人民党带来了革命。它为被剥削人民的权利而斗争。六百万以上的人民摆脱了高利贷盘剥，三百万贾里布（一个贾里布等于一百四十四英亩）土地分给了三十万戶人家。一万二千名毕业生得到了工作机会。低收入职员以及办公室听差的地位已经提高到与军官的地位相同，现在都可以利用合作商店的方便。消除语言、宗教、种族和部落偏见的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功。教育所使用的是本国语言。这位总领事驳斥了关于新政府是反对伊斯兰教的说法。另一方面，他说明，正在重新修建清眞寺，给清眞寺的那些领拜人规定了薪金（早些时候他们必须依靠人民的慈善捐款生活）。但是他认为，宗教领导人在人民中间引起了一些不好的成见。他还指出，一九七九年大约有八千穆斯林去麦加朝觐，而在革命以前只有三千五百人去朝觐。

就迄今为实行社会和经济改革所采取的具体步骤而言，这些步骤肯定是对阿富汗社会有利的。此外没有事实证明政府有反伊斯兰的性质。开头，其他国家都把这场革命看作是阿富汗的内政。然而，阿富汗各族

人民自己内部逐渐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反对革命的运动。它代表的是阿富汗各族人民当中的那些亲伊斯兰的阶层对他们所称的共产党统治者的抵抗，这些统治者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的目的是摧毁阿富汗国内的伊斯兰。这场运动在塔拉基革命发生后的几个月内变得日益强大，起初只在库纳尔、帕克蒂亚、巴达赫尚和诺里斯坦展开，后来遍及全国各地。阿富汗军队对“穆斯林叛乱分子”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使双方伤亡惨重。因此导致大批叛乱分子越界逃入巴基斯坦领土，在那里建立他们的营地，继续展开反政府游击战。现在据说阿富汗难民人数已不下五十万。

对这一叛乱活动的性质和目的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官方的说法，另一种是叛乱分子的发言人的说法。根据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为止所了解到的叛乱分子的说法，这一运动是由在伊斯兰阵线的旗帜下组织起来的一个伊斯兰力量和民族力量联盟领导的。这些伊斯兰教徒要求：（1）废除一党政权和恢复多党制，（2）撤消新的红旗和恢复伊斯兰的绿旗，（3）撤走军政府各部门的苏联专家，（4）宣布大选的日期。他们认为，新的统治者不尊重宗教，他们逮捕了大批“宗教领导人”（其中有一些被判处了死刑），破坏了他们的学校和图书馆。所不清楚的是这一运动到底有多少组织参加。据这些组织中的一个组织，即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的一位领导人布尔汉丁·拉巴尼教授分析，这场伊斯兰运动最早大约是在二十年前由一些大学教师和“宗教领导人”掀起的，后来扩大到一些大学生、伊马姆和其他一些受过教育的人士中间。它还影响到了武装部队和官僚机构。它的主要基础是在知识分子中间。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的主要目标是：（1）促进和实现伊斯兰教教义，（2）使阿富汗不再有贫穷、失业和镇压，（3）在阿富汗建立一种伊斯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组织研究团体以及在巴基斯坦、伊朗、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出版的书籍帮助下出版伊斯兰的书籍。他解释说，在一九七三年的政变后，这一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虽然在（一九七三—七八年）达乌德政权执政时对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的积极分子进行了镇压。后来，该协会对其成员和支持者进行了军事训练。拉巴尼教授说，该协会当前的首要目标是推翻（塔拉基的）共产党政府，根据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传统教规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将禁止通过非法手段积累财富并将彻底根除贪污腐化现象。将适当

建立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将把国家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该协会反对在语言、种族和部族方面的任何偏见。关于阿富汗各个爱国组织需要在斗争中合作的问题，拉巴尼教授说，他们的斗争已经经历了组织的阶段，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场阿富汗民族各阶层都参加的眞正的群众运动。

虽然对积极参与这一叛乱活动的一些组织的情况了解得很不够，然而，看来有四个主要的组织。据说，这些组织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叫伊斯兰统一战线。这四个组织是：（1）以布尔汉丁·拉巴尼教授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协会，（2）以穆勒维·纳比·穆罕默德·穆罕默迪为首的一个宗教领导人组织伊斯兰教革命运动，（3）以西卜加图拉·穆贾德迪为首的民族解放阵线，（4）穆罕默德·穆勒维·穆罕默德·尤努斯·哈利斯的伊斯兰党。据说这个联盟的主要目的是根据古兰经和传统教规建立一个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另一个受到大家尊重的、有大批追随者的叛乱组织是以工程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伊斯兰党，该组织沒有参加这一联盟，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全国拯救阵线——同上述提到的一些组织都不同，它正在为把流亡国王查希尔·沙阿重新扶上台而作出努力。另外，还有消息说，以一个名叫赛义德·艾哈迈德·吉拉尼为首的一个亲美的叛乱组织请被废黜的查希尔·沙阿国王回到阿富汗被"圣战者"组织"解放了的"国土。叛乱分子的领导人之一齐亚·汗·纳斯里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访问新德里时提到在一九七九年八月还成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名叫阿富汗伊斯兰民族主义革命委员会，其领导人是该组织的创建人法扎尔·拉赫曼·汗·穆克塔德，该组织的最终目的是使伊斯兰教得以复兴，"使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居民联合起来"，这些穆斯林"过去通过英国、美国和俄国帝国主义在西方民族主义概念影响下被搞得四分五裂。这种协调行动最初可以采取成立"穆斯林联邦"的形式。阿富汗伊斯兰民族主义革命委员会正在努力争取实现各叛乱组织之间的联合以对付"俄国的侵略"。据纳斯里先生说，伊斯兰党的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工程师能有效地领导这样一个联盟。纳斯里先生在对伊朗革命发表评论时说，圣职与国家事务应该分开，国家事务应该由政治家、官吏和专家来治理。他认为，宗教领导人有他们自己另外的职责范围，双方应该共处和互相协作。他进一步说，希克马蒂亚尔领导下的伊斯兰党建立了一个电台，用普什图语、波斯语和乌兹别克语这三种语言进行广播。这些叛乱分子还办了一

些刊物，如伊斯兰党的《烈士》、阿富汗伊斯兰协会的《眞理之路》和《圣战者报》，以及穆勒维·尤努斯·哈利斯的《光明》。在伊朗还出版了另一家报纸《赞扬》报。这些刊物是用英语、波斯语和普什图语出版的。为这一运动撰写文章的思想家和作家有：拉巴尼教授、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工程师、尤努斯·哈利斯、阿里·沙里亚蒂博士、伊朗的胡拉姆·贾赫·穆拉德、埃及的哈桑·班纳和库特卜以及巴基斯坦的阿布尔·阿拉·毛杜迪。纳斯里先生称，（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阿富汗大约百分之七十的领土都在“圣战者”组织的控制之下。他们在有些地方建立了地方政府，正在进行着管理。他说，还建立了伊斯兰法院，进行各种判决，包括在公正的审讯后判处死刑。

拉巴尼教授在对塔拉基政府关于它得到阿富汗贤哲会（部族领袖会议）的支持的说法作出反应时，否认存在着这个贤哲会。他说，大约有七、八个来自曾经支持过新政府的所谓宗教领导人中间的人被雇用到司法部工作，沒有独立的地位或公众的支持。他指出，实际上，新政府开办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授证学习班，在学习班毕业，一个人才能称自己是宗教领导人，因此这些宗教领导人后来不得不表示他们是支持政府的。

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已使巴基斯坦政府处于困难境地。它不能拒绝向他们提供方便，也不能把他们赶回阿富汗。它对这种局势采取了一种人道主义的看法，避免同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发生牵连。难民现在还得到了联合国的援助。如果巴基斯坦不这样作，那么，它还必定会在穆斯林国家中间引起不利的反应。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朗，已表示支持叛乱分子的事业。争取解放伊斯兰领土组织秘书处秘书长萨利姆·阿扎姆已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立即向在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提供援助。科威特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伊朗著名的宗教领导人阿亚图拉沙里亚—马达里一九七九年三月十日在电台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向遭受阿富汗反伊斯兰政府迫害的阿富汗穆斯林提供全力支持，后来，阿亚图拉努里在德黑兰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支持圣战者。另一方面，阿富汗伊斯兰党的负责人也表示全力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并且“为伊朗、阿富汗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伊斯兰运动取得成功而祈祷”。

阿富汗政府认为叛乱是由于革命政府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和土地改革而丧失统治地位的封建分子策划的反抗。另一方面，这个运动被称为

“几个狂热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采取的小动作”。政府对关于抵抗运动力量强大的报道持怀疑态度。它甚至否认叛乱分子中有任何重要的宗教领导人。据驻伊斯兰堡的阿富汗总领事说，他们当中有一些毛拉，但是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说，实际上，这些人中有些人不是阿富汗人：例如，毛拉舒雷巴扎尔和他的儿子西卜加图拉·穆贾德迪（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本来是印度人，他们是在很久以前被在印度的英帝国主义者派到阿富汗煽动反对阿曼乌拉·汗国王的叛乱的。穆勒维·尤努斯·哈利斯同伦敦和华盛顿有联系。同样，查希尔·沙阿国王的支持者赛义德·艾哈迈德·盖拉尼来自伊拉克的吉兰，而且是国王的亲戚。这位总领事解释说，所有这些人都占有三万多贾里布土地，同时，因为这些土地已经分配给了农民，因此，他们进行了抗议并发动了叛乱。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奎达拥有大型宫殿，并且沉溺于奢侈的生活。他问道：“这些人怎么能称为圣战者呢？”

叛乱分子声称，一九七九年年初，他们的斗争已在他们所控制的阿富汗不同地区取得了成功。穆斯林战士同阿富汗军队在巴达赫尚、佐尔杜和巴哈拉克发生了冲突。在库纳尔、努里斯坦、乌鲁兹甘、马扎里沙里夫、楠格哈尔、拉格曼、赫拉特和巴达赫尚等好几个省爆发了战斗。还有消息说，阿富汗军队的士兵叛逃到了叛乱分子方面。据报道，这些叛逃的士兵携带了武器，其中包括火箭发射器和高射炮。

上述分析说明了革命政府面临的困难情况。尽管塔拉基政府得到了俄国的全力支持，既有政治上的支持，又有军事上的支持，但是它未能解决叛乱问题。

正是在这些复杂的事态发展情况下，哈菲祖拉·阿明才决定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十四日发动针对他的总统的政变，在政变中总统被杀，权力全部落到阿明手中。领导层这一变动的根本原因不清楚。这位新主席受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祝贺。

阿明政变之后，穆斯林战士加强了他们的攻势。一个一千六百人的装甲旅在库纳尔省的伊萨达巴德向他们投降，这地方在巴格拉兰俄国基地以东大约三十七英里。

这些事态发展太严重了，不能再加以忽视了。苏联似乎也对这两个政权在镇压穆斯林持不同政见者方面的无能越来越不耐烦了。不管是出于苏联的强迫还是出于新的统治者的邀请，俄国军队大规模进入。表明

苏联军队卷入的第一个迹象还是阿明本人提供的，因为他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初曾说："我们并没有要求世界上的任何人来为我们战斗——我们在世界上的弟兄们坚持要来帮助我们。"后来，成千上万俄国顾问的驻扎得到了正式承认。

从阿明的政策声明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他做得太过火，而且暴露出一种过于匆忙地作出重大决定的倾向。这不适合俄国人的战略，他们的战略大概认为最好采取一项果断而有克制的行动方针。然而，许多宝贵的时间已经丢失，只有采取一项急剧的行动计划才能为阿富汗革命政府和苏联挽回局势。不到三个月，这项计划付诸了行动。阿明在二十个月内发生的第三次政变中被打死，旗帜派领导人巴布拉克·卡尔迈勒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担任了新主席。同时，大约二万五千人的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并占领了阿富汗同巴基斯坦边界沿线和其他地区的所有战略据点。卡尔迈勒主席在他第一次讲话中，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词和提到任何意识形态立场，使自己只限于对国内冲突和同邻国的关系表明和解性立场。卡尔迈勒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宣布，他的政府将加强它同所有伊斯兰国家、邻国和印度的关系。阿富汗将坚持它的和平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尊重所有国际协议——联合国公约。它同时还将支持普什图人和俾路支人的事业。除了忠实于被处决的阿明主席以外的一切进步政党都将允许有政治活动自由。答应实行所有的民主自由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并宣布，选举将早日举行。他还宣布，所有政治犯都将被释放，后来他们中大约有二万人获得释放。随后，阿富汗也恢复了绿色国旗。

在领导人更迭的整个过程中，由于在革命者自己中间缺乏一致意见而造成通过两次处决出现了两次政变，成了有利于穆斯林抵抗运动的一种因素。在过去二十个月中，苏联对所有这三个相继接替领导职务、彼此互相反对的领导人的自发支持，无助于弄清他们之间分歧的性质是理论性的呢还仅仅是个人之间的。在塔拉基、阿明和卡尔迈勒这三个人中，看起来阿明的野心更大。人所共知，塔拉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知识分子，阿明把他赶下台显然大大违背了苏联的意愿。据认为，特别是由于阿明使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卷入阿富汗的五年发展计划——类似的做法曾导致了达乌德·汗的倒台，克里姆林宫对阿明的忠诚和意图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关于苏联恢复了同流亡在外的旗帜派的接触

的报道表明，俄国可能在考虑更换阿富汗的领导班子。随着叛乱分子在所有穆斯林国家得到的民众或官方的支持的大大加强，穆斯林抵抗运动的力量日益得到了发展，这使俄国卷入阿富汗革命的威信受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护一个忠诚的社会主义政权，对苏联来说就没有其它选择余地，只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了。根据苏联阿富汗友好条约是可以这样做的。然而，苏联的这一步却带来了很多国际后果，而且其次，它的这一步需要有一个完全可靠的人掌权，以避免以后出现可能的丢脸情况，就象它在埃及由于萨达特而经历的那样。这就说明了苏联采取军事干涉并把阿明赶下台这一双重行动的原因。俄国人在所有这些行动背后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一个兄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和阻止在阿富汗出现一个反共的伊斯兰政权。

上边所追溯的这些事态发展基本上是政治方面的（不能排除这些事态在最近的将来不会进一步发展），而且没有为从理论上对阿富汗局势作出估价提供充分的根据。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却存在着某些导致发生这些变化的永久性因素。最重要的因素是，在一个以一种强烈的忠于伊斯兰教信仰的观念为主导、为进入建立现代平等社会的阶段而奋斗的部族社会结构中，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哲学。俄国人支持的社会主义在阿富汗直接遇到了三个障碍：（1）根深蒂固的部族的观念、风俗、习惯和制度；（2）传统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概念对一种受无神论曲解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抗拒；（3）在人们心目中，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国家是与宗教势不两立的（西方和穆斯林国家关于苏联穆斯林在宗教方面遭到镇压的新闻报道更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阿富汗的革命者已经注意到这些因素，从塔拉基的命题中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上面所谈到的，他的命题是，在阿富汗这样一个落后的穆斯林社会中，社会主义的实行，只能通过军事力量，而不是通过“标准的方式”。然而，通过军事力量是否能够取得成功却值得怀疑。第一，一个军人政府，依靠性情豪放、敢做敢当的阿富汗人（他们过去对这种通过军事力量引进社会主义的做法已经进行了充分的抵抗）对它的容忍，可能会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实现政治上的巩固。第二，在一个保持着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穆斯林国家里，要使由一个指望依靠苏联维持其生存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军人政权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见到成效或得到全面实施，可能性是非常小的。第三，最近几年，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国际化，在

也使阿富汗穆斯林叛乱国际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阿富汗革命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能掉以轻心的一个事实。值得注意的是，阿富汗的穆斯林叛乱者在以建立伊斯兰国家取代这个反伊斯兰政府作为目标的同时，对革命政府发起的社会经济改革的必要性一直没有提出过疑问。事实上，他们目前无需这样做，因为社会主义和伊斯兰的社会经济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正是被埃及的纳赛尔、巴基斯坦的布托和叙利亚及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称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伊斯兰信条中的这种社会经济的平等主义，是使穆斯林国家不接受共产主义的最大保证。尽管有这些外在因素，如果阿富汗的社会主义政权能够提供具体的证据证明阿富汗人民（他们的支持对阿富汗的未来的社会结构来说最终将表明是决定性的）的生活在社会经济方面有了改善，如果能给伊斯兰教一个受到尊敬的地位，至少在法律制度上，象在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这样一些“进步的”阿拉伯国家里所做的那样，它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

（原载印度新德里光明与生活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伊斯兰和当代的穆斯林世界》一书　白景山、师云志、薛琴珍、吴江域、王成凤、薛群、裴善勤译　康敬贻校）

阿富汗的穆斯林

阿富汗人总是带着怀疑的目光看待陌生人，当他们得知你是来自阿拉伯的故乡，并且能背诵古兰经时，疑虑便立即消失，满面怒容变成一副和蔼可亲的笑脸，同时伸出双臂来拥抱你。

阿富汗人对麦加圣地的怀念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在这里，不分贫富，不分老少，每个阿富汗人生前都要设法到麦加去朝觐一次，否则他就会有犯罪的感觉，觉得对他的宗教欠了账。因此，到沙特朝觐过的人在阿富汗人口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在历史上，阿富汗一直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一个思想堡垒，伊斯兰世界许多有名的学者都在这里诞生。在阿富汗的南部城市坎大哈有一座麦扎尔陵墓，据说那里珍藏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圣袍。直到现在，阿富汗

的宗教教育和文化仍象许多伊斯兰国家那样盛行。私塾、宗教学校、经学院遍及所有城乡。

这里的宗教人士分两个等级，一级叫毛拉，他们受过中等宗教教育，一般多是青年人。另一级比毛拉高的，叫穆拉维，只有有经验的长者或在埃及、沙特阿拉伯的经学院或喀布尔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人才能获得这一称号。喀布尔大学法律系只收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是进不去的。

阿富汗的宗教思想总是和各个时代的发展及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的。然而，当代伊斯兰的一些光辉思想却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没能传进这个国家。其结果，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分歧在一些偏远的山村里十分尖锐，这在这个文盲达百分之九十的社会中是很自然的事情。

尽管它的邻国，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着十分活跃的各种教派，但是，由于阿富汗的政治和自然条件的闭塞，都没有能传到阿富汗。

在这里，毛拉的话就是法。一些喀布尔大学的教授们说，他们遇到了难办的事，有时他们对穆斯林们讲真主是如何讲的，先知是如何讲的，而有些穆斯林就会问，“那么，毛拉是怎么讲的呢？”如果有人相信了教授们的话，他就会遭指责，说他不应讲毛拉没有宣布过的看法，应当对此保持沉默，直至真主允许，或毛拉允许！

除私塾和宗教学校外，伊斯兰教法书籍也是传授宗教知识的一个途径，各个家庭都把这类书籍当作神圣的遗产珍藏起来。大人们常常用这些书来教孩子们。

在阿富汗仍然保留着旧式的家庭生活，祖父母和子孙生活在一起，祖父负责家庭教育。每天全家人都要做晨礼，晨礼之后，坐在祖父周围听他讲经，他们背诵古兰经，然后读有关教法的书籍，并尽可能地把它背下来。

阿富汗许多风俗习惯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婚礼就是其中之一。婚约要由毛拉主持签订，婚礼也完全按照宗教习惯进行。举行婚礼那天，新娘要穿一身绿色礼服，据说这是天堂里的人穿的衣服。新娘和新郎的右手要染成绿色，以表示他们忠于自己的誓言。新娘和新郎坐在两张靠在一起的凳子上，两人的头靠在一起，用一块盖巾盖上，然后给他们送进去一面镜子，让他们通过镜子看清对方。因为这里的传统习惯是新郎第一次见到新娘必须是在婚礼上。在新郎和新娘相互看清楚后，就

把一本古兰经放在镜子上，两人随便翻开一页共同朗诵，这表明他俩是在眞主面前结合在一起的。在人们赞美眞主的欢呼声和掌声中盖巾被揭开来，人们再一起唱赞颂先知的歌，朗颂经诗。

阿富汗妇女在一九五九年以前是被禁止出家门的，后来，国家颁布了解除这一禁令的法令，常年蒙在阿富汗妇女身上的长袍也被允许脱掉。

（原载《阿拉伯人》杂志一九七八年九月　王秀纯编译）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

伊朗《新闻周刊》

【内容提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影响，使一些组织学会了利用清真寺作为学校和战壕，采取群众示威游行、大学生参与伊斯兰革命的斗争方式。伊朗“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已变成一些解放运动的政治纲领。所有这些影响就是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

在世界各地，任何争取解放的革命都具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那就是全民性的大运动影响着一些小规模的运动，这些小运动为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加强自己“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地位，需要借鉴比自己大的运动，得到它秘密和公开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战斗的革命家、第一任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在法国同自由的阿尔及利亚签署历史上著名的“埃维昂协议”和标志着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的第二天，在一次谈话中说：“……一次眞正的革命历来都有影响，因为革命从来都不会停止、也不应该停止。阿尔及利亚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也门人民，苏丹人民是同命相连不可分离的……。”

“尽管我成了自由的阿尔及利亚人，但世界各地的处在专制和变相专制统治之下的同胞们未获得解放以前，我的自由并非眞正的自由。我搞革命也应唤起受压迫者起来闹革命，并要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摆脱桎梏。这是吾辈天职。这是每个眞正革命者的天职……。这是其它任何爱好自由者的天职”。在本·贝拉之前，一个革命者曾提到：印度人民的领

袖是甘地。

甘地在应邀到伦敦参加政治会议商谈英国人撤出印度问题时，英国首相对他说："你的所作所为使大英帝国所属国家步你的后尘闹独立，这对于我们来说甚为伤脑筋"。他答复说："艾登先生，我们的目的正是如此，就是要影响别的民族使之得以解放。"

印度革命成功了，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了。今天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也已大功告成。尽管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在内部和外部施展种种阴谋，但无济于事。它依然在各个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社会……甚至艺术和体育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犹如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世界各民族、新老运动的道路，从邻国阿富汗到西半球受压迫的萨尔瓦多所有被压迫的人民都深受鼓舞。

革命必然产生影响。现在已是伊朗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第五个年头，不仅局内人，而且局外人都耳闻目睹伊朗革命是怎样使世界各阶层受压迫者和弱小民族行动起来，以极大的声势影响着各地反殖民主义的争取解放运动。

这对于我们的革命、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无尚光荣的事，它是其它民族的光辉典范，它毫无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之目的。

伊朗革命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影响

巴勒斯坦这块伊斯兰圣地是我们和世界所有穆斯林的世袭领地。巴勒斯坦运动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解放运动。因为，巴勒斯坦落入殖民主义魔掌、被分割已多年。由于这种分割才出现统治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从一九四七年算起已三十六年。显然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巴勒斯坦战士通过各种途径学习了战场上所需要的东西，甚至传授给他人。但在搞运动方面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需要他人的指导和向他人学习，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则保障了这一需要。比如今天的巴勒斯坦战士，无论加沙地带扛步枪的士兵，还是约旦河西岸提机枪的战士都已不是四、五年前的那些巴勒斯坦战士。今日的战士比以往更加机智勇敢。因为巴解成员从伊朗学习到的第一课就是不能将清真寺弃之不用。

清真寺在伊斯兰教创立时就是穆斯林唯一重要的堡垒，但由于殖民主义政策逐渐扩大影响，所有伊斯兰城镇的清真寺都未发挥作用。而伊朗的清真寺在伊斯兰革命中则成为坚不可摧的工事和战斗指挥部。在推

翻国王政权以后，所有的穆斯林，不论是受残暴政权压迫的，或是受温和政权统治的人们都认识到：清眞寺不只是祈祷的地方，而且可以作为学校、战壕和诊所。如今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说：巴勒斯坦穆斯林也把清眞寺变成了战壕，从新的战壕里向犹太复国主义敌人开火。这就是伊斯兰革命对世界解放运动的一种深远影响。

伊朗革命对菲律宾的影响

目前，帝国主义遭到爱好自由民族的沉重打击，有时则是致命的打击。而清眞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给予帝国主义帮凶的打击是至今追随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走狗们未曾遭受过的打击。实际上帝国主义的私生子——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同巴勒斯坦战士们的较量中正领教战壕似的清眞寺的厉害。因此他们不寒而栗闻风丧胆。目前，殖民主义者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不愿再遇到在伊朗出现的灾难。

“不要撤出清眞寺，要使之成为战壕”，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革命领袖和缔造者发出的战斗号令，它不仅改变了巴勒斯坦人的面貌，而且其眞正的含义是所有伊斯兰城市和国家的清眞寺都要住满以民族命运为重和信仰坚定的穆斯林。然而，殖民主义者正仿效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所实施的计划，妄图破坏在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邪恶势力统治下的全部清眞寺。很遗憾，很多地区此类计划业已实施。

菲律宾是亚洲的一个国家，有四千八百万人，其中穆斯林近八百万，这些穆斯林多数都居住在菲律宾南部的一些岛屿，主要是棉兰老岛、巴拉望岛、塔威塔威岛、巴西兰岛、卡拉棉岛、苏禄岛，他们都属于南部居民。

伊朗革命对菲律宾南部战斗的穆斯林的主要影响是人民和神权之间，归根结蒂是伊马姆和人民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伊朗组织革命力量推翻国王统治政权，摩洛人（即穆斯林）拍手称快，在伊朗神权取得胜利后，他们为完成自己担负的任务在菲律宾也实施了类似的计划。据他们的代表说，目前，他们从“人民和神权”联系的尝试中尝到了甜头。

伊朗人民和神权之间建立了坚如磐石的联系，结果赢得这一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它不仅在摩洛解放阵线中产生影响，而且对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不论是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还是受伊斯兰教影响的

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德黑兰召开的“世界解放运动讨论会”上大放光彩。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决议体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所有伊斯兰社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不妨看一下决议的第五部分，决议说：“……我们执行伊马姆霍梅尼的指示，支持阿亚图拉·阿齐米·蒙塔泽里的建议，赞成将伊朗伊斯兰革命日定为世界弱小民族世界性纪念日，我们希望成立伊斯兰阵线，我们将把伊朗作为世界伊斯兰运动的中心，在它的旗帜下，把一切反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斗争推向前进，使它成为一场反对东西方霸权主义的伊斯兰人民运动。”这段话充分地反映了伊斯兰革命对其他穆斯林的影响。

伊朗革命对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影响

撒哈拉是一个北非国家。“波利萨里奥解放阵线”就生长在这块人烟稀少，地域辽阔的伊斯兰土地上，它已为撒哈拉政治上彻底独立而奋斗多年。从星罗棋布的小城镇到炎热干旱的沙漠，从边远的绿洲到繁华的首都均在千方百计为此奋斗。撒哈拉长期被西班牙占领，后来西班牙出于政治需要从那里撤军，于是撒哈拉的两个邻国——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都觊觎这个国家，从而引起了战争。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两军交战，但在这场争权夺利的战争中，穆斯林国家毛里塔尼亚接受了撒哈拉要求独立的正当要求，退出了战斗。如今撒哈拉只是在同摩洛哥和哈桑二世国王战斗。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政权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正式在德黑兰设立大使馆。伊斯兰伊朗在三年前即一九七九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参加了该国独立四周年庆典，根据国际外交关系准则正式承认了撒哈拉的独立。

伊朗对解放运动和当今世界活动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伊朗对超级大国、殖民主义者和搞讹诈的人毫不妥协，不管他们多么强大和气势汹汹。波利萨里奥解放阵线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作为本地和大陆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出现后便同伊朗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外交关系，后来也被伊朗立场坚定所感动，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受影响，但影响程度是很大的。在对外方面已使自己新生政权的外交政策建筑在“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伊朗宣布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的口号是伊朗的政治纲领。现在这个口号已变成了一些解放运动的政治

纲领。

波利萨里奥解放阵线宁愿在炎热的沙漠中战死，决不妥协投降，决不搞任何违背撒哈拉穆斯林人民意愿的和解。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口号："伊斯兰的党是善战的，宁可战死，决不妥协……。"

伊朗伊斯兰革命对萨尔瓦多和阿富汗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现了最初作为"路线"而确定的目标并以各种语言、各种形式公布于世，这对输出伊斯兰革命产生了推动作用，也极大地影响着其它弱小民族，不论是伊斯兰民族还是非伊斯兰民族。萨尔瓦多反美战士们也采取了这种作法，从而在企图称霸的美帝国主义面前显示出力量。

萨尔瓦多为摆脱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殖民主义统治，也使用了伊朗使用的武器，每天都在国内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正象当初在伊朗那样。他们还接连发表反美决议。而在远离萨尔瓦多数千公里的另一个弱小的被奴役的国家——阿富汗，俄国人武器中的子弹通过阿富汗傀儡政权的人员射向阿富汗争取自由者的头颅。阿富汗为摆脱红色殖民主义灾难也在走萨尔瓦多效仿伊朗所走的道路，即反对殖民主义示威游行的道路。

伊朗革命对扎伊尔的影响

受伊斯兰革命影响的另一支解放运动是金沙萨刚果即扎伊尔革命的卢蒙巴式的伊斯兰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是个名叫哈桑·伊斯梅尔·阿斯班达尔的穆斯林战士，他从一九六四年就开始了反政府的运动。虽然目前遭受很大的损失，但它的力量有了显著的增加。

伊马姆霍梅尼"圣训"的威力

伊马姆霍梅尼多次强调："这次人民的革命，这次伊斯兰的起义，这次神圣的行动不应该仅局限于这块土地上，而应该向世界各地输出革命……，哪里有弱小民族，哪里有霸权主义铁蹄下的弱小民族呼救，伊朗就要去援助它。"一九八三年一月二日出席世界伊马姆大会的人拜见了伊斯兰革命领导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缔造者，当时，伊马姆霍梅尼再次提到这个问题，并对外国与会者说："你们看，手无寸铁的、没有

任何组织的伊朗民众战胜了残暴统治伊朗二千五百年的政权。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大国曾纷纷援助它，给它武器，向它提供各种东西，然而伊朗这个小国在所有大国——无论是东方大国还是西方大国——面前站立起来。她的人民不怕牺牲，成为真正的臣民，他们愿意去见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真主，勇于为真主献身。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并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其它国家也应这样。”

“应该让一些国家明白，如果它们信仰伊斯兰教并准备按伊斯兰章程办事，我们就承认它们；如果它们不准备这样做，我们就同它们斗争，毫不畏惧。穆斯林的困难来源于超级大国。穆斯林所有的困难都是它们造成的。不摆脱它们的束缚，困难就不会消除。”伊马姆的这些话已被所有与会者接受。同样，在伊朗革命初期以及革命胜利后在伊朗举行的“清算美国在本地区的罪行”大会上，所有解放运动领导人和代表都接受了伊马姆霍梅尼这些教导。

总而言之，伊朗革命领袖霍梅尼发表讲话的目的是在伊朗和伊朗右翼穆斯林中激起消灭二千五百年政权和斩断西方大国——美国——魔爪的情绪，这种情绪已逐渐地影响其它民族和解放运动，这就是向全世界输出伊斯兰革命。目前如果说这种革命已影响一些民族和解放运动，那么都应该归功于伊马姆圣训的威力。

（原载伊朗《新闻周刊》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九日）

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伊斯兰教

詹姆斯·皮斯卡托里

【内容提要：本文介绍了沙特阿拉伯王室及其政治发展同伊斯兰教的关系。作者认为，沙特阿拉伯王室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灵活态度，使伊斯兰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从而有助于满足人们希望改革的要求。但是在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对沙特阿拉伯也产生了影响。沙特王室为了安抚宗教保守派，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快速发展。因此，伊斯兰教对沙特阿拉伯的前途具有重要意义。】

对大多数西方人说来，沙特阿拉伯使人想到伊斯兰本身，尽管对许多穆斯林说来，情况并非如此。当然，麦加和麦地那这两个圣城都在那里，但是，令西方十分感兴趣的是，一方面，沙特阿拉伯的保守王朝常常谈论信奉伊斯兰教，偶而还实行报复法，另一方面，这个伊斯兰社会又迅速地向现代化迈进。虽然西方公众在一九七八年前几乎不注意沙特阿拉伯的情况——例如，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七年，美国电视台每年只播送九分钟有关这个国家的节目——但是今天，有关这个国家及其政权的稳定情况几乎成了人人注目的问题。不过，他们对发展与伊斯兰教，君主制度与伊斯兰教能否和谐共存，看法却大相径庭。伊朗革命的亮光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些观察家看到，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什叶派的伊朗大不相同，从而断定，伊朗国王被推翻没有普遍的意义；一些观察家则看到，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沙特阿拉伯人对家财万贯的大人物表示不满，从而断定，王室的末日就在眼前。我要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对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发展何以如此重要，然后还要试图说明，伊斯兰教为什么对沙特阿拉伯的未来也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伊斯兰教与王国的建立

虽然许多人认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同伊斯兰教国家的理想相差甚远，甚至是对伊斯兰教国家的曲解，但是，当人们谈起沙特王室的时候，就有理由想到伊斯兰教。确实，自从十八世纪以来，他们就为坚持不懈地按伊斯兰教教规和习俗行事感到自豪。一七四四年，一个本地的统治者和一个本地宗教改革者，即穆罕默德·伊本·沙特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结成了一个特殊的联盟。后者对人们显然已失去对先知穆罕默德在半岛的信仰感到不安，因此宣扬：眞主是不可分的，对圣徒的崇敬近乎多神论，礼拜是应尽的义务以及报复法必须实行。

穆罕默德·伊本·沙特被这一改革的信息打动了，因为它可能对地区的政治产生有利的影响。阿卜杜勒·瓦哈卜也清楚地看到了政治上的分歧。据菲尔比说，主张改革的阿卜杜勒·瓦哈卜对沙特亲王说："对荣誉和权力必须非常有信心，无论何人，只要他相信唯一的眞主并按眞主的意愿行事，他就应该拥有这个王国及其臣民。"毫无疑问，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也认识到，他的宗教信息要是得到象沙特王室这样强大而有抱负的人的支持，就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政治利益和宗教利益的

这种结合导致形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盟：在这两个人分别作出相互支持的保证之后，不久便诞生了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个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从一七七三年至一八一九年，这支联合力量自最初的伊斯兰社会形成以来第一次把现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大部分疆土统一了起来。

一八一九年，已经取得的成就突然中断了。因为沙特阿拉伯势力强大，对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以及奥斯曼帝国对朝觐地的控制都构成威胁，因此埃及的奥斯曼政府大为震惊。于是奥斯曼帝国的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入侵沙特阿拉伯，把这个国家的首都夷为平地。然而，这并不是沙特—瓦哈卜联盟的完结。这个联盟又找到了第二个表达政见的方式，这次，中心转到了利雅得，时间始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这次联合沒有第一次那样成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反对，当地也有对立的势力爭权夺利，再加之家族内部的明爭暗斗，形势如此严重，以致沙特王室不得不于一八九一年流亡科威特。但是，和第一个沙特阿拉伯国一样，这个国家在其存在期间，使沙特王室得到了好处，因为这个国家使他们取得了对领土的控制权，同时又使他们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把那些毫无价值的革新从这个神圣的半岛上清除出去。这个国家也使那些狂热的宗教信徒得到了好处，因为这个国家帮助他们传播了口号。

这种联合力量最明确的体现大概发生在本世纪初叶。当时，阿卜杜勒·阿齐兹（也称作伊本·沙特）采取行动收复并控制他当时所认为的祖先的土地。为此，他第一次进行了一项独特的试验，即让一部分游牧民定居下来，目的是在领土内建立固定的村镇，并为一支常备军补充兵员。据认为，第一批安置的人多半是穆泰尔部族的成员，但是，后来终于建立了二百多个固定的村镇，大多数大部族都参加了。促使他这样做的动机显然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一个信徒被称为兄弟，整个运动叫做兄弟会，每一个定居点被称为是希杰拉——从腐败之地迁移到了洁淨的地方，就象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一样。当然，一个人有责任逃离游牧生活转而过定居生活的含意是符合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构想的，因为一旦游牧民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就要依赖于他。

尽管一些外界的人认为这种依赖把他们变为赤贫，他们却被组成了一部有效的军事机器。每一个希杰拉都由这样几部分人组成：现役士兵，平时进行放牧，但可以很快进行组织动员的预备役军人，以及那些一旦宗教当局宣布处于紧急状态就可以“应征入伍”的人。阿卜杜勒·阿

齐兹可以从这支几千人的军队中得到支持，他们大部分都勇猛而献身伊斯兰教。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他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且也的确发生了可怕的过分使用暴力的行动，例如，一九一九年在胡尔马和一九二四年在塔伊夫都是这样。大概是由于这种热情，他们很快就推翻了在半岛中部地区内志省的拉希德人的统治，推翻了在包括麦加和麦地那的红海沿岸地区汉志省的哈什米特人的统治。

一位当代作家的推断是正确的："伊本·沙特已经转向一种由来已久的作法：利用他的臣民的宗教信仰帮助他造成一种武器用以推行他建立政治王朝的野心。"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阿卜杜勒·阿齐兹口是心非地赞同兄弟会的价值标准，那将是不公正的。毫无疑问，他相信兄弟会的"一神教"或普遍称为瓦哈比派的目标，而且他本人也是比较虔诚的；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不可能沒有意识到兄弟会对建立其统治的用途。在十八世纪，沙特和瓦哈比派力量互相利用，大体上是平分秋色，但到了本世纪初，瓦哈比派对沙特派的利用就远远不如沙特派对瓦哈比派的利用那么重要了。这是过去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一种模式：俗权与教权相结合，最终教权将处于隶属俗权的地位。

伊斯兰教和政权的维护

在依靠武力和思想动员相结合的办法建立起单一民族国家以后，阿卜杜勒·阿齐兹发现，这种办法对于维护他的统治也是有益的。显然，他和他的继承人都是用伊斯兰教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政策——事实上是他们作为一个王室家族进行统治的权利本身合法化的。他们的这种合法化，是通过强调他们作为圣地保卫者、朝觐保护人和伊斯兰教事业向全世界发展的推动者的特殊作用建立起来的。而且，他们还依靠古兰经就是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宪法这一命题使其王朝合法化。根据这一命题，这些国王们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国王在内，都要听眞主的话。并不使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古兰经就是宪法的概念，支持了沙特家族的统治，因为他们一直能够在声称尊重伊斯兰教的基本法规的同时进行统治，而他们的权力沒有受到任何挑战。

具体的政策也常常帮助确认沙特家族的统治权。比如，费萨尔国王毫无疑问地认为，泛伊斯兰合作是可取的，但是他实施他的计划的时机是在他受到深得人心的阿卜杜勒·纳赛尔的攻击的时候。这表明，在他

看来，泛伊斯兰是对抗纳赛尔主义或泛阿拉伯主义为其政权合法性带来的不利影响的一种办法。然而，有时候沙特家族也不得不求助于伊斯兰教的支持，他们所要求支持的不是他们王室成员的继位权，而是他们所希望的行使其特权的方式。例如，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开始使用无线电和汽车的时候，在费萨尔引进电视和开始兴办妇女教育事业的时候，他们就必须巧妙地借助伊斯兰教的总原则对保守派的声嘶力竭的反对作出回答。当阿卜杜勒·阿齐兹雇用异教徒石油技术人员时，也使伊斯兰教历史成了得心应手之物：这位国王在说明他对先知穆罕默德的生活和传统有透彻的理解以后，便引用了几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说当时先知就单个地或成批地雇用过非穆斯林。“我这样做对不对？”他问道。结果，宗教当局一致回答说，他这样做是对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沙特家族一直都能比较容易地利用伊斯兰教使其统治合法化。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有三个原因：第一，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没有一个与其合法性竞争的力量。什叶派穆斯林（下面我将会谈到什叶派）有可能例外，除此以外，部族和宗教的分歧一直并不重要，没有使民族的团结复杂化。总的说来，沙特阿拉伯王国是同源同种的阿拉伯人和逊尼派穆斯林的国家；同伊朗或叙利亚不一样，那种使伊斯兰教仅仅成为使个人保持忠诚和同一性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的多元论，在沙特阿拉伯是不存在的。

连传说中那样富有独立精神的贝都印人都没有一直抗拒民族一体化。在这个王国的初期，部落之间的对立给阿卜杜勒·阿齐兹造成了有利条件，因为这种对立使得它们无法组成一个统一的运动来反对他；还因为它们是贫穷的，它们依靠他的赏赐。在这之间的五十年中，沙特阿拉伯政府渐渐巩固了对它们的控制：它阻止了对迪拉，即传统放牧场的依附；废除了有关的希马制度，部落依靠这种制度对水井甚至村庄拥有独占的领土权；把卡拉马特，即新的供水设施收归国有，这些供水设施导致部落分享资源而不顾它们的旧习惯和所有权要求如何，特别是在干旱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且，鼓励它们定居。结果是，部落标志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它们极不可能成为有效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正如贝都印人现在经常说的：“所有土地都是沙特王室的迪拉。”

外来的意识形态，如纳赛尔主义、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学说或马克思主义等，只有有限的号召力，因此，还没有同伊斯兰教互相竞争。这

不仅是由于沙特阿拉伯人民天生信仰伊斯兰教，而且由于年轻人现在正在经历社会化过程。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武装部队，年轻的沙特阿拉伯人都受到了某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影响，这种方式起码对阿拉伯世界别的地方所盛行的激进意识形态是敌对的。他们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机会总是有的，但是迄今为止，他们看来欣然服从了这种意识形态。正如一位学术研究者一九六八年在谈到一批大学生时指出的那样："看来，我们的臣民中间大多数人是愿意接受权威和尊敬权威的。"令人遗憾的是，得不到最近的数据，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一看法不再是中肯的。也许，表明沙特王室在防止外来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取得了成功的一个迹象是，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学生抨击他们通过"灌输"（圣训）来奴役人民。

第二，沙特王室一直毫不费力地利用伊斯兰教来证明它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已使宗教当局制度化，同时还因为他们让宗教当局发挥范围广泛的职能。自从阿卜杜勒·阿齐兹——他是忠于罕白里法律学派的——逐步换掉在汉志敌对的哈乃斐学派法理学家以来，宗教领导人不得不依靠政府发给薪金和安排职务；他们已变成了国家的代理人。同时，因为挑选和教育他们的方法已成制度，他们也官吏化了。在伊斯兰国家中，这种格局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使沙特阿拉伯与众不同的是，宗教领导人具有的更大影响。

例如，直到不久前，他们还控制着教育。即使在现在，当大学教育部和大学前教育部正在使制度现代化的时候，宗教领导人开办了好几所高等学府，例如利雅得的伊马姆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他们还负责朝觐工作并且控制了对宗教表示虔诚的捐款（宗教基金）。为了朝觐，每年有一百万穆斯林来到麦加和麦地那。他们还是社会道德的仲裁人，控制了劝善止恶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要在礼拜时使商店关门和在较大城市提倡衣着朴素。一九六二年，费萨尔答应要减少他们的权力，因此很显然，他们越是使沙特阿拉伯政府感到受窘，他们就越变得不那么活跃。而沙特阿拉伯政府所担心的是它在国外的声誉。然而，由于最近在全国各地保守情绪高涨，而哈立德国王也有这种保守情绪，因此宗教警察大概不会完全废除。

此外，宗教领导人由于同社会上层人物本身有着由来已久的联系，因此他们具有直接的政治影响。主要的宗教领导人都来自重要家族，他

们同沙特王室的关系特别密切。例如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后裔谢赫家族就是这样。因此，沙特王室自然要指望他们来支持确保这个政权稳定的决定。例如，作为国教的宗教曾被要求支持一九六四年作出的废黜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无能的儿子沙特，并以另一个儿子费萨尔取而代之的决定。最近，哈立德国王和王储法赫德，还有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其他儿子，都小心翼翼地谋求得到宗教舆论的支持，以使他们为结束对大清真寺的接管而采取的行动成为合法。当然，没有宗教舆论支持他们本来也是能够采取行动的，只是要求有这种舆论支持并不要他们付出任何代价，而且，从长远看来，大概还会使他们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重新肯定沙特王室作为圣地保护人的作用，并从而重申他们关于实行统治的主要要求。

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原因，沙特王室一直能够用伊斯兰教来证明他们的合法性，因为他们对伊斯兰教本身采取了一种灵活的态度。他们基本上巧妙地使伊斯兰法适应现代社会，而不是作僵硬的解释和运用；他们这样作有助于满足人民希望进行适当改革的要求，并且使他们自己能孚众望。这是被普遍忽略的一点，大概是因为历史学家强调瓦哈比派清教徒式的谨严，以及新闻记者大肆宣传宗教警察的偏执。当然，这两点都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提供的是目前复杂的沙特阿拉伯生活的一幅不完整的图景。事实上，同我们可能预料的相反，沙特阿拉伯人非常轻而易举地进行了革新。

为什么他们一直能够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罕白里法律学派的灵活性。在这个问题上传统的西方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罕白里学派是最固执的法学家，因此，他们在一个由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妨碍了法律的发展。然而，这个观点曲解了罕白里学派的保守主义：必须忠实信奉古兰经和圣训——穆罕默德先知的传统。但是如果他们对某个问题没说过什么，那就没有规定严格的指导方针。在实践中，这种态度便转化成了这样的设想：除非有明文禁止，否则改革是允许的。这种态度所提供的灵活性是同罕白里学派坚持强调勤奋，或独立思考是一致的。罕白里学派，特别是十四世纪的大法学家伊本·泰米亚一直认为，当古兰经、口头流传下来的教义以及同先知一起的人们所发表的权威性一致意见含糊不清的时候，宗教当局应该依靠他们自己的判断。久而久之，这种独立判断的实践产生了有益的后果。例如，哈乃斐学派仅仅使最亲近的亲

属负责照顾穷人和病人，而罕白里学派把这一责任扩大到包括那些准备成为他们继承人的所有亲戚。伊拉克和约旦认为这种解释较为公正。

除了依靠罕白里学派内在的灵活性，沙特阿拉伯人还采取其他进行可以接受的变化的方式。一个方式是用精选的法律意见来判断一个人的意见。在王国早期，阿卜杜勒·阿齐兹在说服宗教当局起用非罕白里学派人士方面遇到困难，最后他规定法官将主要依靠六部罕白里学派文本。同时他强调，当他们自己学派的经文对手头的问题没有明确规定，或没有谈到问题本身时，法官可以查阅其它学派的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既然罕白里学派是容许变化的，这个规定似乎毫无必要。但是这位国王和他的继承人却明白，在为一项法律政策辩护时，任何文本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例如，在矿业法规中，沙特家族依靠了马立克学派的比较明确的见解，在任何情况下矿物不应该落入私人手中。

促进变化的另一个方式是行政上的决定自由。从十一世纪以来，它已经成为统治者们在伊斯兰法约束范围内行使某种自由的一种方式。对这一方式沙特阿拉伯人是很敏感的，他们谈到一项他们已使之生效的“法律”时不大愿意使用“加努恩”这个词——这个词意味着一项已制定的法律，而宁可使用更中性的词“尼扎姆”。但是，不管用什么术语，他们历来不是被动的。例如，早在一九三一年，他们就实行了商业法，并于一九五四年根据受西方影响的奥斯曼商业法作了修订；一九七〇年他们还实行了劳工和工人法，在一九七〇年还颁布了社会保险法。这表明政府能够如何通过行政上的决定自由改变传统的法规。当一个得到保险的工人死亡后，这项条例不是遵循通常的继承法，而是限制可能有继承权的亲属的范围，并限制其中某些人的继承权资格，例如，死者的父亲，必须年龄超过六十岁，并丧失了工作能力。

同行政上的决定自由有关的是君主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伊斯兰统治者可以作些制度上的改变。沙特阿拉伯政府在一九二七年、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五二年改变了法院制度。最重要的是，它创立了上诉制度。因此现在公民可以越过第一次审理案子的法官上诉：他可以去最高上诉法院和最高审判法院。如果他是一项行政方面的不正义行为的受害者，他还可以上诉伸冤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五五年。该政府还根据劳工和工人法设立了一个法庭，以审理和解决劳工纠纷，和课以适当的处罚。更有一般性意义的是，在一九七一年政府以成立一个

司法部代替了大穆夫提办公室。

于是，通过所有这些方式，沙特阿拉伯人表明，他们愿意并能够适应现代条件，以新的立法和新的制度补充伊斯兰法。这一灵活性已有助于使社会杰出人物不会落后于许多社会事态发展，从而表明它自己是一个明智的政府：它对伊斯兰的态度已经影响到了它利用伊斯兰来取得合法性的能力。

政权的反对派

这样看来，伊斯兰教似乎是沙特阿拉伯政府的主要支柱，但是，如果由此得出它将总是如此的结论，或者甚至得出它将总是一种起稳定作用的因素的结论，那就错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现在正经历史无前例的由于快速发展而造成的紧张，伊斯兰有可能在抨击政府方面起某种作用。但是，在我们对这一可能性作出评价以前，有必要考虑一下近四十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沙特阿拉伯从依靠西方补贴和贷款过日子变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管人员。这段时期，沙特阿拉伯开始了工业化建设，引进了大批外籍工人，并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造成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后果。

一个后果是官僚机构迅速扩大。如果说一位美国外交观察家一九四一年可以写出“沙特阿拉伯不存在任何普遍意义上的政府组织”之类的词句的话，那么，现在情况显然不同了。一九三二年，沙特阿拉伯只有外交部和财政部，但是今天，已增加到了二十二个部。政府已成为最大的雇主，制订了有关生活各个方面的大量规章制度和正式表格。尽管手续很烦琐，也许还使得无法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为难处境作出创造性回答，但是，它等于是有了限制王室实行专制主义的某种制度上的制约。

第二个后果是，出现了专家治国论者阶层或者正在实行现代化的中产阶级。新的财富带来了新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而许多受益者现在成了包括内阁大臣在内的重要政府官员。他们特别是在石油部、财政部、商业部、农业部、交通部和新闻部的地位重要，虽然他们分布在政府各个部门。这些人的特点是在国外受过非宗教的高级培训，对一些比较保守的宗教领导人极为不满。宗教警察找他们的麻烦，而且他们对妇女仍然受到一些限制感到不安。如果说他们对宗教领导人冷淡，或者说得好

听点是不感兴趣的话，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却并不反对王室。威廉·鲁一九七三年撰文指出："新的中产阶级并不真正想要同亲王们进行较量。在事业上，这两个集团有时形成自然而然的互利的伙伴关系。"中产阶级的年轻人在社交方面一直同王室中的同辈人有来往，但是，尚无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集团是一种政治运动的核心。

同沙特阿拉伯王国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密切有关的后果是，王室本身现在有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而且在国外受到培训的成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费萨尔国王的几个儿子的影响在扩大。人们常提到外交大臣沙特亲王是继承王位的合适人选。事实越来越证明哈立德亲王是阿西尔省很有效率的省长。其他的一些亲王都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责任，而且将来很可能成为那些虽然温和但却是自由化的改革的发言人。

最后一个后果是，正如现代化使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文盲和乡下人受害那样，现代化正在使沙特阿拉伯很大的一批人成为受害者。在沙特阿拉伯，为建立一种比较有效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在加紧努力，这种努力导致农田实行合并，结果造成小土地所有者跑到城市里去寻找更好的出路。由于社会服务行业不发达，由于住房紧张，而且房价过高，加之就业机会不多，他们涌入城市后使那里已经很困难的局势更为严重。这些乡下穷人同沙特阿拉伯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一样是文盲，而且又沒有学会有用得上的手艺，很可能也成为城市里的穷人。

但是，即便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也可能成为受害者。随着他们队伍的扩大，找到满意的工作的可能性就不断减少，因为经济的吸收能力有限，又有那么多的外籍工人。政府的确打算到一九八〇年使小学生增至一百三十万，高中生增至二万一千人。全国从小学到高中的女学生人数将要差不多增至五十万。由于这些学生尝到了现代化首批成果的甜头，他们期待着取得无限的进步。他们注定是要失望的。

这种种变化说明，尽管沙特阿拉伯现在相对平静，但是，如果它继续剝夺专家治国论者和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机会，或者如果仍不能纠正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偏差的话，沙特阿拉伯政府就可能会受到抨击。沙特阿拉伯过去肯定有反对派运动，但是，他们沒能构成一种严重的威胁，也沒有爭取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几个儿子塔拉勒亲王、巴德尔亲王、阿卜杜勒·穆赫辛亲王和法瓦兹亲王叛逃到了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开罗。他们批评沙特

国王挥霍无度和整个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他们于一九六二年自己宣布成立阿拉伯民族主义阵线，并发誓要建立一个“自由沙特阿拉伯”。鉴于国王沙特已把沙特阿拉伯带到了破产的边缘，同时对也门内战进行干预的埃及人就在该王国边界一带，这些亲王们看来大有成功的希望。然而不久，费萨尔作为首相，为使沙特阿拉伯的经济恢复正常做了大量工作，而埃及军队忙于平息也门的部族和政治纠纷。这些亲王们过于讲究实际，他们看到呆在开罗没有什么前途，于是于一九六四年回到利雅得，适当表示了悔过。费萨尔国王和后来的哈立德国王明智地采取了宽宏大量的态度——他们的父亲是以这种态度而闻名的。他们几个兄弟受到欢迎，其中一个例子是，塔拉勒现在是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他承认是上了“一些漂亮口号和种种许诺”的当。

另一位亲王，保守的哈立德·伊本·穆萨伊德，在一九六五年策划了一次要关闭在利雅得的新电视台的尝试，但是没有成功。当时费萨尔正在参加一次阿拉伯首脑会议。因此一些人认为，哈立德亲王是想在穆斯林兄弟会帮助下利用国王不在国内，发动一次政变。一九六六年底，沙特王室不得不担心又一种威胁，这次是来自左翼的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的威胁。这个组织声称破坏了重要的石油管道，并在沙特阿拉伯几个城市搞过炸弹爆炸。政府把此事完全归咎于阿卜杜勒·纳赛尔，指责他派遣破坏小组破坏公共秩序，“干预对宗教的感情”。此外，一九六九年，空军军官企图推翻王朝，建立“阿拉伯半岛共和国”。被捕的二、三百人当中许多是高级军官，而且被认为同情主张专家治国的中产阶级。由于这次骚动是紧接在利比亚政变成功之后发生的，沙特王室的神经紧张显而易见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一九七九年底，由于在麦加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因而出现了甚至更大的焦虑心情。这些事件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沙特王室以及我们其余的人中的一些人曾经认为，七十年代初期有系统地连根拔除持不同政见者的作法和罗致潜在的闹事者的政策会先发制人，阻止对政权发动重大袭击。但是这里所说的是一个由全副武装的狂热分子组成的奇怪的组织，他们使这个国家陷入了差不多长达两周的动乱。很大一批沙特阿拉伯人和其他国民，大约共有二百人，对这个政权的不虔诚态度感觉非常强烈，以致政权无视古兰经对亵渎伊斯兰最神圣圣地的“不

信教的人”所规定的死亡惩罚。

事实上，这个组织的领导人朱海曼·伊本·穆罕默德·乌泰比和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卡塔尼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所看到的沙特王室的罪过，因此决意要创立一个新的、眞正伊斯兰的国家。虽然很难得到可靠的情报，人们广泛认为，两人中更为重要的乌泰比曾经上过麦地那大学，但他对未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的伊斯兰教育感到不满——因为这种教育沒有告诉人们，沙特王室是非伊斯兰教的。他走向农村，开始宣讲兄弟会在二十年代所传授的信息：沙特王室已变得太有权有势、太富裕，因而太腐化堕落，而且他们积极讨好外国人。但是他还提到救世主概念，这在兄弟会的思想里面是沒有先例的，并认为卡塔尼要起这种作用。这种毫不妥协的信息和以救世主自居的狂热显然成了他吸引到虔诚而有钱的追随者的原因，并且说明了他们对政权带来的危险：“朱海曼集团所吸取的力量和沙特阿拉伯国家同出一源，都是取之于同伊斯兰本身几乎一样古老的好斗的宗教虔诚之心。”

在包围大清眞寺的同时，东部省的二十到三十万什叶派发生了若干暴乱。当时是阿舒拉日的开头，阿舒拉日是什叶派纪念他们在整个伊斯兰历史——包括沙特阿拉伯历史上忍受的镇压的日子。虽然什叶派在阿美石油公司的劳动大军中占了百分之三十五．但是他们从未感到从他们帮助创造的石油财富里得到了同占多数的逊尼派一样多的好处。他们还感到受到了东部省常常是严峻的省长们的歧视。这些在好些海湾城镇发生的暴乱造成了将近十五人的死亡，是那年早些时候霍梅尼革命的消息在沙特阿拉伯的什叶派当中激起了很大的兴趣时所出现的事态发展的重复，不过更为暴烈。什叶派暴乱继续存在的一个迹象是，政府曾采取行动驱散最近去麦加朝觐的人的政治活动，虽然搞不清楚这些活动是否不仅仅是散发受伊朗启发的印刷品。对这个政权来说，另一个更不祥的发展是，好些沙特阿拉伯人参加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大部分是什叶派人发起的推翻邻国巴林政府的努力。

我们可以看到，反对派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有证据表明大多数沙特阿拉伯人经历了过去十年左右发生的变化而沒有出现革命。看来官吏和专家治国论者的情况更是这样，因为他们意识到雇用他们的主子是谁，因此相对来说，对现状感到满足。另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并非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而且许多人，特别是在青年、宗教人士，甚至

新中产阶级的若干阶层中的人们，希望看到发生重大变化。这些人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六十年代初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当时，最初是阿卜杜勒·纳赛尔，后来是霍梅尼，都对沙特阿拉伯形成了可怕的威胁。

建立沙特阿拉伯秩序的前景

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不应该低估沙特王室的足智多谋。沙特王室过去通过使用武力和操纵一种伊斯兰意识形态得以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和培育起人们对他们自己作为一个超级部族的普遍效忠。由于现代化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压力，他们正在再次显示自己是多么足智多谋，正在辩明和回答大概会对他们的统治提出异端的两种人：非宗教的激进派和宗教的守旧派。就象对有关沙特阿拉伯的情况经常不了解那样，我们对非宗教的激进派的情况也没有足够的了解，不知道他们到底有多少人，也不知道他们实际上都是些什么人。但是，空军的未遂政变，现在设在贝鲁特的阿拉伯半岛人民联邦继续展开的宣传攻势，以及沙特阿拉伯在国外的留学生经常怨声载道，所有这一切表明，要求从根本上来改变，而且很可能是从非宗教的角度来改变治理沙特阿拉伯人的方式的这种情绪十分强烈。政府为了对付这种状况拿了大量的钱出来改善那些有可能产生这种想法的人的状况，这些人就是文职人员和军人。例如在一九八一——八二预算年度，绝大多数共用部门雇员的工资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八十。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还表示，它要争取建立新的，据说更为民主的体制。这是到现在为止对付政治动乱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回答。由于一九六二年发生多起王室人员叛逃和普遍动乱，费萨尔保证他将建立地方协商会议和限制宗教当局的权力。在费萨尔于一九七五年去世后出现的不稳定局面当中，法赫德保证，不久即将建立这种协商会议，可是从来没有建立起来。

可是，最近大清眞寺被占领后似乎已促使政府比较认眞地对待了自己的诺言。法赫德宣布，要准备一部“进行治理的基本法”，一九八〇年三月，哈立德国王任命了一个立宪委员会来考虑大约二百条拟议中的条款。这些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建立一个协商会议和确立新的“治理方式”的。由于在这个委员会占支配地位的那些人都是受传统教育的，所以他们不大可能走得更远而建议组织什么政党或工会，而总的说来组织政党或工会遭到拒绝，被认为是搞分裂，因此是违背伊斯兰教关于信

徒之间要团结一致的观念的。虽然许多观察家怀疑是否会真正出现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立宪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纳伊夫亲王一九八一年四月曾表示过国王即将开始研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法赫德亲王一九八二年三月表示过，不久将建立协商会议。

政府也正在注意宗教的守旧派。例如，政府知道，虽然宗教领导人是社会中坚的一部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要靠政府，但是，他们也在全国有很高的威信，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博学多才。象重要宗教权威谢赫·伊本·巴兹这样一些人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的意见有很大的份量——即使接受这些意见并不总是不会受到批评的。另外人们还普遍认为法官是公正的，伊斯兰法庭是主持正义的。虽然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当局不象伊朗的毛拉们那样有组织，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能起到非正式的社会代理人的同样作用。例如，他们经常充当结婚顾问、争端调解人以及个人和越来越不近人情的官僚机构之间的中间人。在财政方面，宗教领导人也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是因为他们控制着来自宗教基金的收入，特别是来自里巴特（为到麦加去朝觐的穷人捐助建造的旅店）的收入。此外，麦地那大学一直是传播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的中心，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常常同官方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政府不能认为可以对成为国教的宗教掉以轻心。正如东部省发生的动乱所表明的那样，政府无法认为得到了什叶派官员的效忠，政府过去对这些人几乎不予承认，而且拚命阻挠他们发挥通常要发挥的作用。

为了安抚宗教保守派，沙特王室不再象以前那样强调快速发展——尽管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实际上正在放慢发展速度。目前人们认为，象以前的报纸主编土耳其族人阿卜杜拉·苏代里所做的那样，强烈地说迅速取得技术与经济进步是捍卫伊斯兰的最佳途径，并不是一个好主意。现在对国内大量外籍工人的控制也更加严格，护照过期或工作合同结束的工人遭到驱逐，宗教警察正在加强他们对外国妇女衣着服装进行的监督。甚至一直有消息说，政府目前声称有权拘留被发现离家三十英里以外和没有得到其雇主授权的外国人。政府还正在通过投入大笔资金和给予特别照顾而更经常派王室人员访问的办法给予受到忽视和动荡多变的东部省以关注。

但是这些日子似乎每个人都要问的问题仍然是：这就足够了吗？许多人的回答看来是“不”。事实上，观察这个王国的一些观察家认为我

所概述的那些行动充其量也不过是些权宜之计。为此提出了两个论点：一个论点认为，他们的伊斯兰传统意识形态已使得沙特王室陷入困境，他们必须放弃这种意识形态，因为它已妨碍他们实现现代化；但是，如果这样做，他们就失掉了他们统治的理论基础。例如，海伦·拉克纳认为，只保持了“严守古兰经的瓦哈卜主义的躯体”，因为“贯彻这种意识形态自然就意味着，与社会技术进步相一致的政治或宗教事态发展都不能鼓励”。但是正如我以前所认为的和现在想在这里重新强调的那样，沙特阿拉伯人在使其意识形态适应所希望出现的变革方面一直比人们一般认为的成功。

另一个论点——我认为更具有说服力——认为，沙特王室与伊斯兰的结合可能证明是起反作用的，这个论点使人看到的是王室令人失望的行为标准。这种论点认为，虽然个别亲王过去有冒犯虔诚信徒之处，但是由于现在财富四溢，看来这种冒犯行为更为严重了。社会名流、亲王和得到优惠的企业家当中的腐化堕落正在受到日益增多的谴责。每个人都意识到有人用大量的金钱贿赂去确保得到合同或绕过繁琐拖拉的公文来往；许多人发现这与伊斯兰关于经济交易要公平的教义是不一致的。目前还存在着一种广泛得令人吃惊的看法，即袭击大清真寺的人在选择目标上犯了错误，但是他们对公共道德衰微表示了正当的反对。从这种观点出发，那么，这个政权关于信奉伊斯兰的吹嘘可能正在产生使它成为非法的适得其反的效果。

人们可以争辩说，沙特王室从前在遭受纳赛尔抨击时也曾面临处于非法的境地，不过当时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这种情况。但是现在大概有两点不同：威胁不是来自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而是来自信奉同沙特王室自称信奉的同一伊斯兰意识形态的人们；伊朗革命，尽管是一场独特的民族革命，却对君主政体的合法性构成了一种普遍的伊斯兰挑战。沙特王室的历史表明，当他们在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二年同他们的意识形态同行拉希德人——他们也是谢赫·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追随者——进行战斗时就最无法利用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沙特阿拉伯人的历史从来都是利益重叠而又有着共同的价值标准的历史。支持王室，让“瓦哈比派”继续接受他们对沙特王室的从属地位似乎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政权是富有的，可以提供很多东西；沒有可以取代沙特王室的明确选择；伊朗革命化进程正在使人们，特别是

中产阶级重新考虑发生激进变革是否可取；伊斯兰意识形态一直是有适应能力的。然而，正是由于沙特王室声称那么信奉伊斯兰，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领域可能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在于这种意识形态能否适应现时代，而在于人们是否认为沙特王室忠实于这种意识形态。

（原载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政治进程中的伊斯兰》一书　白景山、裴善勤、王成凤、薛群、陈秀珍、吴江域、师云志译　康敬贻校）

黎巴嫩的三派穆斯林

（美国）海伦娜·科班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自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一年曾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贝鲁特教授，现在是美国乔治城大学现代阿拉伯问题研究中心的客座学者。本文介绍了黎巴嫩各教派情况，这里着重摘录其中关于穆斯林教派的情况。

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和穆斯林两大教派中，当前穆斯林教派从人口的比例上占优势，但是在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穆斯林教派主要包括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穆斯林。德鲁兹穆斯林是在十一世纪从什叶派分离出来的一个教派。三派中什叶派人数为最多。】

了解黎巴嫩复杂的政治斗争情况的最好的途径是从到它的山区旅行开始。虽然黎巴嫩的山区一天就可以游览完毕，但是松树覆盖的山脊、陡峭的峡谷和分布在蜿蜒曲折的公路上方的红屋顶村庄的这种很不规则的格局，说明了成为黎巴嫩各教派关系基础的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复杂状况。然而，这些教派间的关系，只不过是说明建立一个可以生存的黎巴嫩的活动的背景情况的一部分。这个国家的各教派完全不是铁板一块的。在每个教派内部都有着人员、经济和社会利益的冲突。而且在每个教派内部，在决心使一个泛黎巴嫩社会团结一致的人同要么想为自己的

教派求得自治权，要么想使自己的教派具有更广泛的非黎巴嫩特性的人之间，进行着眞正的连续不断的斗爭。

自三十年代初以来，黎巴嫩一直沒有进行正式的人口普查，但是从法国一家计划生育机构一九七七年进行的人口统计调查可以看出，黎巴嫩人口的具体分类的情况是：

教　　派	拥有的人口	占全国人口百分比
什叶派穆斯林	850,000—900,000	28%
马龙派基督教徒	750,000—800,000	24%
逊尼派穆斯林	600,000	19%
希腊东正教基督徒	300,000	9%
德鲁兹穆斯林	250,000	8%
希腊天主教徒	200,000	6%
亚美尼亚基督教徒	160,000	5%

了解这些数字的历史背景是很重要的。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最终造成黎巴嫩与众不同的民族实体出现的主要力量，是黎巴嫩山区的两个民族：马龙派教徒和德鲁兹穆斯林。在一九二〇年，法国人重新绘制了黎巴嫩地图，把沿海城市和山区以北、以东和以南的农业区也包括进了黎巴嫩版图。新划进的东部和南部地区居住的主要是什叶派穆斯林。但是，在这些新黎巴嫩化的城市——贝鲁特、西顿、特里波利和蒂尔，居住着大批经济力量雄厚的逊尼派穆斯林。

逊尼派穆斯林

黎巴嫩的穆斯林各派，尤其是什叶派，在人口统计和经济方面具有的这种新的力量，使得许多马龙派教徒感到惊讶和恐慌。然而，黎巴嫩独立以来历届由马龙派教徒担任的总统，只有在他们与穆斯林领袖结成战术联盟时才能眞正行使权力。沒有哪一位马龙派总统能无视他们；不[illegible]

治的大黎巴嫩实体中变成了居于少数的教派。

在大商人和解本能的驱使下，大部分重要的逊尼派领袖很容易就适应了这种新的局面，甚至从中得到了好处。但是较为贫穷的逊尼派穆斯林却对他们地位降低的这种新状况感到不满，由此而在逊尼派穆斯林内部产生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城里的逊尼派穆斯林历来同居住在山区的逊尼派穆斯林有很大的差别。经商的大家族不是靠严厉的封建压迫来保持它们的优越地位，而是靠不断地提供保护和就业机会，而大部分就业机会取决于地方和中央政府签订的合同或作出的其他支持的表示。城市生活本身为种种引起争议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所以舆论始终是逊尼派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活跃的因素。

在五十年代，居住在城市里的逊尼派穆斯林受到纳赛尔主义的影响，在随后的整整二十年里，纳赛尔主义和其他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不断对守旧的逊尼派领袖提出挑战。但是到一九七五年，逊尼派老一辈的领袖重新取得了控制，六大家族的成员在似乎是无休无止的循环中一个接一个地担任总理职务。

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的内战为较为年轻的逊尼派领袖提供了机会，正如这场内战也为较为年轻的马龙派领袖提供了机会一样。但是逊尼派从来没有受到这些年来马龙派所遭遇到的那种猛烈的冲击。因此，逊尼派从来没有集体地作出决定，说该派守旧的领袖的战略方针得要经过根本的修改。

造成激进派失败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黎巴嫩逊尼派的政治生活一向对埃及和叙利亚的事态发展敏感。到七十年代末，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两个国家都冷落下来。在埃及，纳赛尔总统生前所奉行的政策被他的接班人已故的萨达特推翻了。而在叙利亚，逊尼派多数面临着哈菲兹·阿萨德及其阿拉维派穆斯林伙伴日益加剧的镇压。甚至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基本上属于逊尼派的领导人也同老一辈的逊尼派领导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尽管巴解组织曾得到黎巴嫩激进的逊尼派组织的为期不长的支持。

到一九八二年初，当信奉纳赛尔主义的候选人在争当马卡西德学校校友联合会负责人的选举中败北时，激进派失败的程度已很明显了。由于在七十年代末期大部分左翼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团体的弱点都已暴露出

来，逊尼派舆论开始转向传统的宗教一边。这样，逊尼派的宗教权势集团的影响增大了，产生了新的同守旧的家族相抗衡的力量，因而也就产生了一个新机构，而它们的内部争端就可以通过这个新机构得到调解。

逊尼派常常受到指责，说它怀有黎巴嫩各教派中最明显的离心倾向。但是到一九八三年底，它大概已成了各教派中最顺从可能也是最随和的教派，它认为不能完全忽略不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只有一两项。其中之一涉及以色列：对于沙菲克·瓦赞总理来说，他很难向他自己那一教派的人说明同以色列签订一项正式的和平协议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悄悄地赞同一项协议，那就极不可能公开违背逊尼派居民的准则。

自从十二世纪以来，逊尼派在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一直居于优势，但是，在黎巴嫩山以南的阿迈勒山地区和以东的贝卡谷地的两小块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却尚存了下来。一九二〇年，什叶派穆斯林的这两个聚居区也被包括在大黎巴嫩之内了。

什叶派

什叶派在封建时代比任何其他教派更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几十年来，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村庄大体上都是与现代世界隔绝的。这些村庄没有为有抱负的什叶派穆斯林提供发展的机会，所以他们也涌到贝鲁特，在日益发展的建筑业和制造业部门工作。在整个这座城市周围，他们聚居的郊区和棚户区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贫穷困苦的地带。到八十年代初期，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分住在大体上同样大小的三个居住区：在南部，在贝卡谷地，和在贝鲁特周围。许多什叶派穆斯林还移居到西非讲法语的地区，在那里他们作为商人发了财。

少数守旧的封建家族支配着什叶派的政治生活一直到六十年代末期，因为到了那时，一位叫作穆萨·萨德尔的雄心勃勃的年轻教士开始号召进行社会改革。他精明地网罗贝卡谷地的一些封建首领支持他反对他们在南方的共同对手的斗争，之后便开始在南方的农民中建立强有力的联络网，支持他的被剥夺者运动。

一九七八年八月，萨德尔在利比亚失踪了，大概是让卡扎菲政权谋杀了。但是，他所创建的这个运动及其军事组织阿迈勒（意为希望）已经改变了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活动。阿迈勒在什叶派的农村聚居区保持着强大的基地，但是它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些人是住在贝鲁特郊区的既年

轻又受过教育的什叶派穆斯林，他们认为阿迈勒是改善他们人民命运的一条出路。在阿迈勒的主持下，什叶派穆斯林的医生和教师到了乡下，大力开展组织民众的活动。

阿迈勒的经费是由许多移居到非洲的工人捐款提供的，他们新获得的大量财富还为什叶派在西贝鲁特掀起的空前的建设浪潮提供了经费，另外还开了几家什叶派的银行。因此，虽然阿迈勒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已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十二年之久战争所摧毁，而且自一九八二年年中以来一直被以色列所占领，但是在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却基本上是成功的。这种发展使什叶派穆斯林产生了新的信心和劲头：什叶派可以相当令人信服地说，使他们有资格在治理黎巴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人数。然而，什叶派希望能增加他们的政治代表。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历来是黎巴嫩最不发达的地区。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以使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农村地区得到更多的政府发展经费。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马龙派教徒曾试图与什叶派结成联盟，想要以在逊尼派居于优势的中东同样处于少数地位这种状况来打动什叶派的心。在这个基础上，马龙派和什叶派的封建首领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但是，到一九七五年，什叶派的这些老派的政界人物同越来越激进的什叶派群众失去了联系。在长枪党人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二年间把什叶派穆斯林从东贝鲁特驱赶出去后，象议会现任议长卡迈勒·阿萨德这样一些老一辈的政界人物获准继续住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但是自一九七五年以来，什叶派老一辈的领导人已对信奉同一教派的人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

长枪党的强硬派不时指责黎巴嫩的什叶派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因而对本国起着破坏作用，指责他们密谋要把黎巴嫩变成革命的伊朗的卫星国。伊朗革命确实使得世界各地的什叶派穆斯林产生了新的自信心。但是黎巴嫩的什叶派这时采取强硬态度在国内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的，而且伊朗政权的过火行动也使黎巴嫩的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感到震惊。

同时，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已表明是非常忠于黎巴嫩的。什叶派青年是应征入伍的黎巴嫩军队的主力；流亡在国外的什叶派穆斯林回国的人数比其他教派的要多；而且依然留在国外的人把收入汇回国内的数量也多。此外，什叶派比黎巴嫩其他各教派更不愿意谋求外国的援助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对于一九七九年来到黎巴嫩帮助同以色列人作战的伊朗

“志愿人员”，当地许多信奉同一教派的人是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的。虽然阿迈勒运动的不同派别多年来一直同叙利亚人，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甚至同以色列人保持联系，但是谋求建立这种联系的主要目的始终只是要确保处于危急状况的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存。

琼卜拉特的德鲁兹人

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多年来的变化比上述教派中的任何一派的变化都小。德鲁兹人是在十一世纪从什叶派分离出来的一个秘密教派的成员。德鲁兹人自形成之日起就不准外界人参加他们的教派；这个教派自那时以来一般说来一直是只关注本教派的事务的。黎巴嫩山是德鲁兹人的发源地，而且甚至在叙利亚和加利利地区建立了卫星居民区后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的定居区。

几个世纪来，黎巴嫩德鲁兹人的历史就是两个部族联盟，即琼卜拉特家族和亚兹贝克家族之间的角逐史。自从黎巴嫩获得独立以来，琼卜拉特家族一直居于支配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已故的卡迈勒·琼卜拉特有政治手腕。众所周知的卡迈勒大领主创建了社会党，这是黎巴嫩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社会党，并且极力要求在黎巴嫩废除按教派分权的制度。但是这一批德鲁兹人始终是最忠于他的权力基础。当卡迈勒被杀害时，他的儿子瓦利德接过了对德鲁兹人和对社会党的控制权。卡迈勒大概是被叙利亚人杀害的。

在以色列一九八二年入侵后，长枪党人曾公开活动，要把亚兹贝克的后嗣费萨尔·艾尔斯兰推进德鲁兹人的领导集团。同时，长枪党的军界试图确立对历来是由德鲁兹人控制的舒夫山区的控制。那时，德鲁兹人就象马龙派教徒一九七六年所作的那样，把他们的内部斗争抛到脑后，为他们所居住村庄的生存而战斗。瓦利德·琼卜拉特由于全面指挥舒夫山区的防御活动，领导作用得到了加强，而艾尔斯兰却完全信誉扫地。

德鲁兹人始终支持建立一个统一的黎巴嫩。他们给予这种支持的一个条件是他们在舒夫山区的传统地位不受损害。卡迈勒曾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作过几次努力，以摆脱现代史使黎巴嫩德鲁兹人所处的二等地位。但是他从未获得成功，而且不论是他的儿子还是任何其他可能接班的人，都不具备卡迈勒的那种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所以德鲁兹人是不大可能摆脱他们所处的不利地位的。

四大教派（基督教马龙派加上三派穆斯林）组成了黎巴嫩国家的基本结构。这个国家另外还有十三个得到承认的教派，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对比趋于复杂，但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作用是不能与上述四大教派的作用相比的。

黎巴嫩教派间和教派内部几十年来，其实是几百年来的斗争，是不可能简单地撇在一边就算完了的。但是，局势并不完全是绝望的。现在，人们认为已经看到各方能为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尽一份力量。这种看法并不是不现实的。

（原载美《外交政策》季刊一九八三至八四年冬季号
王澍秋译）

黎巴嫩什叶派的存在和渴望

艾斯阿德·海达尔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认为，黎巴嫩什叶派绝大多数分布在黎南部和贝卡两个地区。长期以来，这些地区被以色列占领，许多事情把这里的抵抗组织“希望运动”（即阿迈勒）推向极端化，但他们的领导人纳比·贝里还是比较温和的。公平地对待什叶派，不限制他们的发展，即可恢复黎巴嫩的平衡。】

关于黎巴嫩的什叶派，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从七十年代初就是黎巴嫩事件的轴心，由于外部的政治因素和内部的社会因素，他们仅仅是一些不为人所理睬的“数字”或“分量”！

一九三二年在黎巴嫩进行了在其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人口普查，在这次官方统计中，什叶派占全国七十七万五千五百四十三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九，其它各教派分别是：马龙派百分之二十二，逊尼派百分之二十二，东正教百分之十，天主教百分之六，德鲁兹人百分之七。

伦敦今年年初公布的，标题为《黎巴嫩：少数人危机》（这是英国保卫少数人权利学会公布的）的报告表明，黎巴嫩人口在三十二年中增加了三倍，现在已达到三百五十万人。各教派所占比例如下：

什叶派：一百一十万。

马龙派：九十万。
逊尼派：七十五万。
正教派：二十五万。
德鲁兹人：二十万。
亚美尼亚人：十七万五千。
天主教：十五万。
其它教派：五万。

由此看出，黎巴嫩什叶派所占比例约达百分之三十，据说，一些统计数字表明，已达百分之四十。如果我们认为这些统计数字是准确的，那么什叶派少数正是黎巴嫩最大的少数。现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仍然是最落后的，因为从一开始这里就是不为国家所关心的地方。

一百万什叶派人分布在南部和贝卡两个地区。七十多万什叶派同约十五万其它教派的人共同生活在黎巴嫩南部二千二百八十七平方公里，即相当于黎巴嫩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二的土地上。约有三十万生活在贝卡。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战争原因，这一比例已经发生变化，但是仍不免继续有人迁进或迁出。

尽管政府对南部和贝卡同样不重视，但仍可以剖析一下这两个地区的特点，以资国民对什叶派，特别是南部什叶派的问题有所了解。

什叶派基本上是黎巴嫩山区居民，他们于伍麦叶朝时代初期来到这里，到阿巴斯朝初期已经蕃衍壮大，就在这崎岖不平的山区里和平地生活，直到十字军侵略和奴隶王朝时代。一三〇五年，经过十三年的战争和屠杀，什叶派离开山区迁到南部和巴勒贝克—赫迈勒地区。根是一个，但两个地区的社会特点互不相同。

在贝卡，什叶派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在赫迈勒地区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部族和部落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因为真正的力量掌握在大部落手中——最突出的有：加法尔、哈马达、舍姆斯、艾姆海兹、丹代什、扎特尔等，和大家族手中，例如：海达尔、穆尔泰迪、胡萨尼、亚吉、拉厄德、穆萨维等。由于这种社会结构是基于“复仇”原则而加强的一种建立在“力量平衡”和“恐怖平衡”之上的关系，所以政党很难冲破这一结构，除非依靠一个家族。因此，任何一个在巴勒贝克—赫迈勒地区活动的政党都是在某一个部落，或某一个家族内“筑巢”，除了个别人以外，很难冲破其它部落或家族。

关于政府对这个地区的忽视，根据一九七〇年公布的一个报告，在这一地区文盲的比率约达百分之七十。政府在这个地区建立的学校不过几十个，因此，每一个志愿求学的学生，每天早晨都要步行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离家最近的一个学校。尽管如此，离开巴勒贝克—赫迈勒地区的人显然是非常少的，特别是向国外迁移的人更少。至于向国内迁移，即向大城市周围迁移，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仍然是有限的，那里的建筑业和工厂就业机会很多，于是就大批地向贝鲁特东部的纳巴和杰迪德纳法尔迁移。

至于南部，同黎巴嫩其它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这是由于与被占巴勒斯坦北部相对的黎巴嫩南部的地理位置形成的独特条件造成的。

南部的社会结构与贝卡的结构迥然不同，它分成三个阶层：

一、大家族。从过去一直到最近，一直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和政治封建统治，最主要的家族有："艾斯阿德"，最杰出的人物是艾哈迈德·贝克·艾斯阿德和当了十二年议长的现议长卡迈勒·艾斯阿德。"哈利勒"，最杰出的领袖是议员，自由国民党副主席卡济姆·哈利勒。"宰因"，最杰出的领袖是伊赫万·阿卜杜勒·马吉德和阿卜杜勒·拉提夫。还有阿西兰家族，这是阿迪勒·阿西兰领导的一个大家族，它不能算作封建家族，而应算作有突出政治势力的家族。

二、宗教家族。这些家族对有学问的人给以宗教地位，并把他们的学者和学生派到伊朗和伊拉克去。这些家族中有：沙姆斯丁、萨菲丁、阿敏、法吉赫、萨迪克、穆夫蒂耶、胡萨尼。这些家族由于有学问而在南部赢得优越的地位。它们一代一代地保持着这一特点，并同其它家族保持着特殊的的关系，即不屈从于封建家族，也不欺压弱小家族。

三、小家族。多数务农，并受到阶级的和官方的压迫和征服。

除了在社会结构上的这些特点以外，还有以色列的征服和黎巴嫩官方的忽视。以色列的征服首先表现在把一些南部农场，特别是在哈拉杰沙巴的农场兼并到被占巴勒斯坦的领土。尔后是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对南部土地和农村的连续不断的轰炸，发展到侵略边界，一九七八年的全面侵略摧毁了舒巴村，一九八二年的侵略导致了直到今天的占领。

我们再谈谈政府的忽视，尽管我们了解不多，但一些数字已足以说明问题。在南部有五条河：利塔尼河、阿瓦利河、扎拉尼河、哈斯巴尼河、瓦扎尼河，这就是说，这个地区是黎巴嫩水源最丰富的地区。尽管

如此，这里百分之八十二点四的土地都是干旱之地，即没有灌溉系统。国家为利用南部水源制定了一个又一个计划，所有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包括著名的利塔尼河计划，直到以色列占领后，便开始企图把利塔尼河水引到它的土地上去。

政府的第二种征服活动，表现在以种种借口敲诈勒索。

面对这种情况，南方人用两种迁移来解决他们的经济、社会和安全危机：一种是向国外，向西非国家和美国迁移。一种是向国内大城市迁移，这样就出现了在贝鲁特周围的“不幸地带”。最近二十年中，迁移活动已经形成半集体式的出走。

这种从南部往大城市周围迁移的活动不仅使南部的社会结构，而且使整个黎巴嫩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国内的迁移活动产生了如下结果：

一、大城市发展，例如贝鲁特和赛达，以及由于有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大城市中的服务和建筑业繁荣。

二、农村居民和劳动力流失，造成农业落后。

三、城市人口膨胀，一九七五年初，贝鲁特人口达到黎巴嫩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五。

四、卫生、教育、安全保障方面的负担大大加重，造成对其它地区的更加忽视。

这种情况导致在南部和大城市郊区什叶派内部的政治复兴。左派政党，例如共产党、复兴党和叙利亚国家党，为发展自己的基层组织找到了肥沃的土地。因此，什叶派为这些政党输送了多一半基层组织的成员。这种输送造成了互相影响，使南部什叶派青年产生一种用一切形式对镇压和征服进行抵抗和暴动的精神。毫无疑问的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自一九六九年以来在南部的存在给了这种新精神一种有力的推动，特别是在最初几年，因为南部的什叶派参加或支持抵抗运动。这种新情况导致了对南部儿女的军事训练，更加发展了南部什叶派人的特性。

但是，黎巴嫩什叶派现代史的分界线是在伊马姆穆萨·萨德尔来到黎巴嫩的时候。他用简单的、继续不断的、快速的步子启发了什叶派的“集体觉悟”，他首先为南部被剥夺了学习机会的儿女成立了几所学校。在苏尔建立了一个“山区职业学校”，一个“青年之家”，和一个“伊斯兰研究院”。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伊马姆萨德尔根据法律规定，成立了“什叶派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从一开始，穆萨·萨德尔的活动就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点，它概括了南部和贝卡的形势：一是为“被剝夺者”而工作；其次是实践“武器是男人的装饰”的口号。伊马姆穆萨·萨尔德于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给共和国总统的信中谈到最高委员会的纲领如下：

△组织教派事务，改善其社会和经济状况。

△不要使穆斯林四分五裂，致力于完全的统一。

△同黎巴嫩所有教派合作，维护黎巴嫩的统一。

△承担国家和民族的责任，维护黎巴嫩的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

△与愚味、贫穷、落后、社会暴虐和腐化作斗爭。

之后，伊马姆穆萨·萨德尔成立了一个“南部委员会”。并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宣布反对黎巴嫩负责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无视被剝夺者的权利和建设落后地区的义务，并用他们的手段威胁国家的安全和存在”。

之后，诞生了“被剝夺者运动”，萨德尔希望这一运动是黎巴嫩所有“被剝夺者”的运动，但是战爭使得它的基础建立在什叶派被剝夺者之中。萨德尔在宣布被剝夺者运动诞生的讲话中说得很明确，他说：“被剝夺者运动拒绝社会的不公正和政治教派制度，不懈地反对暴虐、封建割据、专横和把国民分类，它是一个坚持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国性运动。”

尽管萨德尔沒有打算为被剝夺者运动建立一个武装组织，但是战爭把事情推向“黎巴嫩抵抗组织——希望运动”的诞生。希望运动扎根于什叶派，特别是在南部。如果开始看来是困难的，特别是它所处的看来是互相矛盾的地位，例如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尔后是同其他政党相对峙的地位，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了，即企图维护行动和政治的独立性。这就有助于什叶派在基层扎根的方针。但是许多事情却把在南部、贝卡和贝鲁特郊区的什叶派希望运动推向极端化，这些事情是：

一、黎巴嫩国家计划行不通。

二、阿拉伯计划总的来说已处于困难的历史危机之中，在萨达特总统访问耶路撒冷之后，许多希望都破灭了。

三、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及其对黎巴嫩什叶派的影响。

四、黎巴嫩战爭及其造成的教派隔离使得每一个教派首先关心自己

的地位。

五、什叶派的基层感到，他们在战争中付出了许多，他们的土地已经变成焦土，他们的儿女已经成了主要的炮灰。

六、一些返回黎巴嫩的迁移者感到，他们是自己祖国的外来人，他们所处的这种外来人地位使他们不能参加左派政党以要求自己的权利，于是他们就转向希望运动，以便使它成为自己的发言人。

七、希望运动转向具体地关心落后地区，其成立草案中规定："推动发展运动，以使黎巴嫩所有地区无例外地繁荣起来，实现所有人民阶层的社会公正"。这样就使这一"被剝夺者"的问题成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从大西洋到海湾广泛问题的一部分。而希望运动是不会忘记它是属于黎巴嫩和阿拉伯范畴的。

八、由于最近形势的变化，南部封建政治统治的垮台。

当希望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在希望运动进入西贝鲁特之后透露，他"不想强加一个穆斯林（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总统给黎巴嫩，而是支持选举一个基督教的总统的黎巴嫩国家元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为这一温和的决定惊呆了。一切所谓这个人是极端分子，有称霸野心的说法都不攻自破了。一位观察家说：纳比·贝里的负责任的作法不是沒有基础的，而首先是希望运动的根子和它的方针的继续，是黎巴嫩什叶派周围的客观形势的继续。因为黎巴嫩的什叶派不是新的，既不是天外飞来的，也不是外地迁来的，他们是黎巴嫩的缔造者，因为他们在这里已有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纳比·贝里知道，什叶派是黎巴嫩人数最多的少数派，但是他们幷不形成能够实行统治的多数。因此总统职位仍留在一个基督徒手里，保持黎巴嫩的特点，多党制，不是一个教派统治另一个教派，这是黎巴嫩继续保持其一万零四百五十二平方公里的国际边界的保证。要求是给什叶派以他们在发展计划中应享受的合法权利，还有在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利，什叶派在国家八十五个最高职位中所占分额不过十九个，在九十九名议员中也不过十九个。因此，公平地对待什叶派，不限制他们在南部和贝卡地区的发展，不忽视不幸地带的什叶派，就可以恢复什叶派运动和黎巴嫩的平衡。

（原载《未来》周刊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八日　马亚慧译）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兴衰史

（埃及）阿卜杜勒·阿齐姆·拉马丹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大量事实生动地介绍了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五四年同法鲁克王朝和纳赛尔政府之间的特殊政治关系，反映了穆斯林兄弟会随着时代的激流而起伏，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兴衰的历史。

穆斯林兄弟会最初是为了抵制侵入埃及的西方化运动而兴起的一个纯宗教性运动，很快它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目标：建立伊斯兰政府，由伊斯兰全面控制国家。因此它便与当时的政府发生了根本性矛盾。

兄弟会同法鲁克王室建立了策略性的同盟关系，组织了从事暴力行动的特别系统，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工厂、公司、学校和医院。王室发现兄弟会已强大到足以对其产生威胁的程度，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宣布解散兄弟会，逮捕兄弟会成员。兄弟会以暗杀进行报复。

华夫脱党上台后，兄弟会重整旗鼓，在对待王室的问题上内部有分歧，但当时的领导人再次与王室合作。

以后兄弟会在主张支持自由军官运动一派的推动下，支持了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推翻法鲁克王朝的革命。革命胜利后，纳赛尔允许兄弟会继续存在。兄弟会企图控制当局。一九五四年一月，革命指导委员会宣布解散兄弟会。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内部纳赛尔与纳吉布两派的斗争中，双方都争取兄弟会的支持，为此，不久纳赛尔又同意恢复兄弟会的活动，释放被监禁的兄弟会成员。

但是，在恢复代议制生活、取消非常措施、开放自由等问题上，兄弟会同纳赛尔矛盾很深，难以妥协。一九五四年七月，纳赛尔同英国人草签了撤军协议，受到了兄弟会方面的激烈抨击。这使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纳赛尔采取了镇压行动，兄弟

会成员转入地下。兄弟会散发传单、小册子，使用宗教语言煽动反对纳赛尔的统治，并与埃及共产党合作。

在兄弟会的领导分崩离析、公开组织遭到镇压的情况下，兄弟会秘密系统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计划暗杀纳赛尔和革命指导委员会其他成员 。一九五四年十月暗杀纳赛尔失败后，庞大的秘密系统顷刻瓦解，兄弟会领导人被押上审判台。

自一九五六年开始，一些兄弟会成员获释。他们又成立了一些小组，计划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但终于暴露了，并再次被逮捕。】

暴力和穆斯林兄弟会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晚七点五十五分，纳赛尔正站在亚历山大满西广场举行的庆祝英国撤军协议签字大会上作演说。当时，演说才开始几分钟，纳赛尔正回忆他参加爱国行动的经历，他说："我是从亚历山大的这个广场上开始我的斗争的。一九三〇年，当我第一次与我的兄弟们——人民大众一起高呼自由时，我还是一个小青年。今天，感谢眞主，你们的先辈和为此而献身的所有烈士的斗争已经开花结果……"

就在这时，穆斯林兄弟会秘密组织成员阿卜杜勒·拉蒂夫向纳赛尔连续射出八颗子弹，但都未击中他。然而，这八颗子弹却给穆斯林兄弟会带来了埃及政治生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大灾难。

在纳赛尔演说时，亚历山大群众的情绪是强烈反对埃及所有政治力量都反对的撤军协议，反对签署这一协议的纳赛尔及其建立的独裁政权。当庆祝会的帐篷在广场上搭起后，亚历山大的群众就占领了广场，要求自由和打倒暴政的口号声越来越高，迫使当局在晚五点时把这些群众赶出帐篷，用从解放省雇来的一万工人重新塞满广场。阿卜杜勒·拉蒂夫混在他们之中，以便坐在离讲台二十米远的前排。他从那儿向纳赛尔开了枪。

虽然纳赛尔沒有倒下，但是，站在纳赛尔旁边的艾哈迈德·巴德尔律师倒下了，一位苏丹的部长米尔加尼·哈姆扎被讲台上飞起的电灯碎片击伤，广场上一片混乱。然而，纳赛尔镇定自若，他要求群众把罪犯捉住。群众抓住了拉蒂夫并痛打了他一顿。纳赛尔还用由于极度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要求群众原地不动，他宣布说，他的血是准备为埃及献出的，

埃及的生存并不取决于纳赛尔的斗争，而是取决于埃及人民的斗争。

自此以后，对穆斯林兄弟会展开了埃及历史上最大的搜捕活动。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即事件发生一年后，被捕人数达到最高峰，有二千九百四十三人。并下令拘留兄弟会秘密组织的小组头头赫达维·达维尔等人。同年十一月六日，政府在报上宣布要逮捕秘密组织头子优素福·塔拉特等人。十一月十五日，塔拉特落入警察之手，政府给赏金二千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巨款。据报纸公布，人数有七百人的穆斯林兄弟会秘密机构的成员百分之七十被捕。

暗杀纳赛尔的这一企图引起了对纳赛尔的广泛同情。艾哈迈德·哈桑教长在同一天发表的演说中，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赞扬了纳赛尔。他说，纳赛尔使国家摆脱了耻辱，通过土地改革法剥夺富人，赈济穷人。

但是，纳赛尔很快就丧失了这种同情，因为在事件的第二天，当局搞了烧毁赫尔米地区斯穆林兄弟会总部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使穆斯林兄弟会失去的同情又恢复了，它使埃及人想起以前革命对自由的侵犯。追捕和拘禁搞得人心惶惶。当时，穆斯林兄弟会是个在青年中具有广泛影响的组织，埃及的每个家庭几乎都有青年与它有关系，只是程度上不同，有的是加入，有的是通过捐款和出席其集会表示同情。这样一来，这些家庭就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搜捕运动对在募捐簿上签名的偶然捐款者同正式成员是不加区别的。

审判又增添了恐怖的因素。十一月一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了以副总理贾马勒·萨利姆为首，国务部长、伊斯兰大会秘书长、《解放报》社社长萨达特中校以及沙菲中校为委员的特别法庭。

从十一月六日起，该法庭称为“人民法庭”，二十八日又建立了三个分支机构。这是革命后组织的第四个法庭，前三个为军事委员会，叛逆法庭和革命法庭，人民法庭的三个分支机构在军事学院大楼里开庭，而人民法庭本身是在加齐拉岛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大楼里开庭。

人民法庭审判了八百六十七人，军事法庭审判了二百五十四人。阿卜杜勒·拉蒂夫以及其他六名穆斯林兄弟会高级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另七名领导人被判处终身苦役，还有的判苦役十五年或监禁十五年。

象对所有影响巨大的历史事件一样，对这次审判的看法是不同的。穆斯林兄弟会断然否认他们制造了这一事件。萨里哈·阿布·拉基格把

这件事说成是政府策划的“丑剧”，是为了进一步采取针对群众的自由，保护他们自己的措施。他还说，“我们有一打以上的证据说明兄弟会在这一蓄意制造的事件中是无辜的，我要求对权力中心策划的这一事件重新进行调查。”

穆斯林兄弟会从一九七六年七月开始出版的《号召》杂志，发动了一场否定穆斯林兄弟会制造满西广场事件的运动。它的证据是，当事件发生时，秘密机构主席优素福·塔拉特正在他的一个兄弟家里，他在听到消息后说，“这是纳赛尔干的，他成功了，明天，他将把这事栽在穆斯林兄弟会身上。”

《号召》在另一期中写道，“纳赛尔当时正在寻找打击伊斯兰运动、消灭人民起义的途径，以便他能独揽大权。他一直在暗地里进行着这一图谋，直到他与英国人签订了条约。兄弟会认为条约限制了民族自由。于是，他就策划了这一事件，穆斯林兄弟重新被投入牢房和集中营，被审判的无辜的被告毫无辩解的权利，受到了形形色色的折磨。”

一九七七年三月一期（《号召》）的文章，把这一事件说成是纳赛尔精心策划的“盖世太保式的一出戏”，然后嫁祸于兄弟会。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这一事件的被告处死二十五周年）那一期里，《号召》杂志还刊登了他们被处决时的照片，那时，阿卜杜勒·卡迪尔曾说“我的鲜血将是对革命人的诅咒”。

哈桑·图哈米曾应萨里哈的要求对事件作了回忆。在回忆中，他第一次公开揭示了关于纳赛尔在事件发生前从美国弄来防弹衣和美国专家劝告纳赛尔制造一个枪杀事件的故事。

图哈米说：“纳赛尔演说时，我不在场，我是从电台广播知道纳赛尔遭枪击的消息的。当时，纳赛尔的安全措施之一是劝说他穿防弹衣。防弹衣在事件发生前几周已从美国弄来，原放在他的家里，事件发生的当夜，我们把防弹衣给他送去，他第二天早上接到。我们的想法是，只要他还在亚历山大，第一次向他开枪的企图失败后，还可能继续发生。当我清晨见到他时，一些同事正在祝贺他脱险，他象往常一样大笑说，‘一切都结束了’，这意思是说，事情已结束了，用不着防弹衣了。”

图哈米还说“当时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一位美籍宣传专家——他是当时世界上最有名的宣传专家——到埃及来了，他的不同凡响的、与我们的理解相违背的建议中有这么一条：制造一个纳赛尔被枪击，然后脱

险的事件，按照人民的感情的逻辑，这样的事件将增加纳赛尔的民心，比任何正常的宣传要好，将从最近的感情渠道使纳赛尔走上人民的领导的地位。”

是的，哈桑·图哈米虽然沒有讲纳赛尔那天夜里穿了防弹衣，但是，他使穆斯林兄弟会可以防弹衣为依据来指控政府策划了这样的阴谋。

那么，事实的眞相是什么呢？

满西事件应该置于它的正确的范畴，即穆斯林兄弟会运动的性质之內。这个运动是具有埃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特性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别于埃及民族运动兴起以来的所有自由主义党派，也有别于那个时期出现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团体和三十年代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它的宗教和政治意识，在目标和手段上同上述所有党派和团体有所不同，它依靠一支强大的，受过训练的，装备齐全的秘密军队，即众所周知的“特别系统”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把暴力作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

哈桑·班纳和军事力量

我们有证据证明，哈桑·班纳在开始组建穆斯林兄弟会时，他的脑子里原来幷沒有使用暴力的想法。当时的想法，正如伊斯兰教历一三五二年八月五日穆斯林兄弟报所说，是通过“友爱、兄弟之情和互相了解”来传播主张。随着运动的成功和扩大，班纳开始把他的兄弟会从一个非军事团体变成一个半军事性的团体，从“友爱、兄弟之情和互相了解”的手段发展到准备用暴力来实现目标的阶段，于是他着手在“巡游队”这个清白的名称下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

穆斯林兄弟会的产生原是对埃及社会中西方化运动的一个坚持祖先传统的反应。西方化运动当时的表现是：埃及妇女抛弃面纱，受教育幷出来参加工作，以至投身到政治中去；谴责多妻制；呼吁取消宗教法庭；埃及男人从穿着、习惯、思想方法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埃及青年普遍地从爱资哈尔的宗教教育转向现代科学；出现了要求重新考虑旧传统、旧思想的思想解放潮流。

欧洲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东方的入侵，不仅在埃及，而且在整个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土耳其，促成了一股巨大潮流的出现。这股潮流主张接受西方的文明，因为它的优越性已被证实幷且战胜了东方文明。这股潮

流还认为，新的日本是一个能顶住西方的国家的典范，它能够与西方并驾齐驱。这股潮流并认为，卡迈勒的土耳其是另一个典范。

但是，这股外来的潮流遭到了伊斯兰宗教潮流的强烈反对。当时，爱资哈尔和知识社的毕业生，苏菲派（神秘派）以及拉希德·礼萨的子弟等宗教文化人士站在反对西方化队伍的前列，而以埃及大学为首的世俗文化人士则站在西方文化的行列中。

可以这样说，宗教文化人士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由于无力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不得不接受当时唯一的免费教育，即师范学校、知识社和爱资哈尔的教育。鉴于这些人士远离欧洲文化，他们的宗教意识很强，带有“伊斯兰联盟”的思想，而他们所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思想相混杂。

出身于传统的宗教家庭的哈桑·班纳是反对西方化的宗教青年队伍中的一个杰出的典型。他在马哈茂迪亚地区上了小学和初中，然后在达马荷尔上师范学校，后去开罗接受知识社教育。一九二七年，他获得了知识社毕业证书，开始在伊斯梅利亚的艾米尔小学任教师，住在伊斯梅利亚城，那时，他只有二十一岁。

作为一个新型的鼓动家，班纳立即在社会上表现出他的个性。他并没有到清真寺去，而是选择了该城的几个大茶馆，每星期去作一次演讲。六个月后，他的计划有了成效。一九二八年三月，他的六位朋友到他家去访问他，一同宣誓为伊斯兰和穆斯林而奋斗。

当初，他们曾想为他们自己起个名字：协会，俱乐部，派别或工会。然而，班纳拒绝了这些名称，他说，让我们抛开形式和名称。我们第一次集会的基础是思想，我们是为伊斯兰服务的兄弟，那末，我们就是穆斯林兄弟。这就是埃及现代史上最大的运动的开始。

由此可见，穆斯林兄弟会运动不是一些与独立、立宪运动，与反对现政权相关的政治因素促成的，而是由一些反对西方化的传统思想促成的。在他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暴力和追求用武力来掌权的思想，这一运动只是进行出版伊斯兰报纸，劝戒，开导，建立协会等一些和平的运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会必须明确自己对伊斯兰和政治事务的思想立场。这时，逐渐形成了它的与当初不同的、完整的、明确的意识形态。

这一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简单的，同时是重要的。它与现政权的意识

形态相矛盾，表现在以下几点上：

1、伊斯兰的无所不包性，即包含宗教和世界，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穆斯林兄弟会一九三八年出版的第一期《向导》杂志对此作了解释。班纳在杂志上写道："伊斯兰是崇拜和领导，宗教和国家，精神和行动，祈祷和奋斗，服从和统治，古兰经和利剑。两者是不能相互分开的。"

2、使伊斯兰回到最初的教义中去。班纳曾在演说中说，"伊斯兰制度应用最初的源泉来浇灌，要象祖辈的追随者一样来理解伊斯兰，我们要站在先知们的界限上，以免用同眞主不同的标准来限制我们自己。"

3、伊斯兰联盟。班纳认为，"升起伊斯兰旗帜的每块土地，是每个穆斯林进行保卫，为之战斗和工作的祖国"，"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种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

4、坚持哈里法（继承人）的思想。班纳在一九三八年第五次大会上说，"穆斯林兄弟认为，哈里法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是伊斯兰各族相互联系的标志。这是伊斯兰礼仪，所有的穆斯林都应重视它。"

5、伊斯兰统治。班纳宣布，穆斯林兄弟的所有步骤和工作都是为了伊斯兰统治。

这些是穆斯林兄弟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支柱，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哲理是矛盾的。那时候是文官政府，一九二二年制定的宪法并不利于伊斯兰社会的统治。

一九三八年，班纳决定进入政治领域，同年五月，班纳出版了政治性的《向导》周刊，第一期的社论中提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民族主义方向和他们开始参与国内外的政治斗爭"。

班纳在这篇历史性的文章中写道："埃及处于外来入侵者统治下，殖民主义为所欲为。人民大众正为恢复自由，要求独立而奋斗……现在，工作和奋斗的时间到了，我们将从只是口头的号召转向伴随着斗爭和工作的号召。

"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我们的计划或偏离我们的道路，通过干预政治来改变我们的做法，而是以此转入我们伊斯兰道路的第二步……。"

他还警告说，这新的一步的后果将可能是兄弟们遭到"压迫和比压迫更厉害的东西；坐牢和比坐牢更厉害的东西"。

是什么促使班纳进入政治领域呢？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力量增长是

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班纳的努力，兄弟会从原只局限于伊斯梅利亚城，人数不超过一百的小组织，到一九三三年发展到五十个地区。班纳在一九三八年宣布，兄弟会已“在各地有机构，人人都进行宣传，有三百多个分会在进行工作”。

然而，班纳选择这一年进入政治领域的问题是需要探讨的。这一年毫无疑问是个反动的年代。在上年末，法鲁克国王迫使多数派内阁，即华夫脱内阁辞职，通过由少数派头目组成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帕夏内阁控制着全国的命运。在这一年，以艾哈迈德·侯赛因为首的青年埃及小组的法西斯潮流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公开反对各种党派，中伤宪法和议会生活，高举伊斯兰统治和协商制度的口号，呼吁法鲁克国王成为穆斯林的哈里法。

在这样的时候，班纳介入政治绝非是为了站在民主力量的一边，而是站在由阿里·马希尔帕夏掌舵的王室一边。一部分原因也许是班纳受了王室宗教口号的欺骗。当时王室为了吸引信教的群众曾说，华夫脱政府是由科普特分子控制的。

到底是谁利用谁呢？也许是相互利用。班纳除了与王室一起反对各政党外，还认为，王室提出的宗教性口号便于伊斯兰统治的目标的实现。总之，由于班纳没有加入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阵营，要保持中立是困难的，必然是倒向王室一边。而在群众中孤立的王室也需要利用这股日益增长的群众力量来对付华夫脱党以图消灭之。这是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迁到开罗后就出现的趋势。

但是，班纳却不能解释兄弟会的思想在变革时代传播快的原因。当时的分支组织，从十个（班纳到开罗前）一下子在一年内就发展到五十个，一九三八年又壮大到三百个。如果说，在华夫脱党时代，发展快是由于该党执行民主宪政路线，那是可以理解的，那末在变革时代就不好理解了。因为这一时代毫不迟疑地以捣乱阴谋为借口追捕着处于萌芽年代的少年埃及小组的成员。无论如何，有一点看法是正确的，就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反动的时代里总是兴盛的。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们同统治者之间发生分裂，同盟于一九四八年破裂。

班纳与巡游队

班纳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是巡游队，他亲自建立了第一支队伍。班纳

在回忆录中说，“我亲自组织了第一支队伍并负责它的训练。训练项目是我们在学技里搞的一些体育训练。”

一九三四年，在其他分支中普遍建立巡游队的想法具体化了，形成了所谓的“巡游队计划”，由穆斯林协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把参加兄弟会活动的人分成三级：第一级是一般的加入，称为“助手兄弟”；第二级是正式加入，其成员称为“正式兄弟”；第三级是加入实际工作，其成员称为“行动兄弟”，只有在这个最后阶段，行动兄弟才有权参加“巡游队”。同时还建立了第四级，其成员称为“圣战兄弟”。

一九三四——一九三七年间，巡游队迅速发展，已达到班纳想显示一下他的力量的地步。这是乘法鲁克国王一九三七年七月到达开罗的时机。兄弟会杂志把这次对国王的欢迎看作是“埃及现代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集结”，当时报纸在描述这一经过时第一次把“巡游队”称作“军事队伍”。报纸说：“开罗的兄弟会总部刚一向各地区的追随者宣布这一集结的消息，向其军事队伍发出向开罗进军的命令，队伍就象潮水般涌来。旗杆有四米半长，旗为绿色绒布，上面画着新月型的古兰经，上面写着“眞主至高无上”，下面写着“穆斯林兄弟”，打旗者是当时的举重世界冠军赛义德·努赛尔。在阿卜丁广场，穆斯林兄弟整齐地站在皇宫门前，高举旗帜高呼“眞主至高无上”的口号，向国王发誓效忠。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兄弟会的军事组织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班纳决定把兄弟会军事组织并入公开形式的童子军协会。当时的最高委员会是由以班纳为首的七人组成，总监是由军队的军官马哈茂德·拉比卜担任。

巡游队最高委员会很快就开设了培养教练的学校，两个月后就有三十五名教练毕业。开罗周围的小组首先组成了，然后又扩大到亚历山大和农村。在这种合法的幌子下，战争结束时，巡游队队员已达到四万五千人。

班纳的下一步棋是搞武器。这项工作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完成的。见证人是萨达特总统。萨达特说，最初时候，班纳自己收买和储藏武器，连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中最接近他的人也沒有告诉，只是靠一些小青年帮忙。萨达特曾叙述这件事的经过说，有一天，他正与班纳坐在一起，这时进来了一个提着两只箱子的志愿兵，当他看到萨达特时显得

十分惊慌，但是班纳却命令他把箱子打开，每一只里都有十枝不同类型的手枪。

兄弟会在羽毛未丰的情况下，与当局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侯赛因·沙里帕夏时代，应英国当局的要求，吊销了兄弟会重新出版的《灯台》月刊的许可证，关闭了他们的印刷所，并不让报纸登他们的消息。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政府还拘留了班纳等人，把他们送入看守所。这样，兄弟会的主张第一次遭到眞正的危险。但王室很快就为挽救他们进行了干涉，侯赛因不得不在十一月十三日，即拘留不到一个月后释放了班纳等人。萨阿德内阁的供应部长哈米德在释放前几天还到班纳的挽留所看望过班纳。

第一次灾难虽然这样迅速地结束了，但是对班纳的计划产生了两个影响：一、为了避免他的主张流产，应不惜任何代价避免与英国人冲突；二、要建立秘密组织。

从此以后，可以肯定的是，兄弟会沒有进行任何反对美国人的活动。在一九四二年进行的“前进吧，隆美尔”游行中，他们沒起任何作用。

据穆斯林兄弟会副总训导师穆罕默德·哈米斯说，秘密系统的建立是在一九四二年左右或者更早。

开始，巡游制度对“行动兄弟”来说是自愿执行的制度。但以后发布的指示又规定，每个行动兄弟即是巡游者，每个巡游者也是行动兄弟。

班纳把这一制度称为“家法”，是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行精神训练的一个具体方面。在兄弟成员分成四级后，“家法”就只限于对行动兄弟有效。

每个家庭由五到十名成员组成，建立在一个阶级或阶层的基础上，不是学生、职员，就是工人。按这一制度规定，每人都要了解其他成员的社会、文化、道德、家庭情况，每周在一位成员家里开会，而不是在分会所在地开会，以便相互熟悉，共同研究宗教问题。

这一家法不久就变成培养“圣战兄弟”的制度。班纳在给他们的信里面提出宣誓效忠的十件事：理解，忠诚，努力工作，圣战，献身，服从，坚定，一心一意，手足之情，信心十足。

班纳把这些圣战者称作“分遣队员”，有学生、职员和工人三种分

遣队，实际上，这种家庭系统是特别系统（秘密组织）的入口。优秀的成员逐渐地进入特别系统中去。

杀死纳克拉希帕夏的阿卜杜勒·马吉德·哈桑描述了进入特别系统的经过：他的“家庭”的一位成员陪伴他去会见了一个名叫艾哈迈德·赫加齐的人，要求他“坚信他说的每一句话”。赫加齐说，除了使用武器这一条外，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张同穆罕默德的主张是一样的。穆斯林兄弟并未忘记这一点，他们将准备实施这一点。哈桑说，“我同意加入这一系统，因为它只接受已被证明是完全忠于兄弟会主张的穆斯林兄弟。”这一系统没有什么专门的名字，在穆斯林兄弟间被称为特别系统。

秘密团体的制度与家法也有相同之处，即“每个成员在社会和道德生活上每天的要求是严格的，活动日程表上有读经、进行体育锻炼等内容”。

不同的是，这一秘密组织成员有专门的、用名字的第一组字母数字代号；要服从严格的监检制度，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在监视之下，任何背叛得到的报应将是死亡。这个系统下的每一小组由五个人组成，要经历三个阶段。哈桑说，当时赫加齐专门教授小组成员民族主义和宗教课，还给小组上使用武器的专门课，以及法律和简单救护课。对这些科目都进行了考试，对武器的训练是在各地的一些沙漠地区进行的。

成员合格后就要进行宣誓，保证绝对服从和保守秘密。哈桑还描述了宣誓的庄严时刻的情形：我到了萨里卜地区的一所房子门前，遇到了一个叫阿卜杜勒·拉赫曼的人，然后一起上了二层，进入了一间里屋，随后一个个地进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屋里已站着一个遮住口鼻的人，在他的面前摆着一部经卷和一支手枪。他说，这是伊斯兰胜利的唯一手段，应该绝对服从，并让我宣誓。泄露这一特别系统秘密的人的报应是死亡。阿卜杜勒对我说，这个人是我们与班纳之间的联系人，这说明这一系统是属于总部的。哈桑从这人的声音和外观猜出他是穆斯林兄弟会副会长，穆斯林兄弟会报纸的社长。

兄弟会的情报机关，其口号是：成为与豺狼在一起的豺狼

兄弟会的“组织法”规定了在小组制度的基础上组成这一秘密机构的方法。它由指挥部、参谋部和士兵组成。它规定了士兵的任务、应具备的条件、选择和培养人员的方法。

该法规定，每个小组有一个“埃米尔”。其任务是接受成员。首先是接受推荐，然后向其介绍工作的性质及合法性，要求其保密并绝对服从，教其在各种情况下如何行事，在执行任务时坚定、沉着，泰然自若，要他思想上作好即将承担任务的准备，然后交给他一个任务和考验他。在规定时间前监视他的行动，最后又取消该项任务。如果这一成员经受住考验，就送到开罗进行宣誓；如果不合格，就分派去搞一般的公开事情。

该法规定，小组成员宣誓后绝对服从“他们的埃米尔”，并订有对不负责任者进行审查的制度。审查通过调查委员会进行，根据不同情况由小组的埃米尔、各地区代表、各地区主任、各地区驻开罗代表和开罗的主任组成调查委员会。对背叛、有意或无意泄密者的惩罚是处死或小组除名。

此外，还发布了一个条例，规定小组成员义务，组长权力和对不尽职者进行审查，埃米尔有签署物质和道义惩罚令的权力。最轻的惩罚是戒食，并让他在戒食情况下步行一段较长的路程。

这一特别组织还设有情报机构，使领导可以了解敌友的一切大小事情。当时，情报机构范围很广，除了工会和协会之外，还把手伸到埃及所有的党派之中，政府各部、大学、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各个学校里都有情报站，提供警察所、军队以及犹太人、外国人、埃及人的一切情况。

组织法还规定了情报机构人员应具备的条件：良好的体质，精干、机智，有自控能力，灵活，能与“豺狼在一起”打交道。组织法还提到对组员的身体素质和技术专长进行训练的方法，培养他们懂电工，无线电，摄影，速记技术，教他们表演、化装、变相，使用交通工具：摩托车、汽车甚至在对外联系时能驾驶飞机。训练内容还包括敢死队行动，游击战，使用自制手榴弹，破坏交通、铁路，使用炸药、地雷、火器以及勒死对方的技术。

这支秘密的队伍有自己的智囊，有充足的资金，武器，弹药，交通工具，通讯设备，无论在城市和农村都有巢穴。

最初，这种圣战的想法在这一秘密组织领导人的头脑中是针对英国人的，为的是解放自己的国家。后来，他们的思想逐步地转到国内。阿卜杜勒·马克德在他的供词中说，在一次会议上我们听说了杀死被证明与敌人合作的穆斯林的故事，第一次听说“伊斯兰是可以杀死穆斯林

的，只要证明他是背叛的穆斯林”。这促使他在去暗杀纳克拉希时毫不犹豫。

这样的秘密机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跨越了不少阶段。有材料证实，它在巴勒斯坦战争前已相当完善，它已建立了小组，对成员进行了训练，也积聚了力量。一九四二年，成员已有二千名，一九四五年增加到四万五千名，一九四六年达六万，到一九四七年底总人数为七万五千人。直到发布解散决定为止，其人数一直稳定在这个数字上。

穆斯林兄弟会组织还渗入军队和警察系统。由于军官的工作性质，这些组织是秘密的。当在人民法庭上向侯赛因·阿布·萨利姆问及这一问题时，他回答说：“自军队或警察中有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后，他们的组织是这个团体的一个秘密组织。”

秘密组织直接隶属总训导师领导。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亲自管理该组织的事务，他的领导是通过一个专门机构进行，这一机构的第一个领导人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桑纳迪，有一批穆斯林兄弟作为他的助手，他们的下面是地区的领导人。

这一秘密组织有自己独立于公开活动的预算，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它根据特殊的制度进行征集，用于搞武装和满足自己的特殊需要。

当时，兄弟会的预算是庞大的，每个参加者平均每月交纳十个皮亚斯，如果按兄弟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散时的说法，即有五十万成员，那么，每月的总收入是五万埃镑，如果按侯赛因·阿里·萨利姆的说法，有二十万成员，那末，每月收入为两万镑。这当然不包括特殊制度的预算和富人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其它捐款。

班纳在组织这一秘密机构上依靠的是工人和由职员、手工业者和学生组成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国家安全检察长在人民法庭上谈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法官先生们，你们已看到，兄弟会为它的秘密系统挑选的是穷人阶级，他们之中有铁匠、厨师、洋铁匠、卫生部的工作人员，这一组织挑选穷人的目的是利用他们这些人穷的因素，激起他们对社会的仇恨，这使得他们在执行破坏性任务时最坚定。”

组织特别系统的想法是在兄弟会与当局发生冲突后才产生的。王室和萨阿德分子曾在使班纳和他的同伙出狱的问题上起了作用，但是，释放两个月后，王室政府垮台，组成了以穆斯塔法·纳哈斯帕夏为首的华

夫脱党政府。在华夫脱党政府的自由主义的统治状况下，兄弟会还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尽管一九四二年底内阁封闭了兄弟会的分支机构，只留下了总部，但第二年一开始就发生了变化，华夫脱党的一些主要成员——大部分是部长——亲自访问了兄弟会总部，关系逐渐改善。到华夫脱党统治末期，兄弟会的运动已有相当的力量，以至使班纳认为在时机成熟时，兄弟会有通过议会上台的可能。

然而，王室不久在一九四四年对宪法作了重大修改，并据此把华夫脱党赶下了台，出现了一个新的朝代，其纲领集中到一点：为二月四日事件向华夫脱党报复，消灭它，清除其影响。当时，由萨阿德党领袖艾哈迈德·马希尔帕夏组成新的经过调整的内阁。

班纳自己参加了伊斯梅利亚选区的议员竞选，他的五名同伴也参加了其它选区的竞选，但是他们都落选了。班纳原在第一轮中获胜，但在再选中，被对方以伪造的微小差别的票数击败。尽管他得到当地多数居民的拥护，但仍未当选。

这对兄弟会的新作用和力量是第一次挑战，兄弟会接受了这种挑战。当艾哈迈德·马希尔打算向轴心国家宣战时，兄弟会就起来表示反对，并与华夫脱党和其它民族主义分子取得一致意见。但艾哈迈德决心走自己的路，于是，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发表了声明。但是他刚一宣读完声明就遭到了枪杀。

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一事件中的作用曾经引起争论。然而，杀人犯承认他是属于民族党的，被指控参与这一暗杀事件而被拘留的班纳等兄弟会成员被释放。不过，也有一部分人的看法是，杀人犯是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但他隐藏在民族党内，这样做是为了不会损伤他的小组本身。

如果说，暗杀艾哈迈德确是兄弟会策划的，那么，这是他们使用暴力手段的第一次。在这以后的阶段，兄弟会运动就象海浪一样滚滚向前发展，其原因如下：

（1）一九四五年五月，大战结束，这为谈论本国的问题打开了大门。埃及所有民族主义力量都起来进行民族主义的斗争，这一问题比兄弟会致力实现的伊斯兰政府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兄弟会已不能象战前一样使公众舆论集中来谈论伊斯兰政府的问题。此时，民族解放问题已先于伊斯兰政府问题。

（2）战后埃及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使民族斗争达到新水平。在

战争情况下，埃及的资本主义从各方面扩大了它的活动，追求进一步的利润和剥削，而一无所有的农民、工人以及小资产者情况急剧变坏。这一切给予民族斗争以空前巨大的社会影响，民族解放事业在群众的眼里不仅是摆脱英国人，而且已成为社会解放，打击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事业。

（3）这种社会和经济形势产生了新的政治力量即共产主义势力。从一九二八年兄弟会建立以来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支力量没有搞什么实际行动。

埃及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一九二五年就遭到打击，几乎完全被根除。兄弟会从没感到来自这方面的危险。穆斯林兄弟会在整个三十年代中一直是占主导地位，在它面前的政治力量是以华夫脱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势力。在排斥了外国因素后，战争给共产主义运动创造了机会，这一运动为首的是“新曙光”小组。

（4）萨阿德政府并未对兄弟会同华夫脱党政府结成过的同盟表示原谅。

班纳和法鲁克的交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变化促使班纳投入王室阵营，因为在这时对英国人采取温和立场，与王室结成联盟可以使班纳的活动赢得足够的时间，使力量达到能依靠它来实现其最高目标——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程度。

安瓦尔·萨达特在他的题为《无人知晓的篇章》的回忆录里记载了班纳的这一迫切愿望。他说，一九四四年他从集中营逃出后，重新与班纳进行了联系，他当时认为兄弟会的力量是政治舞台上唯一有能力的力量。“班纳向我解释了来自王室和外国人两方面的麻烦，他对我说，国王已强烈地感到兄弟会的主张的力量。国王已听说，我们的主张的基础是，国王是可以效忠的，但国王不应是继承的。他对我说，国王正在策划如何袭击这一运动。他担心会遭到国王的打击，因为兄弟会的运动还未达到力量的顶峰。”他还谈了外国人对这一运动的立场。他说，他已开始感到外国人是害怕这一运动的。他们认为，这一运动既然把伊斯兰法规作为必须遵守的，那么这一运动肯定将会反对他们的活动，以及他们根据现行法律和宪法得到的钱财和自由。“这种来自王室和外国人的

一致的看法，使得穆斯林兄弟会的主张处在巨大的危险中。”

班纳通过萨达特与国王进行了联系，但沒有成功。然而，正如萨达特在回忆录中所说，“法鲁克国王在一九四六年的一段时间内对兄弟会采取了某种明确的立场。在巴勒斯坦战爭以后就改变了这一立场。”

可以解释法鲁克的立场，以及他与班纳取得谅解的原因是，班纳改变了立场，采取了敌视华夫脱党、接受和支持变革时代的方针。

当时的大学是华夫脱党和兄弟会斗爭的场所，分成以华夫脱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以兄弟会、民族党和青年埃及党人为另一方的两个阵营。

斗爭于一九四五年夏天开始，一些学生呼吁召开讨论国是的大会，来确定埃及所要求的撤退的含意：是仅仅军事上的撤军还是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撤退？讨论如何才能摆脱殖民主义：是靠谈判政策还是通过亿万人参加的斗爭？

穆斯林兄弟会很快于十月六日在班纳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决定让当时的纳克拉希政府来解决民族问题，并表示对这个政府完全支持。埃及学生也于七日举行大会，兄弟会的代表原打算获得学生对兄弟会大会决议的同意，但是学生们决定还要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迫使兄弟会成员退出了会议。

学生最后作出了与兄弟会不同的决议。他们认为唯一能摆脱殖民主义的道路不是通过拖延而是通过埃及和苏丹人民的斗爭。眞正的独立不仅是军事撤军，而是埃及获得独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复兴。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英国对埃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日提出的备忘录的回答，表示了对纳克拉希政府的蔑视，并表示英国打算通过派大使到埃及来进行准备性会谈，来缩小民族问题的影响，并坚持殖民主义的政策，这引起全民族的谴责和愤恨，在这样的民族气氛下，学生们抛开了他们的党派分歧，集结了队伍，决定于二月九日召开大会，作出向阿卜丁宫进行和平游行的决定。那天游行的领导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

但是，纳克拉希帕夏却想教训一下学生们，以便将来不再发生类似的示威游行。他命令警察在阿巴斯桥阻止游行队伍前进，于是，八十四名学生受了重伤。

法鲁克国王认为纳克拉希采取这一措施是愚蠢的，纳克拉希应为此

付出代价。于是法鲁克国王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到大学去了一次，表示欢迎学生去皇宫拜访他，并向他们暗示纳克拉希将要辞职。接着兄弟会在大学里的领袖在警察的保护下又领导了从大学到皇宫的游行。游行的第二天，纳克拉希下台，由伊斯梅尔·西德基帕夏继任。

西德基应对埃及政府生活中最黑暗的历史负责，任命他领导新内阁是对穆斯林兄弟会以外的所有民族主义力量的沉重打击。然而，在全民族已看到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埃及结盟的阶级实质，肯定了民族斗争的社会意义的时刻，唯独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梅尔·西德基帕夏结成了联盟。

兄弟会从这一联盟中获得的代价是得到一些方便，如允许出版《穆斯林兄弟报》（一九四六年五月正式出版），可用官价购买新闻纸，这比黑市要节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费用，以及使用政府营地进行训练等特权。

在后一阶段，兄弟会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分子和华夫脱党人，为王室分裂民族主义力量的目的效劳，当学生通过选举组成了“学生总执行委员会”时，穆斯林兄弟会就组成“学生最高执行委员会”来破坏总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攻击其宣传品，说它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含有“解放斗争”，“人民斗争”，“学生，工人协会万岁”等一些俄国人的言词。当“工人和学生全国委员会”成立时，兄弟会就成立“民族委员会”来进行对抗。但是“民族委员会”在青年埃及党和民族党中的青年的压力下不得不起来对抗西德基，警告他不要同英国人拖延。但是，在“民族委员会”起来要求自由时，穆斯林兄弟会就退出了这一委员会，宣布说，它的任务只是呼吁把三月四日定为全国哀悼日。

与此同时，兄弟会很快就和华夫脱党人发生了摩擦，一九四六年发生了两者间最大的冲突。他们在冲突中使用了法西斯手段，用棍棒向青年和学生进行袭击。在每次与华夫脱党人发生的冲突中，政府则总是站在兄弟会一边。

杀死纳克拉希帕夏的阿卜杜勒·马吉德曾提到兄弟会与政府间建立联盟的例子。他说，一次他曾与另外两名成员一起到马卡塔姆山（在开罗近郊区——编者注）去练习步枪、手枪和手榴弹的使用方法，当时训练他们的是一名叫赛义德·法伊兹的人，他下身穿着黄色裤子，上身穿着黄色短袖衫，戴着一顶象英国士兵的帽子。在训练中，阿卜杜勒看到

在一些帐篷里放着一些枪支，弹药。两天后，阿卜杜勒得知赛义德和其他几个人都被捕了。然而，又过两天，他们又被放出来，理由是这不违反法律，兄弟会所进行的事与伊斯兰的教义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时的训练是在政府的眼皮下进行的”。

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的训练和准备熟视无睹的藉口是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事业对兄弟会来说，是真正的口号，但对西德基政府来说，却是虚伪的幌子。谁也不能否认穆斯林兄弟会的青年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忠诚，他们曾向其领导施加压力，要求允许他们去为巴勒斯坦进行圣战。阿卜杜勒·马吉德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巴勒斯坦问题开始具有重大的作用，我与所有“特别系统”的人都认为，我们为之训练和准备的圣战的时间即将来临。但是，领导却对我们的多次要求，迟迟不作答复，出现了一些成员想脱离特别系统，到巴勒斯坦去作战的思潮。兄弟会的领导确已感到这样的压力，它对我们说：圣战不局限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不只是在巴勒斯坦，它在埃及也存在。“特别系统”应对它展开自己的活动和斗争。

很清楚，穆斯林兄弟会利用了修改宪法的机会，除了使兄弟会发展了秘密系统外，还为完成其训练和准备提供了合适的气候。在武器方面，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期间，政府允许兄弟会一直武装到牙齿。艾哈迈德·侯赛因曾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在巴勒斯坦问题发生时，阿拉伯国家最初的意见是不进行公开的干预，而让依靠群众团体和机构的阿拉伯联盟作为独立机构来进行这项工作。当时，这个阿拉伯最高机构以埃及为总部，在政府的监督下，安排了它与兄弟会间的关系，它批准兄弟会的代表为巴勒斯坦战争搜集武器。他们在边防当局参谋长协助下，到西沙漠中去集中。当时这一切都是完全合法的。兄弟会还在政府的眼皮下开设了武器修理车间。”对于这一切，穆斯林兄弟会并未否认，在发表解散声明时，还强调说这也是它保卫自己的一种手段。

在题为《我们的事业》的声明中提到，穆斯林兄弟会当时是为帮助阿拉伯最高机构从各地搜集武器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并尽可能的帮助那些到埃及购买武器的巴勒斯坦兄弟。阿拉伯联盟对此给予了正式协助，并以穆斯林兄弟会的名义在苏伊士、努赛拉特和巴里吉开办了专门的营地。

这一切都反映了兄弟会的秘密系统那时已经组成，并制订了条例。

该条例规定了这一秘密系统的任务，发布和下达命令的方法及其权力和责任。这一秘密系统还有了供使用的密码和装备、器械，并通过军队军官的征兵工作使其人数大幅度增加。

班纳那时是这一组织的最高司令。具体的领导先是萨里哈·阿西马维，然后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桑纳迪。在最后阶段，班纳与这一秘密组织建立了直接的领导关系。

王室的公开的恐怖主义政府与兄弟会秘密的恐怖主义政府之间的非神圣战争的结果

不久，巴勒斯坦事业的发展促使兄弟会进入了战斗。穆斯林兄弟会总部先是派一百名志愿人员到叙利亚的加塔纳军营去，并在政府的允许下，在靠近阿里什的地方建立了供二万多人使用的专门的训练营地。总部负责人向这些人供应他们所需要的武器、弹药、装备和工具。一九四八年三月，他们从那里开进了巴勒斯坦，占领了加沙南部的努赛招特营地，驻扎在“苏尔·巴赫尔”、“贝特·哈拉姆”和耶路撒冷外围。之后，他们又突破了中部防线的“拉马特·拉黑勒”，摧毁了“迪鲁姆”军营，在南部地区辗转作战。在这些作战中他们之中牺牲了近百人，有近百人受伤，还有些人被俘。这些人堪称英勇的榜样。

然而，这样的损失并没有对兄弟会的巡游队或特别组织的队伍产生影响。一些人认为，当时兄弟会的领导只从参加公开组织的成员中挑选了志愿人员，只派出一小部分的秘密系统成员，而把这一系统的大部分成员保存下来进行所谓的内部圣战。班纳无疑是支持这种意见的，他在一篇回答别人质疑的备忘录中提到，“当政府在哈克斯蒂卜办起训练志愿人员的营地时，有一千名兄弟提出申请，政府分批挑选了六百人。政府配给他们装备，与正规部队编制在一起。很清楚，这些人员原先并未受过什么训练，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是没有参加兄弟会的公开的巡游队和秘密系统的热情洋溢的穆斯林兄弟。”

诚然，班纳也并未使他的特别系统置身战斗之外，特别是在以色列空袭埃及以后，他让它的成员去侵犯埃及的犹太人利益。阿卜杜勒·马吉德承认这一点，说埃及军队进入巴勒斯坦三、四天后，“我接到了一系列即将行动的通知。一九四八年八月犹太复国主义飞机进行了多次空袭，我们决定对埃及的犹太人地区进行袭击，于是，开始发生了一系列

破坏事件”。

兄弟会在其照会中也并未完全否认它对这些事件的责任，它解释说原因是“以色列公民(即埃及的犹太人)对支持阿拉伯巴勒斯坦持僵硬态度，并已证实，这些犹太分子给了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巨大支援，这种援助在稳住他们的脚根，设立他们的营地和向他们提供武器与钱财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到十一月期间，秘密系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对付犹太人的财产方面，使犹太人的居住区发生了多次爆炸。

然而，在这段时期，班纳也不能阻止秘密系统中的青年成员反对英国人的斗争热情，特别是由兄弟会组成的“民族委员会”，提出把一九四六年三月四日定为烈士日后，在这一天，亚历山大的英国士兵杀害了他们之中的二十八名成员。在七月的一个星期内，在英国人的汽车里和娱乐场所连续发生了四起反对英国士兵的事件。他们使用手榴弹、手枪和步枪打伤了一百二十八名英国士兵。这样，十一名成员被控告入狱，其中三名于一九四六年一月通过他们自己在牢窗上打开的缺口逃了出来，其他人受到了审判。法官是曾主审过“亚历山大刽子手”的艾哈迈德·赫桑达尔。虽然在法庭上沒有提出这些人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问题，但是在审判后八个月，即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艾哈迈德法官被两名穆斯林兄弟会青年杀死，这是对他宣判有关手榴弹事件判决的报复。兄弟会的领导虽然否认对这一暗杀负有责任，但他们在谈这一问题时说：赫桑达尔对那些向亚历山大英军俱乐部扔炸弹的学生的判决太严厉了，判他们坐十年牢，而对亚历山大的刽子手哈桑·卡纳纳才判了七年。学生们原来设想通过他们的行动能实现他们祖国的目的，对他们这样的判决是妨碍民族主义运动的。

总之，穆斯林兄弟会在一九四八年末已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它拥有自己的武装、军队、工厂、公司、学校和医院，只是等着跃上政权的宝座了。就在这个时候，即十二月八日，马哈茂德·法赫米·纳克拉希帕夏宣布了解散兄弟会的决定，逮捕了兄弟会的成员，沒收了他们的钱财。兄弟会活动欣欣向荣的一页过去了，开始了另外的篇章。

政府解散兄弟会的动机是什么？根据解散的照会，有四点指控：

一、兄弟会的目标是改变社会的政治制度，并通过由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员组成所谓巡游队，采用恐怖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的。

二、兄弟会与其政敌间发生多次冲突，以及在开罗的许多地方出现的扔手榴弹的暴力行动。

三、有关兄弟会训练使用火器、制造手榴弹和炸药、收藏武器的事实。

四、穆斯林兄弟会在农村的领导采取煽动反对大地主的立场。

而班纳认为，政府解散兄弟会的动机是外国的干涉，他说："政府这一大胆的步骤的真正动机绝不可能是仅仅怀疑兄弟会的意图，把它当作威胁安全与和平的根源，在这方面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我们认为，其真正的原因是外国人在国际政治动荡、巴基斯坦局势令人担心、埃及政策处于进退维谷的时候，利用发生的一些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

兄弟会的声明还谈到了其它四个原因：

一、用解散兄弟会来为政府和英国人之间谈判作准备。

二、担心兄弟会会对政府在解决巴勒斯坦和苏丹问题上的失败作出反应。声明说："政府完全知道兄弟会是知道事情的内幕及失败的原因的；它感到，兄弟会将会与它算帐，于是抢在它的前面，以这一措施来掩盖它的失败。也许政府估计，兄弟会会在埃及起来革命，它在巴勒斯坦的志愿人员会发生叛乱。但是，穆斯林兄弟没有这样做，只是克制着自己。"

三、担心在下届大选中与兄弟会对抗。现掌权者"知道兄弟会思想在人民及各阶层中深入的程度，特别是在农村。很自然，他们考虑到在这方面的竞争，以这样的打击企图使一些群众远离兄弟会，并歪曲他们圣战的面貌。"

四、世界犹太主义、国际共产主义、殖民主义和叛教者、虚无主义者联合起来在政府面前对穆斯林兄弟会施奸计，因为他们认为，兄弟会及其主张是"阻止他们放荡、混乱、堕落的一堵坚不可摧的墙"。

我们的看法是，王室和纳克拉希政府害怕兄弟会力量在政治生活中与日俱增是这一问题的真正原因。在那时，王室已感觉到穆斯林兄弟会力量的不断增长已达到它再也不能控制的地步，允许它这样无止境的发展下去，最终王室自己将是第一个牺牲品，它感到它要打击华夫脱党的愿望助长了比华夫脱党危险得多的力量的发展。因为华夫脱党说到底是自由主义的党，它不会使用法西斯的办法来对付对手，而兄弟会则会无限度地使用这样的手段。在民族问题再次发生争执的情况下，王室可以

用假选举来战胜华夫脱党。然而，对于象兄弟会这样一支武装力量来说，使用弄虚作假的办法将导致冲突和灾难。

政府是怎样向穆斯林兄弟猛扑过去，而不能不遭到它那扑朔迷离的兄弟会秘密系统的报复呢？十一月十五日在萨德法街查获吉普车的事件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件事发生后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当局就控制了以秘密组织头子阿卜杜勒·拉赫曼为首的三十二名秘密系统的领导。从吉普车里找到的文件、皮包、备忘录以及被捕者钱包和私人记录本中，第一次暴露出这一秘密组织的面貌，进而，完全破坏了这一组织内的联系。当时纳克拉希帕夏对控制局势很有信心，他把班纳孤立在这一组织之外。他对班纳要求逮捕他的回答是“在我们剪掉你的翅膀以后，你就没有什么危险了”。为了吉普车这件事，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穆斯林兄弟搞了炸药包，放置在申诉法庭内，企图毁掉对他们的指控的证据。但是炸封包被及时查获，被送到法庭之外爆炸，二十五名公民程度不同地受了伤。吉普车事件发生后几乎不到二十天，十二月四日在大学又发生了一件事：从医学院屋顶扔下来的手榴弹炸死了开罗大学总监萨利姆·扎基。纳克拉希就趁此机会，控告穆斯林兄弟会杀害了他，并封闭了兄弟会报社。接着，于十二月八日发布解散兄弟会的决定。

穆斯林兄弟会与王室间的联盟就以这样的悲剧结束了。王室公开的恐怖主义政府与兄弟会秘密的恐怖主义政府之间的战争开始了。兄弟会的秘密组织虽然受到了打击，但是它还是报复了纳克拉希一下，使他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自己的生命为解散兄弟会的决定付出了代价，这事情发生在解散后仅二十天，王室政府对此也给了回答，于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二日，即一个半月后，处死了哈桑·班纳。

针锋相对的哈提卜和秘密组织

兄弟会方面的暴力尝试，随着该集团的解散和萨阿德分子政府的恐怖时代的出现而结束了。但是，在这段历史期间，民族民主力量的斗争给予穆斯林兄弟会巨大的帮助。它最终战胜了王室，迫使王室结束萨阿德分子的统治。这一政权只经历了六个月就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告终，组成了有华夫脱党参加的以侯赛因·沙里帕夏为首的联合政府，准备通过自由选举恢复正常秩序。这个内阁释放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的大部分政治犯。一九五〇年一月三日，华夫脱党以绝大多数票

获胜，同年一月十二日组成了新政府。

被释放后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在萨利哈·阿西马维（班纳的副手、原秘密组织头子）的率领下很快就恢复了兄弟会的活动，并着手产生兄弟会新的导师。当时兄弟会分三派：以阿西马维为首的极端派，以班纳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班纳为首的保守派和以艾哈迈德·巴古尔为首的温和派。为了解决争执，避免分裂，他们一致的意见是，从训导局和创建会以外的成员中选举一名导师。这样，从事司法工作已有二十七年、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与班纳有联系的哈桑·伊斯梅尔·哈提卜成了新的导师。

对哈提卜的选择也是离不开王室和华夫脱党之间进行的传统斗争的。

华夫脱党曾幻想，兄弟会从昨天的盟友那儿受到的挫折会促使它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在这一基础上，华夫脱党与兄弟会的关系确实有所改善。兄弟会的发言人阿西马维曾宣布说，兄弟会和华夫脱党之间没有什么竞争。另外，华夫脱党和兄弟会还就兄弟会恢复合法活动问题进行了谈判，华夫脱党的代表是右翼头目福阿德·萨拉杰丁，兄弟会的代表是穆斯塔法·穆敏。

但是，他俩所同意的协调形式并没有得到兄弟会、特别是以萨利哈·阿西马维为首的极端派的支持，阿西马维在任命哈提卜前仍然掌握着兄弟会事务。当时的协调形式是，允许兄弟会非正式的，以一个新的名字——穆敏建议的名字是“伊斯兰复兴”——恢复其活动，待取消了特别法以后，再以原来的名字正式恢复活动。这一分歧是阿西马维和穆敏在坐牢时的思想立场的反映。当时穆敏曾主张要使兄弟会带上民主的色彩。一九五一年底，阿西马维通过训导局发布决定，最终把穆敏赶出了兄弟会，决定的依据是“他背离了兄弟会的原则”。

兄弟会拒绝与华夫脱党和解，是其对王室和华夫脱党之间的斗争的传统立场的继续。兄弟会认为，它一直是与王室站在一个阵营里的，除了民族主义的目标外，就找不出它和华夫脱党人的共同点。至于王室，则是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强烈敌视把它同兄弟会联系在一起。另外，王室的统治天长日久，而在兄弟会从一九二八年兴起，进行活动到一九五〇年初的二十二年中，华夫脱党的统治不过只有五年。兄弟会认为，与华夫脱党人联盟意味着华夫脱党继续充当领导。更糟的是，还

意味着在政治生活中采取自由主义方式，尊重和加强宪法。

一九五一年十月，兄弟会报纸说明了自己对埃及的宪政的立场。它说：问题是埃及采取的统治制度，从一九二四年到现在，埃及对各种制度进行了尝试。所有制度在堵塞制度的漏洞方面都失败了，也都不能阻止腐败的渗透。

有几届政府依靠议会统治埃及。有几届政府废除了议会，中止了宪法。有几届政府废除了宪法，但又搞了一部新宪法。埃及曾采取了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的统治制度，但是什么也沒有改变，也决不会改变。剩下一种还未尝试过的药，这就是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统治制度。

无论如何，拒绝与华夫脱党和解、开除穆敏，都蕴含着准备与王室合作的意义。那时，兄弟会与华夫脱党关系的暂时改善使法鲁克心里很不安，使他感到打击兄弟会产生的后果。安瓦尔·萨达特曾叙述过这件事，他记得听优素福·拉希德说过，国王在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海迪执政后期对他说："我们打击兄弟会是搞错了，我们回到我们的老政策上来就对了。"

当时，有许多关于任命哈提卜为总训导师是得到国王认可和支持的传说，而哈提卜与王室的关系又使人沒有否定这种说法的余地。哈提卜任命还不到一个月，就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坐着王宫的马车去见法鲁克了。

在革命后的一次记者采访中，哈提卜谈了这件事。他说，这次是法鲁克召见的。在会见中，法鲁克要求他清洗兄弟会中的革命分子，采取与英国人停战和和平的计划，并提到一九四八年班纳关于兄弟会将采取敌视共产主义的方针的许诺。在此以后，哈提卜多次会见法鲁克。

在这样的关系下，哈提卜确立了他对民族斗爭和暴力的立场。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他在《埃及民众》杂志上宣布说，暴力行动不能把英国人赶走。"政府今天应该象兄弟会那样去教导人民。这是赶走英国人的道路"。他向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作演讲说："去吧，专心致志地去念古兰经吧"。

哈提卜的这些行径使自己孤立于由虔诚的、热情为祖国事业进而行圣战的穆斯林青年组成的他的广大群众之外。当时反映这些基本群众的思想意识的《号召》杂志，曾经表示支持努哈斯帕夏取消一九二六年与英国人签订的和约，要求进行反对英国人的斗爭，起来反对人民的敌

人。这样的政策促使哈提卜公开出来辩解。他通过兄弟会秘书长广播了一项声明说："《号召》杂志不是兄弟会出版的，不能代表它说话，也不反映其政策。它是一家私人报刊，只表达报纸所有人的意见。"当高等院校的穆斯林青年发表决议，提出重新谈判和与英国人合作是犯罪，要求与英国人断绝经济和政治关系时，哈提卜又在《埃及民众》杂志上评论这些决议说，兄弟会不必执行这些决议，"任何不是兄弟会总部发出的决议都无价值"。当盛传穆斯林兄弟会已要求政府培训一万六千名成员使用武器时，哈提卜否定这件事。他说，兄弟会提倡的力量是"精神力量"，至于"物质力量"，那是政府的事。

哈提卜所采取的政策必然把自己置于与兄弟会的秘密组织相对抗的位置上。

哈提卜自己曾说过，一九五一年十月掌握兄弟会领导权后，他并不知道这一秘密组织仍然存在。"当一九五一年我来到兄弟会时，我才发现有个'特别系统'"。哈提卜原打算取消这一组织，但遭到了这一系统的头头阿卜杜勒·拉赫曼·桑纳迪的反对。桑纳迪认为，这一组织是兄弟会的精华，无论如何也不能取消，而是要继续存在下去。桑纳迪还认为，"哈提卜不应成为总训导师，因为他不是兄弟会的人"。这样，由于桑纳迪不再执行总训导师的命令，哈提卜失去了对这一秘密组织的控制。

然而，哈提卜和桑纳迪之间的敌视在秘密系统中也产生了影响，领导层也分裂为两派。于是哈提卜组织专门委员会去调解，对组织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一些成员，打算逐步取消这一组织。但是这一调整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该组织的武器仍完整地保留下来，桑纳迪仍然在组织里，不久又回到领导地位。它在警察和军队中的组织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尽管兄弟会当时在以哈提卜为首的温和派的掌握之中，但仍出现了一批支持哈提卜的年轻人，他们弥补了哈提卜的弱点，能够在兄弟会的温和与极端间左右逢源。通过这些年轻人，兄弟会与外界公开的和秘密的政治力量进行了种种联系。他们之中突出的是萨拉赫·阿布·拉基克和哈桑·阿西马维。

通过这两名成员，兄弟会和自由军官组织建立了联系，兄弟会从自由军官手中买到武器，并在行动上进行了合作。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开罗发生大火时，这批兄弟会的青年与自由军官也进行了合作。当时阿卜杜勒·纳赛尔与萨拉赫进行了联系，

告诉他说，即将对军营中军官的办公室进行检查，但是，那儿藏着一些武器。纳赛尔要求萨拉赫帮助他把这些武器运走。于是萨拉赫就派了卡车去运武器，汽车装着武器穿过燃烧着大火的开罗街道，直到把武器放进哈桑·阿西拉维家的车库中。在纳赛尔搞好了武器库的设计后，武器又转到东方省去。

对于帮助自由军官运动问题，兄弟会中也分成两派。正如阿西马维所说："一些同事直到最后一刻还是反对军队进行军事行动作为走向全面革命的一个步骤，因为他们不信任军队的行动。而我们及其他对自由的前途充满热情的人没有听他们的。"

阿布·拉基克是第一个在革命前知道革命爆发时刻的人。卡迈勒丁·侯赛因在叙述这一情况时说，在七月二十三日革命前一天，"我们——已故的总统纳赛尔和我——到当时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之一的阿布·拉基克那儿去，按预先商定的意见，我们告诉了他进行革命的时刻，并与他达成一致意见：兄弟会志愿人员在军队协助下控制苏伊士的道路，阻挡有可能于革命那天清晨向开罗运动的英国军队的进攻"。据萨拉赫对我说，他当时还与在亚历山大的哈提卜进行了联系，后者允诺，支持这一运动。"就这样，兄弟会历史上开始了新的一页。

同革命和英国人调情的教训

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自由军官"组织起来进行七月二十三日革命时，他们认为，这个革命对他们是有利的，他们将在革命中实现所企求的改革。这一想法是他们以在任何一次宫庭政变中从未有过的姿态投入这次革命的原因。这使得他们全力以赴地反对华夫脱党议会再次开会的想法，这个想法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天就已提出来讨论。

为此，兄弟会于八月一日发表了关于在新时期所企求的改革的声明，激烈地攻击了以前的议会生活。他们宣布，以往的宪政实践无一例外地都"没有提供健全的代议制和正确的代表性"，议会生活"在所有存在政党的时期最终都成为一种使统治者的欲望和暴虐合法化的工具"。

声明发表一星期后，赛义德·卡塔布在《消息报》上发表了给穆罕默德·纳吉布少将的一封信，要求建立"公正、廉洁的专政"，主张把政治自由只给予"高尚者"，而不给"污浊者。"

当时赛义德把共产主义者也看作是"高尚者"。在兄弟会举行的有

关政治犯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为共产党人要求自由说："他们应象其他与暴政作斗争的人一样"，"我们应与他们进行文斗，而不应把铁与火向他们扔去。"然而，不出三天，赛义德就改变了自己对共产党人的看法。但是，几乎没有多长时间，兄弟会就明白，革命并不想进入他们的口袋或屈从于他们的控制；革命只是根据自己的打算在影响政权。

问题开始于提出土地改革方案的时候。穆斯林兄弟会早在八月一日的声明中就提出要用明确语言规定拥有数量。他们希望私人占地的最高限额应是五百费丹，而规定的二百费丹的限额是他们不能接受的。然而，纳赛尔在萨利哈家里与哈提卜会见时拒绝了这一要求。总训导师曾坦率地对纳赛尔说，为了获得兄弟会的支持，革命将要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应在决定前提交兄弟会。但是，纳赛尔回答说，接受这一点就等于把革命置于兄弟会的托管之下。他接受的只是在总的政策上与所有忠诚者进行协商。

在这样情况下，兄弟会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意见，一些人认为，兄弟会在表示对革命的支持方面应持保留态度，以便不让其有机会利用这一支持站稳脚跟，最终又转过来对付兄弟会。另一种意见认为应继续支持革命，以始终与革命靠近，不给它以向兄弟会以外的力量寻求支持的机会。

这两种意见在革命指导委员会推翻了阿里·马赫尔内阁，让穆罕默德·纳吉布组阁时进行了较量。

一九五二年九月七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决定让兄弟会参加新内阁。纳赛尔给哈桑·阿西马维打了电话，要他第二天一早去见他。据阿西马维说，在这一次会见中，纳赛尔"告诉我已逮捕了八十三名政界和王室要员。他提出兄弟会参加内阁，并让我当一名部长。于是，问题就交给训导局来决定。我当时的意见是同意兄弟会参加内阁，目的是可以了解事态发展，不让机会主义者、两面派围绕着纳赛尔及其同伙转，使他们走向专制。"

哈提卜当时并未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纳赛尔打电话要求他提出三名部长候选人时，就以私人名义提了穆尼尔·达莱，哈桑·阿西马维和阿布·沙特三人的名字，后来又把阿西马维换成巴古里。纳赛尔立即接受了这一名单，并把巴古里列为基本候选人。对这一重大问题，哈提卜并没有单独作出决定，而是转交训导局进行讨论。

在训导局中，反对派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兄弟会参加内阁是加强了革命，削弱了兄弟会自己，因为它将给革命加上伊斯兰色彩，突出其在埃及穆斯林群众中的地位，使各地的穆斯林都效忠它。对兄弟会来说，只有数目这样少的人参加内阁，是把决定权交给军官们，而兄弟会却要对革命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穆罕默德·赫米斯·哈米德在人民法庭上曾说，当时训导局的意思是“兄弟会成员入阁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问题。有的人可能会说，兄弟会参加政权了；革命出现时是沒有特别色彩的，穆斯林兄弟在革命中的存在也许能使其带上特别的色彩……这种情况使得训导局在巴古里被接受入阁后作出开除巴古里的决定。”

这是兄弟会与革命之间的第一次公开对抗。当时兄弟会里一些人也知道，革命对这样的立场是不会宽容的。于是出现了一种意见：只要革命走向独揽政权，建立不公正的专政，最好是在它未能控制局势前就结束其生命。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兄弟会当时仍处于能够发动这样一种打击的地位。那时，在去苏伊士的公路和运河地区都由一批敢死队员据守，外国使馆，开罗的一些敏感地区，各地区以及纳赛尔及其同事的住宅都由穿便服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保护着。但是，这一意见遭到了阿西马维等信任纳赛尔的人的反对。

事实上，纳赛尔当时还沒有完全掌握政权，掌握的是革命指导委员会，所有的决议是根据多数票作出的。当时还有一批以苏莱曼·哈菲兹（国务委员会副主席）为首的文职人员，正促使革命走向专制独裁的道路。哈菲兹属于民族党，对华夫脱党十分讨厌，立志要削弱它，而军官们并不太反对顺从华夫脱党的敌人的愿望，接受他们主动作出的效劳，只要这一切能使他们掌权。当时，哈菲兹想出的方案之一是炮制一九五二年第一七九号组织政党法，意图是以此作为解散华夫脱党的前奏。

这一法律很快就直接打击了穆斯林兄弟会。该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在以纯粹的科学、社会、文化和宗教目的而建立的协会或团体不是政党。”这样，就给了穆斯林兄弟会选择的权利：公开宣布自己是纯宗教性社团，但这将使其失去进行政治活动的权利；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性质，这将需要递交申请，根据该法来重新组织。

在这种情况下，兄弟会又分裂为二派。以总训导师为首的意见是不提出重建申请，把兄弟会看作远离政治活动的团体。但是，这种意见遭

到了建会委员会大部分成员的反对。最后的意见是折衷的解决办法，以便能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一是把宗教活动与政治活动分开，兄弟会保持其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国际性，从事宗教活动。二是兄弟会的另一半作为政党或政治团体提出申请，以便能从事政治活动。于是，哈提卜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下旬提出申请，递交了这一政治团体的法律和组织机构以及建会委员名单。并在这之前，以兄弟会名义把七千九百五十二埃镑存入阿拉伯埃及银行。

但是这样的解决办法很快就在兄弟会成员中引起争论。据当时《消息报》报道，争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兄弟会领导层的大部份是由职员组成。秘书长，司库以及训导局十二名成员中的六名都是职员。同样，兄弟会地区分支领导中的绝大多数也是职员。根据新的法律，他们被禁止从事党务活动，这意味着要把他们排斥出领导中心，成为非建会委员会成员。

二、存入银行并通知内政部长的钱是宗教的“兄弟会”和政治团体所共有的。根据新法律，兄弟会与政治团体分开，它就没有一分钱，因为这笔钱是以它的政治团体的名义存放的。

三、学生和巡游队员是兄弟会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力量的主要部分，他们都是一些年龄不超过二十一岁的青年，把他们排除在政治活动以外，影响了兄弟会作为一个政党的力量。

这些问题引起了开罗的训导局成员和地区的领导之间的争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兄弟会总机构建委会召开了两次会议，得出的结果都是坚持把兄弟会看成一个政治团体，认为这样既防止了双重性，又符合兄弟会的思想和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即宗教和国家是不可分的。在此基础上，召开了第三次会议，训导局一些成员趁训导师有病未能出席会议的机会，坚持以整个兄弟会的名义作为一个政党提出申请。于是，他们于第二天（即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递交了申请书。当时申请书上建委会成员只报了三名。训导局选择了阿卜杜勒·巴基代表开罗地区，穆罕默德·赫米斯·哈米德代表下埃及地区，穆罕默德·法赫米律师代表上埃及地区。

兄弟会在它提交的申请书中表达了它从事政治的明确意愿。他们宣布说，“伊斯兰的目标包罗生活中的一切事务”，伊斯兰是不能把宗教和国家区分开的。穆斯林兄弟从事埃及国内外政治活动，是根据伊斯兰

教来进行的，是进行纯粹宗教活动，即对任何身份的穆斯林提出要求。所以它的政治活动必定是符合政党法的。因此，我们向你们提出我们的观点并附兄弟会总机构的基本法和建委会成员名单。

兄弟会的基本法有八章，它阐明总机构是一个综合性的伊斯兰团体，“致力于伊斯兰所追求的目标以及与其有关连的目的。”这些目的是：解释古兰经中的主张，恢复其本来面目并与时代精神相吻合，使各不相同的伊斯兰派别观点接近；发展、保卫和解放民族财富，致力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社会公正及每个公民的社会保障；与愚昧、疾病、贫困、卑贱作斗争，鼓励廉洁仁慈；把尼罗河流域、阿拉伯各地、伊斯兰世界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援助各地的伊斯兰民族，完全支持阿拉伯团结并走向阿拉伯统一，建立一个实施伊斯兰法规的国家；支持世界合作事业。

基本法还规定了兄弟会实现上述目的所采用的方法：通过出版、广播、向国内外派出代表团进行宣传；对穆斯林兄弟进行训练，使他们体格健壮，精神上崇拜眞主并具有知识；通过制定社会事务中的各种适宜的纲领来进行指导；为此要建立经济、社会、宗教、科学机构以及清眞寺、学校、收容所等。

该法确立的兄弟会主要的行政机构如下：一总训导师。他是训导局机构和建会机构总主席，二，总训导局。它是穆斯林兄弟会最高高管机构，监督工作的进行，指导其政策和管理事务。三，建会机构。它是兄弟会的协商议会和训导局全体大会。基本法还规定总训导师有权每两年召集各分会主席开会，了解与兄弟会的主张有关的事务，回顾其采取的步骤。

就这样，穆斯林兄弟会表达了它要变成一个政党，参加政治斗争的决心。由于兄弟会中存在支持革命的一派，兄弟会得以避免按解散政党的决定所规定的办法来处理。对内政部长要求兄弟会说明是否用竞选等手段实现其目标的问题，它商定的回答是持否定态度。

在这方面，阿西马维承认纳赛尔是起了作用的。他说，“尽管纳赛尔受到同事的反对，尽管兄弟会成员本身也造成一些麻烦问题，我没有必要一个个地通知他们关于与纳赛尔密谈的内容，纳赛尔在这方面确实作出了我不能否认的努力。”兄弟会在基本法中也搞了个预防措施。在该法中，它一点都没有提及要通过掌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是加了一

句“依靠一切其它合法手段”，这样，该法中这节的原文就是“穆斯林兄弟依靠以下手段和一切其它合法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个时候，除穆斯林兄弟会外，革命已失去了所有政治力量的支持。十一月十日革命废除了一九二三年的宪法。一月十六日，用解散政党法打击了华夫脱党。二月十日又宣布了过渡宪法，从法律上完善对政权的控制。当时没有什么原因使兄弟会去反对这些决定和法律，因为这些决定符合摆脱兄弟会的宿敌——华夫脱分子、共产主义分子的利益。兄弟会把过渡宪法的三年时间说成是“走向正常的清白的议会制度前采取必要的清理措施的必要阶段”。

在这下一阶段，斗争围绕着三角势力即兄弟会、革命和英国人三方展开。在革命正通过与英国人谈判力图在民族问题上取得政治成果来加强它在国内阵线的地位的时候，英国人转向国内仅存的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企图获得他们不能从革命方面获得的东西。对革命釜底抽薪。然而，革命却利用兄弟会内部的分歧，使他们之间分裂。革命认为，任何力量的削弱都是对革命有利的。

英国人与兄弟会之间的谈判，与往常的任何谈判一样，是不需要依赖一个强有力的内部阵线的。由于革命和兄弟会之间的无声的斗争对兄弟会的立场有影响，兄弟会在谈判中采取了温和立场，害怕革命和英国人之间会发生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一年后，兄弟会也同意纳赛尔在撤军协议中接受的条款，即让英国专家留在苏伊士运河基地上，在发生外国对阿盟国家共同防御条约成员国或土耳其进行武装进攻的情况下，英国军队有权重返运河，使用这一基地。并在有战争危险的情况下可就重返一事进行协商。

英国人从谈判中了解到，兄弟会并不象他们担心的那样极端。兄弟会愿意与他们谈判，并接受上述条约原则是为了以此证明它比华夫脱党要温和。事实上，兄弟会就是力求让英国人有这样的印象。他们接受条约的基础就是让英国人相信兄弟会的优点。哈提卜在这方面曾明确地表示说：“我坚信西方将会相信穆斯林兄弟会的优点，不再把它看作象一些人所描述的那样是可怕的幽灵。”

兄弟阋墙

当穆斯林兄弟会和革命之间权力斗争的迹象出现时，纳赛尔利用了

兄弟会各派间越来越激化的斗争，从内部打击兄弟会。

把阿卜杜勒·拉赫曼·桑纳迪赶出秘密组织的领导层，是与纳赛尔合作的那一派的失败，是倾向于对革命进行监护的思想的哈提卜一派的胜利。于是，阿卜杜勒·纳赛尔就要求兄弟会解散其秘密组织，以保护军队运动的发展。他把穆罕默德·赫米斯，赛义德·沙比克，巴古里以及阿卜杜勒·拉蒂夫（宗教事务部长的秘书）都召到设在加齐拉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开会，出席会议的有阿卜杜勒·纳赛尔、安瓦尔·萨达特等人。纳赛尔在讲话中谈到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问题。他说，兄弟会在军队里有纵队，他不喜欢有这样的纵队，因为它会导致不应有的混乱和动荡。他同样不愿在警察队伍中有这样的纵队。而且他还从总的方面谈到了秘密组织的问题，他说“秘密系统是不应存在的”。

然而，纳赛尔关于解散兄弟会纵队和秘密系统的要求只得到形式上的回答，赫米斯曾把与纳赛尔的谈话告诉了总训导师，但总训导师却回答说，在军队里，不在存兄弟会的特别纵队，不过是“我们向士兵灌输伊斯兰的思想。”

事实上，阿卜杜勒·拉赫曼·桑纳迪与哈提卜在秘密组织问题上的斗争在这一时期已经加剧。桑纳迪已接受不当这一组织的领导，由他的同事萨巴赫取代他的决定，原因是有人告诉他兄弟会的愿望是解散这一组织。然而，不久他就发现，哈提卜正在重新把自己的支持者组织起来，并着手摆脱桑纳迪。事态逐渐发展到出现流血冲突。当时，哈提卜把这一组织中的第二号人物法伊兹拉到了自己一边，以便能了解这个秘密系统的内幕及成员情况。法伊兹原定在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向哈提卜交一份秘密系统的详细报告。但是，就在这一天，法伊兹收到了伪装成糖果礼物的炸药包，法伊兹和其弟都被炸死。

由于桑纳迪通过其一伙控制着秘密组织，一切切断他与该组织联系的努力都被证明是无效的。唯一的办法是把桑纳迪及其一伙开除出兄弟会。于是，在上述事件的当天，哈提卜就召开训导局会议，以作出把他们赶出兄弟会的决议。在会上，出现五票对五票势均力敌的局面，哈提卜的一票对问题作出了裁决。训导局作出了把桑纳迪等四人开除出兄弟会的决议。在法伊兹死后两天，任命了谷物商人、为哈提卜当选为总训导师出过力的优素福·塔勒特为秘密组织的新主席。

桑纳迪等四人被开除一事使兄弟会发生了最大的分裂。哈提卜的反

对派利用了这件事情沒有进行调查的事实，煽动兄弟会的广大青年成员反对哈提卜，要求对这件事进行调查。在这次斗爭中，哈提卜又取得了胜利。又开除了阿西马维等人。

在哈提卜派胜利后，就开始实施对秘密系统的控制，建立了由四人组成的监督机构，分别负责开罗、各地、警察和军队方面的组织。原来旧的最高机构改变成“圣战最高委员会”。

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革命和兄弟会之间不久就出现发生巨大冲突的气氛。在哈提卜获胜后，纳赛尔不能等待哈提卜在重建秘密系统后来打击革命。阿西马维说，纳赛尔曾多次与他坦率地谈到解散兄弟会的决心，“他感到兄弟会疏远他，对他的政策表示淡漠”，“他多次要我在兄弟会范围外与他合作，但均被我拒绝。在谈话中，我们各执己见，我们之间沒有任何接近的地方”。同时，纳赛尔与纳吉布之间的斗爭态势使得纳吉布向兄弟会靠拢。据兄弟会负责在军队里成立分支组织的一位军官哈穆丹说：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底或一九五四年一月初的时候，他被召去参加哈提卜在一位兄弟会成员家里举行的会议。哈提卜告诉与会者说，纳吉布少将分别通过三名兄弟会成员与他进行了联系，纳吉布告诉他说，由于国内的独裁统治，他已成了革命指导委员会中的“叛逆者”，他愿意根据包括兄弟会在内的群众团体的愿望建立符合宪法的议会制统治，他“要求哈提卜和兄弟会给予合作，以努力摆脱这种局面”。哈提卜还说，“我叫你们来是因为你们是穆斯林在军队里的军官，因为阿布·马卡里姆在医院里，夏迪负责警察，优素福·塔勒特负责文职人员，我自己不了解这些细节，因此这些问题需要你们来研究，然后把结果告诉我”。

哈桑·哈穆丹与阿布·马卡里姆，萨拉赫·夏迪，优素福在马卡里姆家召开会议讨论了这一问题，当时优素福表示在当时情况下不能干什么事，因为“桑纳迪不肯把人交出来”，只有在一年后才能采取措施，他估计到那时他会有一万穆斯林兄弟。

夏迪还说，他只有十九名军官，而且分散在各地，也不能干什么事。在军队里，军官的人数也很少，因为“我们不能随便对任何人讲这件事，这需要信任”。据此，会议决定不能在这方面采取任何措施。

纳吉布少将也在回忆录中谈到了这种接触的细节。他说，穆斯林兄弟会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想通过穆罕默德·里亚德与他联系，要求安排

他们之间的秘密会晤。但他拒绝秘密会晤，建议在他的办公室或家里进行公开会晤。兄弟会表示不能这样做，要求他派代表来谈判，于是就派了里亚德。

当时纳吉布进行合作的条件是，结束军事统治，军队重返兵营，建立议会民主生活，恢复多党制，取消对报刊的检查。但是，兄弟会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他们要求“保留军事统治，反对恢复政党和建立议会制”，他们还反对取消特别法，主张继续维持当时的局面，把政权交给纳吉布一人，赶走纳赛尔和其他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成立文官政府。兄弟会将不参加这一政府，但政府的组成要得到兄弟会的认可，并组织一个秘密的协商委员会，由亲纳吉布的一些军人和相等数量的兄弟会成员参加，法律在批准前要交给这个委员会讨论。国家的主要政策，以及高级职务的人选名单也要提交该委员会。

纳吉布说，他拒绝了这些建议，因为这将导致兄弟会控制政权，却不承担责任。就这样，谈判失败了。

在纳吉布与穆斯林兄弟会进行接触的时候，埃及情报局获悉兄弟会与英国人恢复接触的消息，根据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日两次看到一辆温斯顿汽车停在英国公使科茨维尔在布勒克·德克鲁尔住宅的门前。于是，牌摊开了。仅在三天以后即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发布了一项决定，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政党，应对它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政党的决定。在决定发表的前一天、即一月十三日，警车穿越开罗各街道，把兄弟会成员从家里赶出来集中，火车也从各地运来了被拘留的兄弟会成员。

就这样，穆斯林兄弟会象在一九四八年为支持王室专政付出了代价一样，他们为支持革命专政付出了代价。

总训导师与纳赛尔取得一致意见，开始摆脱纳吉布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自一九四八年第一次被解散五年后又再次进了监狱。但是，纳吉布少将与纳赛尔为首的军官之间在革命指导委员会内激烈争吵向兄弟会提供了起新作用的机会。二月二十二日，革命指导委员会对纳吉布少将的蔑视和挑战达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促使纳吉布提出辞职，让军官们去面对威胁着革命的危机。当时，革命委员会中分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可以接受辞职。另一些人认为应罢免他，并向人民宣

布这件事。最后，第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委员会决定任命纳赛尔为总理兼革命委员会主席。

纳吉布下台的消息一传出，骑兵部队砸了锅，部队的军官坚持要手中无实权的纳吉布回来担任一个代议制共和国总统。纳赛尔不得不顺从这一意见，并委托哈立德·毛希丁领导内阁。受革命委员会的委托，毛希丁率一代表团去见了纳吉布，在这样的基础上纳吉布同意复出。

然而，这样一种取消革命的消息打击了在其它部队中掌握实权的自由军官团中的二等军官，他们担心纳吉布的胜利会使他们失去一切。他们认为骑兵部队搞了一次共产主义的政变，把内阁权交给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毛希丁。于是，他们都到库巴桥指挥部大楼前集中，表示他们要坚持革命的决心，出现了骑兵部队与其他部队会发生激烈对抗的局势，纳吉布和毛希丁也面临着被捕的局面。

当时，对革命已丧失希望，对其专制统治表示愤恨的群众在这紧要的关头也行动起来，使局势再次转向有利于民主的方向。当革命指导委员会正在讨论纳吉布、毛希丁的命运时刻，来自穆斯林兄弟会、华夫脱党和社会党基层的成员汇聚成庞大的队伍，要求纳吉布重新上台，打倒专制。队伍涌向了阿卜丁广场，他们高呼的口号是是：要穆罕默德·纳吉布；把加麦尔送进监狱，把萨拉赫·萨利姆送进牢房。

萨拉赫目睹了这一示威游行。当时他正到一位朋友家里去，准备休息几小时再回革命指导委员会，对纳吉布的问题作出最后的决定。看到这样的情况，萨拉赫就迅速地返回革命指导委员会，把在阿卜丁广场看到的情况告诉了纳赛尔，并表示必须让纳吉布回来。纳赛尔对此未置可否。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民族指导部长的萨拉赫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七月晚六时播发了一个声明，宣布让纳吉布回来。第二天，即二月二十八日，出现了涌向阿卜丁宫的庆祝游行，要求纳吉布释放被监禁者。但是，游行队伍在尼罗宫桥与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纳吉布曾许诺要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到这时候，纳吉布不得不求助于阿卜杜勒·卡迪尔来缓和局势，驱散游行群众。

这次游行是穆斯林兄弟会在其政治生活中第一次参加的、倾向于民主的游行。那么，在这次游行中兄弟会的领导起了什么作用？其广大群众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对于兄弟会的领导来说，要了解他们所起作用的真相，应该了解这

样一个事实：革命尽管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解散了兄弟会，但对它并未完全绝望。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之点，即敌视民主、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在革命前，兄弟会与法鲁克之间也有这种共同的因素。

穆斯林兄弟会与革命之间的分歧是属于两个同盟者之间的分歧，其中的一方感到另一方已壮大到对其形成威胁，但各方又感到需要对方，因为只有这样一个同盟者。

这是在兄弟会宣布解散后纳赛尔对兄弟会立场的脚注。纳赛尔当时并没有把兄弟会搞掉，只是先逮捕了他们之中的四十五名成员，而后又立即释放了二十名。被关在监狱里的穆斯林兄弟也没有遭到后来众所周知的纳赛尔时代的那种惩罚。拿哈桑·阿西马维的话来说："好几天过去了，无人来询问我们，也无人对我们进行审讯，没有什么东西搅乱我们的安乐，只是感到我们是囚犯。"

纳赛尔对兄弟会的这种倾向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明朗。当时政府策动的新闻攻势矛头集中在哈提卜及其支持者身上。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正值班纳献身五周年纪念日，纳赛尔在萨拉赫和巴古尔长老的陪同下瞻仰了班纳的墓地，并在墓前说："我要求眞主作证，我将努力，为这些原则而竭尽全力，进行奋斗。"这意思很清楚，说明纳赛尔当时使用解散的方法的目的是打倒反对革命的哈提卜一伙，让反对总训导师的另一方占上风，以便在新人领导下重建兄弟会。在这样的气氛下，兄弟会在哈提卜被捕后选出的新主席阿卜杜勒·卡迪尔和纳赛尔就重新恢复活动问题进行了谈判，纳赛尔提出了三个条件：1、放弃政治斗爭；2、停止兄弟会在军队和警察中的活动；3、解散秘密系统。迪卡尔原是打算放弃秘密系统活动的，但是，他并不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据卡迪尔在人民法庭上受审时所说，当时卡迪尔竭力使纳赛尔相信：保留兄弟会的活动是有利于革命的，取消这一活动的企图是无益的。

卡迪尔还说：在班纳的墓前，我与纳赛尔最后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加麦尔主席对我说，他明天要去阿拉伯堡，"你可以与萨拉赫联系，你们俩达成的一致意见，我将照办。"我在指导部会见了萨拉赫。我向他提出兄弟会恢复活动的理由，要他允许我进行组织联系，召开大会。他说："我将在革命委员会下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但我不能担保会获得多数的同意。"我还与我能够联系的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联

系，其中包括纳吉布布少将。我当时要求在总理府会见纳吉布，他说："我对兄弟会恢复活动无意见。只是有一条：哈提卜不能当头，"我说，"把这个条件留给我们去办，我们是能够办到的。"

由此可见，如果纳吉布和下级军官之间在革命指导委员会中不发生上述这场斗争的话，兄弟会与纳赛尔之间的协议已付诸实施。据卡迪尔说："二月二十七日黄昏，我得知了革命委员会中发生的事，就与纳赛尔进行了联系，纳赛尔说：我们已提交了辞呈，内阁也辞职了。我从《埃及人报》的一位编辑那儿获悉，英国人正在离我们五十五公里的地方，纳吉布主席正在为这事进行协商。他对我说：现在你到他那儿去，他可能会需要你办点事。二月二十八日清晨，我刚好有事到国务委员会去，办完事后回到了办公室。这时来了一个人对我说，在阿卜丁宫发生了示威游行，示威者在尼罗宫街开了枪，是穆斯林兄弟们干的。我就对他说，你去看看兄弟会的负责人是谁，让他打发他们离开。但是兄弟们不愿散去，于是，我就亲自去解散示威游行。那时，我听到他们说纳吉布将出来讲话。纳吉布站在阳台上，他用手指了指我，我出于礼貌也爬上了阳台。"

二月二十七日的示威游行是由穆斯林兄弟会的广大群众、华夫脱党和社会党的一部分人进行的，他们还参加了第二天进行的欢庆纳吉布复职的游行。根据官方的公告，他们之中因这事而被捕的人数是兄弟会成员四十五名，已解散了的社会党成员二十名，华夫脱党人五名，其他分子四十二名。

从二月二十八日起，卡迪尔开始起新的作用，他原先是去解散这一热火朝天的示威游行的。但是，他在群众中出现激发了群众的热情，群众的情绪也燃起了他的激情，他被群众抬在肩上。这样的场面是纳吉布目睹的。纳吉布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当时抗议敌人的口号声越来越高，我要求被群众抬在肩上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之一的阿卜杜勒·卡迪尔上阳台上来，我告诉他说，我已命令监察院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调查，以此来平息和解散示威游行。

在审判卡迪尔的人民法庭上，卡迪尔说，他当时对群众是这样讲的："今天已经发生向大学生开枪的事情，这是专制的一种表现，伊斯兰正处于铁窗后面，穆斯林被拘留和监禁。释放他们吧！"

由于受到了群众革命精神的感染，卡迪尔从与纳赛尔合作的立场突

然转向支持纳吉布的立场，在讲话中攻击了阿卜杜勒·纳赛尔。

卡迪尔当然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当天晚上，他和其他四十五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拘留，他们在军事牢狱中从早上四点一直站到七点，监狱的军官和士兵狠狠地打他们。

总之，由于那时兄弟会的大部分领导都身陷囹圄，他们没有参加三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没有参与民主和进步力量为反对专制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

三月二十五日，这场群众性的斗争迫使革命指导委员会作出了一系列决定：允许建立政党，直接、自由地选举产生有职有权的立宪议会，该会拥有议会的全部权力，选举将是自由的。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革命指导委员会解散，表示革命的任务已经结束，政权将移交给全民族的代表，立宪议会将选出共和国总统。

正当兄弟会以全部力量投入追求民主的群众之中，公开反对专制的机会已经具备的时候，纳赛尔和纳吉布之间为取得兄弟会的支持展开了一场竞争。阿布·拉基克说：纳赛尔派了一个在纳吉布政府中曾主持社会事务部、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内阁调整后主持国民指导部的福阿德·贾拉勒等三人组成的代表团到他们所在的军事监狱去，“以便同我们相互取得谅解，为了民族的利益而要我们与他进行合作。”我们对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政府已发表声明，指控我们搞阴谋，说哈桑·阿西马维阴谋收藏武器。其实，这些武器是应纳赛尔的要求，我们把它从军营中的办公室里运出来的，目的是使他摆脱困境。我们把武器放在阿西马维的家里的事，纳赛尔是知道的。我们怎样才能摆脱政府的的指控？人民知道这些是谎言吗？”纳赛尔知道这些情况后，提议总训导师一出狱，就到他家里去。为了公共利益，我们说：“没关系，我们昨天被指控背叛，今天，为了公共利益，要求我们伸出手来进行合作。”纳赛尔在总训导师离开拘留所后即去后者家的消息，当时的广播和报纸都作了报道。

由此可见，穆斯林兄弟会提的条件仅仅是要求得到自由、恢复名誉，而没有任何与恢复民主相关联的其他条件。《埃及人报》上提到的兄弟会和纳赛尔之间在军事监狱中达成的协议与阿布·拉基克讲的出入不大，议协的要点是：

1、兄弟会恢复原来的活动和存在，对它的各种自由不作任何限

制，把没收的钱财归还给它。

2、立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开除的军人重回军队中去。

3、革命指导委员会发表一项声明，说明解散兄弟会的眞正原因。这项声明将是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的终结。

在哈提卜被释放的当夜，纳赛尔就上他家拜访。哈提卜声称，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将“帮助政府”赶走英国人，回击他们的侵略。

就这样，纳赛尔在这个问题上走在纳吉布的前面。纳吉布知道这一情况后，也给哈提卜家里打了电话。但是，有人告诉他，哈提卜当时正在“洗澡间里”。纳吉布原来估计，哈提卜会与他联系，对于他的问候表示感谢。然而，哈提卜却完全无视这件事。纳吉布曾说：“我很清楚，纳赛尔在这一阶段选择了走穆斯林兄弟会这条路，他以恢复他们的集团的办法收买了他们的沉默。他以休战诱惑他们，以便能完全扼杀恢复政党和议会制的想法，然后独自掌握政权。而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却不知道这种休战是为了确保穆斯林兄弟在扼杀民主、消灭我本人时能保持沉默的一个策略。在这以后，会制定一项新的计划以便向穆斯林兄弟反扑过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纳吉布并没有灰心，在他的卫队司令穆罕默德·里亚德的影响下，再次与兄弟会进行了接触。纳吉布叙述这个问题时说：“里亚德曾建议同我辞职时站在我一边的穆斯林兄弟会接触，由于我对一些兄弟会的领袖的倾向没有信心以及他们对建立政党和议会制的反对，我曾要求里亚德小心从事。第二天，里亚德回来告诉我说，他派了使者——后来在一个非洲国家任埃及大使的里亚德·沙米——到哈提卜那儿去询问穆斯林兄弟会的眞正立场，问他们是否在必要时准备搞群众性的游行。哈提卜说，他们还没有安排以后的事，他们现在正在等待释放所有的被监禁者。”

明显的是，兄弟会采取这一立场是出于对华夫脱党和议会制的厌恶，而把赌注押在专制上面。对此，哈提卜并不掩饰，他在兄弟会于三月三十日召开的大会上直率地宣布说：“已出现了一种呼吁再次恢复旧政党的看法，我对这种勇气和逻辑，十分惊讶。以往的政党和议会机构已使国家吃了很大苦头。它们是腐败和徇私的产物，在这些政党和机构中自私自利盛行，它们不是为了眞主，而是为魔鬼而工作。如果说我们

要求代议制的话，我们要求的是一个纯洁、正直的议会，在这样的议会下确保新闻、集会和言论的自由。”

如果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蹲了整整两个月的军事监狱并没有使他们的领导丢掉在纯洁的代议制生活名义下建立公正、纯洁的专制的幻想，如果命运注定他们在几个月后将再进入牢房呆上更长的岁月的话，他们将指责的难道不正是他们自己吗？

总训导师消失和秘密机构卷土重来

三月危机以当局策划的一连串有组织的罢工而告结束。接着，纳赛尔对参加过反对他的斗争的一切民主进步力量进行了镇压和清洗。他以纯洁新闻界为名打击了报界，解散了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会，所用的借口是，在其十二名成员中有七名成员曾在王室统治的时代领取过一笔秘密费用。当然，在解散这一理事会的决议中，纳赛尔并没有谈到，自七月二十三日革命以来的一段时间里，革命指导委员会为什么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的原因。此外，纳赛尔还发布一项命令，禁止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六日到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革命前的十年中参加过内阁的华夫脱党分子、宪章派自由者、萨阿德分子的政治家进行活动，不允许他们任公职，负责工会等机构的理事会工作。纳赛尔还把锋芒转向大学，授予大学负责人保障正常学习的权利，开除和处罚了在那次危机中参加过争取民主斗争的大学教授。这样，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只残留下穆斯林兄弟会一家了。按照在这样专制制度下事情发展的规律，这两方的冲突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情报表明，这两支队伍间的第一次斗争是发生在拘留者问题上。据前所述，纳赛尔和兄弟会在军事监狱里达成的协议是立即释放被监禁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文职人员和军事人员。但是，纳赛尔只释放了文职人员，却迟迟不释放军事人员。这些军事人员中为首的是兄弟会在军队中秘密机构的头目。

这些军官是在三月初被捕的，政府之所以不执行上述条件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它认为，不经审判就让这些军官回到军队中去，会向他们提供重新在军队中组织其小组的机会。并认为，兄弟会迫不及待地要求释放他们，恢复他们的军职，并把这看成是他们与政府合作的条件，反映了兄弟会要加强其秘密机构的愿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穆斯林兄弟会

组成了专门委员会来与政府人士接触，以取得谅解。但是，这个委员会遭到了拒绝。

不久，革命就把阿卜杜勒·拉乌夫军官提交法庭审判。当时拉乌夫曾要求军事法庭召纳吉布和纳赛尔出庭作证。但是，法庭拒绝了他的要求。拉乌夫在入狱后制订了一个越狱计划，并成功地从狱中逃了出来。这位军官在以后进一步发展兄弟会的秘密机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两支队伍为之发生分歧、并使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产生疑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协议中的第三条的执行问题。该条款规定，“革命指导委员会应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导致解散兄弟会的原因”。发表这样的声明，对兄弟会来说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宣布来自纳赛尔方面的诚意，使纳赛尔无法以同样的理由向兄弟会进行新的打击。但是，纳赛尔对此也是采取拖延的办法。于是，总训导师哈提卜于五月四日给纳赛尔写了一封信，提到为开始新的合作时代而达成的协议的原则。他在信中说：“您当时已接受了这些条件，即应撤销解散兄弟会的决定，解放所有被监禁者，明确地消除解散声明产生的影响，使我们不必再去讨论这一声明。”“尽管对涉及兄弟会的这些问题的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但是，祖国的利益要求我们向您提出我们认为是安定人心、实现稳定的意见。”哈提卜在信中提出了三点要求：1、恢复代议制生活，把这看作是“当代所有政权的健全的基础。全民族不应学会在过渡时期如何取消代议制，而应学习如何切实地实施代议制”。2、取消非常措施和军事戒严令。3、开放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恢复被监禁者及一些被特别法庭判刑者的自由。这封信还以传单的形式在埃及广为散发，这意味着公开斗争再次出现。

对于这个问题，纳赛尔认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如果是忠实于他们有关民主统治的主张的话，他们首先应该解散与民主制度水火不相容的秘密机构。而且，兄弟会出来要求民主本身也是一种讽刺，因为他们自己的内部制度是建立在百分之百的专制的基础上的，他们的创建机构，即兄弟会的议会是任命的，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创建机构产生出来的训导局成员的一部分也是任命的。训导局的意见对总训导师没有约束，他可以自己决定舍取，还可以不通过训导局自己作出决议。

对于革命采取什么立场的问题，在兄弟会内部不久也产生了分歧，分成三派：以巴赫·霍里为首的一派认为应该继续支持革命；以哈提卜

为首的一派认为不能与革命进行合作，也不可能与革命实现合作；第三派企图调和这两种倾向，为首的是兄弟会的副会长穆罕默德·赫米斯·哈米德。

可以说，在纳赛尔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后，哈提卜对革命已完全失去了信任。赫米斯·哈米德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哈提卜认为“我们不可能取得谅解”，“我不愿与政府进行合作”。

兄弟会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哈提卜认为，为了给主张与革命取得谅解的一派让开道路，他应该到阿拉伯国家去旅行。他对兄弟会说：“我走了，因为兄弟们要与政府取得协议，我被认为是达成这一协议道路上的障碍。我走了，你们是知道怎样干的。”

哈提卜的出走确实给赫米斯一派开拓了与革命取得相互谅解的道路。哈提卜于一九五四年六月离开埃及。赫米斯与阿卜杜勒·拉赫曼·班纳于同月会见了纳赛尔，以探讨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纳赛尔对此的回答是，在存在威胁公民、政府和现领导层的秘密机构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一个民主政府；必须解散这一机构。如果兄弟会确实想表示诚意的话，可分三步来走：休战、谅解、合作。纳赛尔还承诺将发表一个有关撤销解散声明的讲话，着手处理军官的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七日，纳赛尔同英国人草签了撤军协议的主要原则。这向穆斯林兄弟会提供了把它与纳赛尔的斗争转向一个民族问题的机会。哈提卜立即在叙利亚公开宣布拒绝协议的基本条款，强调说：“埃及与任何外国政府之间的任何协议，都应该提交由自由选举产生的、从而代表埃及人民意志的议会，并让不受审查的、有讨论自由的报纸进行讨论”。哈提卜的这一评论于一九五四年七月三十一日发表在贝鲁特的《目标报》上。

哈提卜当时集中抨击的是，这个协议给了英国人重返运河的权利，认可英国人把苏伊士运河作为军事基地，由穿便衣的军人来进行管理，并把埃及、阿拉伯国家同西方阵营拴在一起。纳赛尔认为这样的攻击是对舆论的欺骗，于是相应地采取了行动，查抄了兄弟会的各种活动场所，拘留了在清真寺中攻击协议的演讲者，还搜查了一些兄弟会成员的家，抓走一些人。

这样，这两支队伍的关系进入了冲突阶段，各方都在窥伺对方。八月二十二日，哈提卜从叙利亚回到埃及，事态发展到了顶峰。哈提卜参

加了兄弟会每星期二的集会，在会上以愤怒的声音高呼“让叛国者去死吧！”的口号。紧接着，总训导师的家遭到袭击。后来，哈提卜只能隐藏在新开罗的一所房子里。许多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也分别找地方躲藏起来。从那时起，兄弟会的活动从公开转入了地下，整个兄弟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组织。

同时，在优素福·塔勒特领导下的兄弟会的秘密组织已有一系列的重要变动和发展。塔勒特原是班纳时代的老会员，曾担任伊斯梅利亚地区秘密组织的领导，与哈提卜也有很深的关系。

任命塔勒特为特别系统的头目，是哈提卜在这个系统推行其政策的良机。哈提卜建立这支队伍要实现的目的是“为捍卫伊斯兰祖国造就穆斯林人才”。在这方面，哈提卜曾说：“我们一致同意的是，绝对不允许犯罪，不允许搞什么恐怖行动。”塔勒特证实哈提卜的话说，在哈提卜任命他为这一系统的主席时，曾对他说过”“不希望强盗的精神统帅人们，要严肃，要秘密行动。”

然而，事情并不这样容易。当时桑纳迪的思想控制着整个系统，他的支持者占绝大多数。塔勒特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本来希望能把这一系统提高到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水准上来。但是，我感到它的气氛‘不对头’，在这个系统里，我发现一些不属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分子，他们沒有受过关于兄弟会主张的教育”。

此外，桑纳迪的一些支持者还在注视着塔勒特的行动，看他的计划是旨在取消这一系统还是作为班纳时代的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在这方面，塔勒特自己也说，“我已听到‘你是叛徒，你要解散组织’这样的话”。

这些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即这一系统在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消的。哈提卜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在任命塔勒特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推选了塔勒特，一致同意让这一系统有秩序地走向取消。但是这种取消并不意味着我们去解散这一组织，这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然而，我们可以一方面正确地指导兄弟会，另一方面增加加入这一系统的人员，以便能去掉其神秘的性质。”

对难于解散这一系统的原因，穆罕默德·法尔加利解释道：“困难在于这一系统包含有相当数量的热情奔放的青年穆斯林兄弟，解散它将会对进行解散的人带来麻烦。”赛义德·法伊兹工程师死于桑纳迪的支

持者之手的事，对该系统中亲哈提卜和塔勒特的成员来说是记忆犹新的。

纳赛尔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作出解散兄弟会的决定，从而打击了兄弟会。面对这样的灾难，兄弟会队伍又重新团结起来。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哈提卜等人出狱后，兄弟会开始重新活动，也开始重建其秘密系统。这一切是在适宜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桑纳迪一伙已同哈提卜和解了，也不再与塔勒特过不去。据塔勒特的主要助手、开罗地区主席易卜拉欣·塔比卜说："我们是在一九五四年三月后着手重新组织的，在筹组过程中采取了具体措施，聚集人员，给予他们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培养，并确定了重新组织的时间是'四月上旬'"。

这里必然提出一个问题：塔勒特是解散旧组织，建立一个新组织吗？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包括结构和人员两个方面。

在结构方面，秘密组织的旧结构是建立在五人制的基础上，即每个小组由五人组成，其中一人当头头，按金字塔形逐步升级，每五个小组的头头又组成高一级的小组，这高一级小组的头头又是更高一级小组的成员，一直到总头头桑纳迪为止。换句话说，如果从上到下来看这一制度，情况是：桑纳迪是这一组织的总头目，下面是三个大头目，其次是地区的头目，再其次是另一些头目，这样排列下去直到基层小组。当时，在重要的分支都有几个小组，分支的头头与秘密系统的头头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兄弟会分支的头目与在本分支中秘密系统的头目在组织上是没有联系的。

秘密系统在结构上的变化要归功于阿卜杜勒·拉乌夫。拉乌夫原是自由军官团组织的首批成员，由于他坚持与穆斯林兄弟会和好，于七月二十三日前被军官团组织开除，后来还受到军事法庭审判。拉乌夫从狱中逃出后，就直接到兄弟会总部要求把他藏起来。在这段躲藏期间内，拉乌夫会见了优素福·塔勒特和易卜拉欣·塔比卜，并制订了秘密系统新组织结构的计划。这一计划的基础是以七人制代替五人制，即每七人称为一个小组。每三个小组加上一个服务组形成一个分队。每分队的人数是二十八名，加上正、副分队长共三十名。在一个地区内如有一个、两个或三个分队，地区的头头就是这些分队的最高头目。另外，除行政联络官外，设有直属秘密组织司令部的技术联络官，作为司令部与地区总头塔比卜以及塔比卜与分队长联系的桥梁。几个区队再组成大区队。

整个埃及当时分成三个大区：开罗、其它地区及亚历山大。

这一种正规军队式的组织结构，立即被塔勒特所采纳，其原因是它符合使这一组织开放，清除旧的五人制所形成的神秘感的愿望。

新的秘密系统

新的组织形式必然影响到对加入秘密系统的人员的选择和参加者的质量，因为它为公开系统人员的加入打开大门。对是否在原来的范围内来重组这一系统的问题，塔勒特回答说："不，不必这样，每个作好去圣战准备的穆斯林，都可让他进入这些支队。"这意味着新的组织是由原系统中的人员和公开系统的人员组成。塔勒特当然也只是把与桑纳迪及其一伙有分歧的老成员挑选入新的秘密系统。

除人员的组成外，新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把普通系统和特别系统联系了起来。在这以前，秘密系统的头头们之间是完全隔绝的，也就是说，普通系统的头头不能为特别系统做任何事情。但是在新的组织中，地区的主席就是该地区秘密系统的主席。

这种情况意味着整个兄弟会已转变成一个秘密系统，地下工作已成为兄弟会公开活动中的一部分。这一发展使得兄弟会比哈桑·班纳生前更具有危险性，因为公开和地下活动已无区分，秘密系统主席的权限已经扩大了，他们也是公开系统主席。所有这些情况都是在满西事件后对兄弟会成员的审问中暴露出来的。马哈茂德·哈瓦梯克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是的，地区的头头就是该区秘密系统的头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阿兹在谈到自己的职务时说："我代理开罗东部地区主席的职务。"

——"是在哪里？在秘密系统还是在公开系统？"

——"既在秘密系统又在公开系统。"他还回答说："是这样的，因为不适合领导特别系统的人也不适合领导这一地区。"

这些话说明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事实：普通系统的重建是在特别系统重建的基础上进行的，为的是能与特别系统相吻合，并对普通系统的领导层进行调整，排除了不适合领导秘密系统的领导人，由能同时领导这两个系统的领导者取代之。例如，在伊姆巴巴地区，原来的地区正头头是文学院教师哈桑帕夏，他对秘密系统的事一无所知。该地区的副头是辛达维·达维尔。达维尔当上秘密系统的头子后，帕夏即辞职，达维尔

也就成了该地区的主席。

根据秘密系统新的组成情况，开罗共分十个地区，总头是三十二岁的易卜拉欣·塔比卜律师。

至于开罗之外的地区，总头是艾哈迈德·侯赛因。在伊斯梅利亚、苏伊士、东方省、西方省、曼努菲亚和贝尼苏维夫各有两个分队。在艾斯尤特有两个小组，在法尤姆和明尼亚各有一个小组。

此外，秘密系统还制定了通过直属塔勒特的联络员进行联络的制度，以便能在塔勒特和塔比卜之间、塔比卜和各分队队长之间进行上通下达的工作。

秘密系统还建立了由萨拉赫·阿卜杜勒·莫阿梯负责、直属塔勒特指挥的情报部门。情报部门的任务是监视该系统的成员，向塔勒特提供他们访亲拜友、聚会等活动的报告，观察他们的心理状态。

秘密系统的主要计划是向分队的各小组提供足以完成其使命的武器。据塔勒特说，武器数量是在“一些布伦式轻机枪，三支步枪，一支艾斯顿枪”的范围内。但是，开罗东部地区主席阿卜杜勒·马阿兹却说，各小组的装备情况是：“除每人两颗手榴弹外，组长有一支手枪，另外还有三支步枪，两支艾斯顿枪和一支布伦式轻机枪。”

武器直接由武器库保管员交给分队头头。当时的武器库保管员——文学院学生赛义德·阿卜杜勒叙述过他接受这一任务的经过。他说，开罗各地区的总主席易卜拉欣“要我清查兄弟会手头现有的武器。我清点了阿拉伯、贾赫纳、道基等地的武器。他又要我把武器运到赫勒万和马阿迪，我都运去了。”

当时在开罗地区专门收集和分发给各分队的主要武器库是阿拉伯、贾赫纳仓库，它设立在哈提卜家族的坟地里，当然，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武器库，但这些武器库多半是设在住房的套间里。

对秘密系统成员的训练工作，开始是在卡尔达沙营地进行的。卡尔达沙营地处于农田的尽头和卡尔达沙之间。开罗东部地区主席曾提到过他与易卜拉欣·塔比卜参观这一营地的事，当时负责训练的是一位名叫赫达里的人。在这以后，警察曾袭击过这一营地，但没能抓到任何人。

可见，在每个地区或几个地区都是有专门的军事训练的。据兄弟会一位成员说，阿卜杜勒·拉乌夫在卡尔达沙营地遭袭击前也曾负责过那儿的训练工作。

拉乌夫不仅是参加具体的训练工作，而且还向秘密系统的分队长讲授军事战术。拉乌夫曾长期隐藏过的伊姆巴巴地区的成员叶海亚·萨伊德在叙述这事时说：有一次，他与阿里·努维图一起到住在穆尼拉地区的穆斯塔法家里去，他刚巧不在家。“但是，我看到一个中等身材、脸刮得光光的人正在桌子上用火柴棍摆军事基地。阿里告诉我说，他就是阿卜杜勒·拉乌夫。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他当时正向四个人讲解。我所认识的是哈桑·阿卜杜勒·穆纳姆和阿里·努维图，其他两人，我也不记得是谁。”

向秘密系统提供充足的武器问题，在拉乌夫和塔勒特决定以分队制重建这一系统时就已提出讨论过了。据塔勒特说，武器是通过募捐和征集的办法来购买的。例如，在开罗，塔比卜就用募捐的办法收集了购买十八挺机枪的经费。塔勒特自己也在伊斯梅利亚征集了一些钱，购买了五挺艾斯顿机枪，此外，一些地区还下达了准备一些空瓶，搞自制手榴弹的命令。

总之，在塔勒特掌权期间，据赫米斯估计，秘密系统人员在“一千到二千人范围内”。塔勒特计划是发展到一万人。据其助手、开罗各地区总主席塔比卜说，在夏尔克亚（东方）和运河地区以东已有一支兄弟会的军队，一旦英国人打算在兄弟会和政府发生冲突中进行干预，这支部队就准备以游击战来对付英国人。塔比卜还补充说，这一防止干预的计划就是进行游击战，破坏英国人占据的交通线和设施，切断他们的供应线。

哈提卜最后一个知道

谁是这一新的秘密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是哈提卜还是塔勒特所称的圣战最高委员会？

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怎么容易，因为在这方面的意见十分悬殊，类似一则谜语。

优素福·塔勒特在谈这一问题时说：在他被挑选任这一系统的领导后，穆罕默德·法尔加利把他召到家里，说是要召开由优素福·塔勒特、穆·法尔加利、马哈茂德·阿卜德、阿布·马卡里姆、萨拉赫·夏迪组成的委员会大会。法尔加利在会上说：“我们就是兄弟会中圣战最高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协调兄弟会各种力量的。”他还说，在这第一次会议

上，“每个参加者都要讲一讲”。当时，法尔加利的意见是，这一委员会的工作不应局限在埃及，而是应把圣战工作扩展到别的国家去，因为“那时摩洛哥的形势有点紧张”。塔勒特还说，这一委员会成立的时间约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底或四月初。

塔勒特的副手易卜拉欣·塔比卜是支持存在最高委员会的说法的。他说，秘密系统有一个由塔勒特、夏迪、法尔加利和赫米斯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直属总训导师领导，以协助他管理这一系统。该委员会从总训导师那儿接受总的工作计划，一旦自己的工作计划制定后，具体执行时要征得总训导师的同意。塔比卜还强调说，这一委员会是完全独立于训导局的。马哈茂德·阿卜德在法庭上也谈到了八月在法尔加利家里召开的那次会议。

然而，法尔加利却断然否认圣战委员会的问题。他在谈秘密系统时说，“在警察、军队和平民中的特别纵队是直属总训导师的。各纵队的头都与总训导师直接联系，不隶属兄弟会中另外什么机构”。当问及这些纵队的头（即夏迪、阿布·马卡里姆、塔勒特）是否组成一个最高委员会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这三个人是组织的负责人；如果他们被认为是最高委员会的话，那是属总训导师领导的。他对塔比卜的证词的回答是：“这是不正确的，我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也不知道特别系统有一个最高委员会。”

赫米斯·哈米德也否认自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他对贾马勒·萨利姆法官提出的问题的回答是，“我知道与训导师直接联系的人是塔勒特。如果训导师搞什么委员会，那是他的事”。他还说，“我自己并不是负责人，也不是这个组织中什么最高或最低委员会成员”。

对于这一分歧来说，哈桑·哈提卜的证词是有重大意义的。他说，在训导局决定开除桑纳迪时，“我们任命了三名兄弟与这一系统进行联系。与他们联系的人是法尔加利。委员会由侯赛因·卡迈勒丁、卡迈勒·哈里法和法尔加利组成。法尔加利作为训导局成员与他们联系。我还把秘密系统的工作托付给赫米斯”。把他的话翻译得通俗一点是下面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由卡迈勒丁、哈里法和法尔加利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与秘密系统间的联络官是作为训导局成员的法尔加利，而赫米斯受托管理这一系统的事务。

在另一个场合，检察长询问了哈提卜。——塔勒特对谁负责？

——赫米斯和法尔加利。

问： 只有他们俩！

答： 我想不起来，可能还有卡迈勒丁。

问： 赫米斯和法尔加利都供认，秘密系统的最高负责人是总训导师。

答： 按规定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负责一切的。

那么，圣战最高委员会是否沒有事实根据呢？

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样，圣战委员会确是存在的。只不过建立这个委员会的人不是哈提卜，而是秘密的负责人法尔加利和赫米斯。因此，这个委员会不具有正式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于该系统之中，因为从法律上讲，具有建立这种委员会权力的应是特别系统的最高主席哈提卜。在这样情况下，法尔加利和赫米斯的否认是从委员会的合法性而言的，而塔勒特等人的承认是根据实际情况说的。哈提卜的否认也是对的，因为他沒有以这样的名字搞过委员会，秘密系统中也沒有这种名称的委员会。

在秘密系统中，法尔加利和赫米斯确实有他们的作用。他俩原是桑纳迪时代主持该系统工作的老委员会成员。这个老委员会，正如塔勒特所说，“当时主宰这一系统”。

赫米斯和法尔加利在开除桑纳迪问题上也起过较重要的作用。塔勒特的任命也是在征求他俩同意后才完成的。这是他俩和哈提卜都承认的事实。因此，在塔勒特为首的新秘密系统中他俩起着领导作用，是十分自然的。

兄弟会成员从军事监狱放出来以后，在兄弟会与革命进行联系以便在运河区进行反对英国人的活动问题上，法尔加利在领导秘密系统中显示出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二日，英国政府宣布中断谈判，要埃及当局采取保障英国人生命、财产的措施。纳赛尔当时十分需要在运河区有这样的反英活动。在叙述这个问题时法尔加利说：“我们当时打算与一些革命的人进行合作，在运河区开展活动。我先与一位军官进行了联系，并告诉哈提卜说，我们在运河地区要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与革命的军官进行合作。我要求塔勒特从每个有革命军官的地区挑选出一名（保密系统的）负责人与他们（革命军官）联系，以便在需要时进行合作。塔勒特确实这样做了，交给我一份名单。我们按名单把他们

召集起来，在国民卫队管理处开会，出席会议的有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卡迈勒丁·侯赛因和一些军官。各地的代表也到了会。这样，我认识了这些代表，我知道他们都是与这些地区的政权有关系的人。”法尔加利上面的这些话决定性地证实了他在秘密系统的领导地位。由此可见，哈提卜确实把管理秘密系统的职权交给了赫米斯和法尔加利。同时，从上面的例子也可看出，法尔加利是在获得哈提卜同意后向塔勒特发出自己的指示的。

总之，总训导师否认自己亲自管理秘密系统的责任，不意味着他放弃作决定的权力，不意味着秘密系统主席塔勒特可以不通过总训导师自行其事。

作为总训导师和秘密系统的中间人的赫米斯博士，开始一直与塔勒特一起管理着秘密系统，后来他们两人间发生了分歧，联系就停止了，正如塔勒特所说，他原与赫米斯联系，直到“我们之间闹翻了”为止。

然而，他俩之间的分歧并不是私人间的分歧，而是兄弟会中以哈提卜为首的一派与赫米斯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歧的反映。

哈提卜进入秘密系统和纳吉布的传单

一九五四年，纳赛尔给予兄弟会的惩罚正如哈提卜在同年九月对穆斯林兄弟演说中描述的那样：

“我从阿拉伯国家回来后，发现事态更糟了。有流言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不与政变者合作，要他们解散的威胁已存在，（参加兄弟会的）职员成批调动。还有不实的指控，各种活动，甚至体育活动也禁止了。不让在城市广场上进行礼拜活动，清眞寺的演讲者被拘留，兄弟会成员的家遭到搜查，还抓走一些人。报刊对我们发表不公道的攻击，而又不许我们写文章和在集会上发表谈话。我们曾出版过《穆斯林兄弟会》杂志，但由于限制紧，文章、评论、消息甚至古兰经章节、先知的圣言都要被删去，我们不得不停止出版，因为它已一点也不能反映兄弟会的主张。而他们却在集会上挑动一些人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作对。报刊只发表政府允许发表的东西，使人们对伊斯兰和伊斯兰政权产生怀疑。例如，他们的演讲者一贯主张效仿某些自称伊斯兰统治，其实同它相去甚远的国家。这就是我回来后看到的一切。”

在这样的形势下，使政府和兄弟会感到突然的是哈提卜不再露面，

兄弟会的一些领导人也和他一起躲藏起来了。

那么，他隐匿起来是准备新的行动还是在政府恐怖的压力下被迫的行动呢？普遍的看法认为隐藏的原因是后者。阿西马维在回忆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使哈提卜藏起来的原因是“他和我们都已肯定，由于他在总部召开的大会上回答了纳赛尔的指控，逮捕他的命令已下达”。哈提卜在被问及这一问题时也承认说：“有人告诉说政府打算暗杀我。”

那么哈提卜藏匿的目的是准备战斗还是撤出战斗呢？哈提卜自己说，这是为了“超脱”。他谈到这一问题时曾说：自他从叙利亚回来后，他发现兄弟会成员说得多，但什么问题也不能取得一致，这是“为了完成我同他们保持距离的计划，以免人们认为我对他们有影响，我回避了”。但是，赫米斯的说法与这一说法相矛盾。赫米斯曾记得：有一次，他到哈提卜隐藏的地方去要求让训导局自行处理有关兄弟会的事务，“哈提卜对我说：我是自由的，在有我的时候，我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你只是在我不在时代行职务。”

值得提出的，对问题的研究可能是有益的事情是，不仅是哈提卜躲起来，塔勒特在这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没露面，秘密系统纵队的头子都一起隐藏起来了。这说明兄弟会的工作已从公开转入地下，从一个公开组织转变为一个秘密的组织。哈桑·阿西马维曾在回忆中谈到这样的情况。他说：哈提卜在隐藏期间，“与其同事们——训导局成员——开了两次会，此外还与他想会见的训导局成员开了一系列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在那两次，哈提卜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才确定时间，让我们确定地点，要求我们在会前几分钟才通知会议的地点和时间”。秘密程度是相当高的，“连我们这些组织会议的人，也只是在会前几小时才确切地知道他的地点。因此，我们必须要抓紧时机寻找合适的会址。我们先在开会地点聚集好开会的成员，然后，把哈提卜在保护下从住地送到会址，在任何人未离开会址前，再把他送回去”。

毫无疑问，造成兄弟会从公开走入地下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纳赛尔在三月危机中战胜了民主进步力量后加强了专制制度。

在这一段时间里，穆斯林兄弟会的工作主要是散发传单，动员舆论来反对条约。这项工作主要靠塔勒特领导的秘密系统来进行。

传单这一武器——事实上——并不是伴随哈提卜和兄弟会的高级领导的隐藏而出现的。早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四日兄弟会解散，兄弟会成

员关进军事监狱时期传单就已出现。赫米斯关于这方面的话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我们在集中营里时就有塔勒特的传单。"在那时，定期出版宣传小册子，到一九五四年二月已出版了五期。

这些宣传册子和传单当时使用宗教语言来燃起兄弟会成员心中的热情、牺牲与献身精神。例如，二月出版的，由哈提卜签署的穆斯林兄弟会第五期小册子是这样写的：

"兄弟会的青年们！让我们用上刑用的皮鞭和眞主敌人的子弹来购买乐园！让我们流尽鲜血，使其成为挂在烈士胸前的勋章！让我们饱嗅乐园的芳香，为眞主和宗教献出一切！记住眞主在经典中的许诺：到那时，到处是'欢乐的面孔'和'眞诚的人们'。眞主至高无上，一切功德归于眞主。"

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释放后，传单曾停止了一阵，但在与纳赛尔重新产生分歧时，又再次出现。当时的检查制度不允许赛义德·卡特卜经营的《穆斯林兄弟报》发表与当局不一致的意见。于是，秘密系统就出版了以《战斗中的兄弟》为名的地下杂志。而且这一杂志在兄弟会公开刊物未关闭前就已存在，专门发表通不过审查的文章，赫米斯关于训导局曾反对这一杂志的一番话说明了这一点。他说："任何合适的(文章)，我们训导局已把它发表在报纸上，我们为什么还要出传单呢？"

然而，哈提卜是完全同意并鼓励出版传单的。不仅如此，他还是把审查不让在公开报纸上出版的文章印成传单这种思想的倡导者。赛义德·卡特卜曾谈到这一问题说，哈提卜从叙利亚回来后，他去看望哈提卜，他对哈提卜申诉说，由于审查的关系，他不能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想要发表的东西。因此，他手头有许多不允许发表的评论。他还说："我们不能使我们的声音传到人民中去。"总训导师回答说："开罗省办事处（由马哈茂德·阿卜德领导的）有办法，可印制兄弟会的传单，那些审查不让发表的文章和评论可以印刷。"于是，他就到该办事处主任那儿去了，主任告诉他说："这儿只有一台小印刷机。"他又回来把情况告诉哈提卜，哈提卜立即拿出一百八十镑钱，作为买一部新的鲁纽印刷机的款子。

在总训导师攻击了撤军协议以后，斗争升级，秘密杂志的批评开始越线。在一期中有一篇文章，除了攻击协议外，还对纳赛尔进行人身攻击，说纳赛尔用从王宫中没收来的家具装饰他自己的家。这样指责

是无根据的，连赫米斯自己都承认说，据他所知纳赛尔的家里“只有他结婚时用的家具”。

这样的过分行动曾使训导局内许多人感到不安。在哈提卜去阿拉伯国家期间，赫米斯曾代管兄弟会，在代行总训导师职责期间，曾召塔勒特来询问这件事。他问塔勒特：“这一期是怎么搞的？一些东西怎么不给训导局看，不得到它的同意就发表了。”塔勒特回答说：“我是直接从哈提卜那儿得到命令的，而不是从你这儿得到指令。”赫米斯对他说，“总训导师现在不在国内，我与训导局一起正代理他的工作。”塔勒特说：“即使这样，我们可直接与在叙利亚的总训导师进行联系。”当时，赫米斯对一些文章是知道的，曾要求不要发表，这些文章的发表使他感到突然。

从塔勒特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当时负责《战斗中的兄弟》这份地下刊物编辑工作的是卡特卜。塔勒特曾说过，他从赛义德·卡特卜那儿收到“一些文章”。但是，当庭长问及谁负责这些消息的编辑工作时，他又回避说：“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是赛义德写的么？”他回答道：“是的，先生。”

总之，据赫米斯承认，《战斗中的兄弟》杂志，在哈提卜回来后一直在继续出版。他说，他曾向哈提卜谈了他和塔勒特在杂志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哈提卜回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兄弟们对你是不满意的，因为你使他们不高兴，他们不欣赏你的政策。”副检察官曾提问哈提卜说：

——这是什么政策。

——与政府休战的政策。

在哈提卜及其助手隐藏起来后，散发传单的活动更为活跃。法庭庭长贾马尔·萨利姆在问及这一问题时，赫米斯说：“在最后阶段传单都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现的，这些事都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谁在主持这件事！

——总训导师和与他一起隐藏起来的兄弟。

在那时候出现的传单中，最突出的是以共和国总统纳吉布名义发表的一份反对和约的传单。纳吉布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事，他说：他曾把对和约的意见写成一份备忘录发走。但是，这份备忘录“不

知怎么搞的，到了当时唯一允许存在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手中，他们印制了这份备忘录并以传单形式进行散发。”据易卜拉欣·塔勒特回忆，他在阿卜杜勒·卡迪尔手里看到过这份备忘录，题为《一份用枪弹写成的文件，一份未签字的草稿》。纳吉布备忘录中对和约的批评集中在条约中关于入侵土耳其这一点上。如出现这种侵略，将允许英国军队重返埃及使用埃及的港口和机场。

第二份重要的传单是苏莱曼·哈菲兹写的。苏莱曼·哈菲兹在革命兴起时是国务委员会副主席，在革命前曾是民族党成员。出于顽固的反对华夫脱党的党派立场，他在使革命走向专制方面曾起过较坏的作用，他运用自己在法律上的经验为革命军官们的专制思想服务。然而，纳赛尔也象对待其他在反对华夫脱党和民主中起了作用的同路人一样抛弃了他。为此，他便又反过来开始谈论民主，寻求一种弥补自己罪过的新作用。在这方面，他选择了撤军协议签订的时刻。这份传单原是准备在《穆斯林兄弟报》上发表的。由于无法刊登和报纸停刊，改为用传单发表，发表时的标题为《一位前部长的话》。

除了这两份传单外，其它的传单都是使用宗教语言煽动对当局不满，以图在条件成熟时推翻政权。在一份题为《知心话》的传单里是这样讲的：

“眞主呀！天呀！你一定知道，你的敌人在大地上放荡荒淫，为非作歹，他们在你的天空下叛教，与你的圣典作战，摆脱圣典的约束，使崇拜你的人神魂颠倒，失去理智。

“眞主呀！请让他们的国家垮台，削弱他们的权势，使他们分崩离析，让他们悲观失望。

“眞主呀！你一定看到，监狱已被你忠实的信徒塞满，只有你知道他们心灵中的秘密，他们是为你的召唤而奋斗的崇拜者……”

总训导师也在一九五四年十月五日，以同样煽动性宗教语言发表一张传单，号召人们作拿起武器的准备，他在传单里说：

“致眞主在大地的士兵们！”眞主在他的经典中命令我们说：“尽你们的可能准备好力量，拴好战马，使眞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丧魂落魄。

“忠厚的兄弟！你的日子到了，你要作好准备。在我们面前有敌人，不仅是一个敌人，而是两个：亵渎神明和荒淫无度，是这个可爱的国家的统治者。这些人的心灵中毫无怜悯之心。暴虐者统治着的这个英勇

的人民是不能生活在这样屈辱之中的。

“兄弟呀！难道你不知道他们用疯狂的大搜捕使你的子女无家可归，流浪漂泊吗？也许需要用严酷的的办法来对付他们。每个忠于自己主张的兄弟应准备好钱财和武器，直到所允诺的这一天来临。”

在这段时期里，这样的环境使得以穆斯林兄弟会和共产党人为代表的极右派和极左派开始结合。为协调他们在推翻纳赛尔政权方面的合作，这两支队伍进行了多次接触。

类似这样的接触当然不是第一次，在一九五三年已有过接触。一九五三年，共产主义组织“赫迪塔”（民族解放民主运动的简称）准备在反对军队运动的学生范围内建立一个民族民主阵线。他们通过带有进步倾向的阿卜杜勒·哈菲兹与兄弟会进行了联系。兄弟会同意在不处于被动的情况下以其特有的方式参加这一阵线。它表示不能发表加入这一共产党人和华夫脱党人组成的阵线的声明，但是允许这一阵线的代表与学生中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行联系。在这以后，哈提卜也表示了他对共产党人看法的变化，他宣布说“共产主义是不能用暴力和法律来对抗的”，“不反对他们有一个公开的党，但是伊斯兰是国家走正确道路的保障”。

一九五四年夏天的形势与一九五三年夏天完全相似。当时，所有的民族、民主力量都受到了打击，兄弟会与革命的关系也与一年前大致相同，正在走向必然的冲突。这就造成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同共产党人再次接触的机会。

然而，走向这种结合的第一步是共产党迈出的。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九日，由福阿德·马尔萨博士主持的埃及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旗帜报》宣布说，反对这场革命的运动是由共产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这两大力量领导的。并提出应该为推翻纳赛尔政府作出共同努力。同年七月，共产党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与此同时，在大学生中的兄弟会成员和共产党人的关系也正在逐步走向联盟。他们之间为了在校园内召开大会进行了多次联系，兄弟会成员同意参加大会，认为这是在共产党人宣布声援他们后表达他们感情的良好机会。当时穆斯林兄弟会的代表是学生阿里·努赛尔，他是兄弟会秘密系统的一名成员。

一九五四年七月，共产党的代表和《穆斯林兄弟报》主编进行了第

一次接触。参加会谈的共产党代表七月十六日的报告表明，会谈讨论了这两个集团的共同目标，并取得了一致看法，认为反对把国家与任何同敌人的同盟条约联系起来，推翻现政府是这两个集团的共同目标。这份报告是这样说的："现在的爱国者是反对自己的国家与任何同敌人缔结的条约或同盟联系起来的人，是为了推翻敌人要把我们拴在'他们的战车上'而强加于我们的政府进行斗争的人。"

共产党还主张中断与英国人的谈判，取消限制自由的特别法等措施。对此，赛义德"原则上表示完全同意"。会谈中还指出，有一小撮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按照殖民主义的计划行事。兄弟会的代表说："总训导师之所以离开埃及是因为他同那些鼓吹与政府合作者有矛盾。"共产党认为，"只有在军队外掀起一个运动，推翻政府才能获得成功。人民应该起来推翻现政府"。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日的另一份报告里谈到了另一次接触。这次会谈是研究积聚力量的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谈到了传单这种武器。兄弟会的代表说，已出版了数以万计的传单，并还将继续印刷传单。共产党代表认为，仅仅这一武器是不够的，应该有能促使群众走向决定性行动的一些积极的行动。在这次会上还讨论了作为共同行动的一种手段的示威游行。兄弟会的代表认为，参加示威游行会使兄弟会遭到迅速解散的打击，"应安排一个周密的联合行动"。而共产党的代表则认为，兄弟会在参加游行方面打退堂鼓会使共产党在群众面前处境难堪。兄弟会的使者则表示他们可以参加示威游行，但不允许使用兄弟会通常的口号：眞主至高无上，赞颂全归眞主。

从上面的两个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两个报告确实是代表了埃及共产党对军队的行动的观点。但这一观点是充满疑团的观点。在七·二三革命前，埃及共产党对革命是谨慎的、担心的，因为它认为军队是不可靠的。革命后，共产党对革命表示了三天的友好，在第四天，即七月二十六日就散发了题为《大骗局》的传单攻击说，革命是"一次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军事政变"。兄弟会和共产党之间的上述接触是在哈提卜在阿拉伯国家时完成的。一些人记得，兄弟会的一些高级负责人也指出过与共产党人结盟的愚蠢性。从意识形态来说，这种结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的接触产生的结果只是双方在散发传单方面的合作。埃及当局确实抓到过两名散发共产党传单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并把他们送交最高军

事法庭审判。

兄弟会中的内战

在纳赛尔镇压机构施加的压力下，哈提卜借助忠于他的秘密系统力量，把兄弟会的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此刻，哈提卜遇到兄弟会内部两股重要力量的反对。第一股力量是以副训导师赫米斯为首的一派。第二股力量是阿西马维及其被开除出兄弟会的成员。

当时，阿西马维一派的危险性和重要性来自那时仍在出版发行的《号召》杂志，这一刊物在兄弟会内外的作者和读者对哈提卜一派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哈提卜三月二十五日从军事监狱中释放后，阿西马维等被开除的一伙曾前往拜访，祝贺他荣释归来，重新表示效忠。兄弟会是在一种充满希望的气氛中开始重新活动的，正如阿西马维所说："大家认为，队伍已统一，一家人已团聚在一起。"被开除者也开始经常出入兄弟会总部。许多人头脑里都有这样的问题：兄弟会领导是否将发布让这些被开除者正式归队的决定。

然而，使人感到突然的是，兄弟会出的一份秘密宣传品中解答了这一问题。它说："兄弟们对经常出入总部的那些被开除的人的地位提出了质疑，我们对兄弟会成员的回答是，他们应该抵制这些人，远离他们。"这是哈提卜派和"号召"派激烈斗争的开端。阿西马维一伙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侮辱，特别是这篇宣传品把他们称作："一些人"，而不是"一些兄弟"。《号召》杂志的回击仍是一些老调子。它说，穆斯林兄弟会正受到它的一小撮人的专横统治，它的领导受"新来者"（指哈提卜）控制。这样的领导班子是违背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的伊斯兰原则的。

哈提卜派的艾哈迈德回敬说："航船正处在危险中，不管你们是否感到，你们在船上凿了几个洞。我们的目的不是中伤和诽谤，我们对你们的作用是起航船的卫士和保卫者的作用。"

鉴于以塔勒特为首的秘密系统是站在哈提卜一边的，它也受到了《号召》杂志的攻击。该杂志在谈论秘密系统的地下刊物的《战斗中的兄弟》时，把它说成是"搞阴谋的刊物"，"许多文章不符合眞主的指示"。

在对待革命的立场问题上，阿西马维一派对革命采取坚决支持的立场，多次反对哈提卜敌视革命的计划。阿西马维曾写文章说，从他们之

间的分歧中获利的将是殖民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保皇分子，封建分子和埃及、埃及人、阿拉伯人、穆斯林的一切死敌。

因此，“号召”派认为，医治兄弟会病根的唯一药方必须承认三个事实：一、要重新团聚，集合队伍。二、要知道祖国和宗教的敌人将从兄弟会和革命之间的争吵中获利。三、要让建会委员会手中有全权，可撤消已作出的关于开除和停止建会委员会委员及各分会成员会籍的决定。

当哈提卜在叙利亚攻击撤军协议时，也遭到了阿西马维的强烈谴责。阿西马维认为，哈提卜在把问题提交建会委员会前，是无权发表这样的声明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哈提卜当时是可以立即乘第一架回埃及的飞机回来，在几天或几小时内召开建会委员会大会的。但是，他却迅速地宣布了自己的看法，把整个兄弟会与这一看法连起来，然后才回到开罗。他不仅错过了时间，而且无视训导局和建会委员会。”

当哈提卜隐藏起来时，《号召》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把这样的隐藏说成是滑稽的行动，称哈提卜是“最伟大的隐士”。艾敏·伊斯梅尔在文章中写道：“这种隐藏是‘无能面对局势’的表现，是逃避那些要清算其失败政策的人们。他的政策使兄弟会走到这样的地步：由紧密团结走向分裂；由亲密无间走向互相怨恨；由正路走上斜路。”他还说：“伊斯兰不要这种马戏团小丑擅长的滑稽动作，这种把自己的头埋在沙里不见任何人就认为谁也看不见它的鸵鸟政策会给穆斯林及他们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呢？”

阿西马维也攻击这件事说：“哈提卜在他开始领导兄弟会中的青年与发动革命的人进行斗争时，自己隐藏在某个地方。许多人对这种违背伊斯兰确立的、兄弟会从班纳时期就遵行的协商原则的局面表示不满是不奇怪的。”

阿西马维当时对撤军协议的看法与哈提卜一伙的看法完全相反。他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一协议带来的好处，只有别有用心者才能否定。纳赛尔及其谈判的同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这样的成果。因此，他们是值得感谢和称赞的。而且，他们还勇敢地声明：这项协议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沒有欺骗人民。”

在阿西马维派与哈提卜派矛盾加剧的同时，兄弟会中以赫米斯为首的主张与革命谅解的一派和以哈提卜为首的主张反对革命的一派的分歧

也出现了。

鉴于事态的发展，反对革命的一派几乎全部转入地下，而与革命和解的一派仍在公开活动。于是就产生一个问题：是隐藏在地下的一派管理着兄弟会的事务呢？还是这一大权已旁落在公开活动的一派手里？

赫米斯一派认为，哈提卜及其同伙隐藏起来是撤退，是让他们来主持兄弟会事务。而哈提卜一派认为，尽管在地下，但只要总训导师存在，赫米斯就不能单独管理兄弟会。

当时，被开除的一派把希望寄托在建会委员会身上，希望它能裁决分歧，哈提卜一派也把希望寄托在建会委员会身上。

建会委员会年会按期于一九五四年九月九日召开。哈提卜从隐藏地发来了一封信，说明他对分歧的看法。哈提卜在这封重要的信中说，兄弟会反对任何与殖民主义的协议并不是他们硬要这样做，而是出于宗教的准则。伊斯兰法典要求说，一旦敌人踏上了穆斯林的土地，每个穆斯林，无论大人、小孩都应起来抵抗任何形式的敌人。“我们不能让他们根据我们与他们签订的协议呆在伊斯兰的土地上，不允许同他们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哈提卜在信中还提醒兄弟会注意自从军队的运动兴起以来它给“政变者”提供的使后者能“站稳脚跟”的援助，谈到了一九五四年一月的解散规定，兄弟会成员被捕，强加各种指控，然后不经调查又释放，但仍把一部分人留在监牢里等情况。他说：“他们有权不说任何话就释放我们。但是，在他们要求合作时，我们希望能释放全部被捕者，撤销解散兄弟会的决定。”哈提卜还在信中回忆了兄弟会为实现这些要求与革命进行的谈判的失败以及政府对兄弟会发动的形形色色的战争的情况。他说：“我们在叙利亚发表的对和约的看法，总部发表的我的看法使政府很生气，致使政府把兄弟会看成是与共产党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一样的叛逆者和破坏者。兄弟会所作的一切是基于宗教的准则，是所有东方国家的穆斯林所应采取的、是在政府打算与英国人签约的时候埃及穆斯林所应采取的宗教准则。”“如果说政府是不得不同意这一和约的话，我们不能被迫同意这一和约。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观点，就如政府也有自己的观点一样。谁也无权在不征求本民族的看法，并限制其发表意见的情况下决定其未来。”哈提卜最后要求兄弟会成员“作好为你们的主张而献身的准备。我们的原则之一是：为眞主而死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眞主是支配一切的”。

然而，这封信中强有力的理由，似乎只是使建会委员会听取了这封信的宣读，并把会议推迟到九月二十二日而已。阿西马维在叙述这一问题时说，“哈提卜内心已感到这种凝聚起来的云雾，于是对建会委员会耍了两个花招：一是恐吓。在会前召集各分会和秘密系统的青年与建会委员会作对，使他们心里感到恐惧。二是欺骗。声称一个与政府联系的委员会已成立，并已开始工作。该委员会希望建会委员会给予时间，以便能使兄弟会和政府之间的气氛和谐。企图以此来获得把会议推迟两周的同意”。

这时，兄弟会与政府间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生，建会委员会和训导局的许多成员已开始担心会遭到解散、拘留和惩罚的命运。因此，许多人都同意探索不惜代价与政府谅解的道路。

当时，阿西马维强烈地感到与革命的冲突对兄弟会运动的前途的危险性，“认为解决与革命的冲突问题应先于解决兄弟会中其它事务”。但是，赫米斯却把修改基本法置于首要地位，以便能从哈提卜及其一伙手里夺取权力，使训导局本身“担负起号召的事务”。

九月二十三日，兄弟会建会委员会在赫米斯主持下召开了会议，一百四十七名成员中近一百名出席了会议。绝大部分与会者都反对和批评总训导师的政策。会议进行了十八个小时。哈吉·穆罕默德·戈达在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反哈提卜派的观点。他还说，那种关于革命不愿撤销解散决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曾收到一封总理府的来信，纳赛尔在信中宣布说：这项决定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就已废除了。他曾把这封信交给了准备去黎巴嫩找总训导师的穆尼尔·达莱。戈达在发言中还揭示了训导局组成的联系委员会与纳赛尔会见的内情。他说，纳赛尔在会见中批评了总部关于对和约的声明，并把它和兄弟会在与英国人联系时接受的条件作了对比。

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辩，使到会的委员们筋疲力尽，纷纷离开会议厅去休息，会场上只剩下二十五名成员。哈提卜派趁这一机会以建会委员会的名义作出一项决议，解散了建会委员会，重新宣誓永远忠于哈提卜，修改了兄弟会关于建会委员会成员选举和训导局权限的条法。阿卜杜勒·卡迪尔并把此作为大会一致同意的决议向新闻界作了宣布。

为此，阿西马维写了一篇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是二十年后“穆斯林小组”（或称为赎罪与迁移组织）所信奉的赎罪与迁移思想的基础。在

这篇重要的文章里，阿西马维指责兄弟会的主张已经偏移和蜕变，宣布对改造这一组织已完全绝望，号召背弃兄弟会，以便能把好人与坏人分开。他把这种蜕变的开始追溯到“哈提卜当总训导师以后”。他还说：“我可以肯定，改革这一机构，摈弃利己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的希望已不复存在。这些人围在哈提卜的周围，哪怕他的政策已导致兄弟会的毁灭，他们也美化这一政策。经验还证实：这些分子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弄虚作假的手法，施加压力和恐怖的手段，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事态还证实：纯洁的虔诚分子已无法在这样腐败的环境下生活，无法在这种瘟疫流行的气候下工作。这些为眞主及其主张、为伊斯兰及其法典而奋斗的善良分子只能是离弃。”阿西马维还以眞主的使者迁移到麦地那，然后又重返麦加的事作例说明了这件事。

在与政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哈提卜的反对派开始准备反攻。反对派努力导致了众所周知的“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政变”。十月二十日，近七十名已被解散的建会委员会成员自己召开了会议，作出了以下五项决定：1、认定总训导师哈桑·哈提卜在休假。2、取消原训导局。3、取消近三年来发布的开除、停止会员资格、解散分支机构的决定。4、建会委员会作出的（九月二十三日）决定无效。5、组成兄弟会事务临时管理委员会。六十八名建会委员会成员在这项声明上签了名。训导局成员巴哈·胡利代表建会委员会把声明带回了总部，并通知了训导局。

次日，即十月二十一日，训导局和被解散的建会委员会在赫米斯的主持下在总部召开了联席会议。在会上，反对纳赛尔的哈提卜的支持者与支持和解的一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由赫米斯宣布了以下决定：1、临时的训导局吸收五名新成员（他们都是已解散的建会委员会成员、赫米斯的支持者）。2、推迟建会委员会的选举，选举日期由临时训导局以后决定。

在这次会上，讨论了关于选举建会委员会成员基本法的修改问题。修改方案是：各分支机构管理委员会各选出七名代表，由这些代表挑选出九十名建会委员会成员（建会委员会共有一百二十名成员），由这九十名委员产生的会员资格委员会来任命其它三十名成员。

中传布了民主思想。

但是，鉴于这些变化是以“政变”的名义进行的，它们实际上是穆斯林兄弟会四分五裂现象的表现。这种分裂势必为兄弟会秘密系统的登台开辟道路。

向宪兵和侦查总署索要人质

事态的发展使穆斯林兄弟会和纳赛尔走向必然的冲突。自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的危机以来，兄弟会的政治领导在斗争中分崩离析。兄弟会的公开组织遭到了沉重打击，经历了受当局影响的一系列变动。在这样的形势下，秘密系统的作用自然而然就突出出来，人们翘首期待这一组织来挽救局势，进行报复。辛达维·达维尔在受审时的讲话充分地表达了这一看法，他说：“由于建会委员会中发生的分歧，建会委员会在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心目中失去了尊敬，训导局也失去了尊敬。由于它已不能再指导兄弟会成员，以致它发出的任何指示都得不到穆斯林兄弟的支持。”“在这时候，我们看到兄弟会的管理机构已瘫痪，只有秘密系统在控制着局势，向兄弟们发出指示。”

从阿西马维的回忆中可以肯定，使用武力的想法在哈提卜主持的训导局中已提出来讨论。阿西马维在回忆中说：“会上讨论了对政府的总的立场问题以及我们自己或者在与别人合作的情况下可做的工作，以便改变这一局面，不让增强在埃及人民身上的军事统治继续下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每个认为与政府讲和是可取的人都明哲保身，沒有在正式的会上摆出自己的看法。即使说的话，也是与会外的一些人说说而已。因此，抵抗的形式问题贯穿在整个讨论中。”“在会上还提出绑架一部分宪兵和侦查总署人员，把他们当成人质，作为拘留穆斯林的代价的想法。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使国家活动瘫痪，灭其威风，挫其锐气，使这些人质的同事会比较客气地对待我们之中被捕的兄弟，在执行大搜捕命令时有所顾忌。”他还说：“这样的建议确被采纳，还制订了具体的实施方法。尔后，又推迟了一些时间。在逮捕和开除兄弟会中的学生和职员运动愈演愈烈的时候，这一方案又被再次考虑。但是，事态的发展沒能让这一方案得以实施。”

当时，秘密系统也有自己的建议。阿卜杜勒·拉乌夫曾建议搞四个或五个分队，穿着军警的服装去攻占内阁所在地。塔勒特在受审时也承

认了这样的计划。在审讯中，庭长贾马勒问：

——为了实施攻占内阁所在地的方案，你们买了军装了吗？

——是的！他们去搞来的。

——是带红色贝雷帽的四十二套军服？

——反正是军服！我到易卜拉欣·巴尔卡特那儿去对他说过：我们可以买到军服吗？他对我说：可以。他从我这儿拿了五十镑钱，后来又先后两次拿走了十镑和二十镑。确实是买了五十套军服，就是在事件发生以后查获的那些。

然而，这样的想法，正如塔勒特所说，由于条件不具备，而被排除了。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计划，即与纳吉布取得一致意见，在军队里搞鼓动工作，以帮助亲纳吉布的部队迫使纳赛尔和革命委员会成员回到军营里去，兄弟会同时给予纳吉布必要的群众支持。

这样的计划，很明显是企图重演二月危机时发生的事。那时，在纳吉布退位后，骑兵部队行动起来让纳吉布当上了共和国总统，穆斯林兄弟在阿卜丁广场搞了盛大游行，使纳吉布重新回到了革命委员会。

这项计划也得到了哈提卜的赞同。但是，在和约签订前，哈提卜一直沒有找到实施这一计划的机会，因为他知道，由于兄弟会在三月危机中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支持了纳赛尔及其同伙，打击了民族民主力

军队中的绝大多数将会起来进行类似叙利亚发生的行动，迫使军队返回军营，把国家交给文职人员。兄弟会的作用将是动员群众支持这一新的运动到底。”

卡特卜还谈到了他向哈提卜了解如何对付支持纳赛尔的美国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哈提卜的回答是已作了必要的安排。卡特卜的供词是这样的：

“我当时想（从哈提卜那儿）得到肯定的一点是关于国际形势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形势问题，因为我认为埃及的局势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国际局势相关联的。美国也许切望保持目前的状况，某些阿拉伯国家也是如此。哈提卜回答说，这已考虑了，纳吉布总统仍将是国家元首，一些提供这种保障的人将与纳吉布合作。”

卡特卜在回答副检察官问题时还说：我的理解是，纳吉布少将将领导大多数的军队，这些军队将向其余军队施加压力，以实现重返军营，还政于文职人员的想法。

以上这番话的意思是，哈提卜和纳吉布已就这计划的实施进行了接触。纳吉布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不过他给人的印象是，这样的联系是与他的卫队长穆罕默德·里亚德进行的。他回忆说，里亚德于一九五四年十月（进行暗杀活动的那个月）退休，后来，发布了逮捕他的命令，控告他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一起企图搞反对纳赛尔的政变。

开罗大区的主席易卜拉欣·塔比卜在供词中说：“这一计划是建立在兄弟会和纳吉布少将一致同意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上的。陆军中许多部队支持纳吉布的意见。”

兄弟会的秘密系统，当时对纳赛尔的军队和群众性游行间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作了估计。和平示威游行的想法逐渐发展到由兄弟会秘密系统的武装保护进行群众性游行。一旦与纳赛尔的军队发生冲突，这支武装就开始对革命委员会成员进行暗杀活动。

易卜拉欣·塔比卜在法庭上对这项计划解释说：“计划建立在亲纳吉布的部队和群众武装部队一起来提出要求的基础上。一旦这一运动兴起，而又受到了侵犯，那么，这支武装将用各种办法来回答这种侵犯。”

武装示威游行的想法是阿卜杜勒·拉乌夫提出的。塔勒特在法庭供认说：“有一天，阿卜杜勒·拉乌夫来见我，提出了武装示威游行的想

法，即在武装保护下的游行。目的是：如果游行遭到侵犯，这支武装可回击侵犯，随即便开展对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普遍的暗杀活动。”据塔勒特说，阿卜杜勒·卡迪尔负责游行的安排，秘密系统负责保护游行。

当时兄弟会对英国人进行干涉、使计划受挫的可能性也考虑过，特别是在纳赛尔与英国人签订了和约，取得他们对其政权的支持以后，计划是要作好对付这种干涉的必要准备。对于这方面有关的问题，易卜拉欣在法庭上回答说：“塔勒特告诉我说，在东方省和运河地区有部队，这些部队准备用游击战来对付殖民主义者。”“这是兄弟会分队武装”。对付英国人进攻的计划“是进行游击战，破坏他们占据的交通和设施，切断他们的增援和供应线”。

谁也没有发布暗杀纳赛尔的决定

纳赛尔由于与英国人签订了撤军协议，对英国人是完全放心的。穆斯林兄弟会在走向极端，对埃英协议采取强硬态度，企图动员民族主义力量来取消这一协议后，改变了英国人关于兄弟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会采取温和立场的估计。兄弟会的政治领导在与纳赛尔斗争的形势下分崩离析，兄弟会的秘密系统突出了自己的作用，制订了准备与纳赛尔进行不可避免的斗争的计划。

但是，哈提卜并不同意在那时使用暴力。这点在法庭审判时得到了证明。在法庭上，辩护人曾问哈提卜，辛达维·达维尔陈述说，易卜拉欣告诉过他，下达执行暗杀纳赛尔计划命令的人是哈桑·哈提卜。你有什么看法？哈提卜回答说：“如果他们是这样讲的话，他们没有讲实话！”“我敢起誓：伟大的眞主啊！我没有下过命令，也没讲过一句有关这一罪行的话。”在另一场合，哈提卜曾表示对恐怖行动的谴责，他说：“我不认为恐怖行动是什么手段。我要这样说：恐怖行动有害于兄弟会，有害于伊斯兰和埃及。对此，我已提出多次警告。”优素福·塔勒特也承认阿提卜是不同意使用武力的，他说，当他带着阿卜杜勒·拉乌夫策划的武装游行的计划去见哈提卜时，他不同意任何超出和平示威游行的行动。

塔勒特还提到：哈提卜要求他就和平示威游行的事与阿卜杜勒·卡迪尔联系。于是，他就让易卜拉欣·塔比卜把搞游行的事告诉了阿卜杜勒·卡迪尔，并由卡迪尔提交“示威游行专门委员会”讨论。但是，该

委员会作出了推迟示威游行的决定。为此，他询问过不同意游行的原因。当时，卡迪尔要求他等待，说："你忍耐一下不好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和平形式的还是武装形式的群众示威游行的想法，由于政治领导的害怕和犹豫而落空了。兄弟会秘密系统感到它只能依靠自己单独来干，以表示它的存在。

据秘密系统某分队长法塔赫·布兹说，情况是这样的：他在满西事件前五天见到了塔比卜，从他那儿得知"暗杀纳赛尔的问题已是决定了的事，一些兄弟已被要求承担这一任务"。他为此还与塔比卜进行争辩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将会给国家、伊斯兰带来严重后果和不可弥补的损失。"尔后，他还与一些兄弟会的支队长联系，警告他们不要对此指示作出响应。他并与阿卜杜勒·卡迪尔联系，要求他阻止这一行动的实施，但是，卡迪尔告诉他说，他对这样的意向一点都不知道。总训导师在与他最近的一次会见中，一点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

据秘密系统成员、理工科学生马哈茂德·哈瓦梯克叙述，他是从吉扎分队长、社会学学生伊斯梅尔那儿得到这个消息的。伊斯梅尔告诉他说，秘密系统打算进行先暗杀纳赛尔、随即再暗杀、绑架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和自由军官团成员的行动，然后进行武装的革命的群众性运动。并让他相信这个运动将利用纳吉布少将的名字，他可能会发表一项支持这一运动的声明，运动结束后由他来掌管国家。

这些供词与依姆巴巴地区主席辛达维·达维尔讲的大体相符。辛达维说：在我得到塔比卜的指示前，秘密系统倾向于搞群众性示威游行，因此，该组织开始通过传单来动员人们起来反对和约，使兄弟会人员义愤填膺，纷纷问道："前途是什么？""我们将干什么？"。传单突然停止了。我问塔比卜说，你动员我们，让我们去干什么呢？他说：方向决不是发动群众，我们决定搞恐怖。我对他说：我们和国家都不能从这条道路上获得什么好处。他回答说：已有一个全面的计划，我们将实施这一计划。

辛达维还说："事件前将近十五天或再多一点，塔比卜到我这儿来告诉说，组织已决定先向纳赛尔开刀，然后再用拘留、绑架、杀害等各种办法解决自由军官团问题。"

辛达维还说：塔比卜还给他一支手枪，让交给阿卜杜勒·拉蒂夫。枪确实已交给阿卜杜勒·拉蒂夫。但是，就在这时，马哈茂德·哈瓦梯

克等两人来访问辛达维，告诉他说总训导师不同意恐怖行动的方向，并声称，一旦纳赛尔被刺杀，他对此无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辛达维就要阿卜杜勒·拉蒂夫停止这一计划的实施。但是，在第二天塔勒特访问辛达维时却说哈瓦梯克的话是“错的”，也就是说哈提卜发出了这样的命令。

还有证据说明秘密组织在那时策划了对革命委员会其他成员的暗杀行动。阿卜杜勒·拉蒂夫供认说，他和萨阿德·赫加齐曾研究过安瓦尔·萨达特的住宅和《共和国报》社的情况，以“确定暗杀他的最好办法”。“我们到住宅和报社去察看过，一致的意见是暗杀要在报社进行。最后，有人对我们说，等到命令下达时再说。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去了。”

由此可见，秘密系统的意见主要是暗杀作为政权之首的纳赛尔，他一倒台，革命委员会便会垮台。据辛达维说，在从塔比卜那儿拿取手枪时曾问：“计划的安排如何？”塔比卜说：“安排是阿卜洛勒·拉蒂夫一个人追踪纳赛尔。尤其是纳赛尔在签订和约后经常到广场去，到人民中去演说，阿卜杜勒·拉蒂夫是能得手的。“我后来把这些话都转告了阿卜杜勒·拉蒂夫。”

辛达维还供认，在事件前三、四天，塔比卜还答应给他搞“两挺机枪”，以便对纳赛尔的军队打伏击，并给阿卜杜勒·拉蒂夫搞个用来炸死纳赛尔的“地雷”。但是，拉蒂夫拒绝了使用“地雷”的想法。对这个问题，阿卜杜勒·拉蒂夫在法庭上说：“在我动身到亚历山大去之前，我在晚间十二点到辛达维那儿去，他对我说：我们有一条腰带，你可以系上去见纳赛尔，在相互拥抱时，你们两人都一起被炸死。”我对他说：“由于拥挤，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检察官问道：你去暗杀主席，就没有想过要逃走吗？他答道：“我根本没有想过要逃走。辛达维对我说过，卫兵会向你开枪，打死你的。”“我知道我是去死。”

从审讯情况来看，阿卜杜勒·拉蒂夫选择的进行犯罪活动的地点使秘密系统的所有人感到突然。辛达维说：“当时设想这一事件应发生在开罗。但是，拉蒂夫前来告诉我：“我准备去亚历山大，我从报上读到主席已到亚历山大去了。”我对他说：“不要这样，不必到亚历山大去。”他回答说：“不，我要去。”

可是，塔比卜并不知道这件事。按辛达维的叙述，情况如下：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当我把阿卜杜勒·拉蒂夫已去亚历山大的事告诉

塔比卜时，他对我说："为什么要到亚历山大去呢？"

然而，这种震惊并没有使辛达维和塔比卜放弃暗杀纳赛尔的企图。五点半，穆罕默德·阿里·努赛尔按约到了辛达维的家，辛达维就把塔比卜带来的地雷和手枪交给他。努赛尔认为地雷无用，只拿了手枪，他也承担了与拉蒂夫一样的任务。

就在这时，阿卜杜勒·拉蒂夫正在执行他的任务，据他自己说，事件经过如下：十月二十六日晚获得辛达维的同意。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了来看我的优素福·赫加齐。他为因没带武器而不能与我一起去表示遗憾。我乘了早上九点半的火车去亚历山大，大约中午一点到达。然后，我到了马哈拉姆·比克区，在街上蹓跶了一会，进入一家饭店，吃了午饭就到幸福饭馆订了一个房间，换了衣服。四点二十五分，我去车站广场，看到示威队伍正涌向满西广场，我就跟在他们的后面进入了广场。纳赛尔来了，开始演讲时，我向他开了几枪。"

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一事件的责任应该谁负，是辛达维、塔比卜还是塔勒特？

秘密系统的末日

辛达维承认自己给阿卜杜勒·拉蒂夫下达过暗杀的命令，而塔比卜则否认自己给辛达维的命令是要执行的。肯定这个命令是要执行的是由于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塔比卜（按上文意思应为塔勒特——编者注）向辛达维肯定总训导师已同意暗杀的计划，于是，辛达维就让阿卜杜勒·拉蒂夫继续他的使命；二是塔比卜在知道辛达维已着手执行，让阿卜杜勒·拉蒂夫去亚历山大后，还把炸药包交给辛达维，让他交给努赛尔。辛达维讲述的关于塔比卜在事件当天访问他一事实际上说明，塔比卜对拉蒂夫去亚历山大虽感到突然，但他仍听任事态发展。

然而，暗杀失败后，事态向相对方向发展。据辛达维供认，哈桑·阿西马维把他称为"有神经质、易冲动的人，不适合在秘密系统里当负责人"。辛达维一听到暗杀失败的消息就在当夜带着妻子去明尼亚。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回来向伊姆巴巴警察局自首，他关于这种经过的说法是值得琢磨的。他说："感谢真主，主席没有受到伤害，脱险了。在这事件以后，我估计会逮捕我。于是，我就迅速地带着妻子，乘上十点十五分由吉扎开出的火车，到了明尼亚。第二天早上，我又乘九点的火车

回来，到伊姆巴巴警察局自首。

“在火车上，我考虑到几个问题：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已分成几派，这个时期的宣传是由一些非负责的、兄弟会不熟悉的人控制着；恐怖主义方针的本质是非伊斯兰的；用这种方式杀人也是非伊斯兰的。

“我还考虑到，如果这样的事在我领导下发生，对兄弟会、国家和安全都是损害，这样的企图一旦没有得逞，可能会发生第二次。因此，我把自己交给警察，任负责人来处置。”

至于秘密系统的主席塔勒特，在法庭上一直坚持说，计划是建立在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基础上的，如果受到侵犯，随后才是暗杀行动，不是先暗杀，后是示威游行。坚持这种说法就把在示威前加速执行这一计划的责任归咎于辛达维·达维尔。

显而易见，只要优素福·塔勒特承认制造炸药包、并把它交给塔比卜，而且发生在他在亚历山大会见总训导师，并知道他反对武装示威以后这个事实，那么，任何时间上的分歧都没有什么价值。这样的供认完全肯定了“暗杀行动第一”的计划，他把这一计划交给塔比卜，然后又转交给辛达维，辛达维又把任务布置给了阿卜杜勒·拉蒂夫和阿里·努赛尔。从而，也肯定秘密系统对满西事件要负完全责任。

当时，兄弟会的政治领导，实际上由于受到与纳赛尔发生冲突的压力而四分五裂，并没有眞正建立起来，甚至哈提卜自己——正如哈桑·阿西马维所说——在十月初向其副手阿卜杜勒·卡迪尔提出退出训导局，只保持建会委员会成员资格的要求，并要他在认为适当的时候把这件事提交训导局。从那时开始，他把训导局的权已最终让给阿卜杜勒·卡迪尔。当时兄弟会在事件前的情况的确象哈桑·阿西马维所叙述的：“领导被孤立，训导局成员在任何步骤上意见都不一致，执行局已停止开会，而秘密系统的成员又隐瞒自己的想法。”总之，兄弟会的政治领导虽然没有向秘密系统发出搞满西事件的指示，但这不意味着它可摆脱对这一事件的责任，因为秘密系统是兄弟会的一个机构。

这儿，剩下的一个问题是：在埃及史无前例的这样一个庞大的秘密组织，在暗杀阴谋失败后，怎么会这样容易地败在纳赛尔的警察手里。它没有继续执行其他暗杀革命指导委员会成员和自由军官的计划吗？

事实上，在满西事件以后，出现了执行阿卜杜勒·拉蒂夫以前提出的、但被推迟执行的关于占领内阁府的计划的动向。据塔勒特说，满西

事件三、五天后，拉蒂夫曾与他谈过重新执行他关于占领内阁府的计划，但是，谈话没隔几天，他就被捕了。

据阿西马维说，他曾向塔勒特打听过有多少人参加，有什么武器，准备怎么干等问题，但没得到他的回答，“原因不在于人员和准备，而是所担心的两件事阻碍了他这样去干，即一旦在埃及引起麻烦，外国人会干涉；一旦我们对现军事当局进行公正的抵抗，会以杀害监狱里的兄弟来报复。这样的担心支配了塔勒特的思想，以至给我一个他对其同伴的意愿十分悲观的印象”。

阿西马维还提到他曾与塔勒特说：“你们从两种计划中挑选一种：去投降，我是不会与你们站在一起的；宣布公开抵抗，让双方都有牺牲，我将与你们在一起。”但是，塔勒特却大讲什么组织的继续存在、出版传单、继续集会等问题，而不想使用“公开的武力抵抗”的办法。这使阿西马维十分生气。塔勒特对此回答说：“我们还能干点什么事情来阻止事态发展呢？”阿西马维答道：“我们要进行抵抗，战死在家中、大街上和田野里。如果在开罗作战使你为难的话，我们可把战斗转移到农村去。”但是，塔勒特说：“我仍然对这样公开的方式有所担心。不过，我将与我的同事商量，然后再找你谈。”然而，由于塔勒特被捕，这一会晤没能实现。

与此同时，以副训导师阿卜杜勒·卡迪尔为代表的兄弟会政治领导正在进行与纳赛尔和解的另一种努力。

十月二十八日，即满西事件二天后，阿卜杜勒·卡迪尔给纳赛尔写了一封信，阐明同兄弟会达成新的和解的原则。他在信的开头写道：他听说“企图暗杀你的人是在我的办公室（指辛达维）训练出来的。如果确是这样的话，我要向你强调，我对这一罪行一无所知，如果证实有我的份的话，我将向你献出我的生命。”

卡迪尔在信中要求纳赛尔象对待英国人一样同兄弟会和解。他说：“以您的英明和才智，您已在埃及和英国之间进行七十年的斗争后创造了和解气氛。我对您的广阔胸怀和宽宏大量表示钦佩。我希望您能在政府和组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创造友好的气氛。我期望亚历山大的事件不致成为您所主张的这种宽容的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卡迪尔还在信中解释了拟议中的和解协议的原则，这些原则不外乎是对纳赛尔以前的要求彻底投降。卡迪尔说：我仍然记得您关于解散秘

密系统和在军队警察中的组织的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建议：

一、我方：

1、在您同意这些建议后的十天或两周内解散特别系统，交出它所拥有的武器、弹药。

2、兄弟会至少是在过渡时期结束前不介入国内政府，主要是搞伊斯兰宗教宣传。

3、在两周内，按照这个原则组织兄弟会。

4、兄弟会在两周内停止其在国外的活动，如有必要，可派代表去国外实施这一保证。

二、你方：

1、发布关于武器、弹药法停止执行两周的法令，以便能够上缴所有的枪支、弹药而不必担心会受到法庭审判。

2、在执行上述第一条保证后，释放所有被捕的穆斯林兄弟，然后再考虑解决以前的遗留问题。并允许我会见现仍在军事监狱和加勒阿（城堡）监狱里的兄弟，以取得他们对这些建议的同意。允许我为取得国外兄弟的同意召开会议。

但是，纳赛尔对这些建议只用一句话来回答，指出这是“一个大骗局”。

很清楚，阿卜杜勒·纳赛尔已没有什么理由去同意这样的建议，他已经解决了革命以前的一切政治力量。穆斯林兄弟会只是这些力量中最后的一个，是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手中的道路上最后一个障碍。同时，在辛达维自首招供以后，秘密系统成员和兄弟会政治领导人相继被关进监狱，纳赛尔的警察已完全控制了局势。

在阿卜杜勒·卡迪尔幻想打出秘密系统这张牌时，纳赛尔手中已掌握了所有的牌。秘密系统那时已是一张毫无价值的牌。

这就是秘密系统的末日。

一九六五年的政变

在以后的年代里，在纳赛尔政权的专制下，开始显示出炽热的革命性。革命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打破了武器的垄断，英勇地抵抗了几个同盟国，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史无前例地出现，同时还出现了不结盟运动。纳赛尔政权还把注

意力转向国内，以一系列国有化决定打击了剝削，开始向工业化和建设领域前进。

伴随着这样的变化，民主、进步力量对纳赛尔的态度和感情起了变化，纳赛尔获得了巨大支持，群众对萨阿德·扎克鲁勒和穆斯塔法·努哈斯的那种支持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记忆中。而且，这种支持还延伸到整个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群众之中。

纳赛尔在对国内阵线的稳固感到放心的同时，逐步地释放了被监禁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一九五六年，释放了一些沒有进行审判的兄弟会[illegible]

直到聚集起兄弟会的队伍，并将与那些不愿意作这一工作的人作斗争，不管他们的地位有多高”。

在埃及，他俩多次会面。他俩对解散声明从“伊斯兰的法学角度研究”的结论是：这是一个无效的决定，认为纳赛尔是与伊斯兰作对的，他不遵守眞主圣典，不应对其效忠，穆斯林不应对他唯命是听。他俩还制订了工作计划，“旨在把愿为伊斯兰工作的人聚集起来”，加入他俩的行列。这一计划得到了哈提卜的称赞。

他俩制订的工作计划是这样的：伊斯梅尔“在全埃及范围内，从省、镇到农村进行调查工作，”以了解“谁愿意干，谁适于与他俩一起工作。调查首先从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开始，以便他们能成为这一集团的核心”。伊斯梅尔就各地区的情况写出报告，然后与宰奈白研究，再把研究结果告诉哈提卜。哈提卜是“一会儿同意提出的一些意见，一会儿作些指示”。

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为了给过渡到圣战阶段作准备，必须进行思想教育。以前这种教育除了旧的伊斯兰的根本文献外，在“思想上”是依靠班纳和兄弟会思想家们的书籍。但是，在一九六二年，兄弟会思想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以赛义德·卡特卜写的《道路上的里程》一书为代表的新的伊斯兰意识形态。

赛义德的意识形态十分概括地说，是立足于以下的基础：

一、现代世界生活在蒙昧时代，这些巨大的物质繁荣和卓越的物质创造丝毫不减弱它的蒙昧性。

二、这种蒙昧是建立在侵犯眞主在地球上的权威，特别是神性的特征，即统治地位的基础上。这种蒙昧把统治地位交给了人，使一些人成为另一些人的主宰。这种情况并不表现为蒙昧时代初期的那种原始的幼稚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自称有权脱离眞主关于生活的纲领，在眞主不允许的情况下，规定道德、观念，制订法典、法律和制度。

三、这种蒙昧性——即对眞主权威的这种侵犯——导致了对眞主的奴仆的侵犯。人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的）集体性制度中受到凌辱，个人和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资本和殖民主义控制的虐待。

四、伊斯兰的纲领有不同于所有这些制度的特点，即只有在这个制度下，人们才能从一部分人崇拜另一部分人中解放出来，而只崇拜和服从眞主。这就是我们所具有的、而人们还不了解也不能创造的崭新的东

西。

五、这一新的东西必定在现实中得到体现，一个信仰“万物非主，唯有眞主”的民族一定要以此来生活。统治权只属于眞主，统治权从属于眞主以外的任何人是不能接受的。不在这样的基础上制订的任何法律都是被拒绝的。自从地球上中断了用眞主的法典来进行的统治起，这种特征的伊斯兰民族的存在也中断了。必须使这样的民族重新出现，以便伊斯兰教再次起所期望的领导人类的作用。

六、从以上这些话出发，必须“在人们心灵中重新建立这一宗教”。即使是那些把自己称为是穆斯林，出身证也写明他们是穆斯林的人们也应该知道，“伊斯兰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万物非主，唯有眞主’的信念，即要把统治权归还眞主，让眞主来支配他们，把那些声称权力是他们自己的，从而侵犯眞主权威的人赶走”。

七、为了开始这种“伊斯兰的复兴”，必须要有先锋队，即下定了这样决心，准备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先锋队。它一方面要与周围的蒙昧性有所脱离，另一方面又要有某种接触，在笼罩整个地球的蒙昧中前进。它必须知道自己的作用，职责，目标的艰难和漫长历程的起点，知道自己对这在地球上扎根了的蒙昧性的立场。

八、旧的蒙昧社会也许会溶入新的伊斯兰社会，也可能不会溶入；它可能与新的伊斯兰社会和解或者进行战斗。即使过去的一年已发生这样的情况：蒙昧社会向伊斯兰社会处于萌芽阶段的先锋队的个人或小组，或者向这一社会本身发动了无情的战争，那是从诺亚到穆罕默德的伊斯兰宣传史上毫无例外地发生过的事情。

这是正常的：新的穆斯林社会只有发展到有能力对抗旧蒙昧社会的压力的时候才能建立和出现。

在这本书里，穆斯林兄弟所处的伊斯兰社会已不是穆斯林社会，而成了蒙昧社会，这是赎罪思想的基础。赛义德·卡特卜直言不讳地说：“声称自己是伊斯兰社会的这些社会是属于蒙昧社会的范畴的。这不是因为它相信眞主以外的人的神性，也不是因为它向眞主以外的人表示崇拜之情，而是因为它在生活中不相信只能崇拜眞主，虽然它不相信除眞主外还有别的神明，但它把神性的最主要特征给了眞主以外的人，相信眞主以外的人的统治权，接受这种统治的制度、法典、道德、习惯和传统，乃至几乎生活的一切方面。而眞主对这些统治者的评论是：谁不用

眞主的降旨来统治，那末，他们就是异教徒。”

这就是赛义德的意识形态，它建立在进行长期教诲和从蒙昧社会向伊斯兰社会缓慢地转化的基础上。那末，他怎么会陷入一九六五年的运动中去的呢？

赛义德·卡特卜在这一案件的审讯中谈了这一件事。他说：他由于健康原因于一九六四年被释放。在释放后，阿卜杜勒·法塔赫·伊斯梅尔与他进行了联系，并介绍他认识了阿里·阿西马维、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马吉德、马吉迪·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布里·阿拉法等青年。在几次会见后，他从他们那儿知道，他们身后还有一些穆斯林兄弟，他们在几年前就有了一个秘密组织。这个秘密组织的基础是一个为了替兄弟会一九五四年的遭遇进行报复的敢死队组织。

“但是，他们读了我的书，听了几次会见中的谈话后，明白了报复的行动对伊斯兰的前途来说是无用的行动，伊斯兰制度的建立需要在培养和准备方面作长期努力，它不可能通过最高层的一次政变而到来。他们都相信了这些看法。但是，他们面对的问题是，一个建立在另一种思想基础上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了，他们不能去把这个组织解散，根据他们从我的谈话中理解的精神基础再去重建它，然而，他们认为，如果我能与他们一起努力去培训他们身后的穆斯林兄弟的话，他们是可以改变这一组织的思想的。

“在这时候，他们要求我只从思想上去领导这一组织，他们五个人负责具体领导，负责思想的转变工作。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光景，他们向我揭示了这一组织的性质。我了解到这一组织是由几个组织形成的。原先这些组织各自为政，后来在活动中有了接触，加强了彼此的关系，最后形成了以这五人为首的组织。”

有一次，赛义德还从阿里·阿西马维那儿了解到，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阿里·阿西马维在沙特时曾要求那儿的一位兄弟给他弄一批武器。后来他突然从这位兄弟那儿得到消息说，武器已搞到，将通过苏丹运来。赛义德就提醒他说，他们一致同意的总纲领是建立在“长期教育”的基础上的，但是，阿里却回答说：“他仍然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武器既然已运到，就一定要取出来，否则会使组织暴露。”经过讨论，决定还是把武器取出来，让阿里具体负责保管。

据赛义德说，当时“在几次会上，我们讨论了他们一再提出的一个

问题：在以我们一致同意的和平方式进行工作的过程中，组织一旦暴露，我们又遭到象一九五四年那样的痛苦时，我们该怎么办？”赛义德说，开初他的回答不是肯定的，但他已从他们的倾向中看出，他们是想回击侵犯，以避免再次发生一九五四年的事的。“我最后向他们说的意见是，只有在组织暴露的情况下，才可进行回击。”

在这个时候，兄弟会内部有一种认为搜捕已迫近的普遍感觉。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是已有以下迹象：一、从加纳梯尔牢狱中出来的兄弟会成员的几个小组对《道路上的里程》一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从而在政府面前暴露出兄弟会内部有许多不同组织的情况。二、一些谣言说共产党人企图把搞阴谋方面的罪责转加在兄弟会身上。三、一些青年对在政府面前暴露他们的活动问题掉以轻心，无所顾忌。赛义德说，他当时从穆尼尔·达莱和法里德·阿卜杜勒·哈利格那儿得到警告说，“有一些青年肆无忌惮地去搞危险的活动”，对这样的活动将会导致兄弟会普遍的灾难的担心已出现。他还从阿卜杜勒·拉扎克·胡维迪那儿得知，当局已知道这些活动，只是还没有发现他与这些青年的关系。这是因为“即使是在老兄弟会成员面前，我也不愿意暴露这一关系。我知道法里德教授是主张不要进行活动的一派，他的看法是，最好的组织形式是没有组织。”在五月下旬，穆尼尔又再次提出警告说，这些青年的活动已经暴露，他们在元帅办公室里就想动手打架。

这些因素促使兄弟会在定下了回击的原则后去讨论如何回击的问题。赛义德·卡特卜说：“在讨论中，艾哈迈德·阿卜杜勒·马吉德提出了暗杀和破坏的建议，并宣读了拟议中暗杀的名单：共和国总统，总理，情报局长，总调查署署长，元帅办公室主任夏姆斯·巴德朗。当艾哈迈德念到这儿时，我指出说，这些人就够了，能这样就是巨大成功了。于是，艾哈迈德就开始念要破坏的项目：开罗的两个发电站，开罗的桥梁。我记得当时曾有人起来插话，但已记不清插话的人是谁，可能是阿里·阿西马维。他说，这将会导致惩罚兄弟会的活动瘫痪，在广播方面和调动军队逮捕兄弟会成员方面造成混乱。为了加剧混乱，我还加上了一个项目：破坏穆罕默德·阿里水坝。然后，我问道：你们的实施手段是什么？

“据我所知，当时他们还没有足够实施这一计划的能力，没有足够进行爆破的炸药。在制造土炸药方面的试验还没有取得成功。但他们

说，他们有一支队伍正在进行这样的研究和试验。我问他们第一梯队的人数有多少。他们计算了一下，回答说有七十人。我从这儿得出结论：这个组织总共约二、三百人左右。当时，即一九六五年五月，我们一致同意的意见是，将对这七十人进行训练，以从事这一活动。”

然而，当局的搜捕活动业已开始。一九六五年七月，穆罕默德·卡特卜被捕，赛义德·卡特卜对此还提出了抗议。事情就取决于赛义德下命令了。但是，赛义德·卡特卜说：“由于他知道能力缺乏，准备不足，回击不会有成效，感到进退两难。”于是，他在八月四日给宰奈白·加扎里写了一封信，“要她让孩子们取消包括苏丹行动在内的一切行动”。宰奈白通过阿里·阿西马维带来口信问道：这样的指示是否是最后的指示，即使我们被发现也这样做吗？于是，赛义德·卡特卜修改了以上的指示，回答说：“在被发现的情况下，是可以回击的。但是，一定要到有能力进行全面回击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就取消以前所有的指示。”赛义德·卡特卜还说，他当时认为是他们无能进行全面打击的。

同年八月九日，赛义德·卡特卜被捕。由于当局还未掌握这一组织的确切情报，当时的一些搜捕活动是盲目进行的。然而，在两周后的一个偶然机会里，阿里·阿西马维被捕，承认了所有的一切，这一组织的所有成员都落入当局之手，重新出现了不亚于一九五四年所遭受的灾难。

結束语

总之，从对穆斯林兄弟会运动及暴力问题的介绍中，人们看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兄弟会与专制之间的独特的关系。兄弟会运动是在一九二八年作为一个纯粹的宗教运动而兴起的，是对当时侵入埃及东方伊斯兰社会的西方化运动的一个反应。但是，这一运动不久就从一种宗教的改良思想转变为建立伊斯兰政府、由伊斯兰全面控制宗教和国家、强调对伊斯兰祖国和民族的从属性的思想。因此，它与现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发生根本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当时它应该通过民主、议会代表制来实现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目的。这是它在开始时的方针。但是，兄弟会又发现，这个制度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种假民主制度，王室是一切权力

的源泉。

然而，兄弟会并没有投入反对王室强加的专制的斗争，并没有努力去开拓取得全民族信任的道路，让宗教去为自由和民主服务，而是在王室的影响下与王室结成策略性的同盟关系，来保护它的宣传不受专制的危害。同时，兄弟会还建立了自己的巡游队和秘密系统，以保障自身安全，并在条件成熟时能向政权猛扑过去，完成其对整个民族的思想教育。因此，它依赖暴力来达到其实现伊斯兰政府的目的，并以此区别于其他依靠群众斗争来实现政治和社会目的的民族、民主、进步力量。

象所有与专制的同盟一样，兄弟会也为其与专制的同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一九四八年，王室发现兄弟会已强大到可对其产生威胁的程度，就以解散决议毫不犹豫地给了它一个致命的打击。兄弟会以暗杀纳克拉西来作出回答，从而遭到了来自纳克拉西的继承人易卜拉欣·阿卜杜勒·海迪的骇人听闻的恐怖镇压，并发现暴力是无益的。

原来预料，兄弟会会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与一九五〇年掌握政权的、以华失脱党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结成同盟来共同反对王室。但是，在王室土崩瓦解的时刻，在全民族对王室表示不满的时刻，兄弟会却重新与王室结成同盟，从而证明它的制度、组织和思想属于同民主格格不入、与专制十分接近的另一种体系。

当“自由军官”组织向兄弟会提出结成同盟来共同推翻王室的要求时，兄弟会接受了这一要求。但是它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去建立一个摆脱王室统治羁绊的新的民主时代，而是要建立一个它所谓的纯洁、公正的专制。可是不久，兄弟会也明白过来，在所有的政治制度中是不存在什么纯洁、公正的专制的。在兄弟会企图对这样的专制进行控制时，遭到了强烈的抵抗。由于一九五四年一月的解散令，它再次付出了代价。

革命的分裂给兄弟会提供了考虑自己的错误，站到民主这边来的机会。但是，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一天时间。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是兄弟会历史上唯一为民主而进行斗争的一天。只过了一个月，兄弟会就抛弃了在三月危机里进行了英勇斗争的民主、进步力量，而与纳赛尔恢复了联盟，为纳赛尔提供了扼杀这些力量、强加自己的统治的机会。

为此，兄弟会又付出了代价。没过多久，盟友就迅速变为死敌。这时，兄弟会企图象一九四八年那样使用暴力。但是，刚迈出第一步就跌倒了。

鉴于纳赛尔政权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走上了对外摆脱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内摆脱资本主义剥削的道路，赢得了民主、进步力量的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社会中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并由于长期陷身于集中营和监狱之中而僵化。这时，纳赛尔政权也是处于奇特的矛盾之中：它在下层建筑方面通过摆脱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民生方面取得了成就；但是，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对支持它的广大群众实行毫无道理的专制和霸权，用法西斯的手段来领导社会主义试验。

然而，由于兄弟会并不承认纳赛尔政权在下层建筑方面取得的这些解放和民主方面的成就，必然会遭到其上层建筑中的法西斯统治的打击。纳赛尔政权的镇压，以及埃及社会由于害怕国家的权力而对兄弟会采取否认的态度，使得兄弟会的大思想家赛义德·卡特卜在监狱中创立了以《道路上的里程》这本书为代表的兄弟会的新思想。这种思想拒绝接受埃及现在的社会和现有的一切社会，把这些社会都看作是蒙昧社会。这一切并不象哈桑·班纳二十年代发起这一运动时那样，是出于对付西方化运动的一些社会原因，而是出于同信仰的僵化有关的一些原因。

关于眞主的神性和向眞主表示崇拜活动的信念，已不再足以把埃及社会变成一个穆斯林社会；而是必须否定眞主以外的人的统治权，必须否定人的统治者的一切偶象，否定人的统治权带来的一切制度、法律、价值标准、平衡、习惯和传统。因此，用法律来进行统治的伊斯兰社会就处于叛教社会的地位，尽管这个社会的人们嘴上说："万物非主，唯有眞主"，"穆罕默德是眞主的使者"，并进行礼拜、施舍、捐款，在斋月进行斋戒，尽一切可能去圣地朝觐。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暴力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来说，无疑具有普遍性。这就是哈桑·班纳时代、哈桑·哈提卜时代的暴力和赛义德·卡特卜时代暴力的区别。在班纳时代，使用暴力的范围狭窄，只局限在犹太人、英国人和统治者身上。在一九五四年的哈提卜时代，暴力局限于对付纳赛尔本人和一些革命指导委员会委员、内阁成员。但是，在卡特卜时代的暴力是针对偶象以及以这一偶象为主宰的整个社会。这是一种超出暗杀纳赛尔及其助手范围，走向全面摧毁发电厂、桥梁、水坝、电话等设施的暴力，即破坏蒙昧社会的暴力，这在兄弟会以前的计划中是从未有过的一种暴力。

就是这样，专制制度总是提供孵育极端的社会思想意识形态和暴力的适宜环境。

（原载埃及《鲁兹·优素福》周刊一九八一年　伏柏林译）

埃及面临伊斯兰挑战

《日内瓦论坛报》驻开罗特派记者　让—皮埃尔·阿达

【内容提要：埃及过去被解散的穆斯林兄弟会今天又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面貌出现，并和华夫脱党重新接近。】

宗教复兴

过去被正式解散的穆斯林兄弟会，今天在埃及的伊斯兰教内又以“原教旨主义”潮流的面貌出现了。

宗教复兴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爱资哈尔大学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学生；它在各省都设了分校，各省都创办了十来个古兰经系。每天都有新的清真寺建成。一年之内有十多万埃及朝觐者去麦加圣地。

开罗变成了穆斯林的大首都，街道上，每天五次响起从微型盒式录音机放出的叫穆斯林去做礼拜的呼唤声。在举行婚礼、葬仪时，有关家庭租用的扩音器里传来震耳欲聋的祈祷声，把街上车辆的噪音都压下去了。

每星期五，一千所清真寺挤满了信徒。象加扎利这样的著名“谢赫”的说教由广播电台广播，出租汽车司机停车倾听。这些“谢赫”揭露西方的干涉、道德松懈和穆斯林妇女违反教规的穿戴，尤其揭露“这个该死的西方文化，埃及社会应当摆脱它”。

他们的教义仍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教义，就是建立一个“完全的伊斯兰国家”，一种失去的天堂，这只能吸引穷苦群众，他们百分之七十都是文盲，除了信仰真主，别无其他依靠。

阿卜杜教长是位明智的宗教改革者，他认为伊斯兰教应当跟上时代，讲求理性。他的具有现代思想的、宽容的伊斯兰教，在所有那些公

开声明信仰“最高导师”的人的狭隘的、陈旧的观念面前退却了。

白酒离开“埃及航空公司”

在人民议会会议上，一些议员提出了一项关于酒店的法案，人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根据“沙里亚”（伊斯兰教教律）专门研究法律的修改问题。

萨达特总统在一九八一年十月遇刺前不久，不肯对下面这件事作出决断：埃及航空公司数千名职员中的四名职员要求以后飞机上不再供应白酒。开罗一个法院受理此案，判定这四个人有理。

埃及的航空小姐将不再给乘客送上贾纳克利斯村或法老岛产的酒了。开罗的一位讲道者满意地评论道，“在天上也不能不贯彻神律，因为埃及航空公司的每一架飞机上都总带着一部古兰经”。

在非穆斯林和具有现代思想的穆斯林看来，这是通过把穆斯林土地上历来有争议的那种伊斯兰教禁忌强加在埃及的基督教徒或外国人头上，来限制人们的选择自由。在伊斯兰教中，酒并不是坏事，因为它出现在安拉天国宴席的菜单上。

而且，埃航是埃及亏损最大的国家企业之一，它把喜欢吃饭时喝酒的西方游客运往尼罗河谷，从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大批法国旅游者得知埃航班机上规定用餐不许喝酒后，都说要重新审查他们同这家公司达成的协议。

穆斯林兄弟会和华夫脱党的重新接近

埃及社会被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慢慢侵蚀，这件事显得更为严重。例如，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不久前的非宗教党华夫脱党之间的引人注目的重新接近，就是以科普特人少数（约五百五十万人）再受屈辱为其特征的。

华夫脱党的一位杰出领袖、基督教徒易卜拉欣·法拉杰曾经说，华夫脱党的前领袖（在一九五二年革命之前）穆斯塔法·纳哈斯主张政教分离。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支持华夫脱党的议员萨拉赫·阿布·伊斯梅尔教长则指出“根据伊斯兰教教律，易卜拉欣·法拉杰提供的证据是无效的，因为他不是穆斯林”。华夫脱党让这位教长获得了胜诉，谁也不敢为法拉杰辩护了。

只要你在开罗居民区散散步，留心一下街上到处都有的书摊，就能看到盛行着一种奇特的文学作品。这种小册子的封面颜色总是很粗俗显眼。但它详细叙述了"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图拉监狱惨遭屠杀"的情景。一个象怪物一样的纳赛尔，残忍地咧着嘴，看着打手在拷打戴着镣铐的两个穆斯林兄弟，脸上露出狂喜的神情。这些小册子或者是叙述"伊斯兰解决办法之人——霍梅尼"的非常传奇般的生平。

这些出版物都提明是献给革命的伊马姆鲁霍拉·霍梅尼和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殉教的伊马姆哈桑·班纳的。

大学里的压力集团

开罗大学、明亚大学或赫勒万大学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身穿长袍，即所谓"伊斯兰服"，在亚历山大医学系，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学生穿长袍。他们并非总乐意穿它。这些大学生受到校内一些穆斯林压力集团的控制。

而且，"伊斯兰服"在商店里卖得很便宜，"原教旨主义者"给商店提供补贴，而欧洲式的外衣则贵得要命。据说留胡子的穷大学生甚至得到奖励。社会福利事业和互助系统都为戴面纱的女大学生和留胡子的男大学生运转。在亚历山大，小公共汽车把女大学生从家里送到大学，使她们的"穆斯林"羞耻心不致因男女混杂而受到损害。

考试复查是由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象在清眞寺里那样，姑娘们必须戴面纱。

基督教徒成了靶子

明亚大学发生了严重事件。在这所大学里，科普特人占百分之二十五（在全国人口中占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两个学生领袖被逮捕之后，原教旨主义者组织了激烈的游行示威，并且抓了二十七个科普特人作为人质。

在萨达特总统和六十四名公安人员在一九八一年十月遇刺后政府紧接着实行全国大搜捕还不到三年，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就重新采取行动了。复活节期间，在法尤姆省（位于开罗以西一百公里），谋杀、破坏文物、纵火不断发生，这个省在此以前一直未受到"伊斯兰毒素"的伤害。

一个新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组织“自省与沉思”组织，把法尤姆市的科普特族知名人士和商人当作靶子，该组织的十一个成员已经被捕。

据公安机关说，该组织放火烧了法尤姆的一家电影院，因这家电影院打算放映一部关于基督生平的影片；烧了一家书店和商店，因它们展出基督教的十字架和圣像；还烧了三辆汽车，其中两辆是科普特知名人士的。

该组织成员企图伏击一位科普特族律师，但最后失败了。该组织的人认为基督教徒是“大逆不道者”，“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及同他们来往的穆斯林叛教者的财产是合法的”。据内政部说，该组织是一九八〇年由一位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巴基创立的，企图通过攻击基督教徒来挑起教派纠纷。

政府对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的活动再度猖獗感到不安

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不光是在法尤姆省重新进行活动，而且到前人民议会议长苏菲·阿布·塔利布出生的这个省外广泛进行活动。在穆巴拉克总统要求下被解除职务之前，苏菲·阿布·塔利布曾是主张贯彻伊斯兰教教律的旗手。

自从四月初劫夺“圣战者”集团案（该集团三百零二名成员被控在一九八一年进行了艾斯尤特大屠杀）的物证（武器）以来，治安部队在全国的伊斯兰教徒中进行了大搜捕。在这次秘密大搜捕后，五十二人因属于“赎罪与迁移”这个极端主义组织而被控告。“赎罪与迁移”组织因一九七七年七月绑架并暗杀前宗教基金部长扎哈比教长而出了名。这个组织的许多成员当时都被逮捕，其创始人舒凯里·穆斯塔法同另外四位“埃米尔”于一九七八年三月被绞死。据埃及内政部长说，在最近被逮捕的五十二人中，有“赎罪与迁移”组织的刑满后被释放的老成员以及新成员。

治安部队“很认真地”对待伊斯兰教极端主义者重新猖狂活动的可能性。警方人士估计，自萨达特总统在一九八一年被刺以来，被检查院和国家安全法院起诉的穆斯林极端主义者（近六百人）只占这些组织成员的百分之二十五。

然而政府对伊斯兰教徒的斗争不只是治安方面的问题。在政治上，自从穆斯林兄弟会（萨达特总统为对付左派曾同它联合）重新和华夫脱

党联合以来，穆巴拉克总统的民族民主党(执政党)就对实施“沙里亚”（伊斯兰教教律）保持一定距离。

对于民族民主党来说，“除了有关商业和刑事法的某些细节（利益和体罚），伊斯兰教法已经实施了”。

穆巴拉克总统动员那些“温和的”或“忠诚的”教长在星期五的讲道中和在新闻媒介中谴责“宗教极端主义”。电视台两年来，每周有一个节目是让“乌勒马”（穆斯林法律师、神学家之意）和伊斯兰教教徒面对面进行辩论。感到吃惊的电视观众听见一位“留着胡子的人”肯定地说，他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得到了启示，而爱资哈尔大学的神学家们则否认他这种说法。

因此，象“赎罪与迁移”这样的一些秘密组织在城市中建立起来，在那里，青年人生活和结婚都严格按古兰经的规定办。这个组织和其他同类组织拥有大量的钱，因为它们买了许多一整套一整套的不动产。

“赎罪与迁移”组织的教义可概括为：世界是由犹太人和腐蚀埃及的美国人统治的。为了使现在的社会变质，就必须破坏它，办法是暗杀它的领导人和建立宗教组织。这种宗教组织就是企图破坏现制度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组织。

这个原教旨主义组织的首领之一是有当“最高导师”抱负的奥马尔·特勒姆萨尼。他是发行量达八万份的《呼声报》的社长。这个肥胖老头，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留着白络腮胡子，他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演说家，也不是煽动者。他一点也不象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据说，班纳演说时，“把听众的心抓在他的手里，到说教完了才还给他们”！

一个外国人如果追问奥马尔·特勒姆萨尼，想知道他对同以色列签订的和约的看法，他会拒绝回答的，因为他认为这件事只与埃及人有关，应在他们之间谈这个问题。相反，他广泛地赞成霍梅尼的主张。

（原载瑞士《日内瓦论坛报》一九八四年六月四日）

马格里布国家的原教旨主义者

【内容提要：下面两篇文章介绍了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情况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当局的态度。】

（一）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

《青年非洲》记者　让—路易·比歇

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机关报《行动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在《伊斯兰教：必须警惕！》的醒目标题下发表的一篇很长的社论攻击了“伊斯兰教复兴运动”的支持者。社论着重写道，“必须杜绝初出茅庐的人的捣乱行为，必须揭穿搞愚昧政策的人的骗局，必须揭露人们今天明目张胆地把一国人民的宗教信仰变为欺诈的手段，必须使这些扬着伊斯兰教的白帆，藏着颠覆企图的潜水艇失去作用。”

突尼斯社会主义宪政党党部主任穆罕默德·萨亚赫十二月十日曾说，“这个原教旨主义派打着宗教的招牌，干着破坏宗教和反对本世纪初出现的改良主义倾向的勾当，象布尔吉巴这样的一些人物就是当初改良主义的先驱。”

因此，当局在对这个运动的兴起长期保持沉默之后，决定要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交战。确实，十一月底，清真寺里的某些说教带有公开的政治色彩。伊斯兰大学生们在学校里也活跃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十二月七日，伊斯兰复兴运动周刊《社会》被勒令停刊了三个月。该刊主编拉希德·盖努希十二月二十日被预审法官传讯。

宗教浪潮……

《社会》周刊在一九七九年二月创刊之后不到六个月就发行了两万多册，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它以伊朗革命为例间接批评了现政权，认为现政权犯了忽视伊斯兰教罪。《社会》周刊在它的最近一期中还特别发表了伊朗代表团的一些成员的一篇访问谈话。伊朗由于受到阻挠，没

能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突尼斯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发言。在这一期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德黑兰大学生们撕毁美国国旗，和一些含蓄地赞成抓人质的评论文章。

这种霍梅尼主义的方针——它与官方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对照——以及对政权的攻击（攻击该政权犯了攻击齐图纳伊斯兰大学的大"罪"）显然是激怒了布尔吉巴总统。迦太基宫人士认为，"过分了，太过分了"。总统在揭露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报纸都是在党的印刷厂印刷的这个丑闻之后，就此责备了萨亚赫。随后，社会主义宪政党的这位党部主任在十二月第一周宣布他接到了国家元首关于要开展进行解释和澄清的宣传运动的指示。

伊斯兰领导人的反应是：屈从，以免发生各种挑衅行为。在此之前，各清真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人们都全神贯注地倾听象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哈桑·古德巴尼或阿卜杜勒·法塔赫·穆鲁这样的教士的说教。

比阿尔及利亚政权和摩洛哥政权还要公开"现代主义"的突尼斯政权，对这种宗教复兴运动也采取了一种更坚决的原则立场。但在阿尔及尔就象在拉巴特或卡萨布兰卡一样，伊斯兰教的流派都是老牌号，而且规模大。象在突尼斯一样，人们今天也注意到这些运动在兴起，而且还伴随着人民的信仰正在恢复。象在穆斯林世界的其它地方一样，在伊斯兰教历十五世纪初的今天，要把宗教浪潮、伊朗动荡的影响和政治争论区别开来是很困难的。然而，人们到处都可看到，官方对伊朗或对执行伊斯兰教规的态度和一部分人民对伊朗或对执行伊斯兰教规的感情两者之间是有距离的。

宗教狂热和社会向往正在成为"伊斯兰战士"手中合而为一的武器。

政治争论

比如在阿尔及利亚，就不存在突尼斯那种公开活动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但自从一些时候以来，特别是在斋月前夕做礼拜时，涌入清真寺的青年异乎寻常地增多。人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穿着一种埃及服装——一种在阿尔及利亚所没有的白色长袍，作为宗教的象征。这个运动已发展到了中学。在许多学校中，一些平时不大遵守教规的高年级学

生，强迫教师在做礼拜时停课，以便使那些想做礼拜的学生能去清眞寺或到为礼拜而布置的一个大厅里去。

某些人甚至看出了这种宗教运动对最近发生的罢工运动（十一月底开始，持续到十二月二十日）的影响，阿尔及尔大学的法学系和经济系的三千名阿拉伯语学生抗议对他们精通两种语言（法语和阿拉伯语）的同学不给出路的做法。他们在本阿克隆大学城的墙上曾写过，“阿尔及利亚难道是法国的一个殖民地吗？”

大学生的骚乱甚至险些走向象伊朗危机那样的反美示威运动。因此人们可能会担心，原教旨主义者会动员一部分青年起来反对一个把伊斯兰宣布为国教，而又不实行政治生活眞正伊斯兰化的政权。

谨慎的镇压

邻国摩洛哥的情况也不例外。本刊下面一篇文章的特派记者穆罕默德·塞勒哈米报道了原教旨主义者在哈桑二世的国家中的推进。政权对此感到不安而又不敢采取象突尼斯采取的那样坚决的立场，而似乎是走上了谨慎镇压的道路。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这个运动发生“政治”泛滥。因为，在摩洛哥，比起在突尼斯或阿尔及利亚来，各大城市中心以外的社会伊斯兰教的烙印依然很深。

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大部分是逊尼派，被看成是较之伊朗的什叶派更加循规蹈矩的。而当德黑兰、伊斯兰堡和麦加都在动的时候，大家能够想象马格里布会站在旁边看热闹吗？尽管情况不同，但今天在阿尔及利亚，如同在摩洛哥或在突尼斯一样，人们都会发现一个西方化了的特权阶层，他们对危及他们生活方式并往往危及他们特权的运动表示不信任。

阿尔及尔、拉巴特和突尼斯的领导人曾放手让一些宗教思潮发展，这些思潮曾被看成是对政治化的一种限制和对政权实现稳定的一种保证。今天他们才吃惊地发现持异议的伊斯兰教的活动能量。

（原载《青年非洲》周刊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摩洛哥“兄弟会”

《青年非洲》记者　穆罕默德·塞勒哈米

贾瓦德今年十九岁，但由于留着一脸蓬乱的胡须，看上去好象三十来岁了。从大学预科毕业之后，他在卡萨布兰卡学院专攻法律。贾瓦德的古怪不在于他的胡子，而在于他的行为。每当他遇见某人时，他都要向他背诵几条他根据一种令人吃惊的注释翻译出来的古兰经："眞主禁止酗酒、赌博、吃猪肉……为什么不服从神法？"

说到这里，什么也不要再说了。过去，总有那么一些年轻的或不那么年轻的原教旨主义者要保护古兰经的教义，但是很少有人听他们的，也很少有人害怕他们。但贾瓦德不只是宣扬这些禁令，他在对古兰经的解释中走得很远很远。比如，他谴责社会上的非正义，并呼吁人们起来造反。他还作一些危及摩洛哥政治制度的分析。"我们的土地是伊斯兰教的土地。全民族都应该得益于这块土地。并沒有明文规定有的人可以占有成千公顷的土地，占有房屋和河流，也沒有规定另一些人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找不到"。贾瓦德还指名道姓地说到一些负责人："必须结束他们的暴行。眞主将帮助我们反对他们……"

穆斯林兄弟会

贾瓦德住在卡萨布兰卡的一个叫奥瓦西的居民区。他的父亲是某建筑公司的高级干部。这些穆斯林兄弟们可能也是来自资产阶级知识界。他们到处可见，不仅在卡萨布兰卡，而且在这个王国的所有城市都有。他们有数百人，也可能有数千人，谁也沒法计算他们的人数。他们每天都要出现：他们的"招募"是容易的。贾瓦德告诉我们，"眞主的话无需费力就能使人信服，它是一种信念"。

请注意那种冒险要阻止穆斯林兄弟传道的人。因为某些人什么都干得出来的。许多摩洛哥人还记得社会主义党党员奥马尔·本·杰隆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卡萨布兰卡被暗杀的情景。他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成员，该兄弟会的许多人曾声称是受谢赫·穆提保护的，此人是摩洛哥人，当时在沙特阿拉伯避难。但摩洛哥还有另一些著名的谢赫·穆提，如教育监察员阿卜杜勒·萨拉姆·雅辛，他曾给国王写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呼吁君主国要更多地尊重伊斯兰教的教规。谢赫·雅辛曾被投入监狱，后来又被释放。现在他在马拉喀什出版一种叫《共同体》的杂志。

恢复真实性

这些穆斯林兄弟大部分是从穆斯林法学院或从世俗大学毕业出来的大学教员。某些人甚至是从西方学校毕业出来的。他们都在为恢复伊斯兰教的眞实性而斗爭，所以他们拒绝“一些非穆斯林人发明的”消费产品（电视、电影、跳舞厅……）。贾瓦德对我们说：“所有这些东西都可能妨碍人类信仰眞主和相信天地永恒。请看西方那种生活方式把人引到了什么地步，卖淫、行贿、偷窃和自私自利。”

贾瓦德把我们带到了卡萨布兰卡郊区的一座清眞寺——前欧洲人和犹太人的领地——那里的一个教堂已经变成了清眞寺。伊马姆在谈他对这一改变的反应时说，“有什么关系呢，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眞主的房子。”在这座阴森、冰冷的清眞寺里，四十来名信徒正在举行昏礼。他们齐声反复朗诵，“眞主最伟大”。

五分钟之后，他们面向伊马姆围成半圆圈坐下。在近一小时内，这位伊马姆进行说教和背诵关于人类的不公正的圣训。谁也沒有动弹一下。说教完全是政治性的。大家以为自己仿佛是在一名猛烈攻击政权的反对派议员面前。只有一个人得到了优待，那便是国王。这不是一种遗忘。接着伊马姆就向我们解释，他的国王是一位很关心伊斯兰教的人。“他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批评他，就是损害了先知的家族”。相反，伊马姆特别怨恨国王周围的某些人，其中包括一些部长，“他们是国王的坏参谋”。

这位伊马姆幷沒有被地方当局排到危险人物之列。有些伊马姆，人数确实不多，比他要危险得多。因为他们攻击国王。一个高级政治负责人对我们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本不存在那种侮辱国王本人的狂热分子。”

能阻止这种现象发生吗？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当局决心要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以前，当局曾非正式地保护过穆斯林兄弟会！现在由于搞民主试验，当局担心他们会组成一支联合力量。国家所面临的这种危急的社会局势可能会促进他们的发展。不太政治化、但十分关心宗教的摩洛哥人对涉及伊斯兰教的任何宣传都是特别敏感的。这也说明了穆斯林兄弟会招募信徒为什么那

么容易。他们无需求助于霍梅尼主义。而且，同什叶派的伊朗相反，摩洛哥是属于逊尼派。

（原载《青年非洲》周刊一九八〇年一月二日）

塞内加尔的穆斯林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　法赫米·胡韦迪

【内容提要：四百万塞内加尔人中有百分之九十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集中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大多数穆斯林属苏菲派的四个派别，其中蒂贾尼派有二百万人，穆里德派有一百五十万人。

穆里德派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非洲教派，是非洲土生土长的。该派还是一支令人瞩目的经济力量，塞内加尔最富有的人都在这一派。

除了苏菲派的各教派外，还有一些信奉另一种伊斯兰的据点。一种在路线与成员方面均同苏菲派各教派毫无联系的伊斯兰正悄悄地存在于塞内加尔。

此外，还有一股潮流，推动它的是某些狂热地信仰宗教的宣教者和号召者。这些人还致力于拒绝苏菲派各教派的教规，反对标新立异。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达喀尔。】

外来的人如果呆在达喀尔，必然会如堕五里雾中，因为他只能看到实际情况的一个方面。如果他涉足首都以外的地方，他就会在所到之处遇到各种教派。

塞内加尔和世俗主义

开始，法国人说塞内加尔同法国一样，是个世俗国家。在那里，宗教存在于教堂里，存在于人们的心头，跟普通人无关。宗教是宗教，国家是国家。尔后，他们搬来了基督教的模式，把它原封不动地应用于塞内加尔的穆斯林社会。就象基督教徒那样，虽然同属一个宗教，但有众多的教派，每个教派有自己的教堂和领袖。他们对伊斯兰教作了下述设

想：让所有人都成为穆斯林，不反对他们信仰马立克教派，但是，让穆斯林分成四个为政府所承认并同它们打交道的派别，这四个派别均为苏菲派系统的主要流派，每一派有一个“大主教”，叫做“总哈里法”。总哈里法下面是一些哈里法——小的大主教，但他们须得到那个总哈里法的承认。总哈里法在本派的传统和惯例所确定的各种时日组织宗教庆祝活动，政府应派代表参加这些活动。

这是宗教同国家联系的唯一桥梁。除此而外，就各司其职，哈里法领导教派，政府从政。

按照“世俗主义”的逻辑，在公立学校里，伊斯兰文化不再有任何地位。根据同一逻辑，伊斯兰活动被排除出政治行动的范畴。

左的和右的政治团体名目繁多，但国家禁止建立任何伊斯兰集团，因为这是世俗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在独立以后的二十年里，即在桑戈尔总统执政期间，一直禁止在学校里讲授宗教课程。在那个时期里，实现这一愿望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要求。桑戈尔离职仅二十天后，在新总统迪乌夫——他是一个法国教派的穆斯林——统治下，已第一次决定小学开设宗教课。

伊斯兰教徒的分布情况

四百万塞内加尔人民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占百分之九十三，信奉基督教的百分之五，多神教徒占百分之二。穆斯林集中在北部、东部和西部（同北非和海岸毗邻的地区）。基督教徒在沿海（殖民主义势力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圣路易和戈雷岛）。多神教徒在森林密布的南部，那里居住着塞雷雷部族和下卡萨芒斯人。伊斯兰教正在逐步渗入这些人中间，特别是，皈依伊斯兰教的沃洛夫部族住在塞雷雷部族四周，从而提供了长期接触与影响的机会。

同北非穆斯林一样，塞内加尔的穆斯林信奉马立克教派。

如果说马立克派是主要教派，那么，黎巴嫩移民则带来了什叶派。在塞内加尔的黎巴嫩人估计约有三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穆斯林。他们大多数来自黎巴嫩南部，属于什叶派。此外，移居塞内加尔的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还带来了卡迪尔派的思想，他们曾试图在达喀尔为自己建立一个中心，但有关当局拒绝了他们的要求。特别是沙特的伊斯兰联盟在一项著名的声明中，宣布这些人违背伊斯兰教义。

大多数穆斯林属于苏菲派的四个派别，按照在塞内加尔出现的先后，它们是：卡迪尔派、蒂贾尼派、穆里德派和拉希尼派。每派有一个总哈里法。虽然这并不妨碍在一派内有其他哈里法；然而，政府只同一个人打交道。

这些派别选择了自己的“首都”，在塞内加尔概况介绍中，它们也仿效什叶派的圣城把它作为圣城。这些首都的情况如下：图巴市是“穆里德派的麦加”，库里克市是“尼辛派（蒂贾尼派的一个支派）礼拜者的正向”，安贾桑市是卡迪尔派的“天房”，贾尼贝市是蒂贾尼派另一个支派的“麦加”，图瓦顿市则是追随马立克·西派（它是蒂贾尼派信徒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一个支派）的人的大本营。

塞内加尔居民的百分之五十属于蒂贾尼派（约二百万人），穆里德派占居民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一百五十万人），卡迪尔派有二十五万人，拉希尼派只有三万人。

这意味着，蒂贾尼派和穆里德派起着主要作用。但是，有人评论说，“如果说蒂贾尼派人数最多，那么，穆里德派则最强大。”

具有高贵的宗教身份的人总是居于前列

尽管分成这么多派别，但我们可以发现塞内加尔穆斯林的一些共同的传统与习惯。有一些所有人都承认的节日，首先是宰牲节、开斋节、先知诞辰和阿舒拉节，此外，还有各派自己的节日。

具有高贵的宗教身份的人组成的阶级居于社会阶梯的顶端。这是令人大为迷惑不解的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知道，西非从前的国王们都竭力强调家族渊源，以便加强他们在穆斯林中的地位。

苏菲派和多神教徒

在西非同阿拉伯以及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大多数联系中断后，在后来殖民主义进行封锁、切断尚存的那些纽带的漫长世纪里，穆斯林同多神教徒共处，双方互相影响，多神教徒的某些传统渗入了穆斯林的信仰。

苏菲派是穆斯林和多神教徒进行这种混合的最广阔的舞台。我们应该公正地说，是苏菲派保护和捍卫了西非的伊斯兰教。在西非同北非以及阿拉伯世界各地的联系中断后，他们曾保护了这个宗教和阿拉伯语，苏菲派的各个教派命定成为承担那种历史责任的唯一的伊斯兰组织。

卡迪尔派捷足先登

从历史上看，卡迪尔派是塞内加尔最早的一个苏菲教派。该派的创始人是公元五六一年死于巴格达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公元十五世纪传入西非。现在，塞内加尔卡迪尔派的哈里法名叫叶海亚·昆提（五十五岁），他的总部在达喀尔东北九十公里的阿贾桑镇。

我问昆提，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卡迪尔派的信徒。他说，主要条件是此人系穆斯林。我说，这恐怕不够。他说，有一些不能言喻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断祈祷和做礼拜，他的心里就充满光明，就有资格加入卡迪尔派。

我向他询问卡迪尔派同蒂贾尼派的区别。他说：问题只是人不一样，内容是相同的。

在蒂贾尼派总部

当我对陪同人员说我想会见蒂贾尼派的哈里法时，他问我：你要找哪个哈里法？我后来了解到，蒂贾尼派是唯一有几个哈里法的教派，哈里法的数目多达六个。当然，我们先找总哈里法阿卜杜勒·阿齐兹·西，他是政府所承认的蒂贾尼派的“合法代表”。他给其他哈里法颁发书面许可证，允许他们对信徒们行使自己的使命。

如果说卡迪尔派在公元十二世纪创始于伊拉克，十五世纪末才传入塞内加尔，那么，蒂贾尼派则在十八世纪创建于阿尔及利亚，几十年后即传入塞内加尔和西非国家。这两派在塞内加尔的势力都大大超过它们在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的势力。

蒂贾尼派领导人中的佼佼者

易卜拉欣·尼亚斯属于蒂贾尼派领导人中的佼佼者，他是在非洲宣传伊斯兰教的先锋之一。一九四五年，他建立了“宗教支持者协会”，该会的活动扩展到了马里、尼日尔、加纳和毛里塔尼亚。

也许，尼亚斯家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在一九六一年创办了“库勒哈伊斯兰学院”。这所学院现有八百名塞内加尔以及来自其他八个非洲国家的学生。他们学习小学和预备学校的课程。它的毕业生在塞内加尔

国内沒有任何深造的机会，因而不得不指望阿拉伯各国的奖学金以实现这个希望。某些毕业生长期等待仍得不到此种奖学金，其中有的人就徒步前往利比亚、阿尔及利亚或埃及，试图进入那里的学院。

穆里德派的作用

有人把穆里德派称作“涂上沃洛夫部族色彩的伊斯兰教”。塞内加尔前总统桑戈尔说过：假如我是穆斯林，我就是穆里德派信徒。

桑戈尔的说法以及他对穆里德派的赞赏与热情是基于下述想法：穆里德派是一个百分之百的非洲教派，既不象卡迪尔派是从马什雷克引进的，也不象蒂贾尼派是从马格里布引进的；它是非洲土生土长的。

这个国家大多数政治领导人虔诚地信仰穆里德派的哈里法。现任总统阿卜杜·迪乌夫从当总理时起，就每三个月在“哈里法宫”拜会哈里法一次，同他呆上一整天。

他们还是一支令人瞩目的经济力量。最富有的人都在他们中间，包括塞内加尔的第一号富翁基比和第二号富翁吉拉·米。基比拥有半个达喀尔，他向哈里法的事业捐款动辄以百万计。吉拉·米为一些最重要的企业，即其他小商人提供资金，这使移居来的黎巴嫩商人不得不适应潮流，在他们的商店里挂穆里德派领袖的像，以表示忠诚，吸引顾客。

在生产企业中工作的人大部分是穆里德派信徒，因为该派的原则包括两部分：擢升与劳动。信徒们中间，有的步步高升，有的从事劳动。

他们是一支有组织的强大力量，因为他们积极地在各个单位组织“穆里德集团”，除了达喀尔大学的穆里德学生联合会外，在工厂和各部也有类似的集团。

当哈里法想建设一个项目时，不管这个项目是属于经济方面的，还是建筑方面的，也不管费用多么庞大，他只要通过电台宣布一下，一批又一批的信徒就会响应号召，出钱出力。

有鉴于此，政府同该派打交道特别谨慎，以至当法国《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一组该派认为是丑化它、玷污它的名声的有关穆里德派的图片时，政府毫不犹豫地派遣一个代表团去向它的哈里法表示遗憾与歉意。

鞠躬尽瘁的长老

他们的长老是艾哈迈德·比姆巴·艾姆贝克·东·穆罕默德。他生

于一八五三年，一八五五年前生活在艾姆贝克·布勒村，这个村庄是他的祖父在一七八九年建立的。

艾哈迈德·比姆巴长老正好出生在法国开始对塞内加尔正式殖民的时候（一八五四年），法国竭尽全力征服进行抵抗的南部，首先是消灭当时反抗殖民主义进军的那些分散的王国的领袖。

他开始是卡迪尔派。他到了毛里塔尼亚，在那里向卡迪尔派长老赛义迪学习。他在毛里塔尼亚还学习了沙兹利派和蒂贾尼派的一些基本原则。

约在一八九三年，这位鞠躬尽瘁的长老试图建立一个自己的教派。为此，他采纳了自己从卡迪尔派、沙兹利派和苏努斯派中汲取的所有基本原则。

他对法国占领的立场是十分温和的。当时，有人告诉他自己将去同法国人作战，他的回答是：我相信，是真主派这些人来对我们国家进行殖民的，你如果同他们作战，就是鼓动人们无谓地杀戮。他们活着，就会皈依伊斯兰教。

他的这种立场并没有给他带来宽宥，因为法国人担心他的影响扩大。阴谋分子对他施奸计，于是，法国当局决定把他流放到加蓬。在流放他的决定中，没有提到他对占领者的立场，只是说让艾哈迈德·比姆巴离开塞内加尔，在象加蓬这样的一个遥远的国家至少软禁几年，在那里他的带偏见的训诫不会起任何作用。

这项决定是一八九五年九月五日颁布的。一艘轮船把他送往加蓬。

艾哈迈德·比姆巴在那里度过了大约七年时间，直到一位毛里塔尼亚的苏菲派领袖为他说项。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八日，他回到了祖国。

但是，过了半年，法国总督指控他破坏公共秩序，于一九〇三年六月十三日把他驱逐到毛里塔尼亚。他在那里度过了四年，于一九〇六年底回国。

一九一二年，法国当局允许他迁居古尔比勒。法国总督写道："在艾哈迈德的著作里，我没有找到任何同宗教偏见特别有关的内容，也没有任何反对我们的内容。"

艾哈迈德在古尔比勒住了整整十五年，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九日溘然长逝。他留下了一批诗，他的信徒们时而说有七箱子，时而说有七百公斤重。"至于他的藏书，则汗牛充栋，光是古兰经就占了一大间房子，

其中手写的古兰经有八百部。这位鞠躬尽瘁的长老酷爱古兰经，按照他的旨意，人们用三天时间就抄写一本古兰经！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他留下了一个羽毛丰满的教派。这个教派的教义广泛传播，它不仅在精神上，而且也在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艾哈迈德·比姆巴在他在世的最后十五年里，有机会实践他关于强调劳动的想法，建立了一些农业封地，信徒们在那里劳作，取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然后把其余的收获用于其他活动，包括购置和开垦新的土地。

艾哈迈德长老还留下了他在一八八七年建立的那个叫作图巴的村庄。这个村庄后来成了穆里德派的首都，在塞内加尔的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救世主书店

我们从达喀尔出发，驱车一百四十五公里，抵达阿尤卜·图巴。

我们乘车经过了一大片由于干旱而龟裂的土地，树叶变成了一片焦黄色，几头瘦骨嶙峋的牲口散落在各处。只有树干粗壮的猴子面包树巍然挺立，仿佛是想成为塞内加尔生命长在的象征。

在图巴附近，地面上显现出一条铁路线。陪同人员告诉我，这条铁路是专门为运送参加庆祝活动的信徒们修建的，特别是在穆里德派的最大节日——纪念一八九五年九月五日艾哈迈德·比姆巴长老被流放的日子。同蒂贾尼派庆祝先知诞辰一样，对穆德里派来说，比姆巴长老第一次出走纪念日是最重要的节日，其次是他逝世纪念日（伊斯兰教历一三四六年一月十九日）。

在纪念第一次出走日时，塞内加尔全国各地的生活陷于停顿，政府各部不上班，工厂、商店，甚至首都的出租汽车都停工停业。国家瘫痪一、两天，几十万穆里德派穆斯林携带妻子儿女前往图巴，图巴城呈现出一副末日的景象。所有人都是哈里法的客人，虽然许多人切望在这个城市里拥有房子。这引起了建房热，现在每天盖房超过十间。

我们经过一条宽阔的街道，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出售各种食物和衣服。在一个地方，有人令我们以及走在前面的一列汽车停下来。我了解到，汽车要接受检查，禁止香烟和含酒精的饮料带入。

汽车在一个大广场上嘎地停住了。那里人声鼎沸。哈里法有不受政府管辖的私人卫队。我们先经过了警卫室，然后，在我们脱鞋后把我们

送到一块有顶棚的宽敞的沙地上。沙地上是东一堆、西一堆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站着，手里拿着比姆巴长老的小册子，他们中间有的人在高声朗诵；有的人坐着，同他们比谁的声音高昂有力。在四周角上，站着各种年龄的人——老人、青年，男人、妇女。蓦地，陪同人员象挨了蝎子蜇一样，拉了一下我的手，指着远处的一个角落，说：这就是哈里法。我想上他那里去，陪同人员一把拽住我说，事情不这样简单，我们应该首先征得他的同意。陪同人员朝着他走去，走到离他不远的地方，双膝跪下，小心翼翼地爬行到他跟前。哈里法沒有理会他，而是继续听他的信徒们站在远处小声同他谈话，其中有一个人爬上去。如果他能有幸吻哈里法的手，就不胜荣耀；假如由于哈里法周围的人太多，沒有机会这样做，他就一直呆在那里，双眸充满了期待的神情，希望能有机会吻哈里法的手。

哈里法阿卜杜勒·艾哈德·艾姆贝基盘腿坐在沙地上，他头上包着一块缠头布，身穿兰长袍，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眼镜，胸前挂着装在皮套里的穆里德派的护身符。

最后，陪同我的人鼓足勇气同哈里法搭话，凑在哈里法耳旁悄悄告诉他这件事情。随后，他带着哈里法的指示回来了：我们先吃饭，然后再同他会晤，会晤结束后将安排我们参观图巴市容，特别是清真寺、书店和大学工地。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位青年，他是哈里法家族的成员，名叫穆斯塔法·艾姆贝基长老，他通晓阿拉伯语。他陪我们用了两个小时在城里观光。他遇到的每个人都向他问好，俯身吻他的手，用他的手擦拭自己的前额。我了解到，这是对比姆巴长老家族所有成员的传统礼节，表示信徒们的忠诚。他们沐浴着长老的恩泽，而长老的这种光华代代相传，一直传至他的后代。

印刷厂和书店印刷穆里德派的学生抄写的古兰经以及艾哈迈德·比姆巴长老的书。长老的书印刷数量甚巨，十分畅销。

除了穆里德派的古兰经和这一派的长老的书外，这家大书店的书架上沒有一本超出这个范围的书。穆斯塔法长老告诉我，这家书店里有十万册书。

面见哈里法

午饭后，我们应邀去见哈里法。

他在我脑海里的形象仍受到我在达喀尔听到的关于他的传闻的影响。他是一个执拗的、个性很强的人，对他的信徒极有影响，对国家敏感的神经中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了如指掌。他貌不出众，生活简朴。但是，他不是无用之辈。有人说，一九八〇年穆里德派同蒂贾尼派信徒之间的一场摩擦有可能导致内战，而这场摩擦的起因同他有关。他采取了一种显示力量与影响的做法，但他在适当时候——事情恶化前——同国家以及蒂贾尼派的哈里法携起手来，控制局势，从而使这场危机和平地过去。

我们光着脚经过几条胡同，来到了阿卜杜勒·艾哈德·艾姆贝基面前。他随便地坐在地上，背靠一张大床，包头布已换成了一顶黑色呢帽，鼻梁上仍架着一付黑色眼镜，他的小胡子中已出现稀疏的白须，使他更加威严持重。

他友好地接待我们，通过翻译问我们：你们想了解什么？

他在回答问题时说，他把自己的一生用于为伊斯兰服务。在这方面，他有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兴建大学是眼下他的几个主要目标之一。

我问他对塞内加尔穆斯林的状况有何看法。他说，重要的是信仰，它同政治无关。

在回答另一个问题时，他说，他关心塞内加尔在物质方面的发展，而信仰和精神方面的发展是基础。

关于穆里德派同苏菲派的其他教派的关系，他说：没有误解，也没有分歧；同时，也没有时间接触和建立联系，各派都忙于自己的事情。

我向他问及穆里德派的活动，他说，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启迪人们，使他们对宗教和认识真主感兴趣。

在教派的大墙外面

以上讲到的是在塞内加尔得到认可的四个伊斯兰组织。法国殖民主义曾竭力巩固这些组织，把伊斯兰的活动完全纳入它的范围。但是，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塞内加尔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各个教派的作用和影响只是现实的一部分，即呈现在台上的那一部分。

在塞内加尔，伊斯兰一直是超越各个教派长老的权力和影响的。如果说各个教派有自己的笔杆子和活动中心，那么，它们的控制并没有遍及所有居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所有相信真主的人。在苏菲派的各个教派

在大街、清眞寺和学校所控制的据点外面，还有一些信奉另一种伊斯兰的据点。

在殖民当局不同程度的鼓励下，苏菲派的一些教派曾控制了老百姓，但是，六十年代初独立后，整个这种逻辑已开始逐步改变。这不仅是由于殖民统治已正式宣告结束，还因为在最近二十年里发现了几代受过教育的人，随着他们的出现和成长，塞内加尔舞台上出现了许多变化，从而有助于制止和纠正以前某些宗教领袖所采取的某些越轨行动，也导致了这些人中独立思考者队伍的扩大。这一切缩小了各个教派的人士的影响。

一种在路线与成员方面均同苏菲派的各个教派毫无联系的伊斯兰正悄悄地存在于塞内加尔。它的活动有限，没有组织，活跃在正式舞台下。因此，第一眼看不到它，认不清它的面貌。

表明这种存在的是，在塞内加尔农村，有一种教小孩阿伯拉语和古兰经的小学校或私塾，管理这些学校或私塾的男人和女人，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属于各个教派，而是由当地居民在每个收获季节结束时给他们发工资。

除了这些学校或私塾外，一些受过教育的人纷纷在塞内加尔各地建立伊斯兰文化协会。这些协会的联合会在首都成立时，参加的有各地区的四十个协会，至今还有一些协会沒有宣布加入这个联合会。

伊斯兰文化联合会

这个联合会的起源要追溯到五十年代。当时，一些关心国事的塞内加尔青年在阿尔及利亚开会，他们是被自己的家族派遣到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开罗留学以学习他们在塞内加尔学不到的语言和伊斯兰法律的。在他们一九五一年的会晤中，他们在两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一、苏菲派的各个教派当时被认为是殖民主义得心应手的工具；二、这些青年必须选择一种行动方式，这种方式要打破殖民主义设置的、对抗伊斯兰活动的框框。

第二年，他们在达喀尔聚首，决定建立“伊斯兰文化联合会”，该会于一九五三年四月正式宣布开始活动。一开始，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采取行动：一方面，在农村建立“茅屋学校”，教小孩子学语言和伊斯兰教义，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们在各个地区宣传自己的主张，募款建立那些简陋的学校；另一方面，加入以非洲独立党为代表的主张独立的力量。

正如伊斯兰文化联合会主席艾哈迈德·伊亚努·提沙姆所说，这样，这批青年发现自己正在两条战线上苦斗：指责他们企图越过各个教派独立行动的苏菲派各个教派人士；被他们参加非洲独立党所震惊的殖民当局。

殖民当局颁布了一项决定，封闭文化联合会青年建立的“茅屋学校”，并认为这些学校的活动是非法的。

当时，伊斯兰文化联合会的活动沉寂了多年。独立后，该会领导人另辟蹊径，让苏菲派各种流派领导人的子女参加这个联合会，这些人中间的大多数是受过教育的，他们年轻，因而易于接受伊斯兰文化联合会提出的某些思想。他们程度不同地欢迎涤除宗教所附着的迷信与瑕疵的想法，其中有的人还同文化联合会的青年一起参与批评苏菲派各种教派人士种种玷污伊斯兰的行径。

就这样，一九六二年，由六个协会组成了伊斯兰文化协会联合会，领导这个联合会的是蒂贾尼派的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长老。但是，各个教派领导人的子女未能为使联合会的使命取得成功做出贡献，这要么是由于高级领导人的压力，要么是由于他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关心自己所属的教派的事情。

纵然如此，联合会的存在本身也鼓励其他人以另一种方式重新进行这种尝试，而又不重犯联合会所犯的错误。这就是“伊斯兰文化复兴协会”现在试图做的事情。他们也是一些阿拉伯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正以更快的步子、更大的热情展开活动，他们实践的时间还不足两年。除了复兴协会外，还有其他几个协会，正朝着同样的方向前进，企求实现同样的目标。

除了这些人外，还有一股潮流。在这股潮流中，知识分子不起重要作用。推动它的是某些狂热地信仰宗教的讲道者和号召者。这些人还致力于拒绝苏菲派各个教派的教规，反对标新立异。他们受到瓦哈比派（瓦哈比派是伊斯兰教的一派，教规比较严格，如规定信徒必须做祈祷，不得饮酒抽烟等，沙特主要信奉该派。——编者注）教规的很大影响，瓦哈比派教规是通过前往沙特朝觐的人（每年平均四千人）传到塞内加尔来的。这些人组成一个未加宣布的、叫做“安乐协会”的团体，他们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达喀尔，政府当局对它们的情况了解甚详，他们讲经和聚会的清真寺也是众所周知的。

（原载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一九八二年二月　沈肇读译）

苏联的穆斯林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特约记者

【内容提要：苏联穆斯林现在占苏联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六，到本世纪末可能占四分之一。在苏整个南部边境，穆斯林和土耳其族的势力越来越大。本文作者认为这给苏造成两个问题：一、在经济方面，穆斯林不肯到西伯利亚去开发资源，如果转移财力到穆斯林多的共和国兴建工业，又将引起欧洲部分的不满；二、在政治方面，穆斯林的团结、自信以及与苏接壤国家中伊斯兰教的复兴，必然使苏领导人不安。】

事物并不总是只要又大又多就是幸事。苏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给它带来了很多好处。一件不那么清楚是否值得庆幸的事情是：苏联是穆斯林人口居世界第五位的国家。这可能有助于苏联国际旅行社吸引身上带着钞票想一睹撒马尔罕的金顶教堂或帖木儿之墓的游客到苏联中亚地区旅行。但是，苏联政府已经开始提心吊胆了。

苏联的大约四千三百万穆斯林是一批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悠久灿烂的历史传统，有丰富的土耳其文化——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认为自己比苏联人口的核心俄罗斯人要优越。穆斯林大部分居住在苏联南部的六个加盟共和国：中亚的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以及哈萨克大草原的阿塞拜疆和北高加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斯大林从克里米亚放逐出来的鞑靼穆斯林现在主要居住在俄罗斯中部的喀山一带。

虽然苏联的穆斯林在地理上被分为许多民族，各有各的文字和政府，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土耳其文化（百分之七十的苏联穆斯林是土耳其族，语言十分接近）和共同的历史传统，这有助于形成高度的穆斯林团结。除了阿塞拜疆的四百万阿塞拜疆伊斯兰教徒，中亚局部地区的十二伊马姆派和帕米尔的大约七万伊斯梅尔派之外，绝大部分穆斯林属于伊斯兰教的主流逊尼派。

人口比例是他们同北面的大俄罗斯邻邦关系紧张的一个原因。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九年期间，苏联穆斯林人口增长了近百分之二十四，而俄罗斯人口只增长了百分之六点五。苏联穆斯林已经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六，他们如果继续保持高出生率的话，到本世纪末人数将达到六千五百万到七千五百万，接近那时苏联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到那时，大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将降到在心理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百分之五十这条线以下。

然而，人数还不是唯一的问题。苏联南部的穆斯林非常固步自封。一九七九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和百分之九十八的塔吉克人和土库曼人仍然居住在中亚地区。俄罗斯白人移居穆斯林地区是早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就开始了的，赫鲁晓夫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还曾大力推了一把，但是这种移民现在已少之又少，有些地方甚至在倒流了。在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九年期间，由于不受当地人欢迎，打起行李离开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俄罗斯人比从俄罗斯迁居到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人多十五万。哈萨克也已出现俄罗斯人向外迁移的迹象。

同苏联南部接壤的，是世界上一些政局最动荡的地点——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在苏联整个南部边境，穆斯林和土耳其族的势力越来越大。到本世纪末，甚至在中亚的城市里，俄罗斯人也将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民族。

这给苏联当局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经济问题。苏联原料丰富，人口众多，但是这两者分布得不是地方。就原料而言，现在往往只有在远东的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的地下才能找到。苏联主要工业中心仍然在西部的欧洲部分。但是，能为这些工业供应愈来愈多的劳力的地方，却是南部的穆斯林地区。

穆斯林的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普遍低于俄罗斯人。而且他们不愿意离开故里。尽管政府大力鼓励，但是看来至今还无法诱使苏联的穆斯林去荒凉的西伯利亚帮助开发那里地下的丰富资源。苏联政府不大可能鼓励人们向俄国欧洲部分的人口已经很稠密的城市移民。因此，只剩下了一个办法，就是在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共和国兴办工业和服务行业。这意味着需要转移财力，而转移财力势将在历来受到照顾的俄国欧洲部分引起不满。

第二个是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说，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穆斯林将随着

思想的成熟而“苏联化”并接受俄罗斯文化。然而，事实上他们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特征，十分尊重本民族的传统和宗教遗产。与外族通婚的情况不多见。还沒有出现过当地土生土长的知识分子被俄罗斯人同化的现象。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人士”虽然基本上仍然忠于苏维埃政权，仍然把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正式信念，但是他们不愿在行动上充当莫斯科在自己的共和国的代表。对莫斯科，他们主要是以本民族人民的代表自居。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人和当地穆斯林在一起工作，但是在生活上各有自己的天地。

穆斯林民族的团结的程度和与日俱增的自信，加上它们在苏联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必然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苏联伊斯兰的特点加强了他们在文化上自成门戶的局面。同时，与苏联接界的一些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复兴使这个已经成为苏联国内一大问题的问题又增加了一个关系重大的方面。

忠于信仰

来自居统治地位的西部的要求政教分离和要求现代化的双重压力对苏联穆斯林的影响与对别国的穆斯林的影响一样。不过，苏联是一个无神论国家，公开宣布以消灭一切宗教为目的，因此，苏联国内穆斯林所受到的双重压力更不知大多少。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苏联消灭了十月革命前的整个宗教界上层和数以百万计的游牧者。据老布尔什维克加里宁说，这样做是为了使穆斯林“对列宁格勒的俄罗斯工人的形象和行为留下印象”。但是，对宗教和对穆斯林生活方式进行的历时五十年的游击战至今成绩有限。

伊斯兰对本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力量已经丧失了很多，然而，最近的调查结果表明，穆斯林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自称是无神论者（属官方鼓励的“好斗”分子的还不到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这种或那种信仰或传统的“信徒”，其中包括一些“犹豫动摇”和“态度冷淡”的人，这些人之所以遵守某些伊斯兰礼节和那些据认为民族性大于宗教性的宗教风俗习惯，有的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有的是因为受到社会或家庭的压力。（过去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的情况刚好倒过来：现在百分之八十的人是无神论者，百分之二十是信徒。）伊斯兰三大礼仪——割礼、婚礼和葬礼，是人人都遵守的，包括共产党

宣传机关里负责进行反宗教宣传的官员在内。

苏联国内两种宗教平行存在这一点意味着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日子要比苏联其他信仰好过一些。

代表官办伊斯兰教的是四个伊斯兰教协会，分别设在塔什干、乌法、马哈奇卡拉和巴库。正式登记的神职人员有两千五到三千人，他们控制着约五百座清真寺、两所玛德拉萨（伊斯兰教学校）和一家宗教刊物《苏联东部穆斯林》。那两所宗教学校，一所设在布哈拉，一所设在塔什干。《苏联东部穆斯林》是在塔什干用英文、法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乌兹别克文出版的季刊。但是，那些神职人员几乎根本没有机会通过官方的大众媒介工具宣传他们的宗教，而且不得参加一切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活动。每逢星期五，在现在开放的为数不多的清真寺里讲经是他们同普通穆斯林的唯一联系。因此，官办的伊斯兰教甚至不能满足穆斯林最基本的需要。

官办的伊斯兰教的领袖们对不信神的苏联政权是忠诚的，甚至唯命是从。对于当局的反宗教压力，他们不表异议，反而说他们对苏联穆斯林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感到高兴。从伊斯兰教的教规和理论的角度来看，苏联的伊斯兰教没有受马克思主义的侵蚀，还是革命以前的那种正统的、真正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领袖们从未承认过马克思主义同伊斯兰教两者可以调和。

官办的伊斯兰教类似一小批非常合格的伊斯兰学者的组合，活动效率很高。这些人一般是三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在埃及和摩洛哥的穆斯林大学中留过学，不比伊斯兰世界里最出色的宗教学者逊色。他们代表着俄国伊斯兰教的开明、温和的传统，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十九世纪穆斯林的伟大思想家谢赫·阿布德、拉希德·里扎和鞑靼著名神学家和宗教改革家谢哈布丁·马尔加尼等。

另一方面，民间的伊斯兰教体现了高加索和中亚的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的和好斗的“圣战”传统。它的民族英雄是抵抗沙皇征服高加索的伊马姆沙米勒、二十年代初期达吉斯坦最后一次反对苏联政权起义的领袖谢赫·乌曾·哈吉和强烈反西方的、激进的伊朗神学家杰马勒丁阿夫加尼。

民间伊斯兰教的领导者是苏菲兄弟会，这个组织在苏联是被取缔的，但是它在当地穆斯林中间根深蒂固，经过无数次镇压仍然存在至

今。据一位苏联社会学家说，北高加索的伊斯兰教信徒有一半以上参加兄弟会。他们开展有效的宗教宣传，神职人员主持各种必要的宗教仪式，他们开办秘密的宗教学校和地下清真寺。

苏联的苏菲派具有强烈的反苏、反现代和反俄罗斯精神，思想同伊朗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或阿伯拉世界的穆斯林兄弟会的思想大同小异。去年十二月，阿塞拜疆的克格勃头目齐亚·优素福·扎德少校严厉地批评了“地下教派和反动的穆斯林神职人员进行罪恶的、反苏颠覆活动”——苏联说的这两种人通常是指苏菲兄弟会。

伊万的小帮手

苏联的伊斯兰教对苏联在国外穆斯林世界推行它的政策究竟是有好处还是有妨碍呢？好处是明显的。中亚和高加索有一批经过官方首肯的、“政治水平很高的”穆斯林，他们为苏联输送穆斯林专家和语言学家，其中许多人在苏联外交机构工作成绩突出，有的甚至担任了大使（苏联驻喀布尔大使是伏尔加流域的鞑靼人）。

在扩大苏联在中东的势力这一点上，他们通常比俄罗斯人更敢于冒险，这也许能说明他们为什么欢迎占领阿富汗——虽然这种支持有其局限性，这一点可从占领初期派往阿富汗的中亚军队的懈怠表现中看到。官方的穆斯林精神领袖是苏联在国外进行宣传的有效工具，同时，他们在国内也能对穆斯林起节制作用。沒有他们的帮助，苏联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教至友”的形象是塑造不起来的。

不利之处也是有的，不过要准确地指出比较困难。苏联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是一些具有高度技术、专业水平和知识丰富的人，但是他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空虚。无论是革命前光辉的穆斯林改革运动，还是革命初期布尔什维克中的穆斯林为探索穆斯林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作的大胆尝试（这些人已在三十年代完全被斯大林消灭了），都沒有留下一丝痕迹。

由于几十年来一直被迫适应呆板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苏联的穆斯林很容易接受从动荡的中东传来的最极端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如穆斯林兄弟会的革命激进主义，阿亚图拉霍梅尼的宗教民粹主义或者卡扎菲上校的穆斯林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思想对苏联的稳定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为它们的主张对苏联穆斯林的吸引力大大超过单调、刻板、无神

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

中亚人可能欢迎苏联向穆斯林世界进一步扩大影响。但是，苏联政府必须作出重大的让步才能换得他们对这一事业的任何臂助，例如政府必须减少反宗教宣传和增设清眞寺（这样一来必然使宗教活动重新活跃）。几个穆斯林加盟共和国还可能要求在治理国家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和要求增加投资。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将加强穆斯林加盟共和国对莫斯科中央政府的经济和政治自主权。

如果苏联继续推行它在中东和穆斯林世界的扩张政策，它可能在两种战略中择一而行。第一种是打着苏联和伊斯兰友好的旗号扩张势力；第二种是打着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旗号扩张势力。

选择第一种战略的可能性较小，但是苏联的穆斯林会欢迎这种战略。如果采取这种战略，宗教领袖在同苏联政府打交道时的地位将提高。第二种战略，即向国外输出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战略如果实行的话，苏联穆斯林共产党干部的帮助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在阿富汗奉行的就是不必他们出力的方针。在那里，正在使用非穆斯林的苏联军队打击圣战者。然而，如果这场对穆斯林叛乱分子的斗爭无限制地继续下去，这种方针对苏联的稳定可能威胁较大。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为了使不稳定的穆斯林世界的动乱蔓延到苏联境内的危险性减小，苏联政府可能下令逐步退却，然后重新拉上铁幕，使它的中亚和高加索边疆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感染。这种与世隔绝的状况需要持续多久，那将取决于以下因素：阿富汗抵抗运动能坚持多久，伊朗的激进的原教旨主义能保持多久。

现在看来这也许是对克里姆林宫统治者说来危险性最小的办法。苏联入侵阿富汗已经严重损害了苏联在穆斯林世界的名声。一九八〇年九月在塔什干召开的国际穆斯林会议因为一半以上被邀请的穆斯林代表团拒绝出席会议而告失败，从那时以来，苏联沒有派过任何穆斯林代表团出国，苏联在宣传工作中也几乎根本沒有利用穆斯林神职人员。一场新的反伊斯兰和反民族主义的运动正在中亚和高加索进行。苏联是不是正在南部边疆放下百叶窗？

（原载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陈如为、朱慧珍译　卢佩文校）

苏联伊斯兰教问题的历史背景

（日本）仓桥敏夫

【内容提要：本文作者是日本苏联问题研究专家。本文介绍了苏联穆斯林人口、穆斯林居住地区的形成和历史背景。其中谈到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问题和穆斯林的关系。他说当入侵阿富汗的苏联穆斯林士兵知道他们的枪口对准的阿富汗人也是穆斯林时，他们的士气消沉，进而和阿富汗人结成友好关系，有的投身到游击队中。】

伊斯兰教问题威胁着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经常摇撼着世界和平。对西欧各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对我们日本也由于中东石油而令人头痛。

尤其是苏联的穆斯林同苏联政府及党的关系，以及国内中亚的穆斯林的思想动向和苏联的人口问题的关系，是难处理的问题。

伊斯兰问题是苏联最大的弱点，是使它发愁的问题。

世界第四个伊斯兰教国家

如果说，“俄国（苏联）有伊斯兰教徒！”大多数人都会惊讶。一定会问，有多少，居住在什么地方。

“是呀，人口约有五千万，从伏尔加河流域到黑海的北岸，从高加索北方的达吉斯坦到靠近伊朗的阿塞拜疆、塔什干和撒马尔罕所在的乌兹别克共和国、塔吉克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即昔时的西土耳其斯坦、现在的中亚全区都有伊斯兰教徒。”现在苏联政府的旅游总局和全苏旅行社都竭尽全力劝诱游客沿丝绸之路旅行。在这条线路沿途有往日使中亚开放出伊斯兰文化之花的帖木儿的遗迹。

苏联政府的实情是一方面排斥伊斯兰，一方面又把伊斯兰遗迹当作珍贵商品招徕日本人去丝绸之路旅行，去撒马尔罕、布哈拉、希瓦、塔什干、阿拉木图等地旅行。实际有多少穆斯林居住在那里呢？这里且介绍苏联政府中央统计局发表的一九七八年度苏联信奉伊斯兰教的共和国

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度是六千万人，比一九七七年度的五千万人增加了一千万人。但是在乌兹别克、哈萨克共和国等处，除伊斯兰的亚洲人以外还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血统的移民和殖民者，从远东滨海边疆区强制迁移来的朝鲜人，所以说纯穆斯林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妥当的。六千万人的百分之八十，约四千八百万人，大体可以说是五千万人。

为了更精确些，介绍一九七〇年度苏联人口调查时发表的《苏联穆斯林人口及其民族名》和《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〇年的十年人口增长率》，供参考。

据此可知苏联的穆斯林在一九七〇年的人口调查时是三千五百二十三万二千人，比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的调查增加了约一千万人。一九八〇年度人口调查的结果还没有发表，但是很明显，恐怕也会增加一千万人以上。

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穆斯林和俄罗斯人的人口增加率差数。穆斯林人口平均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俄罗斯人只是增加百分之十三。因此，人们说，苏联的俄罗斯人和穆斯林人的比率，到二〇〇〇年说不定会反过来。这里潜伏着苏联政府和党对国内伊斯兰民族的恐怖。

现在知道苏联的穆斯林人口约为五千万人。苏联次于印度尼西亚（一亿二千万人）、巴基斯坦(六千二百万人)、印度(五千九百万人)，是世界第四个伊斯兰国家。次于苏联的是土耳其（三千四百万人）、埃及（三千二百五十万人）、伊朗（二千八百万人）、阿富汗（一千六百五十万人）、伊拉克（九百四十万人）、孟加拉国（七百五十万人）、沙特阿拉伯（七百二十万人）（据一九七七年度联合国调查）。

还有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据一九三九年的《英文中国》说，有三千九百七十万人。现在推算数为四千五百万人。据说维吾尔自治区有四百零九万人，云南有二百万人。

其次谈谈苏联主要伊斯兰共和国所在的位置。

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有个叫喀山的城市，在列宁诞生地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上游。列宁是喀山大学毕业的。

这个喀山是鞑靼自治共和国的首都，自古以来就是繁荣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商业城市。这是俄国穆斯林鞑靼人的集居地，自以前蒙古的钦察汗国隆盛时代以来，它同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的河口河畔的阿斯特拉罕，

是俄国丝绸之路贸易的中继地，非常繁荣。以后钦察汗国变为伊斯兰教国以后，这里就成了伊斯兰教在俄国的中心地了。

为什么这里称鞑靼自治共和国呢？在俄国本土（除去中亚、哈萨克斯坦等西土耳其斯坦）居住的穆斯林都叫鞑靼人吗？中亚的穆斯林分别以乌兹别克、塔吉克、吉尔吉斯等民族名命名，所以有不解之感。这里居住的鞑靼人和居住在中亚的穆斯林人（除去伊朗血统的塔吉克人）全都有不同的部族名，但都是土耳其民族。

俄国本土的穆斯林全都称鞑靼人，居住在西伯利亚、远东、甚至如今居住在日本的人也都被称之为鞑靼人。

为什么成了这样呢？说明一下鞑靼这名称的来源吧。

起因于成吉思汗的俄国远征

话要回溯到成吉思汗的蒙古军西征，入侵俄国的时代。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建立了强大的游牧民国家，在中亚有称花剌子模的汗国，以阿姆河流域为据点（当然是伊斯兰国家）。在穆罕默德时代，国家的影响渐渐向西方扩大，以致扩大到中亚全地区。它的东部边界是锡尔河。有消息说，穆罕默德汗在东方建立新的游牧民国家，希望同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于是决定派去有商队同行的代表团，目的是侦察这个新兴国家的实际情况。一行都是伊斯兰教徒，但是很多人不诚实，对蒙古人态度粗暴，并压低商品价格。本来蒙古人是很尊敬伊斯兰教徒的，但是因为遇到这样的情况，对穆斯林商人的信任完全丧失了。花剌子模代表团有如上述，侦察了新兴国家的军事和经济状况，设置了调查国家实力的间谍组织。但是这个间谍组织不很能干，不能看出蒙古的真情。成吉思汗在他们回国的时候，派了答礼代表团，并让商人随行。一行共有四百五十人，带有巨额资金以便购买中国的丝绸等商品和西域的商品。

锡尔河边界奥特拉尔的知事（伊那尔丘克，称号是加伊尔汗）看上了蒙古代表团所携带的商品和巨额资金，便把他们全部逮捕，关进牢房，向国王穆罕默德请示处置，国王竟命令处以死刑，于是伊那尔丘克杀害了全部四百五十人，掠夺了其全部货款。

穆罕默德和伊那尔丘克的轻举妄动造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悲剧。这成了成吉思汗西征的原因。那时代，杀人掠物是有权者的家常便饭，所以

他们这样干不过是按照惯例而已。但是代表团全体的死亡对蒙古来说，是莫大的损失和极大的侮辱。不过成吉思汗非常克制，派去了追究责任的代表团，要求穆罕默德正式道歉赔礼，处罚奥特拉尔知事。可是穆罕默德错误地估计了蒙古的军事力量，决定再打一仗，于是又把代表团的全体成员杀害了。

一二二三年在俄国南部的草原第一次出现的蒙古骑兵队，在哈拉哈河畔冲散了俄罗斯人和博洛别克族的联军，向乌拉尔方面前进。成吉思汗等到各地部队都集合以后，于一二二五年春天一度胜利返回蒙古。一二三五年召开了大会，决定再派军队远征中国、波斯和俄国。这次是他的孙子巴图指挥，于第二年一二三六年率领二十万大军登程远征。

侵入俄国的蒙古军攻克伏尔加河流域的布尔加尔汗国之后，于一二三七年袭击俄国东南的梁赞公国。梁赞公国经五天的激战，终于沦陷，居民全都遭屠杀，全城化为灰烬。这年冬季，弗拉基米尔公国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大公军在锡提河畔之战中败退，大公自己也阵亡。蒙古军一个一个地攻占了伏尔加河流域的城市，向诺夫哥罗德挺进。幸而到了春暖雪化的时候，蒙古骑兵队难以对付泥泞，终于放弃了诺夫哥罗德，而把矛头转向南方，一二四〇年十二月攻陷了基辅。翌年三月，巴图再次率军西进，入波兰，攻占了匈牙利和德国。但是因为突然接到窝阔台大汗逝世，巴图就撤军东去。一路上征服了保加利亚、蒙达维亚、瓦拉基亚等国，还在俄国伏尔加河下游萨拉伊建立了钦察汗国，控制了俄国。

俄国，欧洲的人们对蒙古军队的摧毁城市和屠杀全体市民都感到惊恐，说这简直不是人干的，而是传说的古代匈族的阿提拉王的残暴行径的再现，说他们是“地狱之民”（塔尔塔尔）。塔尔塔尔这个词后来变成鞑靼，把蒙古人称为鞑靼了。然而虽说是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其实蒙古人只是这支军队的少数最高领导。部族长，军队的主力是由友好的骑马民族、被征服地的居民和俘虏组成的。其中的大部分是土耳其血统的人，但是俄国人也称他们鞑靼。后来成为在俄国本土居住的所有伊斯兰教土耳其人的名称了。

中亚伊斯兰教的特殊化

中亚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及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有不同的特点。

（一）不重视到麦加朝觐

在中亚，到麦加和麦地那朝觐没有群众性的意义，但是却鼓励参拜当地的庙（洞窟、井、大树等），认为这些是他们信仰的对象。当然去麦加朝觐还是有的，那是例外活动。富有的信徒雇用穷人代为参拜的很多。十七、八世纪时，到麦加朝觐必定要到土耳其的君士但丁堡。因为土耳其的苏丹从一五一七年以来就是全伊斯兰的哈里法。

（二）什叶派为多数

教派方面，信仰阿里的什叶派的一派伊斯梅尔派人数较多。在帕米尔山区，这派信徒现在还是很多的。但在布哈拉等城市，正统派逊尼派占有统治地位。因此，什叶派被认为是异端而受迫害，势力减退了。然而因为到处遍布着阿里遗迹，这说明什叶派的势力曾经非常强盛而被奉为圣地。

十六世纪的布哈拉市民，男子的名前冠以阿里的很多。信仰哈桑和侯赛因的在塔什干、撒马尔罕、费尔干纳、布哈拉等地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和当地信仰结合在一起。传说哈桑和侯赛因是双胞胎，人们认为，信仰他俩是和中亚自古以来把双胞胎视为神圣的风俗有关。在塔什干、乌拉—丘别，把生双胞胎的母亲称为“天国之妇”——认为这种女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据说布哈拉尊重“三胞胎”，据传说，“三胞胎”是在天宫里和王子一道哺育的。但是相反，“四胞胎”则被认为是恐怖的对象，传说要和母亲一起被杀死。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和穆斯林

从帝政末期到十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很多卓越的穆斯林思想家、政治家和活动家。这些伊斯兰民族主义者、泛土耳其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站在思想和政治上都非常落后的全穆斯林人的前列，和列宁、斯大林等人并驾齐驱，为打倒帝政，建立民主政权和共产主义政府而奋斗。然而结果怎样呢？从结论来说，他们都为列宁、斯大林所利用，最后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都被处死了。

这样，苏联（俄国本土和中亚）的穆斯林现在和帝政时代没有丝毫不同，实际上不得不在殖民地的政治、社会、经济、民族、宗教压迫下生活。

然而苏联的穆斯林的前途在于穆斯林中正在形成的民族主义、独立要求、反帝国主义（这时的帝国主义是苏联）思想，这种思想在蓬勃发展。俄罗斯、中亚、哈萨克斯坦、高加索的伊斯兰教徒认识到自己和阿

富汗的穆斯林是同一民族，都是土耳其族，同时土耳其共和国本身也认识到这些国外的土耳其族和土耳其国民属于同一民族，渐渐认识到世界土耳其族有必要实现大同。

在这次苏联入侵阿富汗中，苏联政府派红军中来自中亚的穆斯林官兵去改组动摇的卡尔迈勒政府。然而不久就会知道是犯了极大的错误。

穆斯林士兵受的教育是，自己的斗争对手是美帝国主义和毛泽东一派，但是当他们知道枪口对准的阿富汗反政府军和自己一样是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同是穆斯林时，士气消沉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一向派往海外的官员都只是斯拉夫人。亚洲穆斯林只不过是担任司机、警卫等下贱工作，而如今阿富汗政府中的中级官员出来迎接他们，所以他们就喜出望外。前往阿富汗，为了解放在帝国主义者的桎梏下呻吟的阿富汗民众，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来到这里，却连一个美国人或中国人也沒有看到，帝国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苏维埃；正在呻吟的是自己的同民族的穆斯林。

苏联派出来的这些官兵同阿富汗当地人民之间结成了友好关系，其中就有逃跑而投身到阿富汗游击队的。发生了与苏联的意图完全相反的现象。于是苏联政府急忙撤回这些中亚的穆斯林官兵，换上其他斯拉夫人士兵和东德人的官员。产生了完全相反的效果。

伊斯兰的确是苏联的棘手问题。

（原载日本《全貌》月刊一九八二年三月）

南斯拉夫科索沃的穆斯林

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记者

【内容提要：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南斯拉夫的科索沃省人口为一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共有穆斯林一百万人。科索沃省会普里什蒂纳的伊斯兰长老会，负责掌管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省的宗教活动、清真寺和主要的伊马姆。

南斯拉夫有穆斯林四百万，清真寺二千七百座，伊马姆一千九百五十人。属普里什蒂纳伊斯兰长老会管辖的有：穆斯林约一百四十万，清真寺六百七十座，伊马姆五百人。】

科索沃地区通过骚乱之门开始闻名于世界，去年夏季，它的名字不止一次地被记录在警察的岗楼上！

自从去年夏季这一地区出现游行示威和冲突以来，科索沃的名字就出现在世界报刊之上，所有的报纸都在显著地位以醒目标题进行了报道，并刊登了地图和照片。一时全世界都知道了这一位于巴尔干的地区的名字。人们发现这个地区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突然出现，并在街道广场上自我宣传，在世界报刊通讯社进行报道之前，它早已在察警局和法庭里记录在案了。

我承认，在科索沃发生骚乱之前，我对它是一无所知的，我想，许多人同我一样，都是这样的无知。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这种无知说明我们应该以深感悔罪和惭愧的感情对待他们，这并不是因为科索沃人希望加入第三世界，也不是因为他们是东方人而生活在欧洲的心脏，而是因为他们（这一点很重要）是恪守五功的穆斯林。

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是穆斯林，理论上是正统的伊斯兰，有时是共产主义者，内心是阿尔巴尼亚人，外形是南斯拉夫人，这种奇怪的结构是怎样形成的，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是怎样共处的。这就是科索沃的奥秘，这就是科索沃的激动人心的故事篇章。

科索沃的人口据一九八一年统计为一百五十八万四千人，省会是普里什蒂纳。如果人们走出省会到一些农村转一转，那么你在省会和一些工业城市就会看到，一种是南斯拉夫面孔，另一种则是阿尔巴尼亚或伊斯兰面孔。而在农村和一些偏远城市，则只看到一种明显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面孔。

悲剧的背景

科索沃的这些奥秘——也许是它的悲剧——只能从历史中去寻求解释。

如果巴尔干目前的地图是根据强者的斗争和体现在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中的和解，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决议而形成的，那么，还有一些古老的详细的分界线可供我们从头研究这一故事的戏剧性背景时参考。

最新的历史研究报告说明，这个阿尔巴尼亚地区早在石器时代以前

就已经有人居住了。公元前二千年阿利尔人居住在高山和丛林中，直到罗马帝国的势力伸展到这里达数世纪之久。自从阿尔巴尼亚人摆脱了罗马的统治，直到十二世纪，之后，拜占庭人、马其顿人和塞尔维亚人又相继统治了他们。

但是，这一地区历史上新的一页是从奥斯曼人于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打开巴尔干大门之时开始的。

不控制科索沃就不可能控制巴尔干，因为科索沃处于通向半岛各地的十字路口，地位险要。一三八九年，奥斯曼军队在穆拉德苏丹率领下向科索沃前进，在那里遇到了塞尔维亚国王率领的巴尔干联军，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同塞尔维亚人一起均在其指挥之下。

在科索沃展开了残酷的战斗，奥斯曼人战胜了，但是穆拉德苏丹和塞尔维亚国王均战死。

尽管奥斯曼人打了胜仗，而由于土耳其军队另有任务迅速撤出这一地区，致使奥斯曼苏丹的势力直到一四二三年才在阿尔巴尼亚获得承认。十五——十六世纪期间，奥斯曼人已经能够将其势力伸展到巴尔干地区。阿尔巴尼亚一直是奥斯曼统治的基点，强悍的阿尔巴尼亚男人成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重要支柱。

但是有一点应该提出更正的是，伊斯兰进入巴尔干与奥斯曼的胜利沒有联系，而许多人的传说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伊斯兰是随着奥斯曼的剑锋所至进入这一地区的。

肯定的是，阿拉伯国家是东方向西方进行贸易的桥梁，即经过叙利亚的港口通向欧洲海岸的罗马和威尼斯，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之间的相互来往和联系打开了大门。这些贸易桥梁就是把伊斯兰输送到这一地区的渠道。

科索沃付出了代价

当奥斯曼帝国夕阳西坠时，阿尔巴尼亚，特别是科索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著名的巴尔干战爭燃烧到这个新独立的国家，从而分割了阿尔巴尼亚，对它怀有野心的邻居占领了它的许多地方。塞尔维亚的地主占领了科索沃地区，它的部分领土被割据幷入希腊、马其顿和黑山。

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时正巧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巴尼亚大乱，它的土地成了掠夺的对象，奥地利和意大利占领了它的一些土地。

意大利、俄国、法国和英国于一九一五年签署一项伦敦秘密条约，它们一致同意肢解这个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并一致同意把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和南部分给希腊、塞尔维亚和黑山，条件是，仍给阿尔巴尼亚人保留一个小小的独立国家，由意大利控制它的对外关系。但是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它粉碎了这项计划，这个政府使这个国家团结一致，拯救了能够拯救的肢体，只有被割据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除外。

这除外的部分正是塞尔维亚地主占领的科索沃地区。

访伊斯兰长老会

普里什蒂纳是科索沃地区的门户，是政权和行政管理中心，是科索沃的神经中枢和决策地。但是科索沃的历史中心仍然在七十公里远的地方，那里是过去的省会普里西林，是科学和文化的灯塔。

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省会便从普里西林迁移到普里什蒂纳。据了解，当时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断了交，这就是作出迁移决定的背景，因为普里西林靠近阿尔巴尼亚边境。

穿过几条狭窄的街道，我们来到普里什蒂纳伊斯兰长老会的会址，这里掌管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宗教活动、清眞寺和主要的伊马姆。因为南斯拉夫六个共和国的穆斯林分属于四个长老会或宗教管理处，每一个长老会负责管理一定范围（可能包括一个共和国以上的范围）内穆斯林的宗教事务。

这一天正好是开斋节前一天的聚礼日，尽管还不到礼拜的时间，人们已经环坐在那里，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高高的白色毡帽或羊毛织的帽子。

后来我了解到这些人都是前来纳天课的。在面向清眞寺的一座建筑物的第一层楼里，工作人员接过每一个穆斯林的天课，并给他一张收据。有人对我说，整个科索沃地区的天课收入每年约为三万美元，原来规定应用于修葺清眞寺，但是十年来则用于修建一所新的伊斯兰中学，以代替一所宗教学校。

在楼上，我会晤了塞尔维亚、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地区伊斯兰教长

老会伊斯梅尔·哈基长老，他是一个六十开外，矮个，消瘦的男人。他的办公室里有空调设备，一些伊马姆和宗教人士参加座谈。大家都用标准的阿拉伯语谈话，只有哈基长老一人能听懂阿拉伯语，但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另一份关于南斯拉夫穆斯林的研究报告（这是一位杰出的南斯拉夫研究人员艾哈迈德·伊斯梅尔·沃什博士写的）指出，每六个南斯拉夫公民中就有一个穆斯林，穆斯林总人数达四百万，其中约有一百四十万属于普里什蒂纳长老会管辖范围。全国二千七百座清眞寺中，有六百七十座清眞寺属于普里什蒂纳长老会管理，南斯拉夫全国一千九百五十位伊马姆中，属于普里什蒂纳长老会的有五百位。

伊斯梅尔·哈基长老及其助手说，仅科索沃一个地区的穆斯林就有一百万人，此外，长老会还要负责管理伊马姆和清眞寺，它还有专门机构管理宗教基金，长老会在科索沃各地共有三十个管理处，负责管理清眞寺其它不动产的收入，用于维修和兴建清眞寺。

我问他们：伊马姆的工资从哪里领取？

他们说：穆斯林承担这些工资，每戶的戶主每年固定向自己住在地区清眞寺的伊马姆交付一美元。但是伊马姆还要从事其它活动，特别是伊马姆还承担许多工作，例如签订结婚契约，洗尸体和埋葬尸体。后一种工作几乎已经成了伊马姆的任务。

苏菲派人属于什叶派

当谈到人们的信仰和收入问题时，他们说，自从奥斯曼人建立了哈乃斐派以来，这一派就占多数，什叶派占少数，集中在贾库瓦镇，他们自称阿拉维人，认为伊马姆阿里·本·艾卜·塔里布是最高门位的弟子。他们还说，科索沃还有一些苏菲派，“卡迪尔派”在普里什蒂纳是苏菲派中最著名的一派，它的名字是同巴格达的苏菲派人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些派别在活动，例如里法伊派、哈勒瓦特派、萨阿德派和纳格叶班德派。

但是确实意外的是，这些派别的活动都是在什叶派的范围之内，因为在亚非各国公认的是，这些派别首先在逊尼派各理论派别的信徒中找到了自己肥沃的土壤。当我谈到这一点时，在座的一位伊马姆说，逊尼派人与苏菲各派沒有任何关系。他们谴责苏菲派的活动，以及浸透他们

行动的异端思想。

他接着说，一些加入苏菲派的人走得太远了，甚至背离了伊斯兰。其中有的人不礼拜，而只是参加祈祷小组，有的人引用一些经文逃避履行穆斯林的任务。

我问：这一派在哪些地方活动？他们说，主要在农村，也在一些城市。

我问：是不是青年人正在走向极端？

他们说：参加这一派的人多数是年纪大的人和一些对他们的宗教一无所知的头脑简单的人，他们沒有得到正确认识的合法途径，因此只能设想宗教是这种方法或那种方法。

我问：清眞寺的伊马姆起什么作用？

他们说：伊马姆每周讲一次话，在另外的日子里，人们生活在另一个拒绝宗教、驳斥宗教基本教义的世界里。

另一位补充说，伊马姆在清眞寺里教一些小孩背诵一些古兰经的段落，父亲们在把孩子送到政府办的学校去以前，就先把孩子送到清眞寺去，一旦孩子进了学校，就逐渐把一切都忘了。

聚礼日

聚礼的时间到了，响起了唤礼者高声唤礼的声音。伊斯梅尔·哈基从长老会的二楼走下来，楼下一间办公室是空的，里面铺着礼拜毯，他坐在那里，周围有一些长者和工作人员，他沒到附近的清眞寺去，也许是因为身体有病，或为了避免拥挤，伤了他瘦弱的身体。

我注意到参加聚礼的人都是礼十六拜，而在阿拉伯东方，我们只礼四拜。

第二天就是开斋节的第一天。

清晨，当我走出来随着人群到苏丹穆拉德清眞寺去作礼拜时，大街上沒有任何迹象表明今天是绝大多数居民的珍贵节日，直到后来看见戴白帽子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才知道我已来到那座古老的清眞寺。礼拜者多数是老年人和年轻的妇女，他们穿着新衣裳，头上戴着雪白的帽子，也许很少穿戴过。

礼拜以后是节日的讲话。许多穷苦人挤在甬道上以便得到施舍，我挤出人群走到大街上，人们互相祝贺节日，他们互相握手，并把自己的

头靠在对方的肩上，就象拥抱一样，而后用阿尔巴尼亚语说：节日好。

不到十分钟，聚而复散，一切照旧！我追上谢赫阿丹，他是这座清眞寺的讲演人。我问他，节日活动结束了？他用阿拉伯语微笑着回答说：节日好。你不能在这个城市里看节日活动，如果你决心要看，你就到远离首府的地方去，在那里，节日欢乐的火焰尚未熄灭。

他建议我陪他一起回到他居住的农村去，当我因另有约会而表示歉意时，他说，我还有一个机会，第二天是星期日，是节日的最后一天。当我问他节日放假几天时，他说，无论是开斋节还是宰牲节，这里都不放假。今年的开斋节是在每周的正常假日，即星期六和星期日，这纯属巧合，从而给希望庆祝节日的人带来一个机会。

农村不戴面纱

根据谢赫阿丹的忠告，我乘一位友人的汽车出发，以便看看普里什蒂纳以外节日活动的情况。

迎接我们的是普雅镇，这是离地区首府约八十公里远的一个小城镇，一路经过几个村庄，从远处看，这些村庄就象是漂浮在覆满小麦和玉米的田园或金黄色向阳花的浩瀚大海上的一些小岛一样。

村头，一些小孩子穿着新衣服在玩耍，几群年轻的姑娘在树荫下围成几个圈子快速旋转着，长长的金色辫子甩向空中，她们身穿五光十色的衣服，还有长长的灯笼裤，这是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在城市里早已经不见踪迹了。在服装上仍然保持古老传统的成年妇女们，裤子上都系一条带子，身后边拖着一块半园形的黑布，可能是防止坐在地上时弄脏了裤子。

在另一些农村，妇女们腰间系一长木条，上面覆盖着拖地长的裙，长木条是用来支撑裙子的，这样系裙子，可以使人行动更自由些，妇女行走起来就像在一个大“水桶”内活动一样。

当我走进第一戶人家时发现，把鞋子脱在门外是所有人都遵守的一个传统习惯，看来这源出于对保持地面清洁的一种强烈渴望，担心鞋子弄脏了房间的地面，就象走进清眞寺时的传统习惯一样。

节日的仪式

来到哈吉穆罕默德·伊斯拉米家（他曾四次到麦加朝觐，到去年为

止，他一直是本镇伊马姆事务负责人），显然，从客厅贴四面围墙的长沙发靠床以及刺绣和编织的边饰来看，它至少是属于奥斯曼时代的。

哈吉伊斯拉米说，在节日，人们从清眞寺出来以后便到他们亲人的坟墓去祭扫，这一点和阿拉伯东方许多穆斯林的习惯一样，尔后，男人们便去拜访清眞寺的伊马姆，这是第一天。第二天是伊马姆回访所有向他祝贺节日的人。拜访时都要食用土耳其甜食，这是隆重庆祝节日的主要特点。

我们领略了一下节日传统活动的滋味。当我们访问另一戶阿尔巴尼亚家庭时，不到几分钟，女主人就端来冷饮，还有几小块巧克力，接着女主人再次用托盘给我们端来这种饮料，幷站在一边等我们喝光以后，把空杯子拿走。再过几分钟，又捧来同一托盘，上面放着大的方碟子，里面放着撒满糖和蜂蜜的大饼。女主人重复同样的话，幷分别让我们食用，站在一边等我们吃完，而后把碟子收走，离开这间房子。过了一些时候，她再次小心翼翼地端来这个托盘，唯恐上面的任何一个碟子掉下来。我们看到，碟子里盛着拌奶的米饭，还加一些盐，和我们的习惯一样，沒加糖。女主人一直立在那里等我们用完这第三道菜，把碟子拿走。她第四次回来送上了不加糖的咖啡，以结束对来访者的款待！

引起我注意的还有，特别是在农村的阿尔巴尼亚人仍然生活在被分割的社会阶段，男女之间有很大距离，甚至有人对我说，在许多阿尔巴尼亚村庄里，结婚还要通过媒人介绍，根据我们的了解，媒人都是男的，沒有女的。人们称他们为“穆西特”，也就是媒人。在农村，他们经常是很受尊重的人。

“穆西特”进行一些预备性接触，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结婚仪式便开始了，首先是新郎的父亲付给新娘家一笔钱，作为准备结婚的费用（这与塞尔维亚人的习惯正相反），仪式以村镇伊马姆书写婚约而结束。届时，新郎在人们簇拥下去到新娘家里，送新人的队伍必须以深红色的阿尔巴尼亚旗帜为前导，这种旗帜被禁止使用达六十八年之久，后来批准人们在节日时拿出来使用。新郎家的人走在旗子的后面，再后面是敲鼓吹笛的队伍和同村的人，直到在新娘家写完婚约。

尽管一夫一妻制是法律承认的根本制度，但是多妻现象仍然存在，法律制止不了，而他们却能利用法律上关于第二和第三个妻子的子女的权利的有关条文！

当我问起他们时，他们对我说，多妻现象是存在的，但一直是一种例外情况。在农村，有人娶两个或三个妻子，而法律只批准登记第一次婚姻，但是不禁止一个男人同另外的女人建立关系，就象所有欧洲国家流行的那样。

我对和我谈话的人（他是一座清真寺的讲演人）说，但是这却造成了丈夫死后第二个妻子及其子女的问题。他说，法律允许一个男人同任何其他女人生的孩子有继承权，即使不是他的妻子，但只要有两个人证明，他同那个女人有来往，并且同她生了孩子。但是法律不允许第二个妻子有继承权，她通常同孩子一起安排自己的事情，或者孩子幼小，她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人。

我们可以说，多妻是阿尔巴尼亚家庭成员多的原因，但这是次要原因，因为多妻仍属例外情况，而不是根本制度。可以肯定的是，有十个子女的家庭在阿尔巴尼亚农村还是很多的，在城市中，每一个家庭的子女平均是五个或六个，用任何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个很高的平均数字，甚至官方的研究报告也说，科索沃每戶平均子女数和人口的增长已经超过南斯拉夫和欧洲的平均数字。

官方的统计表明，这种说法绝不夸大。

人口炸弹

根据一九七一年和一九八一年的统计，南斯拉夫全国总人口在这十年中（南斯拉夫人口一九八一年为二千二百三十五万二千人）增加了二百万，科索沃地区在这一增长比例中占百分之十七，而科索沃地区的人口只占南斯拉夫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六。

关于科索沃，根据一九八一年统计，其人口为一百五十八万四千人，比一九七一年增加差不多三十四万人。我们必须指出，科索沃居民不完全是阿尔巴尼亚人，也不完全是穆斯林，但是过去多年相互接触和迁徙的结果，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已经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四，其中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是穆斯林，而塞尔维亚人只占百分之十八点五。

在这方面，最后统计的结果出现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即统计表过去不包括关于宗教信仰的任何项目，而只是根据地理和民族来区分，像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已经从统计表上取消了宗教信仰问题这一栏。但

是从一九七一年开始，第一次允许人们在正式表格中填写他们的宗教信仰。当年的统计结果表明，正式宣布自己是穆斯林者共有二万六千三百五十七人。一九八一年统计时，数字超过了一倍，达到五万八千九百五十人。这说明，在科索沃约一百万穆斯林（根据最近统计，仅阿尔巴尼亚人就有一百二十二万七千二百四十二人）中，只有五万九千人敢于宣布自己信伊斯兰教。

按年龄划分，百分之五十二点二的居民年龄不到二十五岁，即多一半是青年和儿童，百分之四十二点六为中年男女，他们是有效劳动力，而老年人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五点二。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生育方面发动的“攻势”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强调他们的存在和自卫。

在生育方面的这种“攻势”是在教育方面发动类似攻势的前奏。在教育方面是用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两种语言进行教学的，从而最终形成了对劳动市场的越来越大的、科索沃发展着的经济所承担不了的压力。

一九六〇年开始时只有不到九十五名学生的大学教育，仅仅过了二十年，现在已经发展到四万五千名男、女学生，其中有三万二千名阿尔巴尼亚男学生，这还不是所有的中学毕业生，因为大学不能容纳所有的中学毕业生。例如，一九八一——八二年度中学毕业生为一万七千人，而大学只能接纳九千人，余下的毕业生还有八千人，都加入到劳动市场。因此失业总数达到七万人就不足为怪了。根据当局的估计，失业人数每年平均增加一万四千人。

（原载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马亚慧译）

英国穆斯林自办穆斯林学校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

伊斯兰教现在在英国是居于第二位的大宗教，有一百多万教徒。许多穆斯林都认为，英国教学制度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都有他们自己的国立学校，为什么穆斯林就没有？

在英国已经有三所私立的穆斯林学校：一所在博尔顿附近，叫作拉姆斯博瑟姆，是训练阿訇的；一所在布里斯托尔附近，为适应中东教徒的需要而设；最后一所在伦敦东北部的沃尔瑟姆斯托。在其他地方，伊

斯兰教徒就必须在学校的课时以外接受他们的宗教教育了。他们许多人对此都不满足。特别是，他们想把他们的女儿安排在女子学校里，这些学校要遵守饮食和服饰方面的教规，女孩子们也可以免去没有伊斯兰道德的英国青年的注意。

英国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五个中心：伦敦，英格兰中部地区的西部，约克郡的南部和西部，曼彻斯特和兰开夏的东南部。根据宗教分设的学校在这些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找到足够接受教育的人。因此，穆斯林的领导人们都力求办起他们自己的“民办”学校。

在现在八千多所民办学校中，百分之六十六属于英国教会，百分之三十三是罗马天主教学校。最近积极参加天主教活动的成人估计数字（大概是那些一个星期去做一次礼拜的人）是三百五十万；而英国教会要少得多。英国四十多万犹太人拥有二十一所他们自己的民办学校。

民办的意思是，地区当局支付所有的办学费用，还支付学校基建费的百分之八十五。教会在出了百分之十五的基建费以后，就有权委任多数主管人员，委任负责人，决定课程和控制入学。几乎没有什么新办的民办学校。根据一九四四年的教育法，只有在地方不够的时候才能建立新的民办学校。既然除了郊区（这是多半还没有为穆斯林所渗透的地方）以外，各处的学生名额都在不断下降，地方当局就要穆斯林忘掉这件事。

学校学生名额下降就足以回答问题吗？穆斯林在现有学校中的集中程度正在迅速上升：并且也不仅在非教派的学校如此。在奥德姆的一所英国教会学校里，百分之九十的儿童是亚洲人，大多数是穆斯林。学生名额下降并不是教育事业进展迟缓的唯一原因。男女分校和教派学校都是不合时宜的。民办学校必须接受政府的视察——而视察者又极其厌恶机械的学习方法。然而穆斯林的孩子们都必须背诵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钱是有的。沙特阿拉伯人削减了他们的一部分赠款，就有别的国家来取代它的位置。现在正在伯明翰修建一座“萨达姆·侯赛因清真寺”，这是伊拉克政府赠送的礼物。英国一些城镇里繁华的锡克教寺庙也能够办起他们自己的民办学校。但是英国两个新教的信徒将会发现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

某些英国的穆斯林，特别是职业教育家，不主张男女分校的办法。他们认为，穆斯林的女孩子们在家里已经娇纵惯了，如果不让她们进入正规的国立学校的话，她们是无法在多种文化的社会里生活的。那些反

对男女分校的穆斯林愿意看到有较好的辅助教育。目前，这种辅助教育，有一天半小时的，也有四小时的，在伯明翰的斯帕克布鲁克伊斯兰中心的七百六十名儿童则是一星期七天。这个伊斯兰中心建在一排平房里。假如地方当局准备提供更多的帮助——也许只要使学校的房子在课余时间更容易加以利用——男女分校的要求就会逐渐消失。

不然，决策者就将面临困难的抉择：一方面是公平待遇；另方面是取消学校里宗教隔离的愿望。不管如何，决定都可能使已经紧张的种族关系更加紧张。

（原载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一九八二年四月十七日）

伊斯兰教在美国

（美国）彼得·盖勒

【内容提要：二十世纪初才在美国扎下根的伊斯兰教是在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教徒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目前穆斯林人数已有二百万至三百万，其中为数最多的是伊朗什叶派穆斯林，其次是叙利亚和土耳其的穆斯林。】

日暮来临，清眞寺做好了做礼拜的准备，清眞寺的尖塔在昏暗的夜色中熠熠发光，人们三三两两进入大门，穿过阿拉伯式的拱门柱廊，默默地走进寺内。现在到了昏礼的时刻。

这一情景极象是在利雅得和伊斯兰堡，但它却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座清眞寺是美国伊斯兰中心，这所建筑在华盛顿使馆区显得格外突出，象是一个穿着长袍的人夹杂在一群身着三件一套西服的人当中。

大部分美国人可能认为，伊斯兰教只在北非和中东盛行。事实上，它是在美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据宗教学者们说，目前美国的伊斯兰教徒要多于土生土长的美洲印第安人和美籍日本人。

他们由各种各样的人组成，从黎巴嫩的哲学博士到南也门的出租汽车司机、苏丹的学生和本地出生的黑人无所不有。有些人是反对西方价值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大部分人则正在努力同时既成为一名穆斯林又成为一名美国人。

加利福尼亚奥林奇县伊斯兰协会会长兼伊马姆穆扎米勒·西迪基坚持说："伊斯兰教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

总的来说，今天在美国，只有当伊斯兰教与邪恶和惊人的行动——政变、战争和暗杀发生联系时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美国本身的事态发展常常起着加强人们把伊斯兰教看作一种暴力宗教的刻板看法的作用。

·一九七七年，一帮哈乃斐黑人穆斯林——一个极小的分裂出来的教派——袭击了华盛顿的三座大楼，杀死一人，扣留了数十名人质。

·一九八〇年，一位流亡美国的、著名的批评霍梅尼政权的伊朗人阿里·阿克巴·塔巴塔巴伊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他的家门口被人枪杀。

但是，美国的穆斯林说，这些事件是脱离常轨的。他们说，穆斯林在美国有着源远流长与和平的历史。他们指出，美国穆斯林帮助使许多中西部的工业居民定居下来。曾经有一度，穆斯林控制了纽约的饼干工业。他们还参加了一次为期很短的为美国军队筹集驮畜骆驼的尝试。

在十九世纪初，美国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有着极大的兴趣，认为是一种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宗教。霍华德大学苏莱曼·尼扬博士说："你可以从埃默森、索罗、梅尔维尔和所有这些重要的思想家身上发现这种兴趣。"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位驻菲律宾的美国外交官亚历山大·韦布信奉了伊斯兰，搬到纽约，试图在美国传播这种宗教。但是直到二十世纪初，随着来自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和东欧的穆斯林教徒来到这里，伊斯兰教才在美国扎下根。

许多伊斯兰教徒移居中西部，在那里当沿街叫卖的小贩，或是在该地区日益兴旺的工厂当工人。一九三四年在衣阿华州的塞达拉皮兹落成的清眞寺可能是美国第一所清眞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专业人员开始移居美国。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目前住在美国的穆斯林有二百万至三百万人。

圣劳伦斯大学教授阿里夫·加耶说，美国伊斯兰教徒中为数最多的是伊朗的什叶派穆斯林，其次是叙利亚的穆斯林，再则是土耳其的穆斯林。

在美国的穆斯林有百分之十五是外交官和留学生，其余的是美国公民或永久性居民。

伊斯兰教并不是美国的主要宗教势力。（比如，卫理公会教徒就有一千三百万。）但是，它在美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其原因一是放宽了移民限制，一是穆斯林的生育率相对来说比较高。阿里夫·加耶估计，美国的伊斯兰居民自一九六五年以来已增长了九倍。

他说："穆斯林可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种族集团。"

这种增长出现了性质上的某种差异。今天，在美国的穆斯林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觉悟与坚持自己的权利的意识。

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首次严肃认真地笃信宗教：每天祷告五次和学习古兰经。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针对他们所认为的国内非伊斯兰教政权奉行一种政治行动主义。

对许多第二代和第三代穆斯林来说，与美国社会融为一体意味着对他们的宗教保持一种思虑周详的态度。华盛顿伊斯兰教中心主任萨姆·哈穆德说："我们并不总是对外向人们表明我们的宗教信仰，但是我们极为坚定地付诸实践。"

（原载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师云志译　康敬贻校）

附：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和人口

国　家	人　口	其中什叶派人数
阿尔及利亚	19,590,000	
阿富汗	16,360,000	6,000,00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122,000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8,556,974	
阿曼	1,500,000	
埃及	45,000,000	
巴勒斯坦	4,500,000	
巴基斯坦	85,650,000	15,000,000
巴林	358,857	200,000
冈比亚	695,933	
吉布提	450,000	
几内亚	6,400,000	

几内亚比绍	793,000	
加蓬	1,230,000	
喀麦隆	8,826,000	
卡塔尔	250,000	
科摩罗	347,000	
科威特	1,464,000	300,000
黎巴嫩	3,160,000	800,000
利比亚	3,200,000	
马尔代夫	157,300	
马来西亚	13,[illegible]80,000	
马里	7,160,000	
毛里塔尼亚	1,680,000	
孟加拉	92,000,000	
摩洛哥	20,420,000	
尼日尔	5,687,000	
塞拉利昂	3,500,000	
塞内加尔	6,244,000	
沙特阿拉伯	9,000,000	300,000
布基纳法索	6,900,000	
苏丹	18,900,000	
索马里	5,000,000	
突尼斯	6,510,000	
土耳其	45,217,556	4,000,000(阿拉维派)
乌干达	12,630,000	
叙利亚	9,310,000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2,030,000	
伊拉克	13,500,000	7,000,000
伊朗	39,000,000	30,000,000
印度尼西亚	147,383,075	
约旦	3,250,000	
乍得	4,500,000	

注一： 除伊斯兰会议国家外，穆斯林人口多的国家还有印度、苏联、中国等，其中什叶派人数印度为17,000,000，苏联为4,500,000。

注二： 表中的国家和人口两项系根据《世界知识年鉴》一九八三年版；什叶派人数一栏系根据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一期。

（王秀纯、费解平）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穆斯林世界
作者=杨效农
页数=236
SS号=10153081
出版日期=